

高连奎 秦逸飞 著

# 中国大时局 Ⅱ

—— 未来二十年的大趋势与变革方略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 • BEIJING

## 内 容 简 介

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居于世界第一，如今中国又重新回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根据世界银行的算法，中国不仅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一，而且实体经济的总量已经是美国的2 ~ 5倍。没有了标杆的中国如何改革将是一个更难的问题。中国如何才能从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变成引领全球进步的世界第一“文明大国”？这是本书所思考的问题，也是中国未来二十年所面临的问题。

本书以世界大潮流为背景进行分析，梳理了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兴衰变迁，分析了世界五次大变革的潮流大势，解析了当下中国各个阶层的现状，指出了隐藏在中国改革背后的阻力和动力，展望了中国变革的目标，解答了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作者认为中国只有迎合世界级潮流大势，才能真正走到世界的前面，成为世界文明的领导者，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这不仅关系到当下中国的变革方向，也关系到未来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大时局. 2, 未来二十年的大趋势与变革方略/高连奎, 秦逸飞著.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121-24403-2

I. ①中… II. ①高… ②秦… III. ①发展战略—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2256号

**书 名：中国大时局Ⅱ——未来二十年的大趋势与变革方略**

**作 者：高连奎 秦逸飞**

策划编辑：张 昭

责任编辑：雷洪勤

印 刷：三河市双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市双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20 字数：360千字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5.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 88258888。

# 目 录 | Contents

## 上篇：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

### 第一章 西方的过时与中国时代的到来 / 003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对了 / 003

二、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 / 005

三、在西方世界中，繁荣与民主毫无关联 / 008

四、“美国梦”为何破裂？ / 011

五、东欧、冰岛与智利——那些走错路的国家的现状 / 016

六、中国一直是历史的主角 / 019

七、“重回第一”的中国怎么样？ / 024

### 第二章 中国继续改革的方向与动力 / 035

一、未来20年推动中国发展的五大引擎 / 035

二、中国应谨防“诱错”和“逼错”式改革 / 039

三、警惕右翼民粹势力正在对中国的危害 / 041

四、中国四类知识分子 / 047

## IV 中国 大时局

——未来二十年的大趋势与变革方略

五、当代中国应该“少谈些价值，多谈些模式” / 050

六、美国“进步时代”带给中国的启示 / 051

七、中国改革不分“左右”，只分“好坏” / 062

八、研究中国要用“大经济观” / 066

### 第三章 中国各财富阶层分析 / 069

一、中国阶层状况的新变化 / 069

二、产业资本阶层——开明资本阶层 / 073

三、高产阶层——隐形的利益集团 / 077

四、投机资本阶层——新崛起的控制性阶层 / 080

五、城市白领阶层——真正的社会底层 / 084

六、经济学家阶层——也是有阶级性的阶层 / 087

七、舆论阶层——舆论不代表民意 / 094

八、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 / 103

九、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现状 / 108

十、政府决策必须绕开精英阶层 / 111

十一、中国需要为中下层代言的有机知识分子 / 116

### 第四章 中国问题的现实根源——房子、票子的问题为何越来越大 / 119

一、中国长期通货膨胀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 119

二、通胀的误解与分析 / 123

三、“货币超发”鼓噪下的冷酷现实 / 127

四、大家都是通缩的受害者 / 130

五、通胀的根本原因 / 131

- 六、“通胀感”不同于通胀 / 137
- 七、房地产背后的三大“伪问题” / 140
- 八、房地产背后的五大“真问题” / 142
- 九、解决房地产问题的根本之策 / 144
- 十、中国有重蹈美国覆辙的危险 / 146
- 十一、美国是如何建设成“伟大社会”的？ / 150

## 下篇：世界大趋势与中国改革前景

### 第五章 中国梦：“富而自由”的国家 / 163

- 一、“大政府”与“小政府”孰优孰劣？ / 163
- 二、北欧为何成为“富而自由”的国家？ / 166
- 三、合作主义社会是怎么回事？ / 178
- 四、德国——欧洲的新盟主 / 186
- 五、德国制胜法宝之一：社会国宪政模式 / 188
- 六、德国制胜法宝之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 193
- 七、“居者有其屋”成就了新加坡模式 / 197
- 八、希腊从来不是高福利国家 / 205
- 九、对福利社会和大政府的八大谎言 / 210

### 第六章 从“世界模式1.0”到“世界模式3.0” / 217

- 一、“大同社会”和“理想国”并非真理想 / 217
- 二、世界模式从“1.0”到“2.0” / 218
- 三、为什么有社保的国家不会乱？ / 220

四、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 / 223

五、中国养老金根本问题在哪里? / 233

第七章 世界模式3.0: 社会福利型国家 / 237

一、英国是如何率先建立福利国家的? / 237

二、福利国家好在哪里? / 238

三、为什么有福利的国家不会腐败? / 243

四、福利社会的本质是什么? / 245

五、关于福利社会的七大谎言 / 247

六、现有的福利社会存在哪些缺陷? / 254

第八章 世界模式4.0: 社会投资型国家 / 259

一、什么是社会投资型国家 / 259

二、社会投资型国家的理论基础: 风险社会理论 / 264

三、社会投资型国家的效果 / 266

第九章 世界模式5.0: 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 / 269

一、低生存成本社会的诞生背景 / 269

二、人类的生存成本是如何提高的? / 272

三、低生存成本社会的理论 / 283

四、如何建立低生存成本社会 / 288

五、低生存成本社会的具体政策建议 / 292

六、建设低生存成本社会的样本 / 294

七、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应用案例 / 297

八、低生存成本社会有什么好处 / 302

九、低生存成本社会相对于福利社会的优势 / 305

十、为何称为新福利社会 / 308

# 上 篇

## 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



# 第一章

## 西方的过时与中国时代的到来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对了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曾提出用70年时间“三步走”，到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实现中国的战略目标。他最后的嘱托也是对国人的激励。邓小平所指的21世纪中叶这一时期，为什么将是很要紧的时期呢？因为这正是中国走向世界第一的时期。

从2005年开始，广东省GDP增量首次超过韩国。广东仅仅是中国的一个省，而韩国不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世界排名第15位的经济大国。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不仅可以省可敌国，而且一个省就可以抵得上一个强国。

其实中国一个省超过韩国也不算什么，再给中国七八年的时间，中国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可能将超越英国，那时候的震撼力才大呢！而现在“富可敌国”的省还有：山东的GDP已经超过了土耳其（第18位）；浙江的GDP则超过了瑞典（第21位）；河南的GDP则与挪威（第24位）不相上下。

在城市方面，中国的国际大都市也在不断发展，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现代化建设的前沿。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上海全市生产总值快速增长，2008年超过新加坡，2011年超过韩国首尔。

中国如此大的人群，用这么快的速度，维持了这么多年的增长，而且，这种增长的势头丝毫没有要停止的样子。在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中，中国几乎毫发无损地度过了几场大的地区和全球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和拉美金融危机、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和随后发生的美国公司丑闻以及阿根廷债务危机，当然还有就是2007年以来的全球金融海啸以及欧洲债务危机。这些危机，在让很多国家陷入深渊的同时，却似乎在让中国变得更加强大。这些并不是偶然的，因此“中国模式”提法的出现也是合理的。

近年中国最引以为豪的还有高铁，中国的高铁网络也经历了出人意料的高速发展，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之一。高铁不仅让中国内陆的经理们可以接触到更广大的市场，也促使外国投资人将眼光投向内陆，回避沿海业已增高的劳动力成本。

与中国的高铁规划相配的是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地铁建设规划。世界上超过一半的隧道挖掘机此刻正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地下。这意味着，大量人群可以轻松抵达高铁车站，毫无疑问，高铁已经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了中国。高铁让许多公司的经营方式发生改变，让中国工人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世界银行三名专家的一项研究表明，高铁网络已经连接起了中国100多个城市，生产力将大幅度提升。公司发现自己通过几个小时的车程能接触到潜在的客户群、雇员和竞争对手，生产力自然会开始提升。中国高铁开通5年来，每个月的客流量几乎是国内航班的两倍。最近几年，客流量以每年28%的速度增长。按这个速度，到2015年初，中国高铁网络的客流量将超过美国国内航班每个月

5400万的人次。

中国取得的成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如西方所言一无是处。与苏联不同，中国成功地创立了一种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这一制度与其他体系相比，在促进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方面无疑更为成功，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就。

如今数以万计的西方年轻人选择在北京、上海定居，数以万计的科技工程师来中国寻求工作机会，因为他们觉得可以在此感受到全新的世界和发展的潮流。而对于那些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的西方人而言，他们自认为已经把握了未来世界发展的真谛，并深知他们也正在参与创造的过程。在他们眼中，中国是社会经济变革和政治思想孕育的温床。

如果说今天的北京、上海已经部分超越了纽约，成为一个生机勃勃、富有活力的国际化大都市，那么这一切必须归功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当代中国以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在亲历史、创造历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哪怕只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邓小平的梦想或者是其所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正在逐步实现。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现在，姑且不说北京和上海，中国内地现代化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中国已今非昔比。在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稳步提升，人们对此十分认同。中国的汽车产业即使加班加点地生产也无法满足需求。而中国的共识也是明确的，在世界舞台上人们又重新看到了中央之国的身影。

## 二、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

不应该否认的是，中国一定做对了很多事情。其实中国的成功是有秘诀的，但这种秘诀从来不是秘密，而是一个常识，只看人们敢不敢承认而已。最

近世界著名战略学家，《增长的极限》一书的作者兰德斯在其新书《2052》中指出，在未来四十年中，中国最有可能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比起西方，中国更能担任世界拯救者的角色，首要原因就是更高效的体制和强大的政府。他说他在世界很多国家生活和工作过，可能比大多数年轻人以及只在一个文化中生活的人，见识过更多体制的优劣。兰德斯不过是充当了那个说出真相的小孩而已，中国的优势一直存在，只是很多人不敢正视而已。

而最近经济学家张五常也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为中国优势给出了解释，“自由经济学派坐井观天，我们不要误信自由经济学派之见，认为凡是政府主导的投资皆乏善足陈。其实政府投资可以比私人投资更有经济效率，因为在好些情况下，政府主导的交易费用较低。牵涉到征用或收购土地，又或者牵涉到地役权，私人往往难以处理。假设政府补偿地价或购买地役权的钱与私营地产商的差不多，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由政府主导可以节省很多时间。这就是中国的经验。”

确实，中国经验的优势就是政府主导下的低成本、高效率的发展，中国的这一优势绝不能放弃。这也正如习近平主席在APEC会议演讲中所警示的那样，“中国是一个大国，绝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 中国发展经验

然而中国的发展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不是自发的而是有目的的，不是无序的而是有规划的。

中国的发展是三种趋势的结合：一是自然发展趋势，二是宏观规划指导下的市场驱动，三是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引导。自然发展趋势是社会主体自发行为的结果，市场驱动是在国家规划指导下的企业自主投资、自主决策的过程。它受到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激励，激发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调动了

全社会的力量，加速了国家预期目标的实现。

国家发展战略引导是政府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公共力量，来影响实际的发展趋势，推动其加速发展，或者限制其发展趋势，它反映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在国际规划中，规划引导值的确定一方面要充分体现政治意愿的强烈程度，另一方面也要以政府对公共资源的汲取能力、动员能力和配置能力为基础。上述三重趋势也反映了中国特有的发展优势与制度优势。

从发展优势来看，中国具有后发优势、巨大规模效益优势，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具有较长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具有保持高速发展的惯性和趋势。

### 西方对中国的误解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具有历史性意义的1989年，这一年，柏林墙倒塌，这一事件对全球化的进程和未来的世界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主义在西方忽然崩溃，新自由主义以胜利者的姿态成为整个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模板。全世界都沉浸在新自由主义的狂欢中，几乎没有人预料到全球化意味着西方经济霸权的终结。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当这一事件引发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与调整重画地缘政治的版图，使其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时，我们再次回顾冷战结束这一事实，不难发现，西方所谓的“胜利”是得不偿失的。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取代了苏联成为众矢之的。然而就最近20年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而言，中国比西方的民主国家更好地把握了全球化的进程。自1989年以来，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而在西方民主扎根开花的东欧等国，贫困和文盲人口数量却不断上升。至于通过武力手段输出民主却导致其国内战乱丛生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更不用提了。

当民众推翻柏林墙时，他们并不是希望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主政权。实际上，民众所要求的是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就当时而言，“只有实行民主才能改善生活”这一观点十分普遍，然后事实最终证明，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

与西方世界相反的是，中国却在不断前进，每天都在进步。中国人所要求的“民主”实际上是经济平等，是对获得公平发展机会的渴求。这些正是在过去20年中绝大部分中国人获得的权利。

总之，中国把马克思主义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了起来，这种结合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成功的经济模式。

当今世界是高速发展的世界，其发展速度使那些沉浸于过去荣耀中的西方遗老遗少们显得无所适从。过去十年中，西方一直沉迷于当下，再一次感到身上所穿的只是“皇帝的新衣”。西方的宣传机器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本质和西方模式所遭遇的困境同样绝口不提。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如果不想被时代的车轮碾碎，就必须客观地观察世界，客观地看待中国。

### 三、在西方世界中，繁荣与民主毫无关联

西方的经济已经过时了，甚至西方的民主也显现僵化的迹象。西方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工资是如此微薄，难以负担基本的生活费用，他们成为“啃老族”。他们的父母是在婴儿潮中成长起来的黄金一代，不得不继续负担儿女的生活成本。

所谓民主政治的精英已经不再是民意的代表，早已变成了醉心于手中权力的特权阶级。过去，人们为了自由进行过无数的斗争，许多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现在自由已经变得苍白无力。

尽管西方的政治体系遭受了灾难性的危机，但是没人准备推翻现有的统治阶级，甚至没有人承认它是问题之一。西方民众都深知，在过去20年中，西方世界的生活标准在不断下降，但是并没有要求政府采取具体的政策，而是要求其发扬民众的信仰。纵观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带来财富的是自由贸易而不是普选产生的政府。美国的创立者本身就是自由贸易坚定的信仰者，扮演着大力宣扬自由市场和政府的“守夜人”角色。但是西方的宣传机器对冷战的阐述却误导我们相信民主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言：“民主是最糟糕的政体，但却是其他已经试验过的政体中最好的。”

根据心理学家的观点，逃避现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消费，跨国公司每天用无数广告对我们进行轰炸。这种做法无疑抓住了人们的要害，影响人群的集体行为。在此影响下，人们会不自觉地伸手从超市的货架上取下某种商品，而不是做出另外一种选择。

很多心理学家将消费主义视为困扰这个地球上最富有地区顽疾的主要原因。人们拼命地赚钱只为了满足自己畸形的消费欲望，而这反过来又成为压力的来源。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们陷入一个怪圈，我们拼命消费试图减轻日常生活的压力，而这一行为又成为持续不断的压力之一。那解决之道何在呢？那就是百忧解（Prozac）。

自1988年伊莱·莉莉发明百忧解以来，已经有4000多万人依靠其对抗抑郁症的困扰，结果却不甚乐观。赫尔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欧文·基尔希（Irving Kirsch）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同僚曾于2008年在《公共科学图书馆杂志》（Journal of the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该研究表明，与服用安慰剂的人群相比，服用百忧解群组的状况并没有特别改善。不仅百忧解如此，帕罗西汀（Paxil）和郁乐复（Zoloft）的效果也不明显。靠药物解决困扰西方人的顽疾并不现实，唯一的可行之道应该是改变生活方式。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西方发达国家抑郁症患者的数量逐年上升，并且增长率与个人债务的增长率相同。在西方意义中的富有地区和民主国家，抑郁者与债务违约者成倍增加。正如金融危机一样，这两种现象最先发源于美国这一世界上最富有、也号称是最民主的国家，然后衍生到世界其他金融市场。

身陷经济危机之中使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加节制的消费并不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动力，相反，却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我们生活在一个自己建构的海市蜃楼中，银行消费的信用额度被自己当成了切实的财富。“我能借多少，我就值多少”这一在喧嚣的20世纪90年代响彻美国所有商学院的咒语最终成为全球化的赞歌。我们的行为准则是十分荒唐的，对财政风险的评估成为空谈。然而，西方政府现在劝说民众像危机发生之前一样大肆消费。消费是西方经济的命脉所在，一旦消费停止，经济就无法继续。这也是政府向民众传达的信息主旨。也就是说，消费这一将西方国家推向无底深渊的罪魁祸首却是能将其拖出泥潭的救世主，你相信吗？难道这就是当代经济的自相矛盾之处？到目前为止，事实似乎真的如此。

然而，经济学与心理学存在明显的差别。心理学的目的是寻求心理疾病的治疗和预防之法，探寻病因。当心理学在荣格的推动下摆脱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桎梏之时，经济学理论却止步不前。经济学家们仍生活在亚当·斯密（经典经济学理论之父）的羽翼下。但是亚当·斯密所创立的理论模型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事实上，两者毫无关联。在过去的20年中，没有人真正潜心研究经济学理论，也没有人试图进行理论创新，甚至没有人对现有的体制提出质疑。答案就在于新自由主义貌似赢得了冷战，每个人都认为它是一劳永逸的。然而，就在此时，根据福山的理论，经济学理论来到了历史的终结点。

现在很少有人相信个人的逐利行为会自然导致国家财富的聚集。我们很难



发现金融高管们所获得的数十亿美元的红利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到底有什么关系。过去20年，美联储采取的通货紧缩政策实际上就是金融领域的百忧解，通过对病症的抑制使西方忽视了真正的危机。依靠药物或者不切实际的方法治疗抑郁症或者处理经济问题只是饮鸩止渴，治标不治本。现在，当自欺欺人的药物和方法不起作用时，危机就爆发了。

就此而言，当今世界已经不再是某一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可以一手遮天的时代了。凯恩斯以鲜活、富有建设性的话语创立的宏观经济学曾经统治了世界，但是其在剑桥大学时同马克思主义者的交流却是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成文的基础。

#### 四、“美国梦”为何破裂？

---

在中国日益繁荣的时候，美国这个所谓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正在成为一个低工资经济体，现在既没有现金，也没有希望和就业岗位，美国梦似乎已经成为过眼云烟。美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进步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其实“美国梦”一直是很多外国人移民美国所追逐的愿景：只要你遵守规则，勤奋工作，不论来自何方，不管你来自社会哪个阶层，你最终都可以获得成功。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也曾这样解释“美国梦”：“任何人，不管他出身如何，也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更不管他有何种得天独厚的机遇……他有权生存，有权工作，有权活出自我，有权依自身先天和后天条件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用中国人今天“中国梦”的话语就是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还有人这样描述美国梦，美国梦就是有一所自己的房子，四周围着白色的栅栏，院子里养条狗，一家人其乐融融。这就是美国梦的典型。但现在的情况

跟以前不一样了。相比现在这一代人，他们父母那代人实现理想要容易得多。

现在美国梦的标志，正在成为负担——贷款买房的代价太高；有两辆车的话，债务就更高了；再加上孩子上大学。这些贷款的成本，正在让越来越多美国人的情绪变得矛盾起来。他们不确定，上大学到底值不值。

### 美国调查结果显示：

——维持生计已经越来越难了。近三分之二的人对于维持家庭基本开销表示担忧，而四年前这个比例只有不到一半。

——在职场上，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在原地踏步。一半以上的人怀疑自己在今后5年能不能涨薪或者找到收入更好的工作。事实上，58%的人说自己的劳动和收入不成正比。

——对失业的恐惧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之最。每10人中有超过6人担心自己会因为经济形势而失业。如今的担忧甚至超过了1975年，那年正值高失业和高通胀导致的严重衰退的尾声。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认为今后几年自己的经济阶层会上升。更多的人认为自己只会原地不动——或者下降一个档次。

——在费力挣钱的同时，大多数人开始质疑美国梦的基本准则——下一代人的生活水平会更高。有54%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比父母一辈好，而只有39%的人相信子女一辈的生活会比自己好。

从远处看美国梦，可能还如梦若幻。从道义来说，美国人作为民族已经老化了，这个民族已经失去了对拥有平等机会的信仰。无业者的孩子将是没有职业的人，工人的孩子还将成为工人、或者是无业者。教士的孩子从低年级开始就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农场主和小商亭老板的子女已不想到军队服役。这些人曾坚信，在平等机会的美国，他们在护卫着自己幸福生活的权利。然而，现在在军中服役的人是一些无业者，他们在为金钱和退休金而战。

少数富裕阶层和其他美国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有种20世纪20年代末大萧条时期的感觉。而且，那些经理人们也在为自己开出难成体统的高工资，哪怕是这些公司在承受着亏损状态。

“美国梦”中的另一种理念是每一代人都要比上一代更为富有。但是，这种想法似乎也成了过眼烟云。要知道，目前的美国年轻人完全有可能比自己的父母生活得更惨。传统意义上的全民就业也许永远成为过去时了。而且，1/4的劳动者们不知道什么叫带薪休假。

曾经，可使财富不断增长的钥匙被认为是接受教育。是的，美国大学依旧是全世界嫉妒的对象。然而，现在的美国大学生因接受教育而欠银行巨额债务，其总额要比国内所有贷款卡的债务还要多。与此相反，可以让毕业生归还贷学金的体面工作岗位正变得越来越少。

另一份名叫《美国梦》的期刊更是不无酸楚地写道：“贪婪和债务活生生地蚕食着经济。政府、集团和个人债务总额已经达到GDP的360%。我们将数百万计中产阶级的工作岗位转到了国外，我们数十年超资生活，给世界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债务肥皂泡。”

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指出，2009—2012年间，美国获得的经济利益中有95%集中在占全国人口1%的最富裕人群手中。他的结论是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最大的发达国家。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的经济报告，“大萧条”结束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收益都集中到全国最富裕阶层手中。而最近的一次经济危机在2009年结束以来，占人口5%的最富裕人群已经收回了损失，且2012年的收入已经与危机前持平。而占人口80%的底层民众的收入却比危机爆发前更低。此外，36年前的官方统计将11.6%的美国人定义为穷人，时至今日，以相同的方式统计出来的

这一数字保守估计在15%左右，每5名儿童中就有一名生活在贫困中。

这场经济危机是美国史上最大的丑闻，其中充斥着谎言、骗局和非法操作。没有一个参与制造了这场危机、摧毁了800万个工作岗位、导致数百万人无家可归、使贫困不断蔓延的官员和银行家承担任何责任。恰恰相反，他们面带笑容地享受着他们的“丰功伟绩”，还理直气壮地问：“谁说这个体制不行？”

施蒂格利茨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指出：“这样的贫富差距并非不可避免，这不是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结果。这是我们通过政策制造出来的。”此外，日益有更多的基础需求无法被满足。原因在于，支撑“明天会更好”这一信念的，是人们相信，只要能够保证机会平等，贫富差距是可以容忍的。但这些年来，这两者都在向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人们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进步的机会却越来越少。

从2007—2010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足足丧失了一代人的财富，他们的经济状况与1992年时相当。与此同时，2010年，中产阶级男性的实际收入，只相当于1964年的水平。美国工人的生产力仍在不断提高，美国企业仍在不断盈利。去年，企业盈利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达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问题在于，这些利润没有返还给美国人。

报道称，美国这个所谓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正在成为一个低工资经济体，它的社会阶层的结构比其他国家更苛刻，它的中产阶级正在贫穷与不稳定之间摇摆。缺乏有效合理的工资薪酬体系，作为“美国梦”基石的职业伦理，是无法发挥作用的。

拥有一所房子长久以来一直是美国梦的主要内容，而现在，房子的光环正在褪色，因为超过四分之一的房屋主人所背的房贷比房子本身价值还高。25年前，有80%的人认为拥有一所房子是美国梦的基础，而现在有这种想法的人刚过一半。虽然教育仍被认为是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对大学文凭的追求却失去

了30年来的吸引力。只有刚过一半的人认为上大学是美国梦的重要部分，而在1986年，这个比例是68%。

随着工资增长停滞和财富减少，生活成本暴涨。在过去10年里，家庭医疗保险成本增长了90%。过去5年里，除去通胀因素，公立大学的学费增长了27%，私立大学的学费增长了13%。一个向来以思想超前为荣的国家，正在放任自己退步。

“21世纪对美国的期待是，崇尚公平、尊严和平等这些基本原则。这也是美国所发出的人道主义宣言。美国，是唯一一个将不同人等聚拢在机会周围的国家，以使其获得幸福和实现自己的梦想。这种理想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结合，是非常强悍的体系，这种体系正在运转。”

当然，在美国的乐观主义者还是存在的。比如《时代》杂志。这份期刊曾这样向读者解释道：“我们越来越不像美国人，而越来越像持社会主义观点的欧洲人。但不管怎样，在美国，相信成就是人对局势掌控结果的人越来越少。美国变成了崇尚真正个人主义的孤独的民族。”

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的政客、政府、富人、大公司，他们通过权钱交易动摇了“美国梦”的基础，使得普通美国人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美国的政府替富人减税，用的理由是富人和他们的大公司能给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但这种局面基本没有出现。富人和大公司不热心把利润汇回美国国内，而是更多地把钱财转移到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卢森堡、瑞士等逃税天堂；富人与政客勾结，左右了智库报告和媒体宣传，使政府大幅度地放松管制，结果在短短的20来年内，“美国中产阶级所享有的工资、福利和其他许多经济利益都被侵蚀”。

这也印证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施蒂格利茨2013年2月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所说：“一项又一项的研究揭示，‘美国是机会之地’的说法只是个神话。美国自称‘机会之地’或者至少机会比其他地区多，这在100

年前也许是恰当的。但是，至少近20多年来的情况不是这样。”

而最令美国人失望的还是美国的民主制度，美国的民主制度早已被各种充分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利益集团所绑架。所谓的“三权分立”也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之外，强大的资本力量左右了美国的各种制度安排。一个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应该确保能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这三股力量之间失衡，资本力量独大，这就是“美国梦”被“出卖”的主要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今天进行的政治探索意义非凡，中国人的眼光早已超越了美国模式，我们探索的是下一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这也是“中国梦”应该比“美国梦”更为精彩的前提所在。

## 五、东欧、冰岛与智利——那些走错路的国家的现状

不仅美国梦在美国破裂，在全世界追寻美国梦的基本上都没有好结果。曾经一些耐不住寂寞的国家也推翻了他们的制度，推翻了他们的政府，加入到追寻美国梦的大军当中，墙倒塌之后他们开始了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探索之旅。但是结果却截然不同，虽然他们采用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模式，但是并没给本国人民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生活。相反，这些措施使各国变成了西方经济的附庸。我们不妨关注以下实例：2009年，南斯拉夫等国陷入了信用危机，面临破产；匈牙利国内对共产主义的怀念持续增长；西方各国对东欧移民的敌视和种族主义倾向不断升温。

与东欧一起行动的还有冰岛，面对1989年巨大的政治变化，冰岛坚定地选择了新自由主义道路，奉其为圭臬，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对冲基金。冷战结束之后，冰岛成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室。在随后的20年中，报纸和

杂志上长篇累牍地宣扬冰岛所谓的经济奇迹，他们将冰岛的银行同华尔街的商业巨头相提并论。就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2005年，联合国将冰岛列为全球人均收入第二高的国家。冰岛举国为之欢欣鼓舞，当时冰岛把自己的新自由主义实验视为全球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模板。这就是经济危机发生之前政客和媒体每天吹嘘的奇迹。

而金融危机后，在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你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到处都挂着出售的牌子，有工作的人屈指可数。冰岛的人均负债额是如此之高，冰岛人对这个数字几乎都麻木了。整个国家都破产了，一夜之间跌落到贫困的谷底，时尚店里空无一人。在经济状况良好时每夜宾客盈门、莺歌燕舞的酒吧现在也是门可罗雀，报纸和政客口中都是对冰岛的同情之声。冰岛人只能向世界银行贷款购买捕鱼业所必需的石油及储存牛奶的容器，然后用所存的牛奶制成北欧人最喜欢的黄油进行出口。冰岛的经济再次变成了以农业和渔业为主，而这些产业正是新自由主义所不屑的。

与中国道路相反的还有智利，1956年，智利的天主教大学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根据此协议，智利在随后的20年中每年都向该校派遣学生进行交流，接受芝加哥大学老师的指导。到20世纪50年代末，已经有20名智利学生到芝加哥大学开展交流。当时，此举具有革命性影响，因为他们的导师正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

在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的采访时，弗里德曼曾对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思想进行了精彩的总结：“芝加哥学派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政府在市场中的守夜人的作用，强调自由市场在经济中的统治作用。”

在这些学生学成之后，他们表现出强烈的热忱，试图将他们所学习的知识贡献给自己的祖国。他们每周二都举行集会，对其计划进行商讨。他们的最终目的在于对智利的经济进行改革，很快他们被称为“芝加哥男孩”。

这些“芝加哥男孩”所推崇的政策与智利当时“左派”的总统阿连德大相径庭，他们对总统所推行的对市场的干预与计划嗤之以鼻，他们反对价格管控，认为那是老掉牙之举。但是当时的智利政府认为价格管控是防止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必要措施。因此，在政府的支持者与这些经济学家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直至1973年9月11日政变发生。

皮诺切特上台之后，一群与其关系密切的商人将这些经济学家推上了政治舞台。最初，军政府对此持反对态度。曾于1974—1982年任智利财政部部长的塞尔吉奥·卡斯特罗表示：“最初军政府的领导人倾向于计划经济，即经济必须遵守特定的规则。”但是当时金融业商会会长哈维尔·比亚尔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同军政府进行协商，并在“芝加哥男孩”的帮助下邀请弗里德曼来智利进行了一系列演讲。第一站就选择了位于圣地亚哥的智利天主教大学。

弗里德曼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通货膨胀的。1973—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通货膨胀蔓延至全球各地。此外，弗里德曼还提出了一系列设想和建议，试图将智利变成第一个新自由主义国家。当时，皮诺切特私人接见了，弗里德曼因此也获得了一个当面向其介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良机。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就像狗尾巴。如果你一段一段地切下来，狗就会血流不止，最终死亡。但是如果你一下就把尾巴切下来，狗反而能活。必须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决通货膨胀。”皮诺切特最终被弗里德曼说服，接受了他的观点。

数月之后，从芝加哥大学留学归来的经济学家掌握了国家经济的命脉，开始制定政策，解决国家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将弗里德曼的理论付诸实践：500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进口关税被取消，政府预算被大幅削减，市场被给予了无限的自由。正如弗里德曼希望的那样，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成为第一个以其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的国家。

当军政府扫清了一切障碍之后，智利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拉丁美



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但是，新自由主义本身存在致命的缺陷，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不久之后注定会显现出来。最终为此付出代价的却是智利人民，生活成本大幅攀升，失业率高达30%，贫富差距巨大，至今仍难以弥合。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芝加哥男孩”试验的成功并非是政策灵验，而是建立在对国际经济发展的准确预判，搭上了几年之后国际市场发展的顺风车。

在苏联解体之后，已经大伤元气的西方左翼势力和政党，因为中国再一次受到了打击。它们索性断绝了同共产主义的一切联系，在西方媒体的种种报道中，中国人成为共产主义极权的牺牲者，在媒体的作用下，西方人对“东方兄弟”感到了无比同情，对一党专政的共产主义政权无比厌恶。而此种判断仅仅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极少的事实而得出的，这一观点成为过去20多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的看法，至少是西方的政客和媒体试图维持的看法。

## 六、中国一直是历史的主角

---

其实中国的优秀并非第一次，在过去近两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不单是地球上人口众多、农业经济发达的泱泱大国，而且在技术以及组织能力方面堪称拥有最进步的文明。只不过近代才落后了。

中国最强盛的时代，皇帝的光芒曾经普照着整个亚洲：从亚洲东北部经日本到朝鲜，再经东南亚到南印度诸岛、波斯湾以及东非海岸，所到之处国家及其贸易城市都臣服于这个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大明皇帝，至少从表面上是如此。一个由中国主宰的、环绕着亚洲的贸易世界就这样形成了，它覆盖了北起日本海和东海，南到南海和印度洋的整个地区。

臣服于这位至高无上的皇帝，并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中国文化，这在当时是与中国通商的一道门槛，对此许多外国统治者都乐此不疲，因为他们不仅可获

得贸易的特许，而且可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对付国内暴乱方面获得某种保护，从而巩固了自己管辖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在大明皇帝那儒家道德力量不能自然普照到的地方，郑和就借助于自己的舰队，去说服那些地方的当权者，让他们认识到臣服于大明皇帝的好处。当然，在当时，中国人也只是满足于“顺我者善待之，逆我者撤换之”，而不是自己去统治这个地区。

中国皇帝的贸易王国不同于百年后欧洲人在世界上所推行的那种殖民地式的统治。对这些外国人，中国人既不奴役他们，也不驱逐和灭绝他们。他们的做法既不同于16世纪墨西哥、南美的西班牙征服者对土著印第安人的做法，也不同于英国移民在北美对待印第安人的方式。中国人不在海外建立那种要自己去统领的殖民地，而是满足于他们对至高无上的中国皇权的形式上的认可，并按照中国人的规则与中国通商。如果不考虑道德问题的话，那么与欧洲殖民地统治者所建立的贸易体系相比，中国这种以宗主国身份所制定的规则及其贸易体系还是比较合理与经济的。而欧洲人真正意识到这一点，那已是在大约450年后，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之后。

在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的440年间，在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及其后来的汉朝统治下的中国是与罗马帝国遥遥相对的另外一个泱泱大国。就其人口、面积、交通网络的长度而言，两个帝国彼此相当。罗马帝国作为环绕地中海诸城市及诸国的一种联邦，当时已具有相当高的城市文明。罗马帝国的圆形露天剧院（如罗马的大型斗兽场）、浴场、大型会议厅等的壮观，标志着它在公用建筑方面超越了汉代。两个帝国彼此相似的仅有皇宫，可中国皇帝那时的陵墓却是罗马大帝无法比拟的。另一方面，汉朝在农业技术以及冶炼技术方面是相当先进的，影响到整个的生产经济。当时两个帝国之间没有直接的交往，完全是两个分离着的世界。罗马通过中间商用黄金从中国进口丝绸，故此早在一世纪时罗马帝国元老们就抱怨说，罗马所有的金子都流向了亚洲。

唐代是一个惊人的爆破性发展的时代。大唐皇帝把自己的王土向东北扩展到满洲、朝鲜，向南占领了安纳姆（今越南北部地区）。最重要的扩张当属向西北的推进。经过戈壁、穿过草原、越过无数高达5000米的风雪连天的山口，大唐皇帝的军队暴风般地冲过中亚走廊，经过介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沙漠，在遥远的中亚地区建立了军事武装保护国。

重新开通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使中国贯通了与西亚、地中海周围的阿拉伯地区以及南部的印度等国家与地区的联系。唐朝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所在处）成为世界活动的中心。在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中，住有土耳其人、维吾尔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克什米尔人、印度人、僧伽罗人、藏族人、鲜族人。巴格达也像拜占庭一样给这里派驻了使臣。仅在城墙围起来的长安都市里，就居住了数万名外国商人和使者。除长安城外，在唐王国土上还有其他的大型城市，在那里分布有许多颇具规模的外国人居住区。像佛教、穆斯林、摩尼教、东正教、犹太教、基督教等都有自己的教团，都在传教、发展信徒。唐朝成了一个世界文化的中心。佛教徒用石雕、铜铸塑像以及巨幅壁画来装饰他们的寺院。也正是这个时代，纯粹的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建筑、绘画、音乐等艺术的黄金时代，尤其是抒情诗歌空前繁荣。18世纪初叶所整理的唐诗集，收集了2300余名诗人的4.9万余首诗歌。唐朝文化之光越过国界，朝鲜、日本以及越南诸国在此时期学习并接受了中国文化。

唐朝当时属于一个完全开放的世界，它的开放程度对这个地理位置上封闭的国度来说，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直到1912年皇室时代的终结为止，也是后无来者的。大约公元8世纪时，出现了排外情绪。在公元842—845年间，4600所佛教寺院被废除，所有外国宗教被禁止。自此，佛教与政治和经济分离，尽管它作为一种宗教很快又复兴起来，但是也只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宗教信仰而存在。公元906年，唐朝政权被推翻，唐代的光辉与佛教的光辉同时熄灭。

宋代的朝廷统治的是一个比较小的王国，而且是一个仅仅关注王国境内事宜的朝代。反思传统文明使得儒教文化也就是使纯正的中国创造达到了一个辉煌的登峰造极的高度。新儒教运动把儒家的道德学说发展成为包罗万象的哲学，并在其中确定了人的位置。从而，这种以仁、理为主的哲学成了中国社会精英们的信仰和精神支柱。由此到19世纪末，在这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它不仅社会精英们人生和思想的准则，而且是维系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纽带。但是在明代，当那个在唐代那么开放的中国社会逐渐变成一个封闭、因循守旧的社会时，儒家学说也变成了僵化的教条。在宋代，儒教的复兴却是一场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发展运动。如同哲学方面一样，在艺术领域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富有魅力的、淡色的青瓷，和以山水、田园为主的水墨画当属宋代最美、最崇高的艺术作品，在其中，人被作为微不足道的成分自然地表现出来。

宋代的皇帝都是经过严格培养的儒家子弟，身边大臣都是那些精明能干、忠心耿耿的儒家出身的官员。这些管理着国家的官员们，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这种考试很快就成为社会上流的主题。儒家教育的发展对于印刷业自然产生了一股巨大的推动力。宋代第一个把唐代的这个发明付之于大规模的使用。大宋朝廷把传统儒家的典籍整理为130卷，于公元953年交付印刷并且由国家发行。私人印刷业则出版了大量的年历、诗歌集、佛教经卷以及其他的许多书籍经典，其中不乏以百万册付印的书籍。一个规模巨大的印刷业由此诞生。就当时书籍印刷在社会的精神和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言，宋代当属世界第一。

在技术认知以及使用方面，宋代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1620年，英国哲学家和王室重臣弗朗西斯·培根出版了其划时代的著作《新工具论》。在书中，他对欧洲人进行自然研究的过程进行了科学分析。他指出：“观察发明的结果、影响以及其动力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在此方面，没有什么能比那在古代鲜为人知的三大发明更说明问题。这三大发明就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它

们改变了世界的历史：第一项发明是在文字交流方面，第二项发明是在进行战争方面，而第三项则是在辨别方位方面。随着它们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发展。就对人类的巨大影响力而言，没有哪一个王国、哪一个宗教或者哲学能够与这三大发明相比。”中国文明在宋代达到了最高点。其后的历代王朝还没有哪一个在精神和物质的丰富程度上超过它。经济和技术已具备了发展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也许只有700年后欧洲工业革命才可以超越它。那时宋代已经是商业化和货币交换式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已经为机械生产与全球航海提供了必要条件。许多现代历史学家会问，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就没有看到这些？为什么没有打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道路？

### 轴心时代的觉醒

中国文化的基础确立于公元前1000年初期，即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那是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卡尔·亚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时代”。那时中国的“百家”争鸣使得中国思想的基本方向得到了发展；在印度，奥义书的作者们对整个世界苦思冥想，并求助于佛祖；在波斯，查拉图士特拉设想了那副善恶相争的挑战性世界图景；在以色列，出现了犹太教的先知们；在希腊出现了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谱写的诗歌；修昔底德撰写的历史；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人把自己由盲从以及神话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进而追求逻辑思维世界。之后又进一步，黑格尔式地去表述那“潜在的、忘我的普遍意志”。就这样，人开始了反诘和怀疑。人想自己去辨别，“何者为好？何者为坏？”伟大的觉醒开始了，但是无人知晓，它将把人类引向何处。

这觉醒绝非所有人的觉醒。在“群众”与少数精神精英之间，也就是与那些智力最高的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很宽的断裂带。而且这种觉醒也并非整个人类的觉醒，充其量只是人类内部的一种觉醒。

世界有三个区域处于大发展中：所有三个均位于欧亚大陆。它们当年创造了这样的基础，今日世界这三大文化圈正是在此基础上经过大约2500年的发展才逐渐形成的：中国文化圈；佛教和印度教文化圈；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教文化圈。而第三个文化圈内产生了三个姐妹文化：欧洲文化、拜占庭和俄罗斯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青铜器时代那种统一的文化被熔化了，新的轴心时代文化吞食了当年那些诞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以及黄河流域的高级文明，使它们仅仅作为历史保留在记忆中。唯有中国人在继续前进，他们把神话时期看作自己过去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形成了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持续不断的文化的意识，一个使自己从整体中得到确认的、自豪的意识。所有在这个轴心时代的转折时刻没有保持住自己位置的民族，仅作为“自然民族”得以延续下来，即他们的生活进入了一个类似于自然的没有变化的轮回圈中。直到进入了我们的时代，这些早在2500年前就诞生了的文化才开始随着外部世界的变化而发展，也使保留不多的“自然民族”融入其中。

## 七、“重回第一”的中国怎么样？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只有中国的公知们不敢相信，其实在世界的战略家们眼里，这从来就不是什么悬念，而中国的百姓们更是从始至终就没有丧失过这样的自信。

2009年，大前研一在他的演讲和文章中多次讲过：“25年后，中国经济规模将是日本的10倍”，日本要重新适应“日本国力只有中国10%的状况”，日本要有准确衡量邻国中国的“规模感”。从过去2000年的历史看，日本国力的规模一直是中国的10%，从明治维新以后才发生变化，现在只不过是回归到以前的比例关系。日本必须接受“日本比中国小”这个现实，要做“小而强”的国家。庞大的中国市场是日本的巨大商机。日本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拥抱中

国。例如高速公路的建设，日本的高速公路全长大约9000千米，而中国一年就要建设8000千米。大前研一最近十几年频繁来往于日本和中国之间，现在每年定期到中国8次。他说，现在研究世界不能不研究中国。

美国人对于中国走向“世界第一”高度敏感，在20年前就有预见。1987年美国人保罗·肯尼迪对世界政治格局有三大预言：一是在最近的将来，没有任何国家可加入由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组成的“五头政治”中去（基辛格则认为，很可能再加上印度，构成“六头政治”），这些国家将是最后的大国；二是世界生产力量的平衡在某些方面已经从苏联和美国及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向有利于日本和中国的方向倾斜，虽然中国还落后于日本，但是它发展得最快；三是中国经历了长期的艰苦奋斗，它的现任领导人看来正在实现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的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

布热津斯基在十几年前预言说：“二十多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其实力大致与美国和欧洲持平。”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为白宫做出的“2020年计划”中称：“中国的崛起会像19世纪德国的到来、20世纪美国的显现一样不可避免。”

### 高盛预计，到2050年，中国的总产值将是美国的两倍

美国《世界政策杂志》季刊2008年秋季号文章“中国的崛起”中讲道：“到2033年，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中国可能会毫无疑问地居于首位，美国则位居其次。”“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能够开始思考这种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转折意味着什么，并且思考应对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的出现，我们将听到更多的‘北京方案’，而不是‘华盛顿共识’。”

《当中国君临天下：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终结》一书轰动西方。作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对美国而言，逐渐成为并非独一无二的大国，将是一

个痛苦的过程。美国必须学会正视、适应自己的相对衰落……美国最坏的选择是试图抵制、遏制中国，那将使世界重新陷于冷战泥潭，新冷战只能加速美国地位的下滑。对整个西方世界而言，中国的崛起将加深西方世界的普遍失落情绪。西方正进入漫长痛苦的自我调适阶段……我愿意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领导力量鼓掌。中国崛起，改变的不只是世界经济格局，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国崛起预示着一个新时代来临……到21世纪后半期，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国际体系将发生重大改变。北京将成为世界之都。上海也将取代纽约成为国际金融经济中心。”

英国《卫报》专栏作家断言：“中国的转变使世界的重心东移，21世纪将完全不同于前两个世纪，权力不再掌握在欧美手中。”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教授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分析认为，中国可能在2015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2008年5月，英国智库“欧洲改革中心”发表报告指出，世界权力中心东移。到2020年，美国、欧洲、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不相上下，各自的GDP将占全球总量的20%。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名为“2008年世界展望”的报告中指出，2008年是全球政治、经济“脱美入中”的第一年，即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转变为“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元年。

### 中国走向世界第一，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结果，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在生产力总量上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第一次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优势的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由于创造了“世界第



一”的奇迹，也将成为世界第一模式而大放异彩。在近代世界，创造和占有财富最多的国家，一直是西方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崛起，呈现出赶超美国的强劲势头。但是即使是处在巅峰时期的苏联，也仅占有美国生产总值60%的经济力量。在美国称霸之前的100年中，欧洲列强曾经轮流坐庄。在西方国家领先世界财富总量两个世纪后，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在经济规模上，西方正在逐渐被发展中国家赶超。到2030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2050年，世界三大经济体的排序将是中国、美国、印度。西方老牌大国将甘拜下风。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赋予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文明的比较”以新的意义，说明不仅西方文明能够给世界带来福音，东方文化也能够引领世界，而且东方文化具有更大的魅力、更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世界近代历史上，主要是英语民族领跑世界，而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将开启汉语民族领跑世界的新阶段。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将打破西方的“人种歧视”。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说道：“用亚洲人和欧洲人比，从前以为世界上有聪明才智的只有白人，无论什么事都被白人垄断。”“到了近来忽然兴起一个日本，由此便可知，白人所能做的事，日本人也可以做。世界上的人种虽然有颜色不同，但是讲到聪明才智，便不能说有什么分别。”日本虽然是发达国家，但从来没有成为“世界第一”国家。迄今为止，近代的“世界第一”国家，都是由白种人建立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说明黄种人也是世界的优秀种族，并不是白种人独优。白种人能做的事，黄种人也能做，而且会做得更好。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将改变西方长期形成的地缘优越感。近代“世界第一”国家，都产生在欧美地区。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洲，亚洲理所应当出一个“世界第一”国家。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是亚洲的光荣。

可见，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是在进行一个伟大的事业。它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文化意义，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政治资源、道义资源。其世界意义也必将转化为每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可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第一，匹夫有利。”

### 大国崛起，必有“大志”：“志向”准备

葡萄牙在“大国崛起”的时候，只有100万人口，中国现在一个“大县”的人口都要比它多。今天的葡萄牙依然是一个欧洲小国，国土面积九万两千多平方千米，人口刚过1000万。但是环顾当今世界，除了大洋洲之外，地球上的各个大陆都有以葡萄牙语为第一语言或者第二语言的国家或者地区。葡萄牙帝国曾经像巨人一样站立在地球上，横跨140个经度，纵贯70个纬度，印度洋、阿拉伯海、南海一带几乎成为葡萄牙的“内海”。当时的葡萄牙诗人骄傲地宣称：“我就是葡萄牙，我比整个世界都大！”正是这种“我比整个世界都大”的气概，使葡萄牙成为近代国际舞台上第一个“世界第一”。

“小国创大业”的荷兰人有一幅画：《阿姆斯特丹女神》。在这幅画中，阿姆斯特丹女神的手放在地球仪的上面。它预示着小国荷兰把世界装在自己的心中，玩地球于自己的股掌之中。荷兰作为大国崛起的时候，全国人口只有大约170万，却在17世纪的世界舞台独领风骚，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

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

戴高乐的名言是：“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他认为法国的特点就是伟大，法国的性格就是伟大，法国的目标就是伟大。伟大，是法国的“国家信仰”和“国家志向”。

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一直是在“世界楷模”、“领袖国家”、“美国世纪”的呼声中前进的。

竞争是人类的天性，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是国家的天性。而竞争最需要的是自信，自信才能够自强。实力最强的国家要有自信，而实力不足的国家，更需要自信。实际上那些崛起的大国，它们在崛起的时候，没有一个比中国大，在国土面积、人口、财富方面都无法与中国相比。在近代世界崛起的国家中，绝大多数是属于小国崛起，有的是从国土不足10万平方千米、国民只有百万的微型小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大国。

如果说，20世纪是一个战争与对抗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就是一个竞争与淘汰的世纪。新世纪的国际舞台群雄逐鹿。美国人说，21世纪仍然是美国世纪。而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宣称：“21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在21世纪的世界赛场上，具有夺冠之志的国家岂止一二！21世纪的中国，如果不能成为世界第一，不能成为头号强国，就必然是一个落伍的国家，是一个被淘汰的国家。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战略机遇厚待有战略准备的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发展和崛起的过程中，会幸遇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在这一时期所能得到的收获，取决于该国战略准备的质量和程度。

中国的实践证明，战略机遇的价值，取决于战略准备的质量。中国现在所处时期不仅是一般大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而且是摘取世界第一的“战略冲刺期”，必须做出更充分的战略准备，具备优质的战略创新、战略设计和战略指导。

### 头号强国，本来就是中国的历史

但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优良传统一度被丢失。丢失的原因，是中国人“集体睡着了”。正如孙中山于1924年所说，中国国家地位在近代世界“一落千

丈”，“此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从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着觉；现在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唤醒起来”。觉醒的中国巨龙，要再立中国第一的志向，再做中国第一的贡献，再尽中国第一的责任，再圆中国第一的梦想。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约瑟夫·奈说：“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欧洲，国家与国家之间有竞争，这的确使它们不断自我发展。在亚洲，中国的地位是主导性的，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与之竞争，而且它在对待北方国家入侵的问题上只是从内部解决，因此没有对外扩张领土的动力。”

国家间竞争的目标可以分为最低目标和最高目标。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国家是“以自我保存为最低目标，以争夺世界主导权为最高目标的相同行为体”。国家间竞争的最低目标，是国家自身的生存。国家间竞争的最高目标，是成为世界的冠军国家，是取得世界的主导权。成为世界第一，成为冠军国家，是国家竞争的最高目标和国家奋斗的最高境界。

基辛格在《大外交》开篇中写道：“几乎就像是存在某种自然规律一样，每个世纪都会有一个大国崛起，它有力量、有意志、有知识和道德上的激励，依据它自己的价值体系来重塑整个国际体系。”也可称为“世界领导权”百年周期理论。他把500年来的国际政治划分为5个世纪性周期（1495—2030年），大约每隔100年就有一个大国崛起，就会出现一个主导世界体系的霸权国家。在这500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现的霸权国家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

中国不仅要和英国、美国并驾齐驱，还要驾于它们之上，这是孙中山的伟大志向。孙中山在1894年于《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纲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认为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中国“必能驾欧洲而上之”。孙中山后来还多次讲到，实行三民主义，要建设一个驾于欧美之上的“世界第一富强之国”。

把中国建设成为“六至”、“四最”国家，是孙中山一生的奋斗目标。世界第一的中国，在孙中山的心目中是一个“四最”、“六至”国家。所谓“四最”国家，就是世界最强之国、富甲天下之国、政治最良之国、民众最快乐之国。所谓“六至”国家，就是：至大、至优、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

### 重燃中国梦想

在“大国崛起”的氛围中，对中国经济长期表现的预测已成为一门“显学”。在谈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世界时，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说：“在这些欢乐的年代里，我们丧失了政治经济学的建立者们所具有的那种包含深刻思想的世界观。”

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在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取得了成功。而国际组织也没有因为对中国政治制度存有偏见而否认她的这些成就。其核心领导人制定的改革方针政策旨在循序渐进地构建一个强大的经济体系。这些大政方针以经验为基础，而没有陷入教条主义的陷阱。这些发展标准没有以西方国家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为参考，而是另外开辟了一条新路。中国则相信：实践胜于理论。

### 中国的威胁

西方一直利用“政治上正确”来干涉别国的很多领域，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而打击中国也演变成西方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记者关注的焦点。“政治上正确”的思想能够一直占统治地位也是一种因循守旧的表现，人们没有真正了解中国的发展，仍然对中国保持陈旧的看法。当然也有一些外国人想深入了解中国，对她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但是他们通常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只有开放的媒体、杂志或多媒体课件，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增加电视台或媒体的收视率，媒体的负责人仅仅把一些能得到好处的信息放在了首位，例如火车晚点之类的消息成了他们津津乐道的“焦点”。而报纸杂志为了“生存”，也只是报道那些消极的、负面的新闻以及政府的失误和个别

人的错误。由于这些唯利是图的媒体，污染了西方国家民众的思想，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误会，这些西方媒体也没有很好地解析中国的发展和政治体制。

中国没有照搬接受西方社会的体制，而是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和历史背景及传统相关的体制，这种体制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是激励中国发展的催化剂。而西方媒体则制造出这样一种假象：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西方不同，因此它对西方的发展也没有任何积极作用。另外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体制改革将会带给中国人幸福。这两种观点从未达成共识，而且也越来越呈现一种对立状态。

这类文章并没有提高欧洲报纸杂志的素质，他们还大量刊登不利于中国的言论。事实上，欧洲国家和中国并不是敌对的，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媒体和议会都没有这么强烈地反对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人都为中国古老而悠远的文化所深深吸引，也非常钦佩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通过无限的活力和勤奋刻苦所取得的经济飞跃。曾经提出过“古老的欧洲”一说的美国国务卿和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也对中国特有的古老文化怀有深深的敬意。欧洲人经常会有一些自发的运动，如“抵制美国”，这反映了欧洲人对自己原有传统文化及对基督教文化的喜爱和眷恋，这也是世界千百年来发展的印记。欧洲人讥讽美国人的文化通常会说：他们能称霸是因为年轻。中国则不同，她和欧洲一样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二者之间，一定能够找到彼此政治和经济的融合点。欧洲的政治观点是比较分散的，通常还需要媒体来维护；比较而言，中国的政治体制给人一种很完美的感觉，它建立了一个新型的、非常有益的经济和社会体系。

简言之，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她不是简单的、像她在这两三年中自称的“世界工厂”，很可能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现在美国在制订未来计划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把和中国的关系与

“交锋”这个字眼联系在一起，中国和美国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呈现一种对立和竞争的关系。为了支持他们的理论，他们对中国实施最大程度的“地缘政治”围堵，围绕中国采取不平等“战争”的策略，但是这种观念对今日的美国来说无异于自杀。两个国家在经济和金融上完全独立，美国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中国也受到冲击，毕竟在这两个超级经济大国之间一直存在着潜在的竞争关系。

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矛盾似乎已经开始改变，他们之间已经在协商如何为对方提供一些特权或优惠政策，以期达到保持双方实力平衡的目标。如果中国有一个国际关系互动的意识，这对华盛顿来说是一个新情况，也必然会引起美国当局的注意，并制定与之相关的新的国际关系策略。目前，美国政府已经把中国放在一个协商者的位置上，并且附加了一个补充性的研究，同时也和欧盟达成了联盟，甚至和俄罗斯也有一些合作。过去只有民主或共和单极理念的美国正在逐渐向多极和多边方向发展。

中国战略建立在两大主要忧虑之上，一是经济发展，二是国家安全。中国的政治进程表与美国或是从前的苏联并不相同。尽管还存在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信仰的宣传，大规模教授其中的格言以稳固共产党的权力，但意识形态对于内政和外交的影响都消失了。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为基础的现代化改造。最后，中国并不传播有可能在外国扩散的宗教教义或哲学思想。欧洲国家外交政策中无处不在的传教士般的热忱，在中国的战略思维中是不存在的。中国很自然地利用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却不寻求有系统地推广文化和语言。但是，中国最近实施的旨在向海外推广中文教育的“孔子学院”计划，显示出中国有了新的觉悟，认识到了文化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

事实上，争论的关键是如何解读中国领导人的官方讲话，并以此展望他们

的行动和战略选择。在美国和欧洲，最为常见的是将这种调查研究建立在意识形态标准之下，把中国视为魔鬼，或是戴着旧世界的有色眼镜描绘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光芒遮掩的中国，甚至曲解中国现任领导人的政治决策。

而事实上，这些政治决策都是非常务实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摒除了意识形态的考量。



## 第二章

# 中国继续改革的方向与动力

### 一、未来20年推动中国发展的五大引擎

人类正在由“大趋异时代”进入“大趋同时代”

谈中国，就不得不提世界。我们也只有全面地、深刻地认识世情，才能够更加准确地认识国情，才能敏锐地、有前瞻性地识别世界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才能够更加主动地创造战略机遇期。

那么当代的世情是怎么样的呢？近200年，世界经济增长历史几乎就是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的“大趋异时代”。而随着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持续经济高速增长，会大大地促使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从两个世纪的“大趋异时代”转向21世纪的“大趋同时代”。

而这种“大趋同”时代的到来，主要是南方国家自主发展的结果，是知识的全球化和当地政治、经济、教育的推动。

### 世界正处于第三次黄金增长期

人类之所以会出现“大趋异时代”向“大趋同时代”的转变，这是因为世界存在第三次黄金增长期，从大趋势来看，进入19世纪以后，世界先后经历了两次黄金增长期。所谓黄金增长期，就是连续的、稳定的全球经济增长周期，一般可持续10～50年之间。第一次是在1870—1913年间，以电气革命和铁路革命为特征，美国和西欧国家都是这次黄金增长期的领导国；第二次是在1950—1973年间。从1990—2030年，全球经济正处于第三次黄金增长期。

从1990年起，到2030年，全球经济有望保持3.0%～3.5%的年均增长速度。新一轮发展黄金时期参与的国家 and 地区数目之多、人口规模之大、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程度之深，都是前两次黄金时期所无法比拟的，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60亿～70亿人口都参与到这一过程之中，形成超长时期、超大规模的高速成长时期。

在本轮全球黄金增长周期中，全球经济版图将发生重大变化，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经济实力将出现大逆转，不仅中国、印度在2030年回到1820年的水平，整个南方国家也将回到1820年的水平，是一个典型的“U”字形。这一趋势是世界的主流，是世界的基本趋势，尽管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但这种危机一般只会持续五年，最多也不过十年。我们应该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会汇入这一主流之中。

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特别是中国，既是此次世界经济黄金期的最大受益者，也是最大的推动者。从2000年到2030年的30年间，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为代表的人口大国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到2030年，“金砖四国”中、印、俄、巴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将有可能达到60.1%，其中仅中国一家就可能达到并超过北方国家的总和。

与之相反，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将下降，那时，全球规模最大的5个经济体将是中国、印度、美国、欧盟和巴西。

对于中国而言，全球黄金增长期就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是中国充分利用国际和平环境和国际资源、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窗口。全球经济黄金增长期使得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一步延长，中国在世界市场和世界舞台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

### 未来20年推动中国发展的五大引擎

具体到中国的发展，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存在五大引擎，分别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国际化、基础设施现代化”，这五大引擎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新型工业化加速，将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产品生产国；新型城市化加速，将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国家；信息化和知识化的加速，将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基础设施现代化加速，将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现代化基础设施投资国；国际化的加速，将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将来还会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口国、世界最大的贸易服务国。这“五大引擎”相互作用、相互支撑、相互需求、相互促进，我们完全可以对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抱有很强的自信心。

另外重新塑造以城市群为主导的新中国经济地理，也将成为中国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未来中国将形成“两横三纵”的城市群格局：以欧亚大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从大连到湛江）、（北）京哈（尔滨）（北）京广（州）、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昆（明）通道为三条纵轴，以国家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的城市区为主要支撑，以轴线上其他城市化地区为重要组成的城市化战略格局。这可能是现代世界历史上人口规模最大、大城市规模最多的城市化格局，到时候中国经济地理将会大变迁。

到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形成世界最大的现代产业体系，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群，以及建设世界最大、最现代的基础设施体系。我们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对外投资国，中国的对外投资既是中国的海外利益，也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巨大商业机会。将来可能会出现中国GNP超过GDP的情况，世界投资中国的时代还将继续下去，而中国投资世界的时代已经来临。

### “共富”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目标

人类有文明史以来，“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要么是哲学家和诗人美妙的幻想，要么是政客漂亮的说辞，而真实的社会则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几家欢乐几家愁”。人与人之间因为出身、地域、阶层的不同，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近代，中国虽然被西方列强瓜分，急剧衰败，但中国人并没有泯灭伟大梦想，康有为再次重申并发展了古已有之的“大同理想”。他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而只是“升平世”，“升平世”之后还有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即实现了人类大同的“太平世”，可见共富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

另外实现“共富”，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979年之后，邓小平提出了“小康”的“中国梦”，也提出了从“先富”到“共富”的两步走方针。这里面构建“共富社会”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延伸，也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社会主义在中国本身也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不成熟、极不发达，80年代不发达两大阶段，至今才形成了比较适应、比较成熟、比较成功的阶段，但还不完善、还不均衡、还不平等，今后还要走向更为成熟、更加均衡、更加平等的阶段。只有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才能真正凝聚十几亿人民，有效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充分激发人民的创造力，共同分享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因素不仅使

人们更快地富裕起来，而且使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其实当代中国北京或上海或大连的现代部分，已经比富裕的美国要先进。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再过20多年，中国“后来居上，理所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以更小的沉没成本、更先进的技术、更高效的组织能力，全面超越美国。2030年的中国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现代经济强国。伟大的国家有伟大的梦想，伟大的时代有伟大的梦想，当代中国正经历空前广泛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社会变革；这种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变动、大调整已经汇合为时代主流。再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不仅将创造世界经济的奇迹，也将创造人类福祉的奇迹。

## 二、中国应谨防“诱错”和“逼错”式改革

---

其实早就有清醒的学者指出，很多人是进行“诱错”，他们批判政府的正确政策，其实是为了诱导政府做出不利于人民的错误决策。一旦政府听信了他们，那最终受害的还是人民。相反，他们在对政府的正确政策进行批判的同时，却对政府的错误政策进行百般袒护。

现在社会，批判很多，不要以为批判就是好的，更不要以为批判政府的人就是在为人民说话。政府的政策毕竟大部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正确的，如果不怀好意的批判，那这种批判就不值得支持。

正如我的同事罗斯义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无法被“杀死”，因此必须劝其“自杀”。这是西方“反华包围圈”对地缘政治现状的总结。

中国的民族复兴已经达到相当程度，任何外部势力都没有强大到能够阻挡其崛起的地步。美国在军事上依然十分强大，但中国的实力足以让美国在战争

中遭遇重大损失，甚至连新保守主义者都不愿鼓吹战争。美国政府可以尝试“杀死”伊拉克、阿富汗、越南，未来还有可能会“杀死”拉丁美洲国家，但中国太过强大。

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反华包围圈”会就此放弃。如果无法“杀死”中国，是否有可能劝其“自杀”呢？这个想法可能看上去有些荒唐，但实际上，美国曾经取得过两次成功，对象分别是日本和苏联。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面对疯狂增长的日本经济，美国劝说日本升值日元，减少投资以放缓经济增长，并在1987年华尔街股市风暴后实施低利率政策，使得日本的大量资金流入美国，维护美国的金融体系，而日本则成为“泡沫经济”，并于20世纪90年代破灭。

20世纪80年代，西方劝苏联不要进行后来在中国成功的经济改革，而是采取休克疗法，将国有公司完全私人化。结果，苏联迎来现代历史上最大的和平时期经济崩塌。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曾下降40%，男性人均预期寿命减少7年，分裂主义势力摧毁了苏联，使得它从一个人口2.88亿的国家变成了人口为1.43亿的俄罗斯。普京将之形容为“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

但西方明白其优势所在。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在经济上与祖国密切相连，但富裕阶层则可以把财富拿到国外。国家和许多私人企业的命运与中国经济复兴密切相关，但一些金融集团即使在混乱中也可以变得富有，还有一些专业人员可以得到诸如美国大学教授等高收入工作。因此，在这些最高梦想为获得美国绿卡的中国专业人员的支持下，存在一个买办阶级。如果中国无法被“杀死”，这些人便可以被利用来说中国采取带有自我破坏性质的政策，以达到使其“自杀”的目的。

在获取日本和苏联经验之后，美国政府清楚地了解这些政策。投资是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因素，所以可以通过减少投资的方式减缓中国经济增长，正如

日本那样。货币升值也将令一国经济增长减缓，因此可以通过持续地施压让人民币继续大幅度升值。中国的国有公司是其经济核心，是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手段，那么这些公司必须要被削弱或摧毁，正如苏联那样。为了隐瞒中国生活水平的增长是所有大国中最快的现实，他们花费数十亿美元的宣传经费，来夸大每一个伴随中国快速发展而无法避免出现的现实问题，并散布“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功事实上是经济灾难”这一可笑观点。

因此，如果认为中国的最大威胁是美国部署在太平洋上的航母，那就大错特错了，它们不能“杀死”中国。对中国而言，最大的威胁是其内部劝服其“自杀”的力量，是采取无可避免地将其推离民族复兴轨道的政策。

### 三、警惕右翼民粹势力正在对中国的危害

---

民粹主义者喜欢批判，永恒的批判，在他们眼里，政府做的都是错的，但是问题如何解决，从来不说。有的伪经济学家热衷于将自己装扮为民主先驱，有的将自己装扮成改革旗手，有的喜欢以民意领袖自居，政府的经济政策也经常被误导。

中国经济界分为两派，一个是专业派，一个是民粹派。专业派的特点是，问题是什么就说什么，走专业路线；而民粹派则不同，民粹派是民众喜欢什么就说什么，而不管事实到底如何。民粹派也可以是左派也可以是右派，所以大家经常看到一些左派和右派的经济学家观点能够完全一致，因为他们都是民粹派，而非专业派。

民粹主义与民本主义完全不同，民粹主义是迎合民众的短期需求，而民本主义则是迎合民众的长期需求。民粹主义散布的往往是利近害远、短多长空、似是而非的论调，是一种巫毒，民众在民粹的巫毒迷惑下，以为民粹派是在为

自己办事，其实不然，而且正好相反。当下媒体多有民粹倾向，因此往往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成了民粹主义的帮手，而这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民众与生俱来的自利心理和信息不对称，民粹主义者利用的就是这点。

“主义”的背后是利益，哪怕是最华丽辞藻修饰的主义，揭开盖头之后都是赤裸裸的阶层、集团乃至个人的利益。当下中国和世界流行的民粹主义从政治学光谱上属于右翼民粹主义，是一套拒绝现有政治共识，结合自由放任自由主义与反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之所以称为右派，是因他们拒绝社会平等与相关的政府方案、反对社会融合，是右翼中最右的一支。

右翼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立场，更不等于合理的平民利益诉求，而是带有很强的精英色彩。这些人主张极端个人主义，甚至连福利都反对。右翼民粹主义是20世纪最后30年时间里新兴的一股政治力量，并且迅速扩展，尤其是在西欧。他们利用民粹主义动员策略，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稳定，危及民主政治的发展，使政界和民众忧虑不安，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茶党、中国的铅笔社等。

传统传媒领域仍然是社会精英盘踞的地方，互联网或报纸上涌起了民粹主义的大潮，各色知识分子在发言，普通民众也直接表达。但喧嚣过后，人们发现，其实网络并没有给民间人士提供更大的话语平台，反而给那些传统精英提供了冒充民间的平台，这些传统精英，也随时会从虚拟集聚演变成社会运动。

在美国，民粹主义主要表现为茶党，茶党主张一种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强调财政上的保守主义和反政府。但他们许多人不只是反对“大政府”（亦即庞大政府支出），甚至是根本不喜欢政府存在，尤其是痛恨收税的国税局。他们利用的是经济衰退形势下人们不安全感的加强和对政府的怀疑。在茶党掀起的民粹主义政治气候中——53%的茶党分子对华盛顿政客感到愤怒，认为美国政府不需要一个修补匠，需要的是大卸八块的拆卸工。



金融危机发生后，首先爆发的不是“占领华尔街”运动，而是“茶党”运动，因此当时很让人困惑，为什么这次是右翼，而非左翼？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给出了一个解释：因为金融风暴的原因或是经济法案都太复杂，人们很难理解，只知道这会强化政府角色，而极右派名嘴们则刻意把问题简单化，恐吓民众，把政府妖魔化。所以越是危机，人们越不相信政府。而且这些茶党分子自身也出现了自相矛盾之处，例如他们在措辞上反精英，但茶党成员却把选票投给保守派的政客，这些政客恰恰是为他们所厌恶的金融资本家和商业精英服务，简直是一群被人利用的傻瓜。

而美国的前总统小布什也是个右翼民粹总统，其支持者集中在南方文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特别是没有上过大学的群体中，他把共和党从华尔街精英党转化为大老粗党。

马克思曾说，只有当思想回应了大众的诉求以后才能发挥力量。但后现代主义条件下，人们又拒绝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以历史和社会的宏大叙事，更多是依据表面性的判断，这就给某些人提供了运作的空间。但欺骗是很难持久的，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兴起后，“茶党”也就立马作鸟兽散了。而在中国宣传右翼民粹主义的人的虚假面貌也日渐被人看清，公众关注他们最开始也是抱着崇拜成功人士的简单想法，但慢慢发现巨大的阶层差距让人越来越难以认同他们的政治观点时，这些人也就不再具有吸引力了。

中国知识界一些大学教授解释问题也不从专业视角进行解释，也是随着媒体的论调兜售民粹，这是很让人担忧的。其实学者做专业的学问可能要坐十年、二十年的冷板凳，可能需要“著作等身”才能功成名就，而如果走兜售民粹的路线，只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熟练运用几个民粹词汇就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民粹型知识分子，而且比传统知识分子出名更快、经济效益更高。中国很多学者已经从兜售民粹中尝到了甜头，通过提高曝光度，他们的出场费越来越高。

以至于他们不用再像以前一样，要想发财就必须依附于海外基金会或是国内资本利益集团，他们现在只依附于媒体，迎合媒体编辑的审美口味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

### 民粹派知识分子主导中国舆论

现在电视台的时事评论类栏目、都市报的评论版、网络博客、网络微博等都是这些民粹型知识分子的出没之地。根据笔者的观察，中国的民粹型知识分子也分为两种，随着媒体兜售民粹的只是初级民粹分子，还有一种更高级的民粹分子，这些人擅长“差评营销”，专门在最热门的话题上“说反话”、“找骂”，这也是民粹的一种，只是手段更高明的高级民粹而已。但这两种民粹虽然手段不同，但目的相同，都是追求不正当利益，而他们之所以都属于民粹派，是因为这些人解释问题的方式都是从非专业视角出发。一般是电视台、平面媒体上的民粹型知识分子以附和型民粹为主，而网络博客或微博上的民粹分子则以差评营销类民粹为最常见。

中国改革三十年，有人欢喜有人愁苦。展望未来，有人乐观有人悲观，有人安心有人紧张。在专业学者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之前，这些问题就成了民粹型知识分子挑弄民意的对象，有的是无聊地斗嘴取乐，有的纯粹是起哄架秧，但这些却会潜意识地影响到人们的价值观，会改变社会的主导话语权、主导人心的走向。

大家不要小看这些争论，“风起于青萍之末”，社会的大变动，往往首先是从知识分子的争论氛围开始的。从校园讲坛、电视论坛、报刊评论、网络议论吹出的风，与一定的社会大气候相契合的时候，就会演化成不可阻挡的社会风潮，将社会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都席卷进去。这场运动的主人公是互联网几千万愤青，特别是在校学生，但受影响的则是整个社会。而民粹意识形态会导致人民做出错误的历史选择。

### 伪经济学家只会鼓动民粹主义

在目前的环境下，真经济学家已经变得非常稀缺，而与真经济学家的稀缺形成对照的，却是伪经济学家的泛滥。中国的伪经济学家，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媒体人出身的财经评论员，一类是没有真学识的经济学家，这两类伪经济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喜欢煽动民粹主义。现在中国最主流、最掌握话语权的就是这些民粹主义经济学家，他们是中国经济领域的公知，是媒体的宠儿。

经济话题与经济学话题完全不同，任何人都可以在经济话题上发言，但是不是谁都可以在经济学话题上发言。经济学问题不仅要分是非，也要讲道理，任何经济现象，背后都有道理所在，对一个经济问题，看是否能从经济学的角度给出解释，这是关键。民粹经济学的泛滥对提高全民经济学素养毫无益处，反而给民众灌输了很多错误的经济观念。

如果要制止这种情况，需要两方面的自律，一种是经济学家的自律，一种是媒体的自律。经济学家的自律需要的是学识水平的提高，而媒体的自律则是加强专业性，从而过滤掉那些民粹性的观点，现在的财经媒体人大部分都缺乏财经常识，而财经媒体的记者编辑，至少应该受过基本的经济学教育，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就不再会对这些民粹主义的东西感兴趣。

民粹主义是垃圾新闻，是垃圾思想，像垃圾食品一样毫无营养。但是这些垃圾言论却像垃圾食品一样有着良好的气味，吸引着你不得不看，这方面还需要民众的自我克制。

开启民智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但是煽动民粹主义却是一件极其容易的事情。而最可悲的是，很多民粹主义的煽动者们却打着开启民智的幌子，其实贩卖的都是民粹主义的垃圾。然而这些民粹主义一旦被有心人利用，就成为打击中国的巨大力量。

### 附件：中国媒体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民粹主义在中国舆论场上获得强劲发酵，它不断通过一些公共事件滚雪球，虽是松散的思潮，但又很容易受到刺激和引导，形成集中爆发。民粹主义算不上是意识形态，但它在逐渐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材料之一。

民粹主义在中国现实社会中的影响也有限，但它在互联网上表现出所向披靡的奇特力量。一些新崛起的网络精英与民粹主义结盟，借助民粹主义宣扬价值观，围绕民粹主义形成一些通常不可思议的价值观及政治组合，并使一些原本局限在一定范围和领域的争议扩散向全社会。

网络民粹主义的分析逻辑呈现出极其简单化和标签化，由于网络民粹主义表现出过于清晰的政治方向性，它已不是单纯的情绪和思潮，而是政治化了的民粹主义。主流社会需要做的是阻止政治对民粹主义的侵蚀，让民粹主义至少保持它的本色。

新兴网络媒体的话题制造能力、新闻聚焦能力已经今非昔比，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媒体对于塑造当今中国社会舆论和民众心态的强大力量。面对频发的暴力事件，无论是从积极或消极的方面说，媒体其实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我们今天能感受到中国社会话语里呈现出来的强烈的暴戾之气，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应该如何看待媒体话语的功能？

暴戾情绪在中国不但十分普遍，而且经常受到正面舆论评价。我们不能简单去指责中国民众的道德沦丧、思想简单、缺乏教养，而是要认真分析总结暴戾之气盛行的社会根源和精神原因。目前环境下，一个国家既需要有弹压社会转型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极端势力的决心和能力，又要有开放社会、鼓励社会组织在法律框架内的发展、缓解社会矛盾并将社会矛盾的表达和解决制度化的手段。

## 四、中国四类知识分子

我们以上提到的专业派和民粹派主要是对独立知识分子的分类。除了独立知识分子之外，中国还有非独立知识分子，他们也主要分为两派，分别是海外基金会知识分子和资本利益集团知识分子。而整个民粹主义在当下中国的发展苗头是以底层利益自居的民粹型知识分子同资本利益集团知识分子、海外基金会知识分子的意识合流，因为他们的指向目前是一致的，都指向政府。

海外基金会培养的知识分子早已对中国离心离德，他们指向政府是很好理解的；资本利益集团的知识分子其目标也是政府，因为他们所主张放松管制、降低税收、国有财产私有化、企业家犯罪行为非罪化等都是与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相违背的；而底层民众最敏感的还是贫富差距以及生活缺乏保障，而他们并不指责政府管得过多，因为普通公民可能几年都不需要与政府产生联系，都不要走进政府的办事大厅，而他们指责政府的往往是“作为不够”，如政府没有及时降低房价，政府没能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等，更多的是经济问题，总之“豪夺财富入于私门，积累民怨归于公上”是底层反对政府的主要原因。

但细究起来，国家外敌、内部豪强、底层草根虽然都是指向政府，但他们对政府的要求，其实是不同的，但相同的敌人就是共同的朋友，因此三股走向合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政府还应该区别对待。政府如果过于满足基金会知识分子和资本利益集团知识分子的要求，则势必激起底层人民更激烈的反抗，到时候中国的民粹之风更盛，而政府如果按照民粹派知识分子的主张来做，往往又是不科学、不可行，甚至是利近害远的。

那政府应该怎么办呢？其实社会的进步，关键还是要靠学术的进步，靠专业派知识分子，其他派或是毫无建设性，或是往错误的道路上引导，都靠不住，其一般规律是社会出现新问题、学术界产生创新，然后被政府采纳，推动

社会进步。搞学术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一部学术发展史其实也是政府政策史。学术创新推动国家进步是有历史可以佐证的。比如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推动了美国的进步运动，凯恩斯主义帮助美国走出了大萧条，供给主义帮助美国走出了滞涨等。在中国也是一样，而中国现在出台的改革政策基本上是根据滕泰、贾康等“新供给学派”的主张来的，但“新供给学派”的主张也有限，中国还需要更多的新的创新、新的学派的出现。

而对于海外基金会知识分子，中国应该给予规范，笔者不建议采用审查制度，但至少是其课题必须向国家相关部门备案，向社会公示，而 its 所得应该向国家税务机关缴纳个人所得税。目前，跨国企业在中国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已经基本取消，而海外基金会在中国享受的部分超国民待遇目前还没有取消。比如《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常驻人员及其家属免征个人所得税的通知》中规定的免税项目就有些不合时宜了，而这个规定的依据又是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中国政府同美国福特基金会签署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福特基金会协议备忘录》，而这个备忘录都是20世纪80年代积极“引进外资”的产物，早就该调整或取消了。

对于海外基金会知识分子我们也没必要过度担心，曾经海外基金会知识分子在中国实力最强，广泛分布于中国的国家院所、名牌高校。但随着中国本土民粹派知识分子和资本利益集团知识分子的强势崛起，海外基金会知识分子“一支独大”的局面将逐渐消失。现在真正让人担心的是如今民粹派知识分子、基金会知识分子和资本利益集团知识分子三分天下，而专业派知识分子几乎无立足之地的局面。

而对于资本利益集团的知识分子，政府应该看清他们的面目。对于他们的建议，可行者采纳，不可行者要坚决反击，这样才能达到各社会阶层的平衡。而中国的资本利益集团知识分子自身也必须提高修养，也必须树立一定的“阶

层合作”意识，不要一味地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阶层冲突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但阶层冲突的国家是发展不好的，真正发展得比较好的国家是“阶层合作”的国家，这也是北欧、德国等国家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这些国家都普遍奉行“合作主义”路线，“合作主义”也一度被认为是继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比如在北欧和德国的经济制度中，监事会的权力是高于董事会的，而监事会中又必须有职工代表，这就是阶层合作主义的一个表现。当然其他方面的表现也还有很多，笔者在《世界大时局》一书中曾专门讲过这些。而忽略阶层平衡的美国之所以失败，其原因也在这里。目前，在美国，左右分裂得极其厉害，持中间立场者非常少。

从古至今，政府处理政治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处理知识分子的问题，因为政府的政策建议很多都来自知识分子，或是受到知识分子的广泛影响，而知识分子背后代表的又是各阶层、各派别的利益，因此处理知识分子的问题，也就是处理阶层与派系问题；因此，政府倚重哪些知识分子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出路和社会各阶层的出路，因此不可不慎重。

中国大部分政策仍是直接以民众利益为依托的。其实中国政府与民众的利益更接近，而多党制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利益更接近。中国政府必须代表全民，而多党制国家，他们肯定是代表利益集团的，也是利益集团将他们送上台的。因此在中国，政府与人民利益的接近程度，远大于政府与利益集团利益的接近程度。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向上欺压政府，向下欺压人民，横亘在人民与政府之间，“离间官民”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中国太需要有真学识的经济学家了，但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与伪经济学家比起来具有天然的劣势，因为真经济学家不喜欢炒作，其次，真经济学家喜欢用经济原理说明问题，第三，真经济学家不宣传民粹主义，第四，真经济学家不喜欢政治。而这四条都是伪经济学家所热衷的。

## 五、当代中国应该“少谈些价值，多谈些模式”

五四时代，胡适提出“少谈点主义，多解决些问题”，这一主张直到现在仍然被很多温和理性的中间派人士广泛引用，但在当代中国更加虚飘的“价值”取代了倾向性极强的“主义”，又开始卷土重来，因此我们极有必要提倡“少谈些价值，多谈些模式”。

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特别是战后，或是21世纪，其实人类信奉的那些共同价值并没有变化，也没有人提出先贤遗漏的、没提过的价值，而且这些价值也早已经写入了中国的宪法和学校教科书，成为各界思想人士共同信奉的纲领。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宣扬这些价值的知识分子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同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混淆了价值和模式的区别，企图以价值代替模式，当代中国部分知识分子所提倡的所谓价值其实是某种模式的概括而已。

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区分价值和模式。同样的价值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实现模式，价值只是理想，当前中国并不存在价值之争，而是模式之争，大家应该尽量减少在价值争论上进行无谓的浪费，应多在模式上想办法。

《人权宣言》已经问世了两百多年，但这些年中，人权进步并不明显，西方国家的人权改善，其实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如果这些宣言真的能够落实，怎么还可能出现暴力的工人革命，其实在推动《人权宣言》的落实过程中，工人的暴力反抗，比那一纸文书作用更大。

条条大路通罗马，通往价值的路也是不断被创新的，而且这种创新往往出现在边缘国家，而非核心国家，德国和北欧的强势崛起都说明了这一点。

笔者认为中国和世界都应该建设人性化的社会，如果自由不符合人性，那



自由也是不值得要的，如果民主不符合人性，民主也是不值得要的，一切都以合乎人性为标准，才是最重要的。

当代中国没必要重起炉灶，照抄照搬，这样既成本太高，也不科学，我们应该像德国和北欧一样，通过模式创新实现国家崛起和民众的幸福。而笔者在书中提出的世界模式3.0版本，即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则是一个选择。

## 六、美国“进步时代”带给中国的启示

“进步时代”是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大致包括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段时间。

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变革与社会变迁，迅速从一个乡村社会转变成一个城市社会。

同时，随着社会财富集中，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社会开始出现阶级分化，社会公平问题凸现出来。然而，从联邦到地方，美国的国家治理结构基本上仍然是19世纪上半期成型的有限政府，不仅不能解决经济和社会变迁带来的各种新问题，而且似乎越来越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面对这些问题的挑战，在进步时代，大多数美国人开始改变他们关于美好社会和政府的传统信念。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以城市中产阶级为核心掀起了一场改革政治体制和政府的运动。

19世纪后半期几乎所有的工业领域，都已经高度集中化，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公司控制着美国的整个经济。华尔街集中了美国绝大部分的资本，他们操纵着国家的金融，进而控制着国家。凭借其控制的巨大财富，这些大企业和大商业在政治中强有力地影响着各个主要政党的活动，使得这些政党成为他们利益

的代言人，财富的高度集中使得民主大大贬值，使得个人自由成为一个虚假的东西，国家的能力已显得极端脆弱。1893年，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甚至不得不请求摩根集团帮助维持国家的黄金储备。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接的短短15年中，美国面临经济危机，美国总统就曾经三次求助于摩根集团来挽救国家。

在这一时期，不仅大企业可以为所欲为，各种中小企业也是没有约束。企业在进行生产决策时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对食品、药品的生产和销售没有任何监管，食品和药品安全构成了一大社会问题，其中，尤以食品安全问题为甚。牛奶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当时美国妇女也开始进入就业市场，美国家庭对瓶装牛奶的需求越来越大，特别是婴儿用奶。在这种情况下，为城市家庭提供牛奶就成为一个很挣钱的生意。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贪得无厌的生产商和销售商经常销售结核病菌生产的奶、低质量的奶，在牛奶中掺水、盐、苏打水等，在城市妇女看来，这些不清洁的牛奶是当时美国婴儿死亡率居高的重要原因。

工人成为工资的奴隶，工作条件非常恶劣、而且缺乏劳动保障和其他安全保障措施。1888年，《芝加哥时报》曾经以“都市女奴隶”为题，系列报道了芝加哥的“血汗工厂”极度恶劣的工作环境。

不仅是工人，在那些大资本面前，农民也是软弱无力的，农民发现自己越来越依附于铁路公司，受其垄断的运输价格剥削。庞大的但是看不见的金融资本企业也对农民构成了另一层面的剥削，例如，金融企业决定的信贷成本就经常使农民陷入破产的困境，一些农民开始逐渐失去自己的土地，佃农在农业人口中的比重从1880年的26%上升到1910年的37%。

城市化及移民潮也给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带来了巨大的需求和压力。工业化造成了极大的城市污染，也加剧了城市公共服务的成本。当时的城市政府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的腐败问题也极其严重，而且主要是“商业腐败政

治”。“腐败交易”是当时各级政府的操作模式。美国的政治腐败，其实是缘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所实行的政党分赃制，在政党分赃制下，政府实际上变成了政党的“囊中之物”，不可能是人民的政府。政党一旦上台，政府的各个官职就成了本党的战利品，由党魁们在本党的亲信中进行分配，同时如果政党下台，这些亲信也要跟着下台，所以任何官员在任职期间都会抓住机会“捞一把”，因此政府官员很难形成长远的预期，也没有动机去负责地制定政策和管理。

这种政党分赃制政府越来越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政府越坏，人民越不敢将权力交给政府，直到20世纪之交，绝大部分美国城市除了财产税之外，城市不能筹集其他的财政收入。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城市化的压力，城市政府不得不“发明”一些融资方式来改进城市的基础设施。一种流行的方式就是所谓的特许权制度发展起来。在这一模式下，私人企业通过向政府投标来获得供给新服务（例如交通、电力、电话和供气）的合同。实际上是通过出卖公共事业维持经营，而这也成为腐败最多的地方。

总而言之，在19世纪后期，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地意识到，经济增长伴随着越来越大的贫困、剥削、混乱与腐败，自由主义理想彻底落空。而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是毫无意义的，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开始爆发阶级冲突。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分析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国家治理理念以及相应的治理模式。对于美国人来说，个人主义通常伴随着一种对大政府的疑惧心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革命时期的产物，是殖民阴影在作怪。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其核心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有限政府。

同时影响美国的还有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理论认为，自然选

择、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是永恒的自然法则，也是根本的社会法则，因此，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种社会的“自然”进行干预都是错误的，都是违反自然法则的。

因此尽管经济的集中已经越来越明显，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但主流的意识形态仍然反对政府对社会的干预，甚至认为任何对大企业的管制都是在破坏自由竞争过程，并已经开始出现“挑战国家”权力的征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呈现出失衡的现象，这一点可以从司法上得到体现，在19世纪80年代及其以后的几十年里，法院总是将对企业的管制尤其是那些对劳动合同进行的干涉，视为“对自由劳动的限制和侵犯”。从1880年到1931年，各级法院制定了大约200多项法院命令，禁止工人罢工和开展抵抗活动。这使得企业可以为所欲为：“对于商业活动没有全面的检查，没有法律来保护工人和消费者，没有有效的管制机构和法律。商人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从不担心受到惩罚。”

因此即使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发生了两次经济萧条，每次都延续了将近5年左右，并且都导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失业，也没有动摇绝大部分美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沉迷。在这些古典自由主义的支持者看来，“穷人们应该为他们所处的不幸境地负责”。直到1900年，美国大城市中的穷人有将近一半仍得不到任何形式的救济。

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美国社会实际正处于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然而，事情不会永远这样发展下去，在古典自由主义根深蒂固的时候，另一种自由观，在有良知的学者中也开始流行起来，并进而成为进步运动的思想基础，他们认为“一个软弱的政府是对自由的否定”。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进步改革者也极其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进行改革，有钱的工业家不断增长的权力将继续压制民主。”

在这种情况下，进步时代的改革者需要寻找改革的办法。最后美国社会各

个阶层开始从根本上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在进步主义者看来，自由资本主义导致的资本集中和特殊利益威胁着美国的民主和个人自由。这后来成为进步改革时期政治辩论的基调。在进步时代，放任自由的古代自由主义信念逐渐被一种新的信念所取代，即“民主社会应该为所有的人而运行”，绝不允许任何一个阶层可以随意控制、操纵其他所有人的命运。

这些进步知识分子和改革家们重新界定了政府的角色和作用。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开始放弃小政府或有限政府的信念，转而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帮助管制经济和为所有的人民提供保护是政府的工作”。这时美国人开始对政府采取一种支持和积极的政治立场。进步改革运动最终汇总为一个目标，那就是，“必须改革政府结构，以使其回应‘人民的意愿’”。

进步时代的知识分子和改革者首先做的就是将社会责任引入美国的民主政治。在进步主义的影响下，在美国社会各阶层开始意识到，民主需要包含一个社会的维度，在坚持个人主义的同时，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大家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点对他人的社会责任。因此，在公共对话和政策制定中，需要用社会责任意识来平衡个人主义。正如弗兰根指出的，“进步主义的关键问题是，在他们重构政府的过程中，必须在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之间进行平衡”。

总之，进步时代的改革者放弃了长期以来主宰美国人价值观的“消极自由”的理念，转而采纳了一种“积极自由”的理念。在他们看来，“消极自由”实际上剥夺了大多数美国人民的自由，而且几乎所有的进步改革者都相信，过度地忠实于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已经严重地损害了美国的民主。因此，为了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业社会中保证人民的自由和维护民主制度，必须对自由主义进行调整和修正，用“积极自由”来取代“消极自由”。在以“积极自由”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理念之下，“公民和政府应该接受这一点，民主需要对

社会的责任以及保护自由”。

进步时代的改革者还有一个共识，就是他们必须致力于制度建设，希望从结构上根本改革各级政府，使得政府能够有能力积极、负责地采取行动，解决当时存在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进步时代改革的行政目标是，改革政府的运作机制和方式，提高政府的效率，减少腐败的机会，建立更加对公民负责的政府。

进步时代改革的经济目标则是将大型企业置于公共控制之下，运用政府权威制衡私人商业利益，对市场进行管制，保护农民、工人、小业主和消费者的利益。

1895年，芝加哥的改革者和积极的公民成立联盟，抗议市政府、州长及州议会在收受贿赂之后免费将城市公用设施（主要是公共交通）的特许经营权授予商业寡头。1897年，该联盟成功地控制了市议会并支持进步主义改革者卡特·哈里森当选市长。芝加哥的成功鼓舞了各地的市政改革者，许多城市都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并活跃于市政改革领域。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将公用设施纳入公共所有，而不再由私人企业控制。即使保留特许权制度，也开始将竞争引入私人企业的投标。

1901年9月，美国总统麦克利被刺身亡，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继任总统。对于进步改革运动来说，罗斯福的意外就职无疑是一大福音，它使得进步主义改革从地方进入联邦层面。在两届任期中，罗斯福总统开始着手控制大企业“过度的权力”，加强了联邦政府进行经济和社会管制的权力和能力，对铁路、食品和药品、金融等企业进行监管，联邦政府开始起诉一些大型托拉斯。例如，在他的第一届任期，联邦政府起诉并分拆了摩根集团和洛克菲勒集团建立的北方证券公司，在第二届任期起诉了标准石油公司、美国烟草公司、杜邦公司等。

在罗斯福力主下，国会又陆续通过了一些对大企业的行为进行监管的重要法律，加强联邦政府的管制权力与能力。由于铁路是跨州经营的，州政府很难对之进行有效监管。在罗斯福的推动下，1906年国会通过了铁路价位法，授权州际商业委员会规定合理的铁路运价。1906年，国会通过了肉类检查法和食品药品卫生法这两部非常重要的社会管制法律，打击政商勾结，维护公众利益。

同时，罗斯福加强了联邦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的能力。例如，通过法律增加司法部的编制，在商务部成立公司局，专门负责调查企业的跨州商业活动；成立食品药品局，专门监管食品药品安全。其次，在其第二任总统任期的最后两年，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国会通过了一些旨在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例如，支持通过立法来明确雇主对工伤和事故的法律责任。罗斯福还加入了当时刚刚兴起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罗斯福强调要在发展与森林和水资源的长期保护之间进行平衡。例如，他支持将出售公共土地的收入转入灌溉，将3000英亩森林增加进国家森林保护体系。

同时，当时社会上越来越强大的“扒粪运动”也对这些改革提供了巨大的舆论支持。新闻“扒粪”运动其实是从一份名叫《麦克卢尔》的杂志对洛克菲勒家族的美孚石油公司报道开始的。杂志的创始人麦克卢尔起初是怀着钦佩的心情想要报道美孚石油公司的成功之路，他本意是想把美孚塑造成时代英雄、美国的骄傲。负责撰稿的女记者塔贝尔也不是一开始就有意揭丑，忠于真实的原则和职业的本能敏感促使她穷追不舍，结果洛克菲勒的种种罪行，其中包括贪污、背信弃义、炸毁他人设备、腐败等内幕被详细解剖，揭露无遗。塔贝尔愤慨地断言：公平的个人自由竞争已经不复存在。最后她的长篇报道《美孚石油公司史》在《麦克卢尔》上连载15个月，轰动全国。从此，美国黑幕揭发的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一大批新闻记者和文化界人士笔锋转向，开始挖掘美国社会各个角落的阴暗面。从大工厂到贫民窟，从童工到女工，从红灯区到政治交易，从保险公司的欺诈行为到铁路公司的管理不善，从对工人的残酷

压迫到种族歧视，许多肮脏而悲惨的社会现象一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扒粪者”们激发起了整个美国社会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为改革创造了舆论环境和社会基础。这一运动还直接促成了修宪、食品检查法、联邦储蓄法、反托拉斯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一系列的立法进程。

进步运动改革最重要的是，罗斯福成功地使“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应该发挥作用”这个核心的问题变成了美国的国家政治理念，成功塑造了关于政府角色的公共舆论，使得美国人越来越接受一个积极政府的想法。

1908年，塔夫塔当选美国总统，他是罗斯福支持的继任者。塔夫塔担任总统后继续推行罗斯福的政策。在塔夫塔时期，联邦政府起诉的大企业比罗斯福八年中起诉的大企业还要多，而且，扩大了政府管制铁路公司的权力，第一次将电话与电报公司纳入政府管制。此外，还将更多的土地纳入联邦森林保护体系。塔夫塔还与社会安置运动和社会福利改革者携手支持工厂安全生产立法，建立了美国儿童局，保护儿童的权力。

1912年又是总统选举年，这次政治讨论的焦点是：如何从根本上重组美国社会？特别地，如何面对公司资本主义，竞选争夺主要发生在罗斯福和威尔逊之间。尽管他们的主张有所不同，但相同大于分歧。他们都主张必须对大企业进行管制，政府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威尔逊后来当选，当选后他也沿着罗斯福开拓的改革路径进行改革，并在1913—1916年这一段时间将进步主义改革推向高潮，1913年美国开征了个人所得税。最引人注目的是，威尔逊建立了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银行。在其任期的后两年，威尔逊开始关注社会福利，在1916年，威尔逊制定铁路工人八小时工作时间法。此外，联邦政府拨款帮助州修建高速公路。在威尔逊的第一届任期，在全美国范围内，各种进步改革的组织仍然非常活跃。

在美国进步主义改革进入高潮之际，1914年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



战”。进步改革者既不希望美国卷入这场战争，也担心这会影响到国内的进步改革。所以，他们一般都是反对美国参战的。威尔逊也承诺美国保持中立。但是，1916年，威尔逊竞选连任美国总统成功之后，美国于1917年4月宣布参战。在一定程度上，战争缓解了美国国内的社会矛盾。战争形成的大量政府订单，刺激了美国的企业生产，使得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进步主义开始退潮。

但退潮不等于终结。实际上，进步主义改革的余波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在战争期间，许多进步改革者仍然在各级政府推进改革。例如以女性改革者为主的进步主义改革。然而，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进步主义改革开始遭遇严峻的挑战。1919年，西奥多·罗斯福逝世，1924年，威尔逊逝世。随着这两位重要的进步主义改革总统逝世，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对于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的兴趣都越来越弱。而且，继任的总统都是比较保守的共和党人。于是，大企业对政府的影响开始越来越大，而且大企业似乎越来越学会如何在管制中实现自身的利益。

进步社会运动后各级政府都承担起某些对经济进行管制的责任，以实现一种“安全的”经济发展和保护公众利益。其次，进步时代的改革改变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时期，美国各阶层开始认识到，他们面对着某种自己无法控制的来自市场的力量，进而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保护。

联邦政府的权力得到了加强，总统的行政权力也得到了加强，总统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可以影响美国整个国家经济和政治方向的权力。公民权也越来越从国家的层面来定义和理解，美国人逐渐从地方社区的公民转变成美国公民。

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仍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同时，20年代的经济繁荣暂时掩盖了各种仍未解决的问题，持续十年的共和党保守派执政也使得这些问题未能引起足够的关注，而“扒粪运动”的旗手杂志也被保守派资本家收购。这些问题一直持续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面对大萧条，坚持保守主义的

胡佛总统不仅未能缓解危机，反而加重了危机。这再一次改变了美国人对政府职能的认识，并导致1932年弗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开始推行“新政”。从根本上讲，“新政”是进步时代改革的延续，它与进步时代改革是一脉相承的，它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问题。“新政”加强了对改革的干预，减少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并且政府开始在社会福利方面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从长远看，影响历史的是观念而非利益。进步社会运动最伟大的成就是改变了美国人的观念，认识到了积极自由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让美国人从殖民阴影中走了出来，消除了对政府的戒备和恐惧心理，这也为以后的罗斯福新政、约翰逊伟大国家建设等美国文明的狂飙突进奠定了思想基础。而“进步运动”、“新政”、“伟大社会”建设，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国家治理结构和美国社会，如果没有这些改革，我们不可能看到今天这个繁荣、强大、对公民负责的美国，世界也不会出现一个所谓的“美国文明”。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进行一下说明。古典自由主义发源于17世纪和18世纪，自由市场等概念最先也是由古典自由主义提出的。其实古典自由主义与中国很有渊源，世界上“自由放任”一词的提出源于中国老子的“无为”，法国经济学家魁奈第一个将“无为”翻译成“自由放任”。魁奈是法国最著名的学者，也是汉学家，有着“欧洲孔子”的美誉，亚当·斯密是魁奈的学生，也就从魁奈那里继承了自由放任的思想，将“无为政府”更形象化了，称为“守夜人政府”。古典自由主义政府认为干预会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因此主张将政府排除出经济领域，让经济生活自行其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自由放任在当时是具有先进性的，但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与现在截然不同，亚当·斯密时代还没有发明火车，货币运输还主要靠马车，大家可以想想当时的情况。而现在人家早就进入了大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社会，不仅出现了全国性的大企业，而且

出现了跨国的世界性大企业，自由放任早就不适用了，对经济进行监管是必然的。其实在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早就进入了历史的垃圾篓，现在人们信奉的自由主义属于现代自由主义。

现代自由主义者主张资本主义与福利主义并行，即在自由的市场竞争前提下，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与监督。具体的：认为自由市场不可完全自我约束，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是为了确保有足够的自由。它主张政府为了保护公民，使之避免经济体系中某些时候的不公平。现代自由主义者主张的是：工资和工作时间的立法，组织工会的权利，失业与健康保险，为所有人改善受教育的机会，等等。

现代自由主义信奉机会平等，认为国家应该为公民提供一个起跑点。例如，认为家境的贫寒不应该影响一个人的发展，国家应资助穷人上学，把他们带到一定的起跑线上，以便能与条件更好的人竞争。

现代自由主义认为公民都有享有一定程度福利的权利，这个问题最好由国家来承办。这些都是现代自由主义的看法，也是学术主流。现代自由主义是一种积极自由主义。

现在人们将那些少数企图复兴古典自由主义的人称为新保守主义者，当代中国的很多自由主义人士，其实就是这种新保守主义，其实他们只是从字面意思上妄解了自由主义而已。

当前的中国与进步年代的美国虽然大不相同，但也有很多类似之处，比如都处于城市化的高峰期，各种社会问题爆发得相当严重，而且知识界也同样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盲目排斥政府，社会利益均衡机制被破坏。

而中国比美国更复杂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群体正在以某种缄默的方式结盟，例如，官员通过读博士而与知识精英结盟；教授通过做项目或以高额出场

费参加各种财经论坛，与商业集团结盟；老板则通过与官员“交朋友”而与政府权力结盟，等等。而更可怕的是当学者和新闻媒体也与强势群体结盟的时候，社会的“良心”捍卫机制就不可避免地坍塌了。而这样的事情正愈演愈烈。商业群体通过广告费、公关费控制媒体，而媒体又通过稿费控制知识分子，比如南方周末曾报道紫鑫药业为“摆平”媒体及记者，以及删除已有的负面报道，公司花掉了“天文数字”的公关费：“几百家媒体，最少的给5万元，最多的是400万元，而且这只是一年的保护费，一年到期了，有些媒体和网站要求续签。”这种精英联盟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所在。

而中国现状的改变也需要中产阶级的成熟和知识分子的觉醒，中产阶级的成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知识分子的觉醒则需要从“文革”和计划经济的阴影中走出来，正如美国从殖民阴影中走出来一样，这样才能真正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责任，也才能与中国民众一起致力于中国的社会进步运动和伟大社会建设。

## 七、中国改革不分“左右”，只分“好坏”

中国在建立一个新思维的时候，中国改革不应该分“左右”，而只应分“好坏”。

### 中国改革的阻力与动力

按道理说，改革的初衷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制造问题，但现在并非如此，现实中很多指导改革的人，往往并不是从问题出发，而是从主义出发，从利益出发。

改革有阻力，更有动力，改革的阻力是既得利益集团，改革的动力则是

“将得利益集团”。改革本身不是利益的分配，也不完全是利益的分配，但是帕累托改革几乎不存在，因此改革必然伴随着利益分配，而且是不均衡的利益分配，因此必然会出现改革的受益者和受损者。

国企改革是正确的，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房地产改革制造出的问题则远远大于解决的问题。我们在改革之前，一定要充分重估，一方面是评估，这种改革会制造多少问题，另一方面是评估这种改革会产生多少“将得利益者”。

利益受损者，并非是既得利益者，但改革受益者，肯定是“将得利益者”。在“土改”面前，农民是“将得利益者”，因此土改进行得非常顺利。改革能否进行，不在于既得利益者有多大的阻碍，而在于“将得利益者”占多大比重。

在改革蓝图出来之前，既得利益者表现得比较活跃，而一旦改革蓝图确定了，“将得利益者”就会表现得非常活跃。为什么很多阻力很大的改革，进行起来反而出乎意料地快，就是因为有大批的“将得利益者”在推动。中国要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中下层民众是“将得利益者”，是改革的动力，要抓住这一动力。

在明确中国改革的好坏之前，我们非常有必要讨论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明确了目的，才会树立正确的目标，有了目标才会不走错路。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口号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这样的口号务实。但经济发展了，民生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因此积累了很多的社会矛盾。

但政府的思想很难成为“学者的思想”，因为学者的思想受教科书影响很大，他们的观念是先入为主的。比如，中央提出改善民生很多年了，但笔者翻看吴敬琏的文章，发现他几乎从不提“民生”一词，而是反复提他的市场化，

他还是坚持要建立一个市场丛林社会。

房地产是市场化了，但是民众住不起房了，这样的改革符合市场化，但是不符合民众利益，这就是“坏改革”。如果中国政府通过保障房建设，实现了“居者有其屋”，那尽管政府干预了市场，但这样的改革是“好改革”。归根结底还是要明确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在改革开放初期，奠定中国发展的是两次非常重要的大讨论，一次发生在政治领域，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另外一次发生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这次讨论，同样重要，但只有经济学界的人才比较熟悉。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的结果是重点发展轻工业，从而更好地改善民生，当然与此对应的是很多重工业项目下马，中国开始大力发展轻工业，改善民众的生活。中国改革开放后民众生活水平突然提高，就是这次大讨论之后中国转变经济政策的结果。

但笔者并不认为这场讨论是全部正确的，其实放弃重工业也是不对的，但其大力发展轻工业的思想在当时是合时宜的。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中国在建立一个新思维的时候，不能完全放弃旧的东西，这样中国才不会总在左右之间摇摆，而是实现帕累托改进。其实中国当前改革的转向并没有多少反市场的地方，而是更多地承担了政府本就应该承担的职能而已。“小政府”不是好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才是好政府，中国现在就在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当人的思维陷入某种骗局之后，只有残酷的现实才能让他们警醒，而且即使警醒后，他们仍然存在疑惑。这就像魔术一样，人们都知道魔术是骗人的，但是在没有揭开魔术背后的实质之前，观众总是心中充满疑问。

在中国，恶经济学家是有帮凶的，这就是信奉多党民主的人。他们天真地以为市场派经济学家是民主的天然盟友，但他们不知道这些经济学家信奉的是精英治理，而不是民主。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都是反民主的，哈耶克就是典型。我们必须看清楚，民主与公共服务型政府并不对立，而追求民主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而不是一个什么服务都没有的小政府。

改革本身就是辩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改革，让全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也是改革，谁也没有指定中国改革一定就是照搬美国模式，况且美国也在改革中。

另外中国学者一直使用“国有、民营”这样的二分法来看问题，而实质是“国有、民营和外资”三分天下。外资在大部分行业中都处于了主导地位，中国的民营企业要做的是大胆地与外资抢地盘，而不是觊觎着到那三五个自然垄断性行业去捞金。

当前中国如果要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除了要预防美国的金融洗劫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产业上发力。拉美、东南亚不少经济体没有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其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殖民地经济模式”，仆人的收入永远超不过主人，打工仔的工资不可能超过老板。看不透这一点，中国经济再上一个台阶就很难。

笔者近日阅读《中国财富圈》一书，该书从中国富豪俱乐部的角度揭示了中国商业生态。阅读中，笔者发现有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深圳并没有非常知名的富豪俱乐部，其次在这些俱乐部中丝毫看不到金融高管和科技精英的影子，其原因是深圳大多是金融和高科技企业，两个行业都很忙，没什么闲工夫搞这些富豪俱乐部。大家什么时候看到任正非游走于各种论坛和富豪俱乐部呢？但只有华为这样的企业才是中国的希望。

中国学者需要先锋学者，而不需要极端学者，极端学者大多是知识太少的

缘故。中国需要以公共利益为准绳来发言的知识分子，而不需要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部分学者在政治上主张精英治理，反对民主；在民生上主张市场原教旨的小政府主义，反对公共服务型政府。他们不断地炮制新说，或是威胁恐吓，这在一定时期是有用的，但是林肯的一句名言可以做出解释：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 八、研究中国要用“大经济观”

当代中国经济为什么总是存在那么多的分歧，其关键还是“经济观”的不同。其实，任何人说得都有几分道理，但仅凭那几分道理，就想指点江山，左右政府，那是肯定不行的。

其实大部分经济学人都缺乏一种“大经济观”，这其实就是中国经济分歧比较多的一个核心原因。

当然笔者所说的这种大经济观是指“现实世界的经济学”，而非“理论世界的经济学”。理论世界的经济学，越细越好，无论多么偏激都可以允许其存在，但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却远非如此，特别是为国家建言的经济学更应该慎之又慎，一个小小的经济政策错误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经济灾难。因此研究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就必须拥有“大经济观”，所谓“大经济观”，就是从大处着眼，从大处落笔，即使是微观政策也必须考虑其效用放大之后的影响。

笔者认为，研究大经济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 要有历史的深度；
- 要研究综合条件；



- 要有前瞻性而不是只顾眼前；
- 不能摇摆于政府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
- 摆脱某一学派的限制，综合运用各个学派；
- 不能只为一个利益集团说话；
- 既要考虑经济效益的提高，又要兼顾民生的改善；
- 经济高增长与风险控制并重。

笔者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拉美陷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些国家之所以出现了经济发展停滞的状况，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图一时经济的增长，引入了过多的外资，最后各种产业都被外资控制，成为切切实实的经济殖民地。这就是只顾眼前，缺乏前瞻性。

比如在很多学者的眼里，失业、人权、福利都无所谓，只要经济增长就好，但对于个体来说，不用说半年的失业，即使是一两个月的失业都是灾难性的影响，而这些基本上没有纳入很多经济学家的视野。而低人权、低福利、破坏环境的经济增长，本身就违背了经济增长的目的，这就是只考虑经济效益的提高而没有考虑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改善民生。

比如在美国，经济学谬论邪说层出不穷，而这些谬论邪说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在为某一政客的经济政策做论证时出现的。比如著名的减税不会造成税收减少的理论，比如减税会让富人承担更多税收的理论，都是美国共和党的御用经济学家宣扬的歪理邪说。减税是不会造成税收绝对值的减少，但会造成税收在国民产出中的占比下降，最后只能是赤字经济；另外，减税确实使富人在税收中承担的比例更大了，但富人的纳税绝对值却小了，富人税收与自己占有财富的比例也降低了。这些御用经济学家话只说一半，无非是对缺乏专业知识

的民众进行诱骗而已。这就是经济学家只为利益集团说话。

笔者提倡“大经济”观，其实只希望能够使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氛围能有所改观，但这其实很难。首先这种大经济观对那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是没有作用的，对那些民粹领袖也是没有作用的，对西方多党分赃制下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的政客也是没有用的，对那些根本就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经济学的人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只可能为特别利益群体充当经济打手，而那些民粹领袖也只会利用民众的无知对民众进行可耻的诱骗，而在那些多党分赃制下的政客眼里，自己的政治前途远比国家利益重要得多。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绝大多数学者都对经济学各个派别的理论缺乏了解，他们强调什么，其实是因为他们只知道什么，除此之外一无所知。因此，要用“大经济观”来分析中国问题也只能寄希望于那些真正进行学术研究的人了。

另外媒体对经济理论的选择作用也不可小视，学术界并不缺乏良知学者，也不缺乏严谨科学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和学者往往要经过媒体的选择才能与公众见面，而在这里面，媒体人所起的作用也是十分微妙的。

## 第三章

# 中国各财富阶层分析

### 一、中国阶层状况的新变化

阶层研究是社会学家最常用的方法，在制度经济学中，也经常使用这一方法。在中国进行阶层研究，大家最熟悉的当属毛泽东的《中国各阶层分析》，在那篇著名的文章中，他将中国分为“大中小”三个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后来梁晓声在其书中又对这些阶层进行了分析。

毛泽东在其文章中有个著名的论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他这篇文章中对“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的原因进行了总结，那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而要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就必须进行阶层分析，这样的论断现在同样适用。

而习近平主席一上任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召开了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也是对阶层的分析。

笔者阅读《共产党宣言》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马克思对阶级的分析，这也是马克思创立其学说的基础。马克思敏感地发现了他所处的时代的阶层变化，马克思指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资产阶级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后，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有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

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不仅如此，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出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大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

当工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向他们扑来。

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

马克思还对中间阶级和部分无产阶级进行了定性，他指出，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做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中产阶级之所以反动，是为了维持苟且的生存。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了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马克思还指出了资产阶级到来后的一个现象，那就私人财产的丧失，工业化消灭了小资产阶级、小农的财产，而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根本就不可能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

马克思对阶级的变化，对这种变化带来的社会变化，对各个阶级的定性，读起来仍然是常读常新。而在马克思和毛泽东的叙述中，中间阶级主要指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而现在社会的变化是，中产阶级更多的是指：企业中介于老板和工人之间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其他高收入群体，这是企业不断发展的结果。

阶层分析从来不会过时，但对阶层的划分则必须与时俱进，这也是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首先强调阶级变动的目的。当下的中国社会也早已在发生变化，因此本书并不沿用马克思和毛泽东的叙述方式，而是更侧重讲述目前对中国影响最大、主导中国变革的几大核心阶层。其中一大变化是，笔者不像以前那样将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是分为产业资本阶层和金融资本阶层两大类。

第二个变化是，原来的阶层叙述中知识分子阶层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当代社会再将知识分子看作一个整体性的阶层已经不合适。首先知识分子阶层，也有左派和右派，有为精英说话的，有为底层说话的，有坚持专业立场的，有专门煽动民粹的，因此知识分子阶层是分化很严重的，将其看作一个统一的阶层是不科学的，而现在真正具有影响的其实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经济学家阶层，其他知识分子影响都不大。经济学家阶层是人数极少的一个阶层，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阶层比这个阶层对社会的影响更大，这是本书重点分析的阶层。

另外中国还有非常多的其他阶层，如农民工阶层，人数非常多，大概3亿人，但是他们的影响却极小，在社会变革中不具备主导优势，因此并不做重点介绍。

## 二、产业资本阶层——开明资本阶层

---

去年笔者在研究世界史的过程中，不禁发现这样一个结论，“其实很多政策，特别是对底层有利的政策，出台过程中，往往是开明资本阶层推动的，开明资本阶层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这跟我们以前所认为的资本阶层都是追逐利润的，都是反对社会公平改革的印象并不相同，而这样的开明资本阶层往往是产业资本阶层。

其实这样的案例在中国也开始出现，比如格力公司的4万多员工，都可以享受这“一线员工一人住一室，结婚可以住两房一厅”的福利。中国首富宗庆后，在两会时提案政府加上保障房建设等，另外中国很多企业家也开始加入社会责任全球契约组织。

开明资本阶层推动社会发展的案例有很多。比如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社会保障的国家，在德国的卑斯麦时期，德国的资本家们成立了协会，主动要求把工作日首先从13个小时缩短到12个小时。卑斯麦看到“工厂立法”对平息工人斗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后，便亲自推动了这一进程，世界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都是后来学习德国的。

同样，福利社会建设也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英国人民生活异常困苦，进行社保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1941年2月，英国工会联合会提出“国家再也不能向其国民提供没有实际效果的社会保障服务了。我们请健康部率先对英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调查，以便为英国人建立一种更加合理、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该组织进一步指出，现在必须进行此类调查，以便为未来的改革做好准备。

1942年，120名著名工业家再次联名发表声明，提出关于社会保障改革的建议：工人应该获得充分的发展机会；应该建立一种最低的基本工资制度；工

业企业应该从政府以及相关行业联合组织中得到咨询以避免失业加剧；疾病与残废补贴的领取者一旦失去工作能力，此类补贴应该免费发放。在整个工业部门应建立起带薪休假制度；根据工作性质及其他情况，制定合理的工作时间；向所有未达到离校年龄的学生提供家庭补贴；应该提倡建立私人养老金制度；企业有责任向工人提供合适住房；学生离校的年龄应该提高到16岁。

企业界对社会保障的呼声，直接推动了英国政府在社会保障改革方面尽快做出表示。1941年6月，政府宣布成立一个由各部门组成的关于社会保险合作问题的委员会，这就是“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委员会”，由贝弗里奇爵士担任委员会主席。这是英国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社会保障的开始，后来其他国家的福利社会建设都是效仿的英国。

无独有偶，这种情况也存在当代，2011年美国近140名百万富翁请求国会，为国家考虑，应向他们多征税。这个倡议由“财政力量之爱国富豪团”的138名成员联名签署。该组织曾旨在说服国会终止前总统小布什实施的富人减税政策，不过未获得成功。奥巴马上任后又向由12名国会议员组成的“超级委员会”提出同样要求，以帮助美国财政走上健康的轨道。

“爱国富豪团”成员之一——美国高级教育技术公司董事长舍恩伯格称，“有大量的人跟我们想的一样。”股神巴菲特也撰文指出，美国富人应缴纳更多的税，建议国会立即推行对百万富翁最低收30%的税，而千万富翁最低为35%。他的具体建议为：对100万～1000万美元收入的部分最低收税30%，超过1000万美元的部分最低收税35%。巴菲特指出美国的超级富豪已被宠坏了。巴菲特用自己与他的秘书作为对比，指出他的秘书黛比负担的税率明显高于自己，而黛比的收入相对他来说是微乎其微。与此同时，一批年收入最低达百万美元的富翁联合起来，组成“爱国百万富翁”组织，爱国百万富翁们认为需要对自己增税。



其实奥巴马及其他民主党人士一直在推动提高对富人的税收，以帮助削减赤字。但控制众议院的共和党却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提高富人税收会影响就业，并以此来威胁，但这种影响有多少，到底有没有影响，谁也不知道。

爱国富豪团们也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们提出“当我决定是否要雇用员工来发展公司时，我会严格依据公司是否需要他们、顾客是否需要他们，以及这样做是否会有利公司发展的标准。就我个人税率来说，这个根本影响不了。”

同样，在德国也有一群富豪，他们很有钱，这辈子都能生活得舒服自在，他们看到德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帮有心人决定捐钱出来缓解社会不公。他们捐钱的方式很特别，不是常规的捐给慈善，而是多交税。这帮富人成立了一个“富人赞成多交税”组织，21个富豪加入这个组织，并成立了专门的网站，他们认为，金融海啸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不公现象，他们更觉得捐赠自己的财富还不足够，更希望通过促请政府修订法律，使全国的富人都来出一份力，加入到多交税的大军中来。这46个人在加税请愿书上签名，请求德国政府把最高收入级别的人未来的财产税税率提高5%。富人能多交5%的临时财产税：“德国国库就能多1000万欧元收入，这笔额外收入不应该用来填补国库预算，而应该用来帮助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德国经济恢复元气，用在健康医疗、社会福利方面。”

他们的观念是“财富也是义务”，他们提出“作为德国最富有的3%人群中的一分子，我们深信富人应该贡献更多财富”。他们一直有自己的事业，更认识到在德国的富有人群中：“金钱与责任相伴的观念正在逐渐消亡。同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有些富人甚至开始看不起穷人。”

当然，这些人并非为了出名，因为有些成员根本不愿公布其真实身份，因为他们怕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沃尔默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我宣布我加入了这个组织的那天，我家就进贼了，我已经捐献了我大部分的财富，但那些贼

却偷走了我父亲的怀表。”

“多交几个百分点的税，不会让富人变穷！”在欧元危机下，这样要求自己加税的富人在德国越来越多。几个百分点的税只是从富人的“金山”上取走一点钱而已，这是件有意义的事，这可以帮国家创造未来。足球俱乐部汉诺威的老板马丁肯德说：“我愿意接受更高的税，富人义务偿还国家债务。”汉堡保险公司前总裁于尔根则建议，大幅提高“继承税”是“合理的”。同样在法国，欧莱雅集团继承人贝当古拥有160亿欧元资产，她日前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

### 良知资本主义

“良知资本主义”其实也是一种传统，这种传统比较微弱，甚至被忽视，这种传统认为做一位有良知的资本家，意味着你不能持一种狭隘的视野看待自己企业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不能忽略这种深层次的依赖性；你必须心怀整个系统。《友爱的企业》中证实，有良知的公司最终往往能在市场竞争中胜出；举个例子，“良知资本主义”者最近在美国德州奥斯汀市举办了一场论坛，约150位CEO出席。许多人说，这个圈子让他们第一次有了归属感。

在外国，这些人被称为“爱国富豪”。在中国，“爱国”已经不具备号召力，因为国家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很多人并没有这样的政治高度，也有人将这些人称为“良知资本家”，但笔者也不认同这样的词汇，因为在大多数人的眼里，与金钱物欲相比，良知又值几何？笔者认为他们属于“开明资本阶层”，他们也在乎自己的利益，“共和”美德并非他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但他们更在乎的是系统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这个系统失衡了，他们也将是最终的利益受损者，这也是他们的开明之处。

开明资本阶层往往与资本的大小无关，开明资本阶层中从来不乏大资本家，比如在美国的巴菲特、索罗斯、比尔·盖茨都是开明资本的代表。而能否

成为开明资本阶层与从事的领域密切相关。据笔者的研究，在实业领域，制造业的从业者往往成为开明资本阶层，而房地产开发商则往往不具备开明的特点；而在金融领域，比较开明的往往是公开市场上的投资者，而那些私募市场上的投资者往往不具备开明特点；具体总结起来，那就是挣钱比较辛苦的人往往更开明，而挣快钱的人则不行。

开明资本推动社会变革虽是历史惯例，但也是有隐忧的，因为这些人虽然名气很大，从不缺乏话语权，但也从不是社会舆论的强势主导者。其实美国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仑早在《有闲阶级》一书中，给出了解释，有闲阶级是指那些不需要拥有固定职业、生活休闲、以社交娱乐为主的阶级，这些人才是社会舆论的主导者。而开明资本阶层显然不属于这样的人，宗庆后、董明珠在中国名气很大，但上媒体发布看法的时候也不多，他们的影响力甚至远远低于张维迎、叶檀、石述思这些人，这些人一年中至少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走穴演讲、接受访问、担任嘉宾，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有闲阶级，是社会舆论的真正主导者。这也是开明资本阶层虽然重要，但平时又难以发挥作用的原因，而历史也表明，他们发挥作用往往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而非平时。

### 三、高产阶层——隐形的利益集团

---

社会并非为资产阶层所控制，也并非为中产阶层所控制，而是被以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媒体人、高级律师、高级职业经理人等为代表的四大“高产阶层”所控制，他们是影响社会的隐形利益集团。

很多美好的事物，有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极大成功，在一个国家却很难落地。这里面必定是有利益集团在阻挠，但是这样的利益集团并不一定明显，很多是隐形的，并没有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到，隐性利益集团的危害性并不比那些被公认的“显性利益集团”小。

显性的利益集团，会受到舆论和公意的制约，他们一般不会赤膊上阵，也不可能赤裸裸地与公意为敌，也就是当一个利益集团一旦被显性化了，它的能量就会大打折扣。但是隐性的利益集团却不然，他们可以打着“人民”、“公民”的旗号为自己的集团谋取利益，因为他们还没有被以一个利益集团的身份得到确认，所以他们这种代表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不仅是迷惑着政策制定者，有时也迷惑着真正的人民。

人们喜欢用中产阶层来解释这个社会，其实中产阶层的说法也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中产阶层范围极其宽泛。从低了说，除了极少数低收入者，大多数人都可以归为“泛中产阶层”，比如在印度，甚至中国，都宣传自己有着极大的中产阶层比例，但是这些“被中产阶层”的人，却有着极低的认同感。

另外来看，只要不是企业家，无论收入多么高，都会被归入中产阶层，而这也是严重错误的。其实很多中产阶层，他们的生活品质、消费水平以及所拥有的财富远远高于部分小微企业家。比如高级律师，他们的收入是按小时收费的，代理一个案子就有几百万的收入；高级经济学家，从中国政府、外国政府、各种组织中申请课题，或是在超大型企业中担任独立董事，都可以轻松获得巨额财富；而很多高级管理人员其收入要比普通中产阶层高几百倍。这些人，显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了，这些人才是这个社会真正最具影响力的阶层，是社会的控制性阶层，笔者认为应该将这一阶层单独出来，称为“高产阶层”。

高产阶层这些人的收入相当稳定，而且几乎没有什么风险。比如律师只要不违法也是很安全的，高级经理人即使被解雇了，也不愁找不到工作。相反，我们可以看看那些从事服务业的小微企业的创业家们，他们的财富其实远远没有这些“高产阶层”多，但他们日常之辛苦、风险之高，是这些人难以企及的。

其实资产阶层的利益从本质上是与其工人的利益一致的，如果工人有保

障、素质高，那么企业的效率也高，在福利社会其私人企业的发达程度并不比自由经济体差。另外，我们从历史上看，德国卑斯麦的工厂立法、英国的贝弗里奇改革，都是在资本阶层的推动下完成的，如果从现实上看，现在推动美国增税的也是索罗斯、巴菲特、比尔盖茨这些资本家。

笔者提出“高产阶层”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群体，从经济基础到生活方式，都是完全独立的。中国如果建立福利社会，其实无论是低收入者、中产阶层，还是资产阶层，其实都是受益者。建成了福利社会，政府的利益可以从社会的和谐、官员的清廉中体现，而资产阶层的利益可以从高素质的人才中获益。而建设福利社会唯一受损的就是“高产阶层”，他们并不能得到什么明显的好处，因此他们是福利社会最大的反对者。

而在“高产阶层”中，又以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媒体人、高级律师和高级职业经理人最为特别。他们人数其实非常少，但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极大。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媒体人主要影响舆论，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舆论就是政策的风向标，掌握了舆论，基本上就控制了政策。公民政治，其实就是舆论政治，而舆论无疑是由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媒体人左右的。这种左右是很容易的，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社会课题，如果不是社会矛盾无限激化，广大公众一般是不参与的，在这个时候，“公知”就代言了“公众”。毕竟像“郎顾之争”、“韩寒事件”这些全民参与的公共事件是很少的，在大部分话题上，公众是沉默的。

而高级律师虽然不把持社会舆论，但是这些人更占据了立法机构，任何政策都只有形成了法律才有约束力。如果是对律师不利的法律，基本上就不可能被通过，甚至被提上议事日程都很难。

高级经理人更是控制了整个经济，现代企业都是实行的经理人管理，特别是上市企业，股权极其分散，股东、职工在经理人面前都是弱势群体，经理人不顾企业利益为自己设置天价高薪，为自己积累高额养老金，而不管企业是盈

利还是亏损，不受约束的经理人日益成为毁掉现代经济的危险因素。

#### 四、投机资本阶层——新崛起的控制性阶层

投机资本阶层是金融资本阶层的一部分。在世界上，金融资本阶层是随着近30年世界金融自由化的大潮而崛起的。在金融自由化之前，金融阶层并非存在，而是只有银行家阶层、高利贷阶层和少数的金融投机者，而在庞大的产业资本阶层面前，他们虽然独具个性，但总体表现得并不明显。

人类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则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其中有三大标志事件：金融放松管制，利率市场化，互联网企业的兴起。互联网企业靠的是人气，必须有一定的关注度才能盈利，因此很难像传统企业那样一步步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必须高举高打，因此诞生了一批职业投资阶层，这是传统工业时代没有过的现象。此时金融阶层的成员迅速扩大，对冲基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基金等相继涌现，这些人手握重金，成为控制社会的一股力量。

任何一个阶层崛起后都会寻求自己的政治利益，在中国金融发展虽然比较滞后，但近年也诞生了一批职业投资人，这些人渐渐成为中国金融阶层的代表性人物，比如大家熟知的李开复、薛蛮子、王瑛、王功权等，这些人都是中国金融阶层的代表人物。如果将当今中国的资本阶层分为实业资本阶层、地产资本阶层和金融资本阶层三类的话，则金融资本阶层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地产资本阶层和实业资本阶层。

中国的金融资本阶层已广泛介入中国的舆论、政治和学术等领域，而且操控性越来越明显，经常有越轨的行为。但与这些具有西方背景的金融资本人物不同，中国也有一些本土成长起来的投资人，比如李世默、裘国根等，他们积极捍卫中国的金融利益，支持本土学术发展，成为中国颇具建设性的一股力

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金融阶层内部这两股力量的此消彼长也将决定着中国的长期走势。

### 投机资本阶层在西方的表现

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放松管制，最早始于1960年代前后的美国。20世纪下半叶，美国银行法律和监管体制经历过多次重大变革，亮点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逐渐放松金融管制，银行开始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不断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坚持多年的地域限制和分业经营限制被打破。索罗斯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出台对信贷放松管制的政策，以及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对于市场的自我修正能力的过分信任，导致了美国市场的信贷泡沫越来越大，并最终引发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金融业的放松管制方面也迈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两个步骤。取消了对金融机构在市场准入上对地理和产品两个方面的限制。此后也陆续为JP 摩根公司经营证券业务和花旗银行收购经营保险和证券业务的旅行者集团开了绿灯。

1994年国会正式通过了《瑞格尔尼尔法案》。这一法案正式结束了关于跨州经营和设立分支机构的所有限制。而打破产品上的限制则经历了更为复杂的过程。

真正从法律意义上彻底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还是在1999年11月国会正式通过了GLB 法案。GLB法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最核心的两个条款，即禁止国民银行和州成员银行设立以经营证券业务为主的附属机构和禁止国民银行和州成员银行与证券经营机构拥有共同的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和董事的规定，这就意味着，隔离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防火墙被拆除了。

多数金融机构经批准都可以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子公司的形式开展跨

地区、跨产品、跨行业的多种业务。虽然许多金融机构将会根据其自身具有的特点和优势而找出一个特定的市场定位，但所有机构的潜在经营范围却被扩展到几乎不受限制的地步。实际上这确实是美国现代金融史上的一次大解放。它意味着在美国实行了近70年、对国际金融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金融分业经营制度，终于走向终结，以“猫”“鼠”双赢的形式走进了金融发展新纪元。

### 赌场资本主义的特点

在过去的工业资本主义那里，人们通过勤劳工作、创造发明而致富，而现在，这些品德在金融资本主义面前变得一文不值。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导致资本主义成功的因素，例如勤俭、节约、勤奋、努力等美德，已经被金融资本主义所抛弃。与产业资本密切相关的经济民族主义也荡然无存。如今的许多投资银行家没有国家概念、没有道德底线，也无所谓做社会责任人。从前有个“美国梦”，即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功，这个梦现在不再现实。金融资本主义不需要传统意思上的勤劳、努力等美德，它的美德是“机会主义”。

当今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也已经有了质的变化。虽然实体经济还是依赖于金融经济，但金融经济可以脱离和独立于实体经济而运作。这是一种单方面的依赖，即实体经济依赖于金融经济，但后者不必依赖于前者。

金融在成为当今资本主义的绝对核心之后，明显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是金融资本挟持了政府，甚至整个经济。金融资本往往是“过大而不能倒”。其逻辑就是，“我倒下了，也要把你（整个经济）拉倒；因此，你如果还想活下去，你首先必须把我救活。”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为了拯救经济，美国政府动用了大量纳税人的钱来拯救美国的金融业。

相反，金融业还是根据自己的逻辑在发展。当然，除了威胁政府，金融资



本实际上也早已经开始操控政府决策。例如，西方国家早就有征收金融交易税的思想，意在遏制过度投机的金融交易。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思想还只停留在思想。要把此思想转化成为政策和法律非常困难。原因很简单，金融业用其巨大的财富力量在背后作梗。即使是像2008年那样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也没有促成美国政府推动这个立法进程。

### 投机资本的政治特质

当代金融业迫使世界上所有一切“货币化”或者“商品化”，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这也是金融资本的本质决定的。只有当一切都货币化了的时候，它们才可能成为“流动性”的一部分，才可以进入金融交易的过程。金融资本要求各国政府放松对资本的管制，要求开放资本账户，要求用货币来量化财产的价值，等等，这一切都不难理解。

从这个角度看，当代金融业也不需要传统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自由，即避免政治权力的干预。相反，在很多领域，金融资本主义需要政治权力来帮助推进事物的“货币化”进程。这典型地表现在新自由主义和专制政权之间的精诚合作。在一些专制国家，私有化运动远较民主化国家来得有效和彻底，在那些地方，权力和资本的结合推动了私有化运动，私有化又推动着“货币化”，最终又服务于资本与权力。

诚然，并不是说没有政府认识到货币化的弊端和恶果，但几乎没有政府能够拒绝金融投机为其所带来的“快钱”（短期内的经济景气），并美其名曰“生产效率”。这方面，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政府需要大量的钱，就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让金融投机大行其道，在国内和国际上兴风作浪。对美国来说，因为其金融系统控制了整个世界，美国通过其金融业的投机，把其他国家已经货币化了的财富转移到美国来。有这么大的好处，美国政府是不会对金融业实行真正有效的监管的，尽管金融业这样做也在其国内制造了很多问题。

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专家苏珊·斯特兰奇在《赌场资本主义》著作中，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具有高度的投机性和风险性。斯特兰奇和其他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恰如一个巨大的赌场，它具备了赌场的的所有要素：赌徒、赌具、赌资、筹码和赌场的规则，它也像赌场一样充满了投机和风险，少数赌徒可能一夜暴富，但更多的则是满盘皆输。

### 投机资本阶层的行为特点

投机资本阶层比其他资本阶层更渴望金钱，因为金融资本阶层更希望赚快钱、赚大钱，他们一切只以金钱来衡量，严格计算投入产出比。金融资产阶级赌博性更强，传统的工业资本赌的只是商业趋势，而金融资本赌的则更广泛，因为他们的产品不直接面向社会，而是轻资产公司，不会像传统产业那样拥有动辄几万的员工。金融资本阶层渴望被关注，传统产业资产阶级只希望人们关注他们的产品，而企业家本人则往往非常低调，而金融产业，严格说没有核心产品，他们只能打造明星、明星老板、明星交易员、明星分析师，或是直接傍上明星企业等，由于有出名的需要，因此这些人更喜欢在公共事务领域发言，更喜欢做全民明星，这样才能得到更多的关注，招揽到更多的客户，接到更多的业务，这一点在天使投资、风险投资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投机资本阶层往往喜欢给自己披上“成功人士”、“慈善家”、“公共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的外衣。金融资本阶层对政治的欲望更强烈，但他们不喜欢像传统产业资产阶级那样用钱来收买政客，而更喜欢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控制力让政客主动就范。

## 五、城市白领阶层——真正的社会底层

新城市赤贫阶层是这个时代最值得关注的群体，他们结婚无望，买房无

望，维持基本的生活都很困难。城市赤贫阶层以刚毕业的学生为主，但不局限于刚毕业的学生，有的人已经毕业数年，但也无法摆脱赤贫的命运。这些人以前被称为“蚁族”，现在被称为“屌丝”。

### 中国赤贫阶层的特点

中国的赤贫阶层跟拉美和印度不同，拉美和印度的赤贫阶层大多缺乏正当的职业，而中国的赤贫阶层都有着体面的职业，比如他们在公司从事着诸如行政管理、人力资源、市场策划、财务会计、平面设计、质量管理、计算机、文秘文员，甚至新闻记者、出版编辑等职业，但共同的特点就是工资极低，不仅比技工更低，有的比农民工还低，低到仅仅能够勉强维持最低的生活。比如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他们每月仅能拿到3000多元，而在其他城市或许工资只有2000多元，他们维持这种最低的生活还是在公司提供宿舍的前提下，如果公司不提供住宿，他们几乎生活不下去。

中国的赤贫阶层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有第二个区别，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温带，有着长达三四个月的寒冷冬天，因此在中国很难见到像印度、拉美等热带国家常见的简陋到只有一张塑料布的房屋。中国赤贫阶层的居住条件则主要表现为拥挤，公司集体宿舍、多人合租的小区房等，这与那种露天房相比，看起来不那么像贫民窟，这也是很多人不承认中国存在贫民窟的原因。

工作体面与赤贫好像很难联系起来，但在中国却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前两年中国有媒体搞了个“八零后大典”，选取了一些典型的“八零后”进行报道，其中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报社的调查记者，工作两年都攒不下两万元钱。而该报一直被看作市场化报纸的成功样板，而调查记者也因其高危险性，工资还高于其他记者，知名媒体的调查记者尚且如此，而其他人更是可想而知。

中国年轻人刚步入工作岗位时，70%需要家庭接济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啃老”。这些人两年内基本上可以做到不再需要家庭

的接济，但很难攒下钱，绝大部分人在30岁之前没有进入更高级的职位，仍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在生活中看不到希望。

新赤贫阶层的出现，白领阶层的赤贫化，很多人以为是高房价的原因。这是主要的因素，但并不是全部，因为很多人连基本的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买房是他们没想过的事情，他们也从不去售楼处询问。

中国企业基层人员的赤贫化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大企业的工资差距高达1000倍，很多名企高管的年薪可以达到数千万元，而普通大中型企业高管的年薪也有几百万元，而基层职员的年薪只有几万元，相差百倍。这种差距如果是在10倍、最多不超过50倍的差距还是可接受的，而目前几百倍、几千倍的差距则是离谱之极。

### 提高最低工资才能减少赤贫阶层

关于调节贫富差距，从人大代表到舆论媒体，都在炒作“提高个税起征点”，但是从来没人提“提高最低工资”。对于贫富分化来说，提高最低工资却是比任何手段都好的方法，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形同虚设，对企业没用。在深圳，在企业里随便一个工作都能达到月工资3000元，政府却将最低工资定为每月1500元，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能将最低工资定为3500或是4000元，意义则完全不同了。

提高最低工资，可以提高基层人员的工资，拉小基层人员和高管的工资差距，中国应该建立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的联动机制，不再人为地调动，而是自动地调，比如让最低工资为平均工资的60%等。

其实提高最低工资并不会影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因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是由其平均工资决定的，而不是最低工资。提高最低工资也不会导致企业裁员，企业需要多少人，主要是由岗位决定的，而非工资。其实中国的工资增

长很快，差不多五六年就会翻一番，比如改革初是几十元，现在是几千元，增加上百倍，企业照样会招人，不会受太大的影响。

## 六、经济学家阶层——也是有阶级性的阶层

我们常说经济学家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是从利益集团的角度分析的，这是政治学经济采用的另一种分析方法。其实经济学家也是分阶层的，因为经济学是一种思想，所以这种思想的形成更多的是与经济学家在小时候所处的阶层有关，因为经济学家的思想更多来自于自己对社会的理解。

经济学虽然诞生于西方国家，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但却是一门有着极强的道德传统的学问，而且它一直以来的道德传统，可以说高于众多学科。但由于经济学极具现实性，所以也出了很多背叛经济学精神的人。在经济学学家中，最有良知的是中产家庭出身的，有两类学者最可能“变坏”，一类是贵族后代，一类是从非常卑微走向成功的人。贵族后代，从小就高高在上，所以一生都瞧不起普通人，而那些在卑微的环境中长大的人，总是喜欢向富人靠拢。具体到学术界，贵族后代出身的人，大多反对政府对穷人进行照顾，而那些出身卑微然后成功的学者，大多喜欢吹捧企业家，成为“资本二奶”，这两类人都容易成为社会的破坏分子。相反，那些中产家庭出身的学者往往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正能量”。

这些经验性总结，无论是用到中国还是世界上都非常有效，只要将知名学者的出身和他们的主张一一对应，你就会发现神奇的准确。比如，世界上最“坏”的学者当属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了。哈耶克就属于贵族后代，哈耶克所属的家族在欧洲历史上都是有名的贵族；而弗里德曼的出身则极其卑微，父亲是个水手，而且去世较早，弗里德曼很早就是孤儿，靠教会养大，而且成功后，

也对教会不感恩。

另外出身贵族的还有帕累托，在福利经济学中他是个有名的人，但这个人出身是贵族出身，其祖父还被拿破仑封为帝国男爵。自从他“搅和”到福利经济学中之后，福利经济学就彻底变味了。福利经济学在创建之初是对穷人有利的，主张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但自从帕累托这个贵族经济学家提出一个“帕累托最优”后，福利经济学基本就停滞了，就再也没为福利社会建设做出任何贡献，帕累托的主张本质就是为富人提供保护的。

而我们看看创立福利经济学的人，则出身于中产家庭。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是霍布斯，出身于军人家庭，属于中产阶级，福利经济学的另一创始人庇古则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也是中产阶级。霍布斯和庇古创立的福利经济学在经济学史上被称为“旧福利经济学”，帕累托以后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进入新福利经济学之后，福利经济学就成了少数知识分子的数学游戏，再也无法走进社会了，福利经济学那“改善社会整体福利”的宏大目标，更是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我们可以再往前看，庇古之前最有名望的当属马歇尔了。马歇尔也是一个流着“道德血液”的经济学家，一直将改善穷人的生活作为自己研究的目标，马歇尔是剑桥学派的创始人，是英国正统经济学界无可争辩的领袖，现在大家所熟悉的西方经济学的框架就是马歇尔奠定的。马歇尔的父母从事什么职业，现在无据可查，但有资料显示其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朴实的中产阶级家庭”。

我们再看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这也是个毫无道德瑕疵的学者，道德学教授，出身律师家庭，父亲还做过法官和海关监督。

西方经济学的另一个标志人物是凯恩斯，他出身于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剑桥大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母亲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和社会改

革的先驱。

马克思一生为工人命运担忧，但出身并不差，出身于一个律师家庭，妻子更是名门望族，马克思要想过上上层社会的生活太容易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经济学的重点开始转向美国。战后初期直到20世纪70年代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是萨缪尔森和加尔布雷斯了，萨缪尔森出生在药剂师家庭，加尔布雷斯父亲是个农场主，而且热衷于公共事务，出任过多次的县议员，也是中产阶级家庭。加尔布雷斯最主要的理论就是“公共贫困”理论，他是美国人权总统肯尼迪的老师、约翰逊总统的好友，是美国战后建设“伟大社会”的灵魂人物，甚至约翰逊总统关于“伟大社会”构想的发言稿都是加尔布雷斯起草的。

这些在历史留下英名的经济学家都是中产阶级出身，他们分别出生在律师、药剂师、军官、牧师、农场主等家庭。当然，这些伟大人物的存在并不能说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流着道德的血液，而是相反，这些好人在历史记载中是多数，但在现实中却是少数，因为历史往往只记录英雄，而现实中往往那些恶棍比好人混得更体面。在经济学中，也有一派称为“庸俗经济学”，这些人歌颂资本主义的伟大，吹捧资本家的英明，极尽恶俗之能事，这些人现实中非常多，但代表人物并不出名，所以大家很难知道，我们也可以介绍几个代表性人物。

庸俗经济学是马克思的文献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但不是除马克思之外的经济学家都是庸俗经济学家，庸俗经济学家只是一个支流，西方经济学大部分学派都大方典雅，庸俗的只是少数。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是庸俗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出身于法国一个大商人家庭，自己也是一个酒商。

萨伊也是法国的一个庸俗经济学家，父亲是个巴黎的银行家，萨伊被人们所知道主要由于两个事件，一个是凯恩斯推翻了萨伊的论断，创造了宏观经济

学，而供给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又因为恢复了萨伊的论断，而声名鹊起，所以萨伊也经常被人们提起。

以上两位庸俗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都是出身于大商人家庭。我们再看看出身不好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弗里德曼和卢卡斯、曼昆等人成了新的庸俗经济学家的代表，以歌颂资本主义制度著称。弗里德曼出身于极其卑微的犹太家庭，甚至连父亲的真实姓氏都不知道，弗里德曼这个姓氏是借用别人的，关于他母亲的情况也是知之甚少。弗里德曼一家是从奥匈帝国到美国的犹太移民，到美国后，在美国的血汗工厂工作，也做零杂工、水手等，按弗里德曼的说法是“从没发过财”，弗里德曼的父亲早逝，他主要靠教会帮助才完成学业。弗里德曼1912年出生，又是移民，而且当时正是美国由镀金时代向进步时代转变的时刻，可以算是美国“坏”到顶峰的时刻，弗里德曼出身于这个时代、这样的家庭，对社会和政府当然没什么好感。

我们再看看曼昆，曼昆和弗里德曼一样，也是来自移民家庭。而且1958年他从乌克兰移民到美国新泽西州。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是1957年结束的，当时在美国只要与社会主义沾边的人都遭到迫害，即使不与社会主义沾边，只要有进步思想的人都会受到迫害。大批的作家、演员都遭到了迫害，到了后期迫害范围更大，扩大到了政府和军队，甚至包括马歇尔这样享誉世界的军功精英们都没有逃脱麦卡锡主义的魔爪。1958年虽然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结束了，但仍是冷战的高峰期，一个从社会主义国家逃到美国的人地位一般也不会很高。资料介绍曼昆的父母靠“辛勤工作”过上了中产阶层的生活，但在战后美国的黄金时代，中产阶层的定义早就发生了变化，因为当时正处于美国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有正式工作的人都算中产阶层，曼昆的家庭并非很好。资料对于卢卡斯介绍不详，只知道他从公立高中毕业，美国是个私立学校发达的国家，中产阶层一般都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所以卢卡斯的家庭应该也一般。曼昆和卢卡斯出身不像弗里德曼那么差，所以他们的思想虽然也极端，但不像弗里德曼那么



极端，一般是越是贵族或是越穷越极端。

我们看看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知名人物，阿马蒂亚·森是一位有盛誉的良知型福利经济学家，他的外祖父是研究中世纪印度文学的著名学者，是印度教哲学的权威，与泰戈尔交往甚密。阿马蒂亚这个名字就是诗翁泰戈尔为他取的，他的父亲是大学里教授化学的教授。

一日为贵族，世代为贵族。贵族出身的学者的思想倾向是由报复心理决定的，在他们内心深处一直将自己当成高等人，是绝不让普通人也享受贵族待遇的。而那些卑微家庭出身的则往往是补偿心理，他们歌颂企业家，喜欢献媚于资本家，这些人的行为在社会心理学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那些真正抱着改良资本主义思想的往往是那些中产家庭出身的学者，而那些顽固的歌颂资本主义制度、企业家精神的庸俗经济学家们都是贵族后代或是出身极其卑微的人。其实资本主义的好处是任何人都知道的，而且后来的庸俗经济学家们的阐述并不比亚当·斯密的理论突破很多，而且马歇尔、凯恩斯、加尔布雷斯也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的反对者，他们的区别就是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提出改良的主张，这也是他们比那些只会吹捧资本家的学者高明的地方。

在中国贵族经济学家则以吴敬琏、茅于軾为代表，经济学者吴敬琏总是以贵族自居，甚至在演讲中以自己从小学到大学都在贵族学校上学为荣，甚至提出中国大学应该培养“贵族”，可见他自己的贵族思想是多么严重。茅于軾更是如此，虽然不像吴敬琏喜欢用贵族一词，但喜欢用“精英”自居，因为吴是贵族，而茅家根本算不上贵族，只能算精英。而他们的精英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一度享受贵族待遇，甚至提出精英主导社会，主导变革等，其实都差不多。

中国出身卑微的经济学家当数张维迎和陈志武了，吴敬琏等人的童年全是

美好的回忆，而张维迎和陈志武则更多的是贫困的记忆，这在两人的回忆性文章中经常看到。这些在贫困中长大的学者往往存在着很强的补偿心理，一旦成功后，必须马上补偿回来，因此天天吹捧资本家精神，频频向资本暴发户邀宠也就不难解释了。

其实，庸俗经济学从来就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他们疯狂地向正统经济学进攻，以掩盖自身概念、理论、体系的缺憾，一般理论素养极差，只有破，没有立，很难提出有针对性、现实性的观点！虽然人数众多，一时星光熠熠、人头攒动，但最终不会获得主流经济学的认同，以批判政府、兜售右翼民粹主义为晋身之阶，哗众取宠！

相反，左翼学者中，反而大部分都出身优越。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之前就已经是声誉卓著的道德教授了；马歇尔将经济学看作“精明的科学和热爱人民相结合”的一种职业；加尔布雷斯、阿玛蒂亚森、缪尔达尔更是为减轻贫困、改善社会福利而进行研究；凯恩斯虽不研究社会福利，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他却坚决反对向战败国德国索要过多的赔款，他预言如果索要过多赔款，将导致德国的反抗，爆发第二次战争。不幸他的预言成为了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们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再也不向战败国索要赔款了，相反的是在战争一结束，就马上帮助战败国复兴经济。同样，加尔布雷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反对盟军对德国进行狂轰滥炸，“越战”时，更是反对“越战”，甚至不惜与自己的好友约翰逊总统决裂，实践证明他的论断是正确的，美国如果早点结束越战，其损失要小很多。当然这些人的呼吁是有经济学做基础的，但更多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良知，战争不可避免，但过度的生灵涂炭则是不必要的。

阶层分析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因为人会变化，会受到进步思想影响，而做出与其阶层不同的行为。但阶层分析往往又是那么的有效，因为这种与自

己阶层特征不同的人毕竟很少，绝大部分人都不能免俗，因此阶层分析又往往出奇地准确。

由于现在的利益比较复杂了，阶级分析法现在不太用了，但不等于失灵。一个现代公民，有三种身份，首先是地域身份，第二是职业身份，第三才是阶层身份。现在职业身份是非常重要的，地域身份和职业身份也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

比如在美国，加州是民主党的票仓，因为硅谷等高科技产业在加州，民主党一直对高科技产业照顾有加，所以加州人都喜欢民主党，况且加州人很多都是搞科技的，所以支持民主党。民主党在美国主要代表中下层人民的利益，由于一直支持高科技，所以比尔·盖茨等靠高科技发财的人也支持民主党，这就是职业身份在起作用。

但也有阶层的影响，比如美国加州的华人属于政治上的弱势群体，华人在美国政府那里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好处，所以美国的华人从来不支持主张大政府的民主党，传统上支持共和党。因为加州华人非常多，所以很多民主党都担心因为华人导致加州变色，所以近年来开始频繁地拉拢华人，向华人示好。美国的华人就跟弗里德曼这种人是一样的，从来就没从政府那里得到过好处，也就自然认为政府不好，政府从来没关怀过他们，当然他们也对政府不信任。

中国的50后、60后、70后，都比较支持政府，因为他们从政府那里得到过好处，80后支持政府的也不少，但到了90后、00后，这些人就难说了。特别是90后这代人处于“小政府”主义的高峰期，目前这些人成为网络舆论的主要参与者。中国虽然推出了免费义务教育、营养午餐计划，这些人也许会更信任政府，但这至少是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 七、舆论阶层——舆论不代表民意

舆论和民意从来就不是一回事，但舆论往往被误解为民意，但其实很多时候舆论只能代表一部分民意，在一些网络媒体或是社交媒体上更是这样。

### 舆论是否等于民意？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曾发表讲话，提出“现在流行的是，谁能够讲出极端的话，就能够博得网络的眼球……你要讲一些合理的话，反而是被反驳、被攻击，有走极端的倾向。”这是切合实际，也是非常中肯的话。在笔者看来，中国社会舆论所呈现的“走极端”倾向，跟媒体行业的大变革有着很大的关系。

### 媒体的三大倾向性结论

不管你愿不愿意，媒体正一点一滴地渗透你的生活，开始操纵公众的生活，媒体首先划定一个“正义”的一方，然后引导人对其痛恨起来。你变得不喜欢思索，情绪开始随媒体波动。也可能在媒体的启发下，你开动了脑筋，开始了自以为是的“探索”，却仍在媒体思路的掌控之内。电视、报纸、网络铺天盖地向你袭来，看似“花样百出”的趋同思维，你左冲右突，无处遁形。而在媒体的鼓噪之下，人们往往会得出这样三个结论，第一，你生活在最坏的时代，第二，你生活在最坏的国家，第三，这一切都是政府的错误。

媒体民粹化，报纸主编的所谓“拍桌子”选题，只是吸引更多人的眼球而已，即使专业媒体也并没有体现出“专业”和“专家”的力量。记者的选题、采访与专家并无关联。经济类媒体也大都还停留在现象的描述，而非深入事物的本质。以前媒体追求“公信力”，现在更喜欢“争议性”，做出有争议的报道，反而是成功的表现。

然后这三种论调并非一定是预设的，而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是媒体追求负

面、追求轰动的必然结果，然而这三种论调却给某些民粹分子提供了运作的空间。比如你生活在最坏的时代，所以你应该起来革命，不革命也应该改革吧，这两个逻辑就是这样连接起来的，所以宣扬革命或改革的人永远是媒体的宠儿，而人们不管这个人到底懂不懂改革，或是他的主张是否正确。

对于第二个论调，媒体总是宣言你生活在最坏的国家，既然自己的国家是最坏的，那其他国家总比自己的国家好吧，所以民粹分子马上就给你支招：你应该移民，离开这个国家。然而这些宣扬移民的，却是些对外国丝毫不了解，甚至大多是从没出过国的屌丝文人，这不重要，反正这种论调是符合媒体预设的逻辑的。

我们再看第三个论调，一切社会不好的现象都是政府造成的，那就应该不要政府了吧，或是“小政府”吧，“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吧？民粹分子们尽管从来没有进行过政治学、行政学的研究，也不懂得社会运作和社会管理的基本常识，但不妨碍他们给出政治建议。

媒体的三大结论尽管不是媒体的目的，但他们又从不排斥这样的主张。不经意间媒体与民粹主义分子完成了精妙的合唱与合谋。民粹分子的言论证明了媒体的预见性，媒体的案例为民粹分子提供了依据，两者配合得天衣无缝。他们联合起来似乎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媒体将这些人吹捧成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而民粹分子们将媒体吹捧成最有良心的媒体。媒体的批判不再基于客观的了解，而都是基于对现实的错误观察。但是改革不慎的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移民美国的都上当了，小政府更是早已证明是失败的东西，但媒体不管这些。

### 市场化让舆论呈现右翼民粹倾向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一旦与市场化结合起来，就开始变味。市场化的民主导致媒体开始追求眼球，为了自身利益而放弃了社会担当，还通过绑架社会责任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广告一般是媒体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媒体的广告业务员在面向客户时不得不向客户炫耀自己的阅读对象就是“有购买力”的群

体，既然客户是最有购买力的群体，那就得为这个群体制作内容，而“有购买力”的群体无非就是富人，所以中国媒体的民粹倾向都是右翼民粹倾向，而非左翼民粹倾向。

一般认为媒体最具危机意识，但媒体只炒作老百姓能看得懂的危机，而对那些暗藏的、潜在的危机，或是只有专业人士才能看懂的危机则漠不关心。

### 不同媒体产品的“选择效应”

媒体曾经对社会进步起到过重要作用，但为什么媒体突然变了呢？其实归结起来是“产品”的变化。在市场经济中，媒体也是产业，存在不同的产品，其实在商业社会，一切都是产品的问题。杂志、图书主要是学者名流的阵地；报纸，特别是都市报捧红的则是时评写手；而博客捧红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真诚的诉说者，一种是不负责任的社会起哄者；微博捧红的基本上是造谣者，真正的学者、饱学之士不再吃香，知识程度接近文盲的“公知”都成了领袖。

在杂志当道的时候，学者们控制着媒体，杂志一周或是半月、一月一本，刊登的都是成熟思考的文章，而且主要靠订阅。后来，慢慢地舆论界成了报纸的舞台，而且不再靠订阅，而是靠广告，新闻都是当天的事件，评论都是对当天事件的评论，各报纸纠集一些虽然混在大学、但从来不做研究的所谓教授，或是让自己的资深记者撰写所谓的“时评”，几十分钟成稿，然后开始传播，这样的东西能要吗？网络兴起后，这些禁不住推敲的东西本身所具有的争议性，更是让这些写手们成了时代的宠儿，还一度被评为“公共知识分子”。

“批判性”是建立在对“批判”对象的理解上，但这种“理解”需要相当的辛劳，是要建立在深入的调查研究之上。不同的媒体选择的却是不同的学者，不同的产品适合不同的学者，学术界从来就不缺乏学养敦厚、理性客观、而又极具创新精神的学者，但这些人并不受媒体欢迎。媒体不喜欢“专家”，

他们喜欢“砖家”，“砖家”才有争议，有争议才有销售，媒体的这种“选择效应”才是一切社会怪相背后的关键。

很多媒体人往往是这种选择效应的最先受害者，他们率先随着自己的报道起舞，或高兴，或愤怒，甚至有志于成为社会改革者的一员，殊不知舆论并非全部民意，舆论只是被选择的民意。

媒体的这种“选择效应”，导致了民意呈现上的“偏颇”，这种偏颇也给某些政客提供了利用民意的误判，以为自己与舆论做后盾，可以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但真正行动起来，往往支持者寥寥。聪明的政治家应该看到媒体的这种选择效应，正确地估判民意，真正洞察到民意的天平到底在哪边，而那些更具智慧的政治家更应该注意到那些不被选择的民意，主动去回应他们，则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

网络阅读就是标题阅读，绝大部分读者都不会点开文章看内容。网络媒体将平面媒体的文章随便抽出一句话作为标题，基本上都是煽情性的标题，或是直接自己弄个完全偏离文章意思的标题，这种选择甚至变成了煽动和制造民意，很多时候会偏离主流民意。而情绪社会，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思考。

这里面也有个技术性的问题，首先，门户网站的首页都是经过选择的，编辑将最劲爆的内容推到首页，而一个门户网站的转载源就有最少几百家平面媒体，因此门户网站也就集中了这几百家媒体最劲爆的内容。所以网站比平面媒体更容易走极端。其次是随意改动标题的问题，大家看门户网站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首页上所有文章的标题都是长度差不多相等的，这就是编辑加工的结果，如果标题有长有短就很难看，为了首页的美观，所以必须统一，大网站都有专门的“首页编辑”，主要任务就是选择文章和修改标题。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媒体不仅看热闹、凑热闹，而且更热衷于制造热闹。而要改变这一切，最终需要新的媒体产品的出现，或是媒体技术的变革。

## 西方也一样

戴雨果是在中国非常知名的国际媒体人，他在大学工作的同事James Curran 和Jean Seaton所著的一本书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可理解为《有权无责的媒体》，无具体中文翻译，但此书为英国媒体学生科目的必读书目）中指出，西方记者一味地批判与摧毁性的评论态度，而很少有有价值的、积极有用的报道，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最近一两年英国出现的问题，根源也在于媒体只是一味地摧毁破坏社会关系，颠覆政府统治。可是国家需要政府，需要一个可以让人们生活更好、更安全的政府。在欧洲，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甚至于美国政治家们，他们都很担心那些不负责任的媒体。

## 媒体摧毁了政府

媒体人虽然从来不是救世主，但他们应该对自己更负责任、更有积极性、对社会更有贡献，而不是一味地诋毁政府。媒体对政府的攻击，使国家的政治家们本应该为我们的未来计划和实施有效的措施，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这么做。他们花了很多的钱在那些没有远期效应的事情上。

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总体来说，大概有50%的年轻人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失业。由于政策上的缺失和政府管理上的不善，他们也很难自己做些小生意，所以他们想要通过创业来自食其力也很困难。这个问题很严重，政府把大笔的钱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他们没有为青年就业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也没有为教育提供更多相应的设施。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另一方面，政府想要提高医疗保障的制度，可是花费却巨大。例如英国，它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公民医疗体系，公民医疗基本是全部免费的，但是政府无法全部负担这样大的医疗支出。媒体本身的腐败，不道德的甚至违法的新闻报道等，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舆论只是民意的一部分而已，而舆论往往将政府导向短视。



### 舆论阶层的生存状态

在西方，媒体人被称为“聒噪阶层”，虽带有讽刺，但也确切，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兴起，更是如此。而前段时间爆发的“柴静表演新闻”事件，更激起了全社会对媒体伦理的讨论。

媒体人其实面临的压力非常大，媒体的门槛非常低，工资并不高，但是他们面临的工作压力可与业务员相比，而且工作方式也与业务员相似。他们每天都要进行陌生拜访，每天都有写作压力，业务员如果是体力劳动的话，记者是体力劳动加上脑力劳动。

网上有这么一个段子，从中可见媒体人工作之难：某报社招聘记者，许多人打电话到办公室，说保安不让进，希望接一下，考官说：不，如果这都对付不了的话，别做记者了。最后，大部分人都进来了。翻墙进来的最后成了狗仔队；讲理进来的成了评论员；软磨硬泡进来的去跑官会了；撒泼打滚进来的后来都提拔成了总编；硬打进来的顶了保安。

有一个朋友，在上海一家媒体工作，她告诉我，她丈夫受不了她的工作方式而与她离婚。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打开QQ，仍然在线的总是媒体界的朋友。

新闻强调新，新闻的新与企业界的创新不同，新闻主要是观念和认识的新颖，几乎每个新闻都改变着人们的观念。许多接触社会较少的人，他们的观念全部来自于媒体。有时聊天，对方几乎都是在谈新闻事件。这些新其实就是一种洗脑，如果你看到了新闻报道，你的观念没得到改变，这个新闻就失败了。

媒体也经常与启蒙联系在一起，很多媒体人也将自己当成了新观念的灌输者，但是现在的这个社会不是启蒙太少了，而是太多了。

舆论不是民意，甚至往往与真实的民意相反。媒体热捧的人，在民意调查中可能90%以上的人不支持，媒体批判的人可能90%的民众都支持，凭一个网

络专题就想给整个社会洗脑，编辑的想法太天真。新闻可以有态度，价值可以多元，但严肃与公正才是媒体赢得长期影响力的根本所在，公道自在人心。

媒体的新闻，更多是个例，但读者其实是分不清的，读者更多是将个例看成通例。在媒体眼里，乞讨人员都是高薪职业，快递员月薪过万，但你真相信这是真的吗？如果乞讨是高薪职业，那为什么大冬天，他们仍然露宿街头？如果快递员月薪过万，那为什么还有农民工为了等活，而睡在大桥下面？他们难道比快递员收入更高，或是快递门槛太高，他们做不了？不是这样吧，很多新闻其实都是禁不住推敲的。新闻传播有时候也需要止于智者。

新闻人对社会的认知是扭曲的，首先遭受这种扭曲的其实是他们自己，然后才是读者。他们受的伤害其实比读者更深。一个爆炸性新闻，好像“全世界都知道”了，其实也就自己那个小圈圈知道。一个微博大佬被保安拦在门外，高喊自己有960万粉丝，照样不灵，保安根本不上微博。不用说保安，即使整天坐在计算机旁边的白领又有几个有自己的微博呢？民众的任何选择最终取决于利益，而非别人灌输的理念。

新闻人其实也属于吃“青春饭”的人，媒体人中有个词叫“着陆”，其实就是趁着年轻，赶紧成功转行。比如财经记者转行到证券公司搞研究，比如时政、社会新闻的记者转行到企业做公关。只有转行了，才算是着陆了，不能总是飘着。

新闻要求快，要求生猛。对于快，新京报的评论编辑潘采夫曾在微博评论过“天下写稿谁最快？”他本以为是陶短房，某次约稿，陶在加拿大的高速公路开车，靠路边停下开写，四十分钟交稿；后约五岳散人，散人说，“你去抽根烟吧，回来收稿。”三十分钟后交稿；约王小山写刘心武续红楼，曰：别跟我说话，要开写了，二十分钟交稿，中途还接李承鹏一电话。马光远也曾在微博爆料，自己一天写三篇评论，还审核了两个报告，熊培云也经常一天写好几

篇评论。

虽然现在纸媒衰落，我还是建议大家，订份报纸，网络上的新闻几乎90%以上来自平面媒体，但你阅读平面媒体和在网络上看新闻还是感觉完全不一样。

每年年末都是媒体下压订阅任务的时候，每个记者、编辑都有最少数百份的订阅任务，完不成就辞职或是自己买，笔者经常收到媒体朋友这方面的求助。

其实聒噪阶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就超出了传统媒体的范围。“自媒体”已经成为聒噪阶层的主力军，比如博客写手、微博写手等。另外一些智库也成为聒噪阶层的一员，一些商业化运营的智库，主要就是搜集各种危言耸听的言论，然后推送给他们的会员，其实根本不真实，也没有什么用。对于整个聒噪阶层来说，危言耸听的东西最有价值。

记者也不只是做新闻，也写书，比如《现代化的陷阱》、《奇迹的黄昏》等是记者的作品。这些人是典型的记者范，这些书都可以换个书名，那就是《中国黑材料大全》。其实书里面的这些材料大家也都知道，只是他们系统化了，如果要问这些书有什么思想，或是什么目的，也谈不上，其实就是延续自己的职业特点而已。

新闻行业其实是不能自立的行业，仅仅靠发行很难维持运转。美国进步运动时期的“新闻扒粪”运动代表着新闻人的光荣，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运动其实在美国也仅仅维持了十年，而这些杂志也最终被保守财团势力收购了，而这十年正好是进步领域西奥多·罗斯福执政的时候。如果没有政治实权人物的支持，仅靠媒体也是不行的，新闻专业主义在商业面前是苍白的，新闻扒粪运动的前提是政治人物发起的社会进步运动。

公关行业的营业额几乎等同于媒体的腐败程度，国美事件，双方的公关费就数千万元，达芬奇事件等等也是如此。比如《新闻调查》这样的栏目，经常

卷入公关受贿的泥潭，而这也是行业的潜规则，也是这个行业的生存规则，车马费、红包都是小CASE。在新闻敲诈面前，“表演式”新闻又算得了什么？

媒体很大程度上就是表演，电视主持人都有话语脚本，你演出来就可以了，平面媒体都有内部定调，写错了，主编就毙稿。

其实在商业社会，一切都是产品的问题，杂志、报纸、博客、微博都是媒体，却是不同的产品。杂志主要是学者名流的阵地，而报纸特别是都市报捧红的则是时评写手，微博捧红的基本上是造谣者。论坛上走红的主要是消费自己、服务大众的，比如芙蓉姐姐、凤姐等，而微博时代主要是消费公众，自己则赚得盆满钵满。自媒体的兴起，伴随着的是杂志的衰落，报纸也开始英雄迟暮了，同时影响的是学术生态，真正的学者，饱学之士不再吃香。

互联网专家犀利指出：“互联网，得屌丝者，得天下”。有屌丝才会有所谓的女神和大佬，很多女神其实不过是个时评写手、小记者而已，只有在屌丝那里，才被神化。“赚屌丝的钱”是各路互联网大佬成功的不二秘诀。

博客和微博好像是新时代的产物，却带有很强的封建专制色彩。博客主要靠编辑的“推送”，如果没有编辑，你的博客基本没人看；微博也是，如果没有运营商的推送，或是“加V”，你基本没有粉丝。运营商会将博主分为三六九等，主推符合他们需要的博主。

有个IT评论家曾经指出，中国很多人敢状告百度，却没有任何一个名人敢状告新浪。“新浪爱问知识人资料”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百度文库，原因就在于，百度不具备推送功能，而新浪则有。让谁走红，新浪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做到，同样反之也成立。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封建专制，一切取决于几个互联网大佬的喜好。

其实现在行业并没有定型，仍是野蛮生长的时代，当人们失去了对新媒体

的新鲜感，或是新媒体由于鱼龙混杂遭到人们的厌弃时，也许人们还会重新发现严肃媒体的重要性。

我虽不从事媒体，但喜欢分析媒体。分析不透媒体，就看不懂社会。

媒体不仅要遵循新闻伦理和商业伦理，更要遵循社会伦理，做社会的建设者，这最终需求新闻立法来保障。

## 八、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

对于当前中国的贫富分化情况，中国有很多说法，比如城乡差距，比如行业差距，比如体制内外差距等，但笔者认为这都不是主要原因。

当前中国的贫富分化如此之严重，其实不是中国人的勤奋程度不同，不是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不是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也不是垄断企业与民营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因为只要收入来源于工薪收入、劳动收入，从根本上来讲即使有差距，也不可能差得太离谱，这些原因造成的差距也就是几倍的差距，最多不超过十倍的差距，而这样的差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允许的。中国除此之外还存在比这些更重大的贫富分化因素，而这些因素造成的贫富差距就不是几倍那么简单了，而是几十倍、几百倍甚或是数千倍，这才是我们需要治理的。我们治理中国的贫富差距不仅要拍苍蝇，更要打老虎，这个老虎就是存在于中国社会的“财富非正常转移”。笔者将其总结了五类，并将其总结为“新五蠹”。

“五蠹”的提法来源于战国时期大思想家韩非子的一篇文章，指当时社会上的五种人：（一）学者（指儒家），（二）言谈者（指纵横家），（三）带剑者（指游侠），（四）患御者（指依附贵族私门的人），（五）工商之民。韩非曰：“此五者，邦之蠹也。”蠹，蛀虫。韩非认为这五种人无益于耕战，就像蛀虫那样有害于社会。

现代社会也存在这样的人，这些人的行为有的是非法，有的是既不违法也不合法，因为现在还没有相应的法律进行规范，但相同的是他们对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巨大的财富转移。这些人或行为包括职业投机客、政府及企业内的贪污受贿者、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黑社会及色情业、不受约束的高管薪酬。这些人或行为是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所在，是当今中国的“新五蠹”，新五蠹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是几十倍、数百倍，甚至高达数千倍。

### 1. 职业投机客

现代社会已经是金融社会，金融投机已经成为危害经济的头号问题，信息革命也让投机变得非常容易。投机对财富的转移是最大的，也是最快的，如果说炒股损失的只是几年收入的话，那么炒房转移的将是购房者几十年的收入，任何投机行为的最终受害者都是那些最后的接盘者和那些真正需求这些商品的人。

我国投机炒作是造成财富转移最核心的因素，因为投机炒作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但投机造成的物价虚高给企业带来了生产成本的高涨，让那些依靠工薪生活的人大大增加了生活成本，给最后接盘的投机者造成了巨额的损失，而只有少数人在投机炒作中获得了巨额的财富。他们一年的收入可以赶上别人几十年、上百年的收入，投机这种财富转移方式的剧烈程度超过了任何不合理收入分配制度对社会财富的分配。而我们对经济生活中的投机行为一直采取的是纵容鼓励的政策，而新闻媒体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我国近年投机炒作已经非常普遍，除了大家熟悉的股市、房市投机外，普洱茶突然间从地摊茶变成了能喝的古董，价格扶摇直上，红木似乎重新归入只有皇家人士才能典藏的行列，一朵兰花可以换栋别墅，当代的油画作品价格甚至超过了已故的国画大师，甚至连大蒜都成了投机者炒作的对象，这些财富的巨大转移，都最终要来源于工薪收入。

## 2. 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

现在中国不道德的商业行为简直是比比皆是，从屡打不尽的传销、虚假的医疗广告、以药养医造成的小病大治和药物滥用，到形形色色商业欺诈行为，在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社会财富转移。比如传销本身不创造财富，而其中少数人的暴富只是建立在对他人财富的转移之上。目前中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完善，太多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实际上处于完全放任的状态。

## 3. 政府及企业里的贪污及灰色收入

中国官员贪污情况严重，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不用我们多讲。另外，在中国灰色收入严重，据公开资料分析，财政资金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严重管理漏洞，有大量资金脱离了财政管理程序，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2005年这部分资金估计约5600亿元，漏失部分待查。近年来国有投资项目层层转包、工程款层层剥皮、营私舞弊现象严重，漏失巨大。据有些项目的情况，施工单位实际拿到的工程投资还不到工程拨款的三分之一。

其次，金融腐败普遍存在。据央行研究局2003年一项大面积调查，全国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平均而言，企业在每笔贷款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和为维持与金融机构“良好借贷关系”的费用合计，相当于贷款额的9%。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考虑大型企业贷款条件有利，较少发生这种情况，按贷款额的一半推算，额外付费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1万亿元。由此造成的不良贷款损失还未计算在内。上述结果在一些企业调查中也得到了一定的验证。

民众只关心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其实在企业里的贪污受贿行为远比政府系统要严重得多。在企业里，采购部、广告部、行政部等部门都是典型的肥差，法律规定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可以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但这些执行起来都非常的困难，政府贪污都难以发现，企业受贿行为就更难打击了。

#### 4. 黑社会及色情业

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正常社会、具有反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严密的组织形式的犯罪团体。中国目前黑社会成员至少有100万人。中国黑社会猖獗的主要原因，客观上是农村盲流人口涌入城市，迫于生活加入黑帮；主观上是党政官员腐败，警匪勾结，造成扫黑障碍。

转型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防范机制还没有确立，由此，导致流动人口泛滥成灾，失业待业人口大增，社会控制失范。转型期的“综合征”，恰恰是包括黑社会犯罪在内的各种犯罪活动滋生的温床。

不管承认与否，中国的色情业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有专家估计，职业妓女在中国超过400万人，平均以每人每天收入300元计算，每天收入将达到12亿元，全年收入达到4500亿元，这个收入是国家大力扶植的旅游业的4倍。

黑社会及色情业的产值实际上部分都进了企业的财务报表，成为企业的成本，这也是导致企业成本过高，从而工人工资过低的主要原因。因此这不是整顿社会风气的问题，而是降低企业成本的问题。

#### 5. 过度且不受限制的高管薪酬

“高管”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个特殊利益群体，他们不是大股东，但掌握着企业实际控制权，特别是上市公司的高管具有很强的薪酬定价权，投资者们基本没有反对的可能。按道理说股东大会是上市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让小投资者真的为了投上一票而自费前往，况且去了也基本上是99%反对无效，基金等大型投资机构出于某种原因也不会对高管薪酬过多干预。至于国有控股股东，高管们往往就能代替控股股东说话。现在的结果是，



只要公司有钱，高管们想拿多少都是合法的。在攀比和私欲的作用下，高管们的年薪越来越高，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对高管年薪的关注，始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基础——信托责任。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产生了企业信托关系，对高管的信任是作为资产所有者的股东，愿把公司资产交给高管经营。国内上市公司的高管年薪可以连年翻番，上市公司雇员的福利也可以水涨船高，唯有股东权益无人正视股东对高管薪酬应有更大发言权。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大幅攀升，也会带动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攀升，而高级管理人员工资的上升又直接导致了普通管理人员工资的上升，最终的结果就是拉大全社会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成为贫富分化最重要的因素。

“新五蠹”是造成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政府应该将打击这些人或行为当作缩小贫富差距的突破口。2010年的两会上，“灰色收入”一词进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虽然这个词后来删掉了，但是可以确认的是，“灰色收入”的存在已经成为事实，并且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如果能对“新五蠹”进行最严厉的打击，中国民众的生活成本降低20%以上，是可以做到的。

### 社会治理，堵比疏成本更低

几千年前，大禹治水的成功给我们留下了一条经验，那就是“疏比堵好”。但是大家往往忽略的是，“疏”的成本要远远大于“堵”的成本，即使是现在对付洪水，一般小洪水也是以堵为主，对于“新五蠹”造成财富转移的情况，中国在没有合适疏解渠道之前，堵也不失为一个“次优选择”。

中国提出以法治国好多年，中国也制定了不少的法律，但是“法治”也同样存在着“效率低”和“成本高”的特点。公平本来是一种“免费资源”，而法治时代公平成为了“有价资源”，民众获取公平从“免费”到“付费”，无疑

提高了获取公平的门槛及难度，因此在美国这种法治国家也存在着大量的不公平现象，原因就在这里。

法律是有钱人的游戏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多年的实践证明，法治不是万能的，法治迷信应该有所清醒了，在某些法律不完善的地方加强行政管理是非常必要的。中国有着太多的行业协会，但是这些协会没有任何“公权力”，他们只能在自己的会员之间制定一些自律性公约，这些公约对自己的会员企业基本上也没有约束力。对非会员企业更是没有任何约束，中国的中钢协在中国的铁矿石谈判中屡屡失利就是与其缺乏权威性有关。现在经济非常复杂，政府管理不能面面俱到，中国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适度地加强行政管理并赋予一些行业协会部分公权力，以协助政府进行经济管理，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 九、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现状

市场经济的结果就是“生存工资”，也就是领取最低工资的人，仅可维持最低标准的生存，中国现在就有很多人维持在这种生活标准。笔者根据现代人的生存状况，进行了一下分类。

### 第一类人：包身工

这些人，常年住在公司宿舍，吃饭在公司的食堂，这是他们生活的常态，如果没有公司提供的食宿，他们就很难养活自己。这类人基本上处于包身工的状态，一旦失业就必须马上找到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也得不到家人的帮助，就面临流浪的风险。由于工资仅能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他们也攒不下钱，买房更是想都没想过。中国的农民工绝大部分都处于这种状态，中国的大学生也有很大一部分处于这种状态，这类人在中国的产业工人中至少占到30%。

## 第二类人：蚁族

这些人比包身工的生存状态稍微好一点，收入也比他们高一点，他们不再需要居住在拥挤不堪的宿舍，他们至少可以租到一间合租房了，可以不天天吃食堂，可以在路边餐馆解决吃饭问题，这些人被称为蚁族。这类人占到30%。他们看起来虽然稍微体面一些，但生活也非常难，也基本上攒不下钱。

## 第三类人：燕族

他们混了多年，在单位上有了一定的职务，也积攒了一些资历，他们的收入可以让其租到独立的房子，或一居室，或二居室，这些人可以称为燕族，因为他们有自己独立的窝，但需要寄人篱下，他们可以每月攒下一点钱。攒够买房的首付，是他们生活的最大目标。这些人大概占到15%。

## 第四类人：龟族

可以买到自己的房子，但要背负沉重的贷款，一般还款期限为20年，或是30年。等还完贷款，他们也就老了，房子也就坏了，他们好像是住在房子里，其实是像乌龟一样背着房子，房子是他们最大的负担，因此暂称他们为龟族：整天负重前行。这些人大概占到20%。

## 第五类人：真正的人

他们拥有自己独立的住房，不需要背负贷款，生活除了工作，就是休闲和社交，这些人占到5%，他们是中国的精英和贵族。这些人大概占到5%。

近年来，中国开始流行为富人说话，其实“为富人说话”是市场经济的最常见现象，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富人并非社会的受害者，而是社会更大的“占便宜者”。比如大家最常见的国防、公安、道路基础设施、公共科研投入等，更多的是富人受益更多。

比如国防方面，如果发生了战争，穷人没有多少财产可以损失，损失最大的都是富人，富人一旦跑路，带走的也只是一些金银细软，很多固定资产都是带不走的，很多都要被纷飞的战火破坏掉，因此军队的存在，保护的更多是富人的财产。

而公安警察的存在也是这样，一些小偷其作案对象往往不分穷人、富人，但是如果社会混乱起来，更大的盗窃、抢劫就会泛滥，这些更大的盗、抢犯罪则更容易直接针对富人了；如果社会环境不好，遭殃更大的还是富人。其实现在报案的、打官司的主要还是富人。从理论上讲，应该穷富一致对待，但因为穷人的很多损失往往达不到立案标准，所以很难得到警方的帮助。

其实道路和公共设施也是这样，穷人的生活往往是固定的、程式化的，而富人的生活则往往以社交为主，他们对道路等基础设施的使用率更高，比如中国开车族还是以富人为主。虽然部分基础设施进行了一定的收费，但前期更多是靠国家的投入才能建设起来。富人用得更多，当然受益也就更多。

另外，国家每年进行了很多的基础研发投入，这些研发出来的技术，在富人开办企业时都会用到，而且很多都是免费地用到。虽然穷人也从富人那里得到了工资，但显然富人是更大的受益者。

政府每年为职业培训拿出很多钱，现在很多技校学生的学费都是由政府买单的。这些钱，好像是学生享受到，其实也是为企业家节省的，如果政府不培训这些人，那企业家就要自己掏钱进行培训。

总之，我们的军队、警察主要还是在保护富人的资产。我们的道路富人走得更多，国家对基础科研和职业培训的投资，更多的是减低了富人企业的投入。总之，富人是社会更大的受益者。这应该是无争议的，富人绝对不是社会的受害者。

## 十、政府决策必须绕开精英阶层

---

政府的重大政策如果脱离了中下层人民，而总是找上几个经济学家，云山雾罩地开闭门研讨会，那问题永远解决不了。中国讲科学决策要和中下层利益结合起来。

中国现在很多利民政策迟迟不能出台，除了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的阻挠之外，很大程度上还是决策方式的问题。现在中国提倡科学决策，其实变成了专家决策，而专家是有利益倾向并直接代表一定利益集团的。这一点中国要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学习。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罗斯福推行“新政”时困难重重，和最高法院斗智斗勇。他的一位朋友感慨万千地对他说，“假如你成功了，你就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罗斯福总统沉郁良久，带着预言家的口吻说，“假如我失败了，我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总统”。纽约一家当时影响力很大的报纸《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对罗斯福的宣告发表了代表报社立场的赞同声：“如有必要，我们支持独裁。”增加富有群体税收太难，但罗斯福有着坚毅的决心，为了绕开精英阶层，他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炉边漫谈，直接同美国中下层沟通，结交民心，保障“新政”得以实施。炉边漫谈成了特有的治理方式。只有权力中心同中下层直接交流，才可能打破精英设置的种种障碍。当然，只有符合中下层的利益，这种直接交流才可能成功。罗斯福赢得了许多美国人的心，中下层成了“新政”的主要政治基础。就是这些中下层，连续四次将罗斯福送进白宫。前无古人，后来者。

“要富有群体，还是要国家？”这个严峻的历史课题，曾不知道多少次摆在了历史的决策台上。比如在古罗马，下层公民被迫从军，是古罗马军事扩张的主力，但是这些人却分不到战利品，战利品全部属于富有群体和精英集团，

但打仗就不能从业，也不能做生意，贫富悬殊日益加剧，下层公民开始破产，而下层公民的破产又导致了政府税源的日渐匮乏。对古罗马的下层公民来说，帝国扩张的军功章有他们的一大半，而帝国的超级繁荣却没有他们的份。十五的月亮，总是为古罗马的富有阶层圆的。富有阶层为了满足从东方进口奢侈品的欲望，大量输出黄金和财富，后来弄得帝国黄金匮乏，穷困得连铸造货币的黄金都凑不齐，于是就只好“量化宽松”，乱铸钱币，导致通胀更加严重。精英阶层则骄奢淫逸、道德败坏，进而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沦丧。古罗马伟大的荣誉感终于被物欲取代，曾经让古罗马强盛的进取精神在富有阶级的奢靡中逐步崩塌。精英集团的荒唐和自私，导致价值、理想、传统的全面丧失。帝国精英的瞎折腾，即使过去了几千年，都令后人侧目。而古罗马“藏富于富”的另一个后果，那就是作为世界上最繁荣和最富有的帝国，古罗马政府债台高筑，长期面临破产的威胁，走向衰败。而最后蛮族的入侵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国家没有了，包括富有阶层在内的所有阶级都未能幸免于难。

另外法国大革命也是“藏富于富”的结果，法国在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统治下非常繁荣。但是法国政府却陷入长期的财政困境中。法国最富有的6%左右的人拥有大约30%的土地，他们是牧师和贵族，但是他们不交税，税负大部分落在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身上。农民不仅要缴国家的税，还要为政府和贵族服劳役，苦不堪言。法国在七年战争和支持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几乎破产。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在路易十六治下，法国有些地方税收上升了28%。上涨的税收几乎全部落在了穷人身上，导致人们怨声载道。后来路易十六打算改革税制，但是已经晚了，由此引发一系列历史事件，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而当今的美国和中国其实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都面临着与古罗马和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相同的境遇。其实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一个蓝领工人以其一人的工资，就可以养活全家，还可以买房买车，这就是当年的“美国梦”。这几十年来，中下层的相对工资收入不断下降，难以养家，于是出现了许多双薪

家庭。繁重的生活压力，使美国年青一代中出现了许多DINKS和DINK家庭，前者是指双薪而没有性生活的家庭（Double Income No Sex），后者是指双薪而没有孩子的家庭（Double Income No Kid）。即使这样，许多中下层仍然难以度日，不得不从银行和信用卡上打主意，靠借债补贴家用。结果就出现了家庭债务过高的恶果。美国家庭债务相当于GDP的100%，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美国中产阶级正在全面沦陷，失业大军的平均失业时间长达29个月。在美国，共和党主张减税，而民主党主张社会保障。两党较劲的结果，一方面减税，一方面维持社保。财政收支不是变戏法，既要减税，又要维持社会保障体系，于是美国政府只好举债。结果几十年下来，美国政府债务迅速上升。

美国联邦政府总债务高达GDP的96.5%以上。债务上限在过去十年被上调了10次，在过去70年中被上调了70次。几十年前的美国是大约4个工作者养一个退休者，而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期，20～30年后，可能出现1个工作者养几个退休者的困境。美国基础设施严重陈旧，美国许多河堤由于资金缺乏，年久失修，抗灾能力低于设计水平。比如当初新奥尔良的堤坝，据称可以抵御五级飓风，结果在三级飓风的打击下就崩溃了。美国的桥梁中。大约25%有结构问题。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曾经估计，美国光是在高速公路和桥梁上就欠了大约1.6万亿美元的建设账。美国富甲天下，但是美国政府和中下层民众却穷到这种程度。我们前面提到的原因在于不公平的分配机制，实现了“藏富于富”。虽然制造了许多富可敌国的大富翁，却导致了“民困国穷”，以至于政府连维持基础设施和办教育的钱都拿不出来。

2010年中期选举，奥巴马完败，提倡减税的茶叶党大胜。为什么在大多数人希望增加富有群体所得税的时候，提倡进一步减免富有群体所得税的茶叶党反而脱颖而出呢？茶叶党标榜草根，其实背后都是财力雄厚的大财团。在这次中期选举前，大约2010年初，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裁决，美国企业的捐款没有上限，结果许多金主对共和党的捐钱就没有了封底的限制。钱箱流水一样涌向

了共和党，共和党在政治捐款上将民主党远远抛在后面。共和党也就因此水涨船高，钱可以控制选情，可以左右意识形态和媒体。这场选战就成了没有悬念的游戏。共和党有钱，而民主党有人，但民主党的人并不投票。

不管美国的税收多么低，共和党的目的就是减税、减税再减税，甚至减到零，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甚至他们还会主张“惩罚穷人税”。制造问题的原因，不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导致贫困的力量，不可能成为消除贫困的推手。导致这些问题的就是美国的制度，美国号称是民主国家，但民主也很难在美国落地。在美国法律程序过分烦琐化、细节化和条文化的时候，法律服务也就变成了商品，而真正的法律精神被忽略。法律商品化的结果就是财富的不平等导致了法律面前的不平等。在少数人控制大多数社会财富的情况下，那么财富群体就会通过财富的控制来实现对社会规则的制定过程。

同样，财富的不平等也会造成言论的不自由，言论传播就如打广告，销售得最好的产品不一定质量最好，但广告绝对打得最响。中下层人民往往沦为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政治权力的分配取决于社会信息的选择和传播。当谎言被炒作成流行话题，那就必然被不明真相的人当成事实，长此以往，谎言就在社会里潜移默化。反复的广告轰炸可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偏好，那些假冒伪劣的信息，诸如那些故意曲解和丑化历史的言论，就如同假冒伪劣产品，只要被某些渠道选择上并被广为传播，同样会影响信息受体的价值偏好和选择。

20世纪40年代以前，美国最高法院曾经多次判决《最低工资法》违宪；21世纪的第10个年头，美国有家联邦法院裁决刚刚通过的《医疗保险法案》中的某些内容违宪等。

美国民主如果损害到富有群体的利益的话，可以得到解决，但损害到穷人的利益就很难解决。中国的问题虽然没有美国那么严重，但中国人在观念上却存在不少的问题，如果中国人在观念上不发生转变的话，中国也会堕落到与美



国类似的状况。

工资总额在GDP中的占比，在经济学上叫分配率。有些人把板子高高举起，全都狠狠地打在政府税收的身上。其实，那种认为政府税收是导致工资总额占比下降的观点，大概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认为在切割GDP这块蛋糕时，只有劳动者和政府这两个主体，完全无视了资本这个主体。

中国政府的税收占GDP的比重，比美国、比所有发达国家、比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低，而且都低得多。比如，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的数据，在世界上178个经济实体中，从高到低，中国大税收占GDP的比重排名第105位，在世界上是偏低的。又比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08年的数据，24个发达国家的平均税负是45.3%，29个主要新兴国家平均是35.5%，而来自中国的统计显示，中国同期只有17.9%，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数和主要新兴国家的平均数都低一大截。而2008年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是20.5%，也是偏低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税收过重的时候，外资还是大量涌进。无利不起早，外资都是用脚投票的。不要以为外资都喜欢交税，专爱往高税收的国家或地区跑。所以，税收不可能是工资占比下降的原因。

中国正处于发展转型期，正在兴办许多惠及全民、缩小贫富悬殊的事，这都是巨大的财政支出。如果像有些人提倡的那样，中国应当在本来低税收的基础上，再降低税收、增加资本收益，那么，中国只有两条路：要么终止这些民生举措；要么国家举债来办这些民生项目，走西方那种富有群体减税、政府举债的道路。西方的教训证明，这条道路走不通，不可持续。以世界上那些著名的奢侈消费品为例，都把中国市场当成摇钱树，中国市场成了它们下金蛋的大母鸡。许多奢侈品专门有中国市场价格，也就是说，专门针对中国有钱人抬高价格。据我观察，在美国购买欧美著名品牌，即使扣除关税因素，也比在中国便宜很多。所以，如果扣除富有阶层的这些奢侈消费，中下层的消费占GDP的

比例，下降得更加严重。

先做蛋糕、后分蛋糕的理论在中国已经暴露出了巨大的问题。首先，蛋糕分配不公已经导致对蛋糕的总需求不足，进而影响到了蛋糕不能可持续做大。其次，中国那些掌握了蛋糕的人，已经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阻止蛋糕的公平分配，或者干脆移民。所谓的两部曲，最终变成了一部曲。原来的理论原理是骗人的谎言。

其实中国心存社会正义的学者一直在为国家和中下层人民的利益欢呼，他们这样做是发源于内心深处的人性之善，是悲悯与恻隐之心，为了不让社会的堕落踏破最基本的人权底线。

## 十一、中国需要为中下层代言的有机知识分子

中国不仅仅需要政府在进行决策时，绕开精英阶层直接与中下层民众互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其实也需要多为普通公众发声。在中国，从来就不缺少有机知识分子，但是，缺少的为中下层说话的“有机知识分子”。

“有机知识分子”是意大利人葛兰西提出的一个经典概念。他认为传统知识分子是一种超越于一切利益立场的，自我定位于追求普遍真理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有机知识分子必须明确地把自己的立场与某个阶层或利益集团挂起钩来，并且很鲜明地为自己所在的那个“阵营”服务。在葛兰西那里，与知识分子“有机”联系的那个阵营，即阶层或利益集团。这是“有机知识分子”的兴起，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公然提出知识分子要将自己的价值和一个特定阶层捆绑，宣称自己的理论是属于某个阶层的。

有机知识分子对应的就是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御用知识分子等所有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是“智识型”知识分子，保持着自我独立特性和自治，主

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直接产生于和服务于社会集团的专业化知识分子阶层；另一类是相对独立于特定社会集团之外的“贵族化”知识分子阶层，包括教士、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等。

葛兰西认为，区别有机知识分子与无机知识分子的真正标准是知识分子的直接社会功能。而这种直接的社会功能首先就在于具有批判意识并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所以，有机知识分子就是具有批判和建构新世界观功能的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当然首先是“专业人员”，但是又必须超越“专业人员”，他必须是一个在积极参与实际生活中，质疑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有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两个：一是批判和战胜旧的意识形态，二是用新的世界观教育和组织民众。

葛兰西是意大利工人维权运动的主要缔造者，他认为西方国际工人运动受挫的根源在于工人阶层在现代西方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的丧失。葛兰西认为，资本阶层通过收买知识分子，牢牢掌握了西方社会的文化领导权。而这种文化领导权是西方民众在经济上认同、在政治上顺从资本阶层管理和统治的思想文化根源。

其实在现实中也确实是这样，政府和资本利益集团从来就不缺乏吹鼓手，即使是那些标榜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也大多服务于利益集团，他主张那些为中下层说话的知识分子要敢于亮出自己的身份，而且要打出自己的招牌。

葛兰西认为，职工虽然在生产界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并未创造出自己“有机的”知识界，他们也没有“同化”任何“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葛兰西主张以有机知识分子为主体，作为新文化的组织性载体，肩负起教育和组织民众的任务。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基本方式就是有机知识分子对民众自上而下的“灌输”式教育和组织。通过这种教育来同化民众，让民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不要在文化上被动接受不属于自己阶层的文化。

中国处于一个转型期，是一个旧规则正被逐步打破、新规则正在艰难形成的时期。旧有的国家政权已经不再像原来那样在全社会具有说一不二的控制力，而健康的社会自治能力却尚未形成。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权在艰难的改革中容易因恐惧而走向保守，而社会由于缺乏理性的引导而趋向于非理性的激进，这两者都会严重损害社会的健康发展。如果任由其发展，往往容易在新规则形成过程中出现大量让人难以容忍的事情，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更加明显。可惜中国代贫民诉苦、为中下层争取利益的知识分子太少了。

这根本在于媒体，没有媒体，就没有知识分子发声的渠道。而现在的媒体根本不需要自己的受众来养活，仅凭着资本就可以养活自己，在这方面报纸又要远远甚于其他媒体。以报纸和电视来对比，报纸可以通过降价促销来贩卖自己的意识形态，而电视媒体则不行，因为电视媒体本身就是平价的，甚至是免费的，因此电视不可能通过降低促销来兜售意识形态，这也是中国在报纸领域出现了意识形态多元化而在电视领域则没有的原因所在。

报纸只要有足够的资本，降低售价之后就不愁没有销路，而凭资本养活的媒体，必然为资本说话。比如现在很多都市报，厚厚的几十页，就卖一元钱。在报纸竞争最激烈的广州，甚至在促销期间会出现倒贴的情况，比如花一元钱买厚厚一叠的报纸，还被赠送一瓶矿泉水，或是赠送一盒牛奶等。

近年，当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继公共知识分子之后也开始流行起来时，在中国也先后有不少知识分子被贴上了有机知识分子的标签。但如果仅仅是因为他们代表某些利益集团说话，就被贴上有机知识分子的标签，那其实是违背了葛兰西提出有机知识分子的本意，他的本意是希望出现一大批立场鲜明的、为中下层民众代言的知识分子，而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正是中国所缺少的。

## 第四章

# 中国问题的现实根源 ——房子、票子的问题为何越来越大

### 一、中国长期通货膨胀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其实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就像火山、地震一样，看似来得很突然，实际上都是自然能量多年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爆发的规律性结果。中国进入的不是通货膨胀周期那么简单，而是进入了通货膨胀经济时代。

通货膨胀从来都是跳跃式的，也就是一段时间是极其温和的通胀，接下来一段时间就是极其暴烈的通胀。比如五元一碗的拉面，它涨价只会是从5元直接涨到6元，而不是5.1元、5.2元、5.3元这样慢慢地涨。

通货就是钱的意思，通货膨胀就是钱多了。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们一定要分清学术上的通货膨胀和现实中大家所讲的通货膨胀代表着不同的含义。大家平时所讲的通货膨胀是价格上涨的意思，其所根据的指标就是CPI，CPI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这个数据每月发布一次，数据出来之后，大家一看CPI上涨了，大家就高呼通货膨胀来了，平时我们所说的通货

膨胀就是这么来的。但是以CPI上涨为标志的物价上涨与以货币超发为代表的通货膨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通货膨胀对应的是货币超发，但是物价上涨可以对应非常多的因素，比如有需求拉升的价格上涨，比如有成本上升带来的供给性价格上涨，总之因素很多。提到通货膨胀，经济学家会告诉你货币超发了，而且那些大力挞伐货币超发的评论家们往往也能获得更多的掌声，因为货币超发是政府行为，反正坏事都是政府干的，这是一股主流的说法，并且大家都喜欢引用佛里德曼“通货膨胀本身就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说法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说得正确吗？

需求拉升的价格上涨在中国是比较突出的，最典型的是1992年和2010年的通货膨胀。1992年邓小平南行之后，中国思想进一步解放，在经济领域出现了投资热，全国各地都争建经济开发区，因此对各种商品的需求一时供应不上，中国出现了通货膨胀。中国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进行了四万亿元的投资建设，也带来了大量的需求，因此也带来了通货膨胀，这都是需求性的通货膨胀。

那什么是供给性的通货膨胀？供给是宏观经济学术语，供给性通货膨胀其实就是大家通常听到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也就是商品生产成本升高了，其销售价格必然升高，中国现在很多生产资料都需要进口，石油、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都会推动中国物价的上升，这种通货膨胀也通常被称为“输入性通货膨胀”。

### 1. 地租性通胀才是中国通货膨胀的首因

除了需求拉升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的输入性通胀外，笔者认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地租性”通胀。

确切地说，中国的地租级差化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而进入加速阶

段，则是从1997年住房制度改革开始的。地租级差化的过程本身就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因素。中国用十几年的时间要完成发达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过程。在中国地租级差化的过程中，包含着两个重大转变，其一是从无地租到有地租，其次是平等地租向级差地租转变，这两个因素都大大推高了通胀。

中国本身就面临着地租级差化的问题，而中国近年的房地产泡沫化更是放大了这一因素。中国GDP七八年才翻一番，而近年的中国房价从1997年改革以来，已经翻了10倍左右，这对通货膨胀将是多大的冲击力。当然房价的上涨与地租（含商业地租和房租）的上涨并非同步，中国也一直存在着房价上涨与房租上涨的偏离，主要表现为房价上涨快，房租上涨慢，正是这种偏离为日后房租的报复性上涨预留了空间。要么降房价，要么涨租金，如果房价在短期内降不下来，那么租金必然会涨上去，这将是继续推高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

在经典的通货膨胀理论中，并没有地租性通胀的概念，因为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非常慢，并且他们也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一般情况下，地租性通胀不会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通胀膨胀的主要根源。其实现在的经济学教材中也都没有了地租这一章。而中国的情况正好完全相反，地租级差是中国通胀的主要原因。没有学者再从地租的角度来分析通货膨胀。而这是中国的主要问题所在，我们必须重新提出“地租性通胀”这个概念，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

## 2. 中国的劳动力结构变化所致

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由两类性质不同的部门即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构成。这就是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或者说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以中国而论，所谓传统经济部门就是存在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系统，所谓现代经济部门就是现代工商业经济系统。只要传统经济部门

还存在剩余劳动力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现代经济部门就能够以“生计工资”即仅能维持生存水平的劳动成本雇用工人，而且，“生计工资”将一起维持到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时间点上。而这个时间点也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当前中国就处于这样的拐点上。中国的农民工已经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而生计工资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而近期弥漫全国的工资上涨也是这个大背景所致。这将是一个推动通货膨胀的关键因素。

### 3. 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的人工成本提高

中国人工成本提高除了上面的刘易斯拐点的因素，还有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因素，一个国家的劳动成本归根结底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因为一个工人的工资最终取决于他所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劳动价值，创造的价值越高，工资就越高，创造的价值越低，工资就越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比发展中国家高，因此发达国家的工人工资也高。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提高得非常快，特别是刘易斯拐点之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更快，因此中国的工人工资将实现非常大的飞跃式升高。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具有深刻的时代大背景，比如资产价格上涨以及劳动力价格上涨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经阶段。可以预见，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存在长期性的高通货膨胀，而这种通货膨胀可以说是不可治理的。就像火山、地震一样，看似来得很突然，实际上都是自然能量多年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必然爆发的规律性结果。

而对于中国这种由经济结构发生质变而导致的通货膨胀不能单单从货币政策上做文章，只有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劳动价值，从而真正意义上提高劳动者收入。让劳动者收入跑赢通货膨胀，这才是正道，无疑，当前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实，西方国家在处理20世纪的滞涨时也是通过采用“供给学派”的方法，鼓励企业更新设备、提高劳动生产



率才得以成功，而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当前的中国。

## 二、通胀的误解与分析

“货币超发”是媒体最常用的一个词，但这只是利用“统计陷阱”制造的一个假新闻，而且这些假新闻早就被专业人士批判过多次了。比如广义货币与真实货币不是一回事，不能根据广义货币的多少来判断货币的多少，媒体总是利用公众对广义货币概念的不清晰，巧妙地等将广义货币当成真实货币，然后利用广义货币数据制造出一个“货币超发”的虚假结论。

而媒体为了使这个错误事实更加有说服力，又开始做各种比较，但不同国家之间广义货币的概念不同、含义不同、统计口径不同，根本是不可比较的，这又是媒体制造“统计陷阱”的第二招。

“统计陷阱”无非是利用统计数据制造假新闻，这个词来源于著作《统计陷阱：如何利用统计说谎》。通常来说，媒体只提供统计数据，而不会花篇幅去得出此数据的具体过程，这样会少很多好看的新闻。对于数据，如果不知道它的统计过程，那基本上是没多大意义甚至是毫无意义的。

于是，我们经常会在媒体上看到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违背人常识或与我们想象中不同的惊人结论，每当看到这样的结论时，我们二话不说就会对做出此结论的人一顿谩骂或嘲笑（一般是专家）。这些统计调查本身往往并没有错，错的是媒体语焉不详，甚至刻意利用数据得出哗众取宠的结论。比如很多调查只是显示具有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但是媒体通常不会指出这是相关性调查，错误地把相关性认为因果性会导致很多荒谬的结论。把相关性当成因果性，这是事后归因；小样本得出大结论，这是以偏概全，要避免被骗，就唯有对统计学有一定的了解。

### 广义货币M2背后的“四大陷阱”

那么中国M2数据背后，有哪些陷阱呢？主要有四个。

（1）首先，媒体喜欢将广义货币等同于基础货币，这是完全不同的，基础货币才是真正“发行”的货币，是真正印刷出来的，而广义货币不是，广义货币大小主要取决于考察存、贷款的规模。

（2）第二个陷阱是，广义货币的统计方式。广义货币其实只统计了银行渠道，而企业融资并非只通过银行，在美国，企业可以发债、可以上市、可以私募，从银行融资已经很少了，在中国才主要靠银行融资，所以美国的广义货币会不高，所以中国和美国不能比较。

（3）第三个统计陷阱是，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活跃度。中国是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经济非常活跃，特别是贷款的量非常大，而在美国，经济处于半衰退状态，货币非常不活跃，主要表现为货币乘数低，所以通过中美广义货币进行比较，从而推断中国货币超发是错误的。

（4）第四个是统计口径的问题，在美国，广义货币只统计短期存款，而中国则包含长期存款，统计口径都不一样，更是无从比较了，另外还有货币使用习惯等因素，这些就不是主要因素了。

统计陷阱的问题，在中国一些媒体是知道的，也是受重视的。据笔者所知，《每日经济新闻》在为记者做培训时，就提醒“要注意统计陷阱背后的假新闻”，但是这样的专业媒体并不多，更多的媒体是喜欢错上加错，火上浇油，这是不正确的。中国因为高利贷问题有数千名企业家跳楼或是跑路、破产，这些问题不也很值得重视吗？一个假新闻将很多企业置于破产境地，将企业家走投无路，中国这两年跳楼、跑路的企业家仅媒体曝出来的就600多位，那些没被爆出的不知道有多少，中国2011年小企业数量减少了一半，这个责任

又由谁来承担呢？

其实，除了以上那些最常见的统计陷阱问题，笔者还要单独指出的就是，中国的M2数据还存在着严重的“重复计算”问题，这也严重影响着我们的观感和判断。根据一些企业家反馈的信息，银行在给企业贷款时往往要求企业先贷一笔款，存到银行，再以此存款为抵押，再进行贷款，也就是企业家向银行贷款一次，在银行的账上却是两次。这样银行从某种程度上规避了一些风险，但也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利息负担，这对统计数据的影响就是平白无故多出了一笔贷款，而这笔贷款又没有用于实体经济，只是导致统计数据虚高。在现实中，这种操作方式我不知道会占到多大的比例，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操作一次，这笔贷款所对应的金融数据就会扩大一倍。

其实，因贷款违规操作所导致的广义货币数据虚大，只是小问题，而更大的问题则出在社会融资数据的统计上。中国的社会融资数据不仅存在着这样重复计算问题，而且更加的严重。先举个例子，某企业获得1亿元低息贷款之后，将这笔资金投资于（可以通过资金运作规避监管）收益率更高的信托产品或者其他金融产品。那么，这1亿元贷款并未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为0，用于购买信托产品或者其他金融产品的1亿元也许进入实体经济（也许没有或者未完全进入实体经济）对经济增长产生贡献。在这个案例中，央行统计的社会融资规模为2亿元，但是真正对实体经济产生贡献的是1亿元（甚至可能更少）。这就造成社会融资规模的重复计算以及债务利用的低效率。目前，这部分资金的规模难以统计，也难以估算。

抛开案例，我们再从理论上分析，那就是社会融资数据的统计是分渠道的。现实中却是一笔钱可以直接从银行到达企业家那里，也可能从银行先到信托公司那里，再到达企业家那里，也可能从银行到信托公司再到高利贷手里，再通过高利贷到达企业家手里，也可能是从银行到信托再到国企，再转贷到民

营企业手里。总之，中国每一笔货币从商业银行转到企业手里，可能中间要经历三四道手，而每经一次手，金融统计数据就倍增一次，这是成倍的增长，而并非正常经济条件下，由于企业正常资金需求增长所导致的那种每年百分之几的增长。因此，中国货币数据出现如此的大幅虚高也就不难理解了。

现在大家都通过数据做判断，但不幸的是这些数据都是错的，基本没有参考价值。而要解释这一切，我们还必须回归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那就是：金融数据统计，统计的是资金的“使用价值”，而非“实际价值”，这是与其他商业统计非常不同的地方。比如1万元钱，其价值是1万元，但是被不同的人使用了四次，那这1万元钱的使用价值就是4万元，而我们的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都是统计的这种货币的使用价值。在正常的经济情况下，这一笔钱可能同时被四个企业家在不同的时间段使用，而在当前这种货币紧缩的状况下，则是要经过两三个中间商才能到企业家手里，因此现在的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数据不用说增长百分之多少，即使翻了几倍也是毫无意义的，对缓解实体经济的资金饥渴毫无意义。

判断经济状况，一种方法是根据实际情况，一种方法是根据统计数据进行解读。当下的中国，根据实际情况来解读的话，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实体经济缺乏资金，而根据统计数据进行解读就出现了不一样的结果，而这背后关键是很多专业人士也缺乏最基本的经济运行和货币统计方面的常识。由于这种常识的缺乏，导致他们不自觉就调入了学术称之为的统计陷阱：也就是对于数据，如果不知道它的统计过程，那基本上是没多大意义甚至是毫无意义的。于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违背人常识或与我们想象中不同的惊人结论，每当看到这样的结论时，我们二话不说就会对做出此结论的人一顿谩骂或嘲笑。这些统计调查本身往往并没有错，错的是言说者的语焉不详，甚至刻意利用数据得出哗众取宠的结论。而当前中国的经济界就是因为对统计陷阱的认识不足，导致对金融数据的解读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经济也本无数据，只是为了决策方便才发明了数据统计。但由于统计陷阱的存在，这些数据并没有更好地服务于决策，相反，很多时候在误导决策和社会舆论，当下中国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而在现实中，越是经济素养不高的群体，越对统计数据深信不疑，而经济素养比较高的人反而不太在意这些数据，因为他们更明白这些数据背后的陷阱，以至于很多现实版的经济高手在进行经济决策时根本不用这些数据，比如前美联储格林斯潘就不相信这些统计数据，而是从具体的经济现象中体会经济的细微变化。

当下的中国经济确切地说处于病态，虽然数据上看起来虚胖，但从根本上是机体的营养不良所致，而绝非营养过剩，这是最根本的性质问题，也是最基础的问题。我们只有看到了这个最基础的问题，才能找出这些怪象产生的来龙去脉，才能对中国经济有完整的诊断。

### 三、“货币超发”鼓噪下的冷酷现实

---

一切要事实说了算，至少有三个事实说明中国经济不存在通胀，而是存在货币通缩的，这种现实其实非常冷酷。

首先，中国不存在资产泡沫，特别是股市泡沫。股市泡沫一般是货币宽松的指标，中国股市不仅不存在泡沫，而且一直在谷底徘徊，中国股市上证指数最高时达6000多点，而现在仅有2000多点，如果中国货币真的超发的话，那股市早就上去了，但现实却没有。大家可以观察美国和日本的情况，美国在量化宽松的影响下，股市已经基本回到了2007年的水平，日本刚刚实行量化宽松，马上股市就有反应，这都是例证。中国股市不温不火足以说明货币是不存在超发的。

其次，中国融资难，在全社会融资难的大背景下，鼓噪货币超发不仅是荒

唐的，更是个大笑话。货币是流动的，特别是可以在不同行业、不同人群中流动，这种流动可以通过消费、投资、借款、结款等形式出现。中国融资难是非常明显的，中国一直存在融资难的情况，但是像目前这种情况，却是改革开放30年未有。真正的货币宽松是不可能出现融资难的，因为小企业可以向大企业借钱，大企业向银行借钱，然后再加利息借给小企业，这虽然是违法的，但是民间一直是这么做的。但为什么突然小企业借不到钱了，因为大企业也借不到钱了。大河流水小河满，现在是大河也没水了。

第三，中国的通胀并不高，中国在2011年通胀最高，但更多是基于翘尾因素。“翘尾因素”的意思是如果前一年通胀非常低，第二年通胀就会显得比较高，相反如果前一年通胀比较高，第二年就会显得比较低。这是因为我们所说的通胀数据都是来自统计局的发布，统计局发布的是同比数据，也就是后一年与前一年的比较。当然“翘尾因素”下的统计数据，也是媒体广泛利用的“统计陷阱”之一，2012年的中国通胀就非常低了，大部分月份都是2点多，即使考虑“翘尾因素”也是非常温和的。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看数据，看中国货币到底紧缩到了什么程度？根据2013年5月份金融数据统计报告，狭义货币（M1）余额31.02万亿元，流通中货币（M0）余额5.43万亿元，两者相减可得基础货币为25.59万亿元。而5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102.04万亿元，现在存款准备金大银行高达20%，小银行高达16%，按平均18%计算，仅存款准备金就冻结了18.4万亿元。也就是现在25.59万亿元的基础货币中，有18.4万亿元存在央行的保险柜里，在市场上流通的仅有7.19万亿元，约占基础货币的24%，也就是约76%的基础货币被央行冻结，不能进行任何流通。这就是钱荒的根源。

这两年，中国百姓的“通胀感”主要来自于房地产，以及受房地产影响的行业，其他行业通胀并不厉害，而且温和通胀又是必需的，经济增长必然伴随

着一定的通胀，这在后面我们再解释。

由于中国实行了历史上最严苛的货币紧缩，近年来也出现了非常多的冷酷案例。这种案例在世界经济历史上都是极难见到的，而且这些案例没有一个是货币超发的时候可能出现的。

(1)2011年15万家中小企业破产,2010年,中国小企业的数量是406224家,而到了2011年,中国小企业只剩下256319家,而这大约15万家小企业都是中国2011年下半年的货币紧缩中破产的。

(2)企业家出现破产跑路潮,到了2012年7月,财经评论家牛刀宣布了自己的统计数字,据他统计,全国跳楼、跑路的企业家已经达到560多人,而这只是公开报道的,那些未公开报道的估计得以千、万计。

(3)高利贷疯狂,温州、神木、鄂尔多斯三大中国最富有的城市,全民破产;山东邹平民间高利贷泛滥,30余人因债务纠纷被杀,这仅仅是酿成命案的,其他惨不忍睹的情形还有更多。

(4)2013年6月,中国钱荒更加蔓延,甚至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都出现了短暂的支付危机,银行间隔夜拆解利率一度高达30%,而平时1%都不到,这样的高利率在世界经济史上都很罕见。

(5)2012年10月,河北等地征收过头税行为被媒体报道,2013年7月,中国出现税收危机,为完成任务各地开始征“过头税”,2013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刹住过头税》,同时国税总局表示,税收收入严峻,但要严查过头税行为。中国的企业税收为比例税,当企业经营状况不佳时,税收自动减少,而地方政府又无权提高税率,只能今年征明年的税。

而这一切仅仅是建立在一个彻头彻尾的毫无专业性的谎言炒作之上。

#### 四、大家都是通缩的受害者

货币紧缩看起来好像直接危害的是企业、是老板，但其实最终危害的还是那些社会最低层的人，而且比通胀的影响更大。笔者曾跟一些做装修的农民工聊过，前几年经济好的时候，很容易接到活，这几年经济不景气，新建楼房很少，他们接活越来越难，有的都难以为继。还有朋友是做广告的，这几年经济不好，企业都缩减了广告投入，行业很难干，有的在酝酿转型，但尝试了几个项目都不成功。

《经济半小时》采访了一个在垃圾堆拾荒的老人，他反映，这几年国家经济“紧”，废品都卖不上价，结果他们的收入减半。这些人是中国最弱势的一族，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而且赚的也非常少，且这些人一般年龄偏大，到了其他行业也很难找到工作。这位老人坦言，他们全家已经十多年没有团聚过，最小的孩子见到她，连“妈”都不叫。他们这些人在经济好时，还能勉强维持生活，而在经济萧条的时候，维持生计都成了问题。

那些整天高呼要货币紧缩的人们，你们看看那些跳楼老板的遭遇、那些装修农民工的遭遇、那些拾荒老人的遭遇，不知道还会不会这么做。

前几年出了本《萧条经济学》的书，大概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口红在经济萧条时卖得更好等。当然现在也不缺乏这样的例子，比如中国经济最萧条的时候，中国的电商反而逆势发展，阿里巴巴赚得盆满钵满，而口红之类都是万里挑一的行业，电商的兴起也是萧条时期人们对便宜货需求增加的结果。

其实媒体自己也是货币紧缩的受害者，他们也是在乎自己的利益的。媒体刊登耸人听闻的文章，媒体的影响就会扩大，发行量就会增加，发行量大了，广告收入自然上升，这对于个体是这样的，但具体到整个社会就不同了。从宏观上分析就是相反的结果，媒体炒作货币超发，结果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紧缩



货币，货币紧缩导致企业经营状况下降，企业广告投放量减少，媒体因缺乏广告收入而亏损。

事实也充分证明，媒体在货币紧缩中所受到的危害一点也不比其他行业小。今年几大门户中的网易和搜狐都搬迁了新的办公地址，而且网易的一些频道开始允许员工在家里办公，这一般可解读为企业遇到了经营困难。而一家中国最大财经网站的高管也向笔者透露，在往年他们都是高增长的，而今年是他们没有增长的一年。以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一般会认为经营状况应该最好的南方报业为例，大家就可以看出媒体行业的状况了，南方报业从2010年就开始亏损，从2010年的亏损一百多万元，扩大到现在的一个多亿，甚至还在急速地扩大亏损。一直亏到现在，201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326万元，净利润负109万元，2012年南方报业亏损1.23亿元。2013年一季度净亏损9485万元。

这绝不是孤例，比如去年微博传出，羊城晚报大降薪，经管人员降超1000元，采编人员降超2000元，降幅超过20%，堪称跳楼式。近年传出中国最大的财经传媒财讯传媒全体裁员、环球财经杂志集体换人等。

笔者谈媒体的例子，绝对不是宣扬什么因果报应，而是想说明“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货币紧缩导致的经济萧条面前，大家都是受害者。

## 五、通胀的根本原因

---

其实只要熟悉经济史的人就会发现，历史上的通货膨胀大多是由经济增长引发的，也就是经济增长是导致通胀的第一要素。通过对中国通货膨胀历史与经济增长历史数据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平均两个点的经济增长，带动一个点的通货膨胀，比如经济增长8%，通货膨胀就会达到4%，那是不是说，真实的经济增长只有4%了呢？当然不是，我们所说的经济

增长是扣除通货膨胀后的经济增长，而不是数字上的经济增长，如果仅从数字上看，每年的经济增长其实是统计局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与通货膨胀数字之和，也就是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都要在12%以上。这也就是中国经济每五六年就可以翻一番的道理所在。

我们有必要重申一个观念，那就是“通货膨胀是一种经济增长现象，通货紧缩是一种经济衰退现象。”必须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待通货现象，而不是过度用于货币工具。

另外，我们指出通胀是经济增长现象的意思是，通胀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不可避免，另外公众对通胀这个词的理解也不对。其实关于通胀有三种定义，一种是最狭义的定义，只与货币有关，只将由货币超发引起的物价上涨称为通货膨胀，但是由于货币的多少没有标准，所以很难操作，这个定义也无法衡量，所以不用。还有第二种，是学术界采用的定义，那就是物价增长迅速，而且维持一段时间才是通胀，因为正常的物价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现象，不算通胀，只要经济在增长，CPI就是正值，不可能变成零，更不可能变成负数。当物价维持高增长一段时间后，就说明通胀来了，比如在中国，CPI达到5%以上，且连续2个月以上，就认为是通胀了。第三种定义，是老百姓的看法，也是错误的看法，就是将所有的物价上涨都看成通胀，大家平时讲通货膨胀，根据的指标就是CPI，大家一看CPI高了，就高呼通货膨胀来了。但CPI为正值，不一定就是有通胀，而且还可能是通缩，在中国CPI只要低于3%，一般就认为是通缩了，物价增长3%，按老百姓的看法是仍在增长，但是却是通缩，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得更快。

通货膨胀从最狭义上说是一种货币现象，但物价上涨并不是货币现象，而是供求现象。由供求引发的物价上涨，称之为“价格膨胀”，这背后就是货币少发所致。

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实就是劳动价值的提高，如果换成另一种表达方式就是劳动力价格越来越贵。其逻辑链条如下：

经济增长→工资升高→用工成本升高→产品成本升高→物价升高。

在这里面工资增长需要大于物价升高，否则社会就倒退了。工资的毛增长率为“GDP毛增长率”，也就是GDP增长率和物价增长率之和，在中国一般为12%以上。中国工资基本上是5年翻一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工资已经翻了100倍了。2007年北京白领的工资大概就两千多元，而现在基本上都能达到四五千元，也已经翻番了。

通货膨胀是一种价格上升的现象，任何国家只要存在经济增长就必然存在商品价格的上涨，通货膨胀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一个国家只要经济不停滞，必然有通货膨胀，事实上也是这样，经济一停滞或是衰退，马上就会出现通货紧缩，而正常的年份，通货都是通胀的。只有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才会通胀，那些经济停滞或是经济衰退的国家，他们丝毫不面临经济通胀的问题，他们面临的是通货紧缩的问题，比如日本、美国就是这样，他们的物价从来不上涨，但经济状况其实非常差。这就是经济停滞导致的通缩。

### 中国通胀并不严重

中国的猪肉，经过了那么多轮的通胀，现在终于到了十几元钱一斤的水平。来自南方的蔬菜，经过长途运输到了北方，价格大概三元一斤，本地菜还是一元多一斤为主。中国的主粮小麦和玉米，十年前就是一元一斤的价格，现在差不多是一元多的水平，这还是国家保护价收购，否则可能都不会看到涨价。

中国十年没有涨价的商品很多，我们以家庭生活用品为例子，比如一个普通雨伞10年前是10元一把，现在还是10元一把，方便面10年前是一元多一包，

现在还是一元多一包，另外中国的汽车、家电、电子产品等大件商品一直都在降价。很多专业人士都统计过，中国的通胀几乎就是食品周期，其实是猪肉价格的周期波动，在专业领域也被称为猪周期，其他根本没什么波动。

在中国，如果你说没有通胀，往往被讽刺为“不食人间烟火”。那到底是谁“不食人间烟火”呢？中国网民中往往是那些从来不去菜市场的大学生，而网站的编辑目前基本上是一些85后的年轻人，这些人根本从来就不做饭。

当然中国也不是什么都不涨，比如房子是中国最大的消费，涨得非常多，劳动力价格也涨得非常多，比如理发等。而房子也与货币和通胀没关系，是市场化的结果，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必然导致涨价。房价上升是市场化没完成的结果，房子是最后一个市场化的，正处于转轨的过程中。

媒体最热衷于炒作通货膨胀、货币超发等，在门户网站的财经频道，这些文章总是点击率最高的，网媒的编辑们也总是将这些文章推为头条。但可惜的是，这些都不是事实。

### 通胀与广义货币无关

对于通胀，大家一般都有三大误解。第一误解，认为只要物价上涨，就认为是通胀，这不对，物价上涨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不能算通胀；第二误解，只拿农贸市场的产品说事，但从来不看汽车、家电、消费电子产品等，汽车、家电一直处于微涨或是微降的状态，而消费电子一直是降价，这些也是居民生活中很大的比重；第三误解，一通胀就说货币，其实是经济增长闹的，得调整经济增长才有用。

经济大规模的通胀必然是经济发展过快的结果，认为经济增长是货币超发的结果，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也是不懂货币规律的结果。

我们经常将通胀归结为广义货币，但是广义货币不是印刷厂印刷出来的，

而是由企业贷款创造的，创造货币的是企业而不是央行，贷款创造货币，没有贷款就没有货币的放大。而企业贷款只与经济信心有关，与货币关系不大，只有在经济持续向好的情况下，廉价货币才能促进企业投资，其余情况下不会。

根据货币运行原理，其实货币会一直存在于银行体系内，货币永远不可能用完，企业要想贷款永远有钱，这是在理想条件下的状态，也是资本主义早期的状态。正因为存在这样的情况，所以货币乘数很大，经济风险也很大，所以会出现经济危机。后来人们发明了很多方法控制货币贷款，比如存贷比的限制、存款准备金的限制等，这都是政府对货币贷款的限制。其实政府根本就不用超发货币，政府只要取消这些人为限制，企业就有贷不完的款，因此，所谓政府超发货币纯属阴谋论。

货币增长，特别是广义M2增加是企业贷款活跃的结果，是企业创造了货币，而不是相反。现在很多骗子总是倒果为因欺骗不懂货币原理的人。

经济增长，不通胀是不可能的，关键是控制通胀的幅度，而这只能从控制经济发展速度入手，也就是通胀是经济发展太快的结果，要想避免通胀，只能让经济发展慢点。

根据中国的通常状况，经济发展速度如果超越10%，那么通胀就非常明显了。在中国，只要经济增速不达到10%，通胀就不明显。人们高喊通胀的年份都是中国经济增速超过了10%的年份，这些从历史数据上完全可以印证。

因为当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0%时，通货膨胀就会达到5%。如果通胀超过5%，那人们感受就开始明显起来，因为5%只是个平均数据，当平均价格上涨5%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很多商品的价格上涨超过了10%，或是更多。因为通胀从来都是从少数商品开始的，特别是生活必需品，所以通胀超过5%，人们就会感受非常明显。

总之，通货膨胀是一种经济增长现象，通货紧缩是一种经济衰退现象，要想不出现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最好的方法就是控制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不是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因为货币政策往往对实体经济具有太大的杀伤性，这也是中国近年来出现企业家跑路潮的原因。

### 通胀与生存方式转变

在现代社会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都部分失灵的情况下，只能从生存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个世界比如物价的上涨，比如生活方式的变迁，比如社会的改革，等等。我们可以看看物价上涨的问题，物价上涨并非就是通胀，很多是生活方式变迁的结果。

问题一：2007年我理发5元，现在15元；以前麻辣烫3元，现在8元；以前猪肉6元，现在13元；以前牛肉8元，现在24元；这是怎么回事？

### 回答：为何理发和麻辣烫价格翻3倍？

麻辣烫价格翻了将近3倍，但是理发用的剪刀价格翻了3倍吗？麻辣烫用的蔬菜翻了3倍吗？显然都没有。这两个都是由于人工工资导致的，是纯人工上涨导致的价格上涨，而人工工资上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经济学上这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这种行业对工资上涨特别敏感，这些行业的价格上涨会与GDP的毛增长率相同，中国经济的毛增长率为12%左右，五年翻一番，所以这些价格也会五年翻一番。在以后理发和吃麻辣烫都是奢侈，当然其他东西可能会更便宜，比如手机、计算机。

同样，有网友提出，过去5元钱的快餐现在要20元才买得到，也是人工费提高的原因，现在雇个厨师每月四五千元，而快餐五块钱的时候，雇个厨师每月才一千多元钱，也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 为何猪肉价格增长超过粮食？

为什么猪肉价格上涨超过粮食的价格呢？因为猪并不直接吃粮食，而是吃由粮食加工成的猪饲料，这里面包含着很大的加工成本，而加工成本主要是人力成本，所以猪饲料的涨价主要也是人力成本升高造成的。

另外，猪肉价格也跟摊位费有关，城市地价那么贵，直接推高了摊位费，这也是猪肉价格很大的一部分，这也不能完全算是通胀，是城市化的结果，是人类生存方式变迁的结果，也属于生存经济学研究范围。

### 为何牛肉的增长超过猪肉？

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牛羊肉的需要增长了，所以牛羊肉的价格增长得非常快，这是由于生活方式改变，导致供需发生变化带动的价格上涨。另外牛羊的养殖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早先，牛羊都是农户散养，不额外占用专门的劳动力，也不用外购饲料，基本没什么成本，所以价格很低；而现在都是养殖场养殖，劳动力需要雇用，饲料需要购买，成本当然非常高了，所以价格翻番，所以牛羊肉比猪肉涨得快。猪的养殖已经度过了从散养到养殖场的阶段，而牛羊正处于这个过渡阶段，这些都不是宏观经济学的通胀理论能解释的。

大家感受比较明显的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按照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价格五年就会翻一番。

## 六、“通胀感”不同于通胀

当前社会普遍弥漫着的强烈“通胀感”，事实上与货币和物价关系都不大，而是因为“生活方式在变贵”，更多反映的是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的差距。

“通胀感”与真正的通胀是两码事。所以，通胀的时候不一定有“通胀感”，有“通胀感”的时候也不一定存在通胀。通胀是物价上涨，但通胀感并非完全来自物价上涨。

当前社会普遍弥漫着的强烈“通胀感”，事实上与货币和物价关系都不大，而是因为“生活方式在变贵”，更多反映的是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的差距。这种“生活方式变贵”带来的“通胀感”，即使在物价全面下降的情况下也可能滋生。

曾有生活在杭州的记者朋友采访笔者，他觉得中国通胀非常厉害。

我就问他，“你感觉什么物价增长最快，先排除房子，房子的问题单独谈。”他想了一会，也说不出什么物价在涨，但他诉说了他的生活痛苦感：每月最大的支出是汽车的油费，每月加油就得1000多块钱，感觉不堪重负。杭州地铁每次8元，公交每次3元，非常贵。

这位朋友的“通胀感”就是来自“生活方式在变贵”。公交3元，确实不便宜，即使如此，如果使用公交出行，每月500元基本够用；地铁8元每次，也不便宜，即使如此，如果乘地铁，每月1000元也基本够用；若开车，每月就起码得1500元。

从公交到地铁再到私家车，这就是“生活方式在变贵”的典型案例，生活方式每变一次，支出成本几乎就翻了一倍，所以“痛苦感”很强。

但这确实与通胀无关，因为公交价格变化不大，地铁价格变化也不大，私家车汽油的价格变化也并不太大。而这位朋友的通胀感更多来自于与公交和地铁的比较。

还可以举个肉食的例子，猪肉是国人的传统肉食，后来吃得最多的是鸡肉，现在国人更喜欢吃牛羊肉了，但牛羊肉的价格从来就贵于猪肉和鸡肉。



从吃猪肉向吃鸡肉和牛羊肉转变，是“生活方式在变贵”的又一个案例。现在很多人抱怨牛羊肉贵，却很少注意到自己的口味在变。

当然牛羊肉的价格确实也在涨，但这也并非通胀，而是养殖方式的变化和养殖成本的升高，原来靠农户散养，靠吃青草和农作物喂养牛羊的方式早已供应不上国人大得难以想象的需求了。

说到通胀，很多人喜欢比较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物价变迁，其实这是错误的。要知道，计划经济时代，很多物价是不真实的，如果真要比，应该与1997年前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建成的时候比，如此一比，物价变化就不算太大。

而从2007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到现在，客观地说，经济一直在通缩，可老百姓的感觉，通胀感又确实很强，其实这是生活方式在变贵。也就是虽然具体商品在降价，但生活方式却在变贵，所以总体“通胀感”很强。

还是拿私家车为例子，五年前，中国私家车年销量几百万辆，而现在每年销售2000多万辆，而且还在快速增加。

没有私家车的年代不会抱怨开车成本高，吃不起牛羊肉的时代也不会抱怨牛羊肉的涨价，这反映的是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的差距，与物价无关。生活方式变贵，只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关。

国人“生活方式变贵”关键正是中国发展太快了。私家车快速增加肯定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导致“生活方式变贵”的唯一因素就是经济发展速度。看看美国和日本，这些经济衰退的国家恨不得经济能通胀，但无论怎么印钞，股市都翻番了，经济还是不见通胀，这是因为经济没有发展。

在传统的观念中，人们可能会认为高薪的人比低薪的人生活更如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在传统社会不同人群生活方式的差异化不大，几乎

就是吃和穿，玩得很少，也不开车，更不出国旅游，没太多复杂的社会交际。

而现在完全不同了，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差异越来越大，几十元可以生活一天，几百元、几千元也可以生活一天。这就导致了拿高薪的人的生活痛苦感也不低，因为他的薪资也满足不了他的欲望，低薪族挤公交，身体累点，但省钱；高薪资开私家车，身体舒服了，但总心疼油费。

在网络上常有人晒生活成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些人当中几乎见不到月薪在1万元以下的。而事实上，在13亿人的中国，月薪过万者不过几百万人而已，如果这些人都感觉生活困难，那些挣几千元的怎么办？

难怪很多网友都骂他们矫情，这些人当然的确有矫情的一面，但却不能否认他们的“痛苦感”是真实的。这是传统的经济学解释不了的现象，只能从生存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这些高薪的人享受着“更贵的生活方式”，因此痛苦感也不低。

如此说来，若按客观、传统的经济学来分析，当下中国确实不处于通胀年代，不存在普遍的“产品变贵”问题，而按“生存经济学”来分析，当下中国又确实处于“生存方式不断变贵”的时代，而经济发展越快，这种由“生活方式变贵”导致的通胀感就越强。

解决办法绝不是放弃发展，而是要想方设法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笔者反复提及的建设“低生存成本社会”。

## 七、房地产背后的“三大伪问题”

### 中国房地产不是分配的问题

中国一直将民生方面的问题，归结为“分配”出了问题，而且几乎绝大多

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但必须指出，中国房地产面临的问题真不是分配的问题，如果是分配的问题，那只有少数人买不起房，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即使是大名鼎鼎的明星，已经跻身上流社会的精英人士，收入处于社会中等水平的所谓“中产阶级”都是买不起房。在媒体上，我们经常看到，某知名主持人、某副部级干部、某报社的高级记者，他们都买不起房，这难道还能说是分配的问题吗？而且不是现在买不起的问题，而是看不到买得起的希望的问题。

社会学家早就指出“只有造福于多数人的政策才能培育共同的美德”。房地产已经成为为祸多数人的领域，所以社会也必将为之走向败坏。年轻人因为它找不到对象，官员为了它拼命地贪污，老人为了它舍出养老的钱，学者为了它丧失基本的良知，甘愿充当“资本二奶”，难道这些问题还不够严重吗？

总之，政府必须在住房建设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承担更重要的责任，而不是一味将主要责任推给市场，然后再对市场进行各种莫名其妙的治理。中国不是市场出了问题，而是住房市场化出了问题。

### 不要用“泡沫论”来安慰自己

另外，我们必须澄清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房地产没有泡沫，或是泡沫不大。我们不能再用房地产泡沫论来安慰自己，善良的中国人总是期望通过政府的调控能够挤出所谓的“泡沫”，然后让民众买得起房。其实这是错误的，中国的高房价在于市场化，根源是土地的市场化，是级差地租。如果认为县级城市，房价每平方米3000元是正常的话，那一线城市房价每平方米3万元就不离谱，因为一线城市的地价比三、四线城市贵10倍是正常的。因此在目前是市场供应为主体的情况下，房价不可能降下来，我们用挤泡沫来让房价回归的想法，最终必然会落空。中国房地产没有泡沫，靠所谓调控也挤不出泡沫，只要实行市场供应，房价就下不来。

中国不缺钢筋水泥，但是缺少可利用的土地，土地市场化必然会出现城市

的高地价，从而出现高房价。

中国房地产与货币的总逻辑是：市场化推高地价，地价推高房价，房价推高贷款，贷款推高货币需求，从来导致货币越发越多。

### 不要相信“投机炒作论”

中国调控的目标仍然是抑制上涨，而不是民众期待的降价，而且一直是打击投机。之前的限购就是为了打击投机，结果开始有效果，慢慢就没效果了，中国公布了那么多的调控措施，按说房价应该有所下跌，但是效果仍不明显。说明投机炒作不是影响房价的核心因素。其实中国这些年的调控都是针对投机进行调控的，但效果不好，只能是遏制住房价。如果不是投机的话，那中国高房价背后的真问题是什么呢？

## 八、房地产背后的五大“真问题”

除了上面的伪问题，笔者认为高房价背后有以下五个真问题，这才是关键。

### 1. 规划的问题

中国的房价和地价有着极强的“地王”带动效应，“地王”主要是城市的黄金地段，当前城市的黄金地段，住宅楼已经非常少了，但是写字楼却在频繁地兴建。土地价格是不存在刚性成本的，弹性极大，因此中国房价的治理必须采取“掐尖”政策，从房价最贵的地方进行治理，必要的时候，功能重新划分、移出、“禁建”都是必需的。比如在中央商务区不得再新建高楼等。

治理，从城市规划上入手，特别是对各大城市“CBD”的规划，中央商务区内不得再新建写字楼，老楼拆除之后只能建成住宅楼。目前中国各城市的中央商务区都存在着人口过密的情况。写字楼过多，住宅楼必然过少，而开发

写字楼的效益又高于住宅楼，开发商都倾向于开发写字楼。所以如果不是人为地进行规划，那必然是这样的结果，结果住宅的房价越来越高，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在“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中，专门有一条是“合理规划商业区和住宅区”的道理。

中国也主张增加土地供应，但是如果前面的规划没有做好，供应是供应不上，而且即使城市的非核心区域增加了供应，也无法抑制房价的上涨，因为这个市场不完全是总量上的供需问题，而是局部增长过快，从而带动整体房价上涨的问题。

## 2. 税收的问题

房地产工程一向是经济支柱，各地的政府贷款，也主要以土地做抵押，土地转让费是主要的财政收入。要想降房价，就必须解决地方政府的收入问题，世界各国都是这样，要么卖地，要么征税，税收低就必然土地贵。中国的税收现在其实是很低的，在福利国家税收一般占到GDP的50%左右，而中国仅有30%左右，如果要避免土地财政，征税是必需的，这个问题绕不过去。当然征税不是向底层民众征税，也不是向企业征税，而是向社会资源消耗比较高的人群征税，比如销售税、奢侈税、赠与税、遗产税等。

## 3. 利率的问题

在中国，一个家庭有两套房的太多了，而且民众有点钱就想买房。比如中国家庭年净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家庭非常多，这些人三五年就能攒下几十万元，这些钱怎么投资？还是买楼。这就是中国房价下不来的原因，中国的中产家庭基本都将买楼作为资产保值的手段。要想避免这一点，笔者建议将一年期存款利率与CPI挂钩，一年期利率不要再由央行调整，让其直接与CPI自动持平，这样才能避免公众的投资性买楼，让钱存在银行也有利可图。

#### 4. 房地产不能敞开供应

中国不缺钢筋水泥，但是缺少可利用的土地。土地是限制级资源，不能按市场进行自由供应，在这一前提下，中国房地产也是不能随意供应的。确切地说，是不能谁想买多少套房就买多少套房，中国必须对单一家庭拥有的房地产数量进行限制。比如，规定每个家庭不能拥有超过3套住房，超出这一数额就定为犯罪，或是对超出的房子实现高额的社会资源占用税，迫使他们卖掉房子，这才是真正的调控。

#### 5. 市场化的问题

只要市场化就必然出现高房价，这是由级差地租决定的，是改变不了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这些房地产的点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中国需要对住房政策进行通盘的考量以及彻底的改弦更张。笔者主张按保障面积来划分政府与市场，意即在一定面积内政府应该向民众免费提供住房，而超出这个“保障面积”的话，则由政府或民众共同承担，或是民众自己承担。比如政府免费为民众提供10平方米住房，如果想住得更宽敞，可以再自己购买。

## 九、解决房地产问题的根本之策

住房是最大的民生，新加坡不属于福利国家，民众福利都来自于自己的储蓄，这种制度其实和美国及我们现在实行的社保制度没什么两样。但新加坡就是住房问题解决得好，因此新加坡一直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建设成了公认的中产阶级社会。我们也必须将住房问题解决好。

#### 城市化不会导致耕地减少

中国现在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那就是城市化会使耕地减少，但这只是个

短期现象，城市化最终不会造成耕地的减少，只有在中国现在这种大部分人都城市、农村“两栖”生存的情况下，才会导致耕地的减少。我们可以用数据来说明。

中国现在城市的人均占用土地面积是130平方米，发达国家城市人均占用土地面积80平方米。中国的城市密度要大于发展国家，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城市人均占地面积反而比发达国家多呢？笔者分析，这主要是很多中国人，常年生活在城市，但户籍不在城市，导致平均数过大。

我们可以拿我们现在的城市人均占地面积130平方米来与农村人均占地面积进行比较，这样就可以知道，城市人均占地面积不可能比农村大，也就是民众从独门独院的平房搬到楼房里住的时候是不可能导致占地面积增加的。

### 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尾声

笔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不是刚刚开始，而是已经进入尾声。目前，中国的年轻人已经大部分在城市就业，农村都是些老弱人员。如果以就业为标准，而不以户籍为标准，那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结束，中国城市就业人口在以后将不可能大幅增加，而近年从沿海到内地不断蔓延的用工荒则非常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是生活在城市中，而没有住房的大量存量人口的住房问题。中国某些专家指出的中国需要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解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是对中国形势的重大误判，很可能会误导政府做出错误决策。中国现在是在补早期城市化过程中的欠账，因此中国不是像个别专家所指出的要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而是只需要用5年左右，最多不能超过十年的时间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政府对中国城市化形势做出错误的判断导致了“僧多粥少”，也是造成中国高房价的另一个原因。

### 中国民众的住房问题该如何解决

笔者主张以居住面积来划分政府与市场，意即在一定面积内政府向民众免费提供住房，而超出这个规定面积的话，则由政府或民众共同承担，或是民众自己承担。

房地产对财富的转移效应太大，这样既不利于经济的稳定，也不利于政治及社会的稳定，对民众及国家都没有好处。其次，政府为民众提供一定程度的住房，可以保证社会的稳定，这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在住房保障方面，一定要选择比较科学合理、公平的方式，目前以收入为标准的住房保障制度，并不好，可以考虑转向以面积为标准的住房保障制度。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接近尾声，中国不是要用二三十年的世界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而是要用5年左右，最多不能超过十年的时间，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

## 十、中国有重蹈美国覆辙的危险

近日中国一些被称为“新供给主义”的学术思潮开始浮出水面。然而供给学派出山，从来就不是什么好征兆，因为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人类经济极少出现供给的问题，一直是需求的问题。而当供给被人提出的时候，无疑是实体经济出现了巨大的危机，当年的美国就是这样。

### 美国制造业是如何消失的？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滞胀，这次滞胀主要是由于石油因素，中东战争期间，阿拉伯国家以石油为武器与西方对抗，一时间石油价格翻了10倍之多。与之相伴的则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滞胀，滞胀在历史上出现得并不多，因为以前的世界经济没有联系那么紧密，经济停滞时一般是经济衰退时，同时一般伴随通缩。但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危机显然不是由于经济周期所



导致的衰退，而是战争的结果，因此也不会出现与经济周期性衰退时所出现的通货紧缩，而是输入性通胀，其实这点在经济学界是有共识的。

然而民众并不管这些，民众要求控制通胀，政客需要控制通胀，但这种为治理通胀而治理通胀的思路必然会带来更大的负面效果。其实真要治理通胀，也并非很难，无非是紧缩货币，人为地制造一场经济危机而已。美国确实就是这样做的，演员出身的总统里根采纳了一个精算师出身的经济学者弗里德曼的馊主意：紧缩货币，控制通胀。

然而，任何的货币紧缩都是有代价的，货币紧缩对老百姓没影响，但对企业却是伤筋动骨的。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利率最高时达到了20%，几乎相当于平时的10倍，这是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承担的，因此当时的美国，除了少数大企业进行了跨国转移之外，大部分制造企业都倒闭了。这也是美国制造业消失的历史背景。

其实，发达国家并非一定需要制造业，日本、德国、北欧都是发达经济体，都是以制造业见长，而没有制造业的只有美国和英国。美国用弗里德曼的高利率政策击垮了美国的所有制造业，而英国则采用哈耶克的私有化政策变卖了所有的制造业。现在的美国连起重机都生产不了，而英国连一个自己的汽车品牌都没有。

当年弗里德曼的建议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好处，相反，却是经济的衰退。里根也马上发现自己上当了，并随之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学派，那就是供给学派。供给学派并没有统一的理论，只是不同思想的大杂烩而已，归结起来主要有两大方向，一个是主要扶持实体经济，增加供给，改善劳动生产率等，另一个方向是减税，促进消费。

扶持实体经济，大搞企业改造，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正确的，也无可厚非；但减税就不那么对头了。这种经济学在美国被称为“巫毒经济学”，

所谓巫毒经济学，主要是指起源于里根时代的“减税+赤字+借债”的经济政策，而当前美国所承受的国债危机、财政悬崖等一系列问题都来源于此。

尽管总统施行的是有毒的经济政策，但是民众仍然像着了魔一样对这些政策要进行英雄般的欢呼。其被称为“巫毒经济学”原因也就在这里。

而美国历史发展也表明，大减税往往是大危机的前兆。这种情况其实也并非始于里根，在大萧条之前，美国就施行过这样的政策。

那时，美国的财政大权，掌握在当时的美国首富梅隆手里，此人历任哈定、柯立芝和胡佛三任总统的财政部长，是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财长。梅隆在担任财长期间，不停地在做一件事：减税再减税，国会每两年就要制定新税法来满足梅隆的要求。

但梅隆减税的结果就是大萧条，而大萧条之前，他也一度被称为最成功的部长、“汉密尔顿在世”等。

减税所导致的后果，绝不是“借钱一还钱”那么简单，其最毒的地方是利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不带利息的贷款。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的预测显示，美国需要在未来10年支付5万亿美元以上的利息。2013—2022年期间，美国政府需要支付的利息将超出医疗补助计划支出，是社会保障支出的一半，接近美国未来10年国防开支总和。如果你对这些空洞的数字没有概念，我们可以这样通俗地表述，那就是民众每年将大量的税收交给政府，但无法享受任何公共服务，因为这些钱都被用来还利息了。只干活、没收入是奴隶的特征，美国民众就即将成为这样的债务奴隶，而这还仅仅是利息，还不包含本金，如果包含本金，几百年也还不完。

美国不用我们担忧，我更担忧中国，因为现在中国也开始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而且正在步美国的后尘：货币主义者倡导紧缩货币导致实体经济危机，供

给学派提出减税，民众被政治和学术的巫毒所迷惑，不明就里地支持，而一段时间后，整个国家都成为债务的奴隶。

前人的失败并不一定会成为后人的教训，错误频繁上演也是历史的常态，不过这次轮到了中国。但我们也没必要过度担心，因为中国政府具有很强的政策修复能力。中国的民族复兴已经达到相当程度，任何外部势力都没有强大到能够阻挡其崛起的地步。美国在军事上依然十分强大，但中国的实力足以让美国在战争中遭遇重大损失，甚至连新保守主义者都不愿鼓吹战争。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反华包围圈”会就此放弃。如果无法“杀死”中国，他们就会劝中国“自杀”。但实际上，美国曾经取得过两次成功，对象分别是日本和苏联。杀人牵扯到他人，自杀则是个人决定。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便是，中国是否会被劝服自杀。

李克强总理上台后，外资投行一直炒作“李克强经济学”就是这样的作为。“李克强经济学”由巴克莱资本公司创造首次提出，按照巴克莱给中国预设的路径：李克强经济学的政策将把中国推向“临时硬着陆，未来三年里，中国的季度经济增速会降至3%，在那之后，中国经济应能迅速反弹，未来10年内保持每年6%～8%左右的经济增长。”

其实只要熟悉经济史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巴克莱方案其实就是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为俄罗斯开出的休克疗法的变种，俄罗斯使用休克疗法结果惨败。中国如果采用了巴克莱方案，其结果也可想而知。李克强经济学提出不久，李总理马上就做出了回应，那就是绝对不允许经济滑出下限。

其实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率真的降到了3%，且不说其经济后果如何，仅仅从信誉上就是一个重大损失。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低于7%的时候都没有过，如果降到3%，那各种关于中国经济失败论必然甚嚣尘上，到时候即使中国有能力让经济恢复正常，也已经留下了历史污点。到时候很可能就是巴克莱

等投行落井下石的时候，因为这些年他们就一直在寻求唱空和做空中国的机会，但一直没有找到，那些真正做空中国的机构无一不是惨败而归。其实，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那些希望中国走向低投资、低增长、高消费的人的见解不仅无知而且毫无可取之处，更是用“李克强经济学”的名义兜售自己的私货。

中国显然不会上当，这种“诱错”式的炒作，中国经历得太多了。外媒所希望的，其实就是我们最应该避免的，中国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才有了今日的成功。

## 十一、美国是如何建设成“伟大社会”的？

起于老罗斯福的“进步时代”，终于“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建设，中间经历了小罗斯福的新政、杜鲁门的公平纲领，这60多年是美国文明一点点从兴起到巅峰的时期。

1870—1920年是美国资本主义的“镀金时代”，在那短短的半个世纪里，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然而，在这一惊人发展的背后，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和追求财富的本能的结合。资本的力量肆无忌惮地掠夺着自然资源，无所顾忌地消耗着水、森林和土地。依靠这些资源的消耗而形成的诸多工商界“强盗大王”，垄断了石油、煤炭、钢铁、电信和铁路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

伴随着财富而来的还有剥削、苦难、不公、失业、贫困、肮脏不堪的城市贫民窟和动荡的社会。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写道：“在这片丰饶的国土上，从来未能满足下层人民衣食住的需要，周期性的萧条更使千百万人陷入了实际的贫困。在那些大城市里，贫民窟飞快增长，疾病、罪行和恶习四面传播。”

在“契约自由”的旗号下，工人起码的工作安全得不到保障。正如老罗斯

福总统在其《自传》中所写：“那些煤矿业大公司，可以随意地开除矿工；但矿工却不能抛弃公司。他得要有工作才行，找不到工作，老婆孩子就要挨饿。”

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中，如此不公平的现象不会永远持续。下层民众虽然没有富人那么多的财富和社会资源，但他们有人数众多这一独特优势，一旦团结组织起来，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于是，19世纪末期以来，要求社会平等和揭露黑幕的运动此起彼伏、声势浩大，对各级立法机构形成了强大压力，迫使它们不得不通过限制垄断、保护竞争、维护中下阶层利益的立法，以纠正市场自发秩序带来的不公正。

市场竞争中的强者与弱者在政治上的较量，最终化为联邦法院里的司法诉讼。资本的势力依仗既有的宪法原则，强调财产的权利和契约的自由；工人的势力则发掘出新的宪法原则，突出美国宪法序言中的“公共福利”。一时间，最高法院成为了新旧宪法原则辩论交锋的战场。

遗憾的是，美国最高法院一开始却站在了大公司一边。在1895年著名的“美国诉奈特公司”案中，最高法院的判决让“反托拉斯法成为一纸空文”。最高法院甚至将一些州的劳工立法打入冷宫，其理由是“偏袒工人，损害老板”。

在美国司法的保护下，资本主义继续其自由放任，似乎不可一世，但其背后的结构性矛盾积重难返，终于爆发了经济大萧条。罗斯福以“新政”为号召，带领美国走向了一个节制资本、干预市场、倡导公平与公正的新时代。然而，保守的最高法院将其一项又一项规制经济、保护劳工的立法打入冷宫。新政面临着毁于一旦的危险。

但是，司法保守的堤坝不可能永远阻碍追求进步的社会思潮。在强大的民意压力面前，最高法院个别大法官退缩了，一些大法官悄然隐退，新的最高法院认可了罗斯福政府一个又一个的立法。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的法律保住了，《社会保障法》通过了，工人组织工会、集体谈判的权利确立了。财产自由和

契约自由不再神圣。

新政最大的成就就是让富人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在20世纪20年代，税收对富有群体而言是小事一桩。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仅为24%，同时由于对最大的地产所征的遗产税不过为20%，富豪家族轻易便可维系下去。但随着“新政”的来临，富有群体所面对的税收不仅开始远高于20年代，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税率也是很高的。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当前只有35%），在第二任期达到79%。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背起“冷战”的开支，这一税率升到了91%。对公司利润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

还有一点，即依赖资本收入的人不仅发现这笔收入大多缴了税，他们还发现，要把自己的财富转移给子女变得日益困难。房地产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从20%连续升到45%、60%、70%，最终达77%。其结果之一便是，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度明显降低，“新政”把他们的许多收入都征了税。

新政的大规模征税措施，导致了贫富差距减小，中产阶级成为了社会的主体，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里根执政之前。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争斗，美国社会终于开始走向基本的社会公正，劳工阶级终于获得了与资产阶级平等的法律保护。在争取平等权益的斗争中，与当时欧洲的工人阶级相比，美国劳工更多是通过选票和法庭，而非单纯的罢工或暴力手段来获得这些成果。

至此，美国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受到了约束，牟取暴利的垄断遭到了遏制，“镀金时代”的两极分化得以缓解，苦苦挣扎的社会下层有了起码的保障，从乡村到城市化、从农业到工业化的社会转型相对平缓。劳工争取权益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弱势社会群体树立了榜样，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和残障人士，都开始用法律来保护他们的权益，寻找他们心目中的公正。

自新政后，民主党就一直以弱势群体的保护者自居，其政治理念则是利用联邦政府的权力来扩大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美国民主党推动美国进行的脚步并没有止于新政。

### 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纲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继续推进美国迈向进步的是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纲领，1945年9月6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了战后第一个解决国内问题的咨文，内容包括“二十一点”，这是标志“公平施政”纲领的开端。纲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5—1947年为第一阶段，重点是在经济复原和着重解决就业问题，使美国从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过渡，取得了较大的成功；1947—1950年为施政的第二阶段，重点在于改革，即扩大社会经济福利，但只取得了为数不多的实质性的成就。

“公平施政”纲领是杜鲁门政府的施政基础，在其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阻力，1949年第八十届国会对于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纲领”反应迟钝，公然敌视。第八十届国会很快在华盛顿被称为“哼哈”国会，因为它通常麻木不仁，懒懒散散。除了国会的不予支持之外，南方的国会议员施展惯用的妨碍议事策略来击败杜鲁门在民权问题上的努力，共和党人以及南方民主党人联盟成功地推翻了几几乎所有的公平施政计划。尽管如此，“公平施政”纲领在社会保障方面，也是有些成就的。

1950年通过的对社会保障法的修正案，增加了1000万新的受益人，范围扩大到农民、公务人员、个体手工业者、家庭仆人以及其他工人，并将退休工人的养老金平均增加77.5%。1952年对该法案又加了一条修正案，养老金再增加12.5%。而且社会福利保障范围的扩大，也使更多的人都能纳入到社会保障的体系中来，享受到国家的福利待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们在战后对大萧条的恐惧。

美国的“公平施政”纲领在曲折中艰难前进，其阻力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政纲领的实施的不彻底。但纲领在促进公众对国内社会的觉醒方面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从1950年代后期到1965年的十五年间，在美国发生了一一次次唤起美国民众对自由、平等、权利的新理解和新要求的民权运动，这使全国逐渐产生了一种道德升华的心态。这种影响为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新边疆”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奠定了基础。

经过杜鲁门的承上启下后，美国进入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建设”时期。

1964年，约翰逊提出“伟大社会”的政治纲领，宣布向美国的贫困宣战。此时的美国可以说是处于历史上最富强的时候，然而再富强的国家也会存在贫困。约翰逊称美国“对这个富裕国度中的贫穷的、无继承权的、饱尝饥饿和失望、痛苦的人们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寻求一个人人能劳有所酬、在施展才干后能得到满足的国家。”“我们寻求一个人人能追求知识、接触美好事物、享受家庭和社区温暖的美国。”“我们寻求一个美国——在那里人人能工作，伴随着追求幸福的不仅是安全，而且是精神上的成就、升华和满足。因此，让我们共同完成这项伟大任务。”“伟大社会”的伟大目标就是最终解决这些人的贫困问题，实现美国经济和社会的重大改革。他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说，“饥饿的人，找不到工作的人，无法教育孩子的人，被匮乏压倒的人——这样的人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这一说法是和罗斯福所言“四大自由”是一以贯之的，是积极自由的政治价值观表现。

1965年，约翰逊在就职演说中再次重申他的“伟大社会”政治理念，认为“伟大的社会”立足于“契约的立意公正，明定自由，并有联邦约束”，“在一块丰饶的土地上，家家都不容易生活于绝望的贫困中；在一块收获丰盛的土地上，孩童不容易挨饿受冻；在一块充满进步奇迹的土地上，邻人不至于痛苦、死亡而无人问津；在一块知识普及、学者众多的伟大土地上，年纪轻的国民



必须接受读和写的训练。”“我们必须努力提供能增加每个公民成功机会的知识和环境。”他认为变革的时代，美国将“不停地生成、尝试、探索、起伏、休整、再尝试，但只要一直在尝试，就总会有收获。”这显然又与罗斯福的试验精神一脉相承。此后，他以年度咨文、特别咨文、专题演说、竞选演说、总统经济报告等一系列方式强调美国的贫困问题，诉诸全民的良心，推动联邦立法。

约翰逊列出解决贫困的五大关键因素：教育、健康、技能和工作、社会 and 地区重建、机会平等。除了继续新政已经确立的保障和福利外，他运用自己出色的政治手腕和政治影响促成了百余项新项目出台。创造美好城市环境到治理污染；从向贫穷开战，增加就业机会，到强化社会保险和救济；从普及教育到公民权利；从开发农村到修筑高速公路；从“抚育孤儿”计划到关爱老年，为了纪念杜鲁门，约翰逊签署了《医疗保险法案》；为了纪念肯尼迪，约翰逊原汁原味地通过了《民权法案》；即便是在深陷困境的1968年，他也还是全力推动了住房法案的通关。到第89届国会（1965—1966年）闭会时，“伟大社会”的115项立法，已有90项获得通过。

约翰逊的努力有了惊人的成就：1964—1968年，穷人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减少了一半。而在教育方面，约翰逊的成就更是令人瞩目，他所推动通过的四十多件法案，比此前美国历史上制定的全部教育立法还多。

伟大社会与新政的本质不同在于，新政主要是应急，而伟大社会是想从此改变美国，由政府来保障每个美国人的基本生活水准。新政受惠者主要是那些因非人为因素而陷入绝境的人。

### “伟大社会”与越南战争

“伟大社会”不久便遇到了克星——越南战争。正如历史学家所总结的那样，使命感对约翰逊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在营造“伟大社会”的同时，约翰逊还念念不忘“遏制共产主义”的所谓“使命”，而在越南的战争，就被他视为

一项历史使命。

由于“伟大社会”的种种理念和主张深得民心，由于在国会有着极强的活动能量和广泛的人脉，约翰逊总统本可以带领美国走得更远，但正如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所言，“约翰逊致力于‘以一种以前从未梦想过的规模’进行政治改革工作，而‘保卫南越’则一直分了他的神。”

更为致命的是，约翰逊犯下了一个常识性错误：聪明的猎手不会同时追两只兔子。

事实上，约翰逊也曾担心战争会破坏他的伟大计划。当越南战争即将升级时，“伟大社会”计划的许多议案都有待批准，此时，约翰逊忧心忡忡地说：增加国防经费也许会扼杀他提出的自“罗斯福新政”以来最伟大的社会进步方案。

但是约翰逊不肯轻易放弃的性格，使得他对越南战争割舍不下。而越南战争，不仅耗费了美国的大量资源，也耗去了约翰逊的巨大精力，使他的目光变得散乱起来。而最终，他痛苦地意识到：当一个人想同时追两只兔子的时候，很可能一只也追不上。到了1968年，越战使约翰逊的威信“跳水”，支持率也急速跌至36%，并最终迫使他宣布不再寻求连任。而他身后的美国，却用了很多年才从越战的阴影中走出来。

而我们其实可以反过来想，如果没有越南战争这一外在压力，约翰逊总统也不可能凝聚起建设伟大社会的合力，而当年布鲁门的“公平纲领”没有实现，原因也在这里。其实任何社会都一样，没有危机，就没有改进社会的动力。然而越南战争造成的创伤只需几年就能恢复，伟大社会的成果却长期保留了下来。

### 社会动乱之源是公共贫困

因为在历史的大多数时间内，人们都在与“冰冷、饥饿和疾病”做斗争，

人类几乎在所有历史时期都显得非常贫困。而所谓的富裕生活，仅仅在近百年才慢慢显露于我们这个世界，何况贫困远没有彻底离开所有人。这细微的富裕，与人类生存的整个时期比起来，似乎显得那么无足轻重。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从贫困来安排和思考政治生活。

但我们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产品过剩的时期，如果我们的思维还停留在过去，仍进行私人财富的疯狂生产，那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全家人开着内饰桃木、装有空调、使用动力转向和拥有机动刹车功能的汽车出游，穿过路面不平、垃圾横飞、房屋破败、广告牌东拉西扯、电线横七竖八架在空中的城市，到达充斥商业艺术的乡村。他们拿出便携式冰箱里包装精美的食物，在被污染的河边野餐，然后在不符合公共卫生和道德的停车场里过夜。他们置身于腐烂垃圾的恶臭中，躺在尼龙帐篷下的充气床上，睡前可能会反思自己的幸福为何有如此的反差。”

这是《富裕社会》一书中被引用最多的话之一，因为即使过去50年，这样的情景还每天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甚至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汽车在增加，但公路的增加却是缓慢的，垃圾越来越多，清洁工却增加缓慢，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保障防范社会风险的机制却不健全。

加尔布雷思给这样的富裕社会总结了一个矛盾：“私人富足和公共污秽”。这正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当人们注重私人富裕的同时，却忽视了公共富裕，或者是所有人的“富裕”。GDP告诉增长、私人财富剧烈膨胀的年代，教育、环境、交通等公共福利被关注的程度却越来越少。

“我们拥有昂贵的收音机和电视机，但学校却破败不堪；我们拥有清洁的私人住房，但街道却肮脏混乱。”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还在为推行全民医改而踌躇不前。

精力集中于汽车，却忽略了学校和公园，对私人货物毫不吝啬，而对公共货物的生产却极度克制，这不是通情达理的做法。我们远没有从公共服务的应用中获得愉快，甚至所提供的服务远没有使我们免于烦恼。

丰裕社会可以提供充量的私人财富，但对公共物品却非常吝啬，这种悬殊成为了社会不安和社会不健康的原因。而私人物品的富裕与公共物品的贫乏不仅形成了惊人的对照，而且私人货物的富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公共贫乏的来源。最鲜明的就是私人汽车的增加，就必然要求道路投资的增加，而后者增加是缓慢的，所以变得越来越拥挤，结果是每年都有惊人的车祸或交通堵塞。

在食品领域也是这样，人们获得的食物越来越多，那么他们抛弃的食品包装盒就越来越多，但没有相应的公共卫生投资，结果就是不断加深的污秽。财富越大，污垢越厚，这就是我们的时代趋势。

在更多的财物生产出来或拥有的时候，欺诈的机会也越大。财产更需要保护，如果公共法律跟不上的话，财富的增加就会导致犯罪的增加。

比如竞争的加剧，就需要社会安全机制的健全，因为在竞争社会中，是没有安全的。个别劳动者或经营者的好运都可以在任何时候遭到突然的衰落，这表面是因为懒惰或无能使他失去顾客和职位，但是最能干的人，也会遇到消费者嗜好的突然改变，这与他们自身是否无能没有关系，而且这种变化是不可预见也是不可避免的。失业成为现代人命运的一部分，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职业可以让你干一辈子。

我们没有看到两者维持平衡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在公共服务与私人消费不平衡、不匹配的社会中，人们生活在私人富裕、公共缺失的气氛中，学校不能与电视和电影竞争，电影中的人物成了学生的偶像，发热的手枪甚至成了学生的玩具，学生们不再喜欢更安稳的游戏。

学校周围，酒精、麻醉品、击剑家的刀子成了畅销的商品，这些在早年朴素的社会中不曾有的诱惑，在富裕社会中就不可避免。

生产和消费的繁荣剥夺了诸如清新的空气、干净的街道、良好的学校，其实增加学校和公园，甚至增加清洁工、交警，跟增加私人汽车是一样重要的。私人生产导致公共服务需求自动增加，如果后者跟不上就将成为社会紊乱的一大来源。由于没有很好的扩充公共生产，我们失去了本该享有的机会，

我们必须在贫乏的世界和丰裕的世界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必须通过有效的政府手段使人们尽量避免个人的过度奢侈消费，而在外部公共环境上增加合理开支，这样人民的生活就会更有意义。并且这是长时期内的主导任务。

但除了邮政等少数几个例外，大部分公共服务是不适合收费的，他们必须给一切人使用，这些必须用税收支付。

加尔布雷斯是新制度学派的创始人物，他认为只有制度经济学才能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面临的各种复杂经济问题，提出要在新方法的基础上创立“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他们把技术革命作为研究出发点，对现代资本主义新现象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治理社会的具体方案和理论措施。

公共服务落后于私人生产是加尔布雷斯考查现实的社会背景得出的结论，他揭示了社会不平衡的原因来自落后的公共服务。

他的《富裕社会》一书扭转了整整一代人的政治意识。经济学是一门背负着帮助大多数人走向更美好生活的具有道德诉求的学问。私人产品和服务与政府产品和服务供给之间令人满意的关系，被加尔布雷斯称为社会均衡。

# 下 篇

## 世界大趋势与中国改革前景

## 第五章

# 中国梦：“富而自由”的国家

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梦”主要是指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另外还有两个具体的目标，也就是“两个一百年”梦想，第一个一百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虽然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模式”似乎也战胜了“西方模式”，但我们对西方的理解有误区。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西方主要是指美英，偶尔也包含欧洲，但是其实美国代表不了西方，美国模式虽然是世界的主流，但并非最好的模式，当今人类文明的巅峰在北欧，这里真正建成了“富而自由”的国家。

### 一、“大政府”与“小政府”孰优孰劣？

近30年的世界是最精彩的，其精彩的程度，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及冷战时期。而这30年时间格局的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坚持“高福利”、“有为

政府”的国家都胜利了，而那些实行“去福利化”和“小政府”的国家则遇到了全面性的失败。

在这30年中，大政府的北欧从一个以打鱼捕猎为主的国家，攀登上了人类文明的巅峰，成为世界最富有、最自由的地区。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而非“自由市场经济”的德国成为欧洲的新盟主，与此同时，英国在遭遇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之后，仅出现了三个月的繁荣，然后就是长达30年的沉沦，今天成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三流国家，包括汽车在内的众多核心产业均被外资控制，英国在治好了英国病的同时，却染上了更严重的拉美病。美国虽然出现了克林顿时期的“新经济繁荣”，但结果也不得不面对“里根-小布什”巫毒经济学的危害，而那些经历了自由化危机的经济体比如日本、拉美、东南亚、东欧等至今没有起色。

当下的世界可以分为“大政府”和“小政府”两大阵营，实现“大政府”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北欧、德国、中国、法国、奥地利、荷兰、亚洲的新加坡等，实行小政府的国家和地区有英国、美国、日本、拉美、东南亚、解体初期的苏联及东欧。两大阵营人口相当，大概各有20亿人口，前者实行大政府的国家基本上都形成了经济稳定增长、低负债、低失业率、社会福利不断改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经济局面，而后者则出现了经济动荡、高负债、人民生活倒退等情况。前者以实行社会主义的中国和实行莱茵兰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为主，而后者大多奉行或实践过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模式。两相比较，胜败立现，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 一、高福利国家全面胜出

大家可能经常被灌输这样一个思想，“在高福利国家，人是懒的，经济是低效的，国家是贫困的。”但事实上，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其实大家只要看一看“世界各国人均GDP”排行榜，你就会惊奇地发现，世界各国的人均



GDP的排名几乎就是各国的社会福利程度排名，排在最前面的国家几乎都是福利水平最高的国家，越往后面的国家，社会福利水平也越低，经济发展水平也越差。因此“高福利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是全面胜出的，我们也可以以具体的板块来看，在欧美地区，北欧是高福利国家，北欧的经济发展水平就远远高于西欧和北美。

## 二、国企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差

在世界上国企优于私企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我们以汽车产业为例，在德国，国有的大众汽车的业绩要远远好于奔驰和奥迪；在法国，国有的雷诺汽车业绩要远远好于私有的标志雪铁龙，作为国企的雷诺还收购了日本的私人车企日产汽车，而作为私企的标志雪铁龙汽车近年更是亏损连连，近日更是被中国的国企东风汽车收购了50%的股份；而英国的汽车企业是私有化最彻底的，但也是败得最惨的，宾利、劳斯莱斯、阿斯顿·马丁、Mini、路虎、捷豹、莲花汽车……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些大名鼎鼎的名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汽车产业来说，这简直就是梦幻之队。撒切尔执政时对其进行了私有化，然而这些车企的命运并不是复兴，而是不断地分拆、转卖、再分拆、再转卖。那些大名鼎鼎的英国汽车品牌，在一个又一个新主手中漂泊，如宾利被大众收购，Mini和劳斯莱斯归宝马所有，捷豹和路虎被印度塔塔收购，MG汽车被中国上汽、南汽收购。对于通常为国家支柱的汽车产业来说，没有比这个更悲剧的结果了，英国百年老店都归到了外国巨头旗下，英国再也没有什么可自豪的民族汽车工业了。

在铁路领域，法铁是国有的，德铁、英铁、美铁都是私有的。英铁私有化之后出现了安全事故不断的丑闻，而德国联邦铁路公司（DB）私有化后则被指“只让有钱人坐火车”，而近乎疯狂地信奉社会福利和人人平等的法国，到现在还保持着铁路的国有化，并且运营得不错。2010年欧洲民调结果显示，在

德、法、意、西四国，法铁受法国人的喜爱程度最高，只有41%的受访德国人表示“对德铁有好印象”，而对法铁有好感的法国人则占66%。

在高铁中，德国私有的高铁曾在1998年发生过重大事故，而法国国有的高铁则以“30年零事故”闻名世界，而奉行私有主义的英国和美国至今没有一条高铁，而且即使是普通铁路，其速度也非常慢，英国铁路的速度只有80千米/小时。在核电领域，法国和中国的核电是国有的，而且以技术新、效率高著称，而德国和日本的核电是私有的，日本私人核电发生了福岛核泄漏，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德国的私人核电也是隐患重重，改造不利。

### 三、减税没想象的那么好

最近一次经济危机使很多国家都陷入了债务危机，而关于债务危机的成因却是谎言连连。西方的保守派媒体一直宣传债务危机的根源是因为高福利，但是他们的这一谎言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债务危机是因为高福利的话，那债务危机应该发生在北欧、德国、新加坡等世界上福利最高的国家，但是不幸的是，这些高福利国家都完好无损，相反，陷入危机的都是那些低福利国家，比如美国、日本、南欧等。对于债务危机一直有个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欧美却难以启齿的根源，那就是减税。政府减税，收入减少，当然会出现债务危机，当前债务危机比较严重的国家都是近30年实行了“大减税”的国家，而非真正的高福利国家。例如，在美国，巴菲特缴纳的税还不如他的秘书多，这样的国家发生债务危机并不稀奇。

## 二、北欧国家为何成为“富而自由”的国家？

经济危机前的2008年，北欧各国人均GDP均超5万美元，挪威甚至高达9.5万美元，即使因全球金融危机而濒临“国家破产”的冰岛，其人均GDP也达

5.5万美元，北欧五国中四个国家人均GDP都高于美国，而剩下的一个芬兰也与美国不相上下。

北欧也是世界上人均跨国公司最多的地区，瑞典诞生了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如沃尔沃汽车、萨博汽车、爱立信通信、伊莱克斯电器、ABB、哈苏相机、宜家家居和H&M服装等。按人口比例计算，北欧是世界上人均拥有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

在经济竞争力上，北欧五国经常领先世界各国。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排行榜，芬兰、瑞典、丹麦经常囊括前几名，挪威和冰岛大概分占第12名和第14名。

北欧福利国家还是世界上民众幸福感最强的地区。2010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刊登的盖洛普幸福指数调查显示，来自北欧的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在受调查的155个国家中名列前四，感受幸福的人比例最高。

北欧是世界科技创新最活跃的地区，无论是在芬兰，还是在瑞典，无论是与政府官员交流，还是与大学教授座谈，无论是考察跨国企业生产线，还是聆听中小企业发展报告，创新一词，总是被高频度地提起，并成为会议、报告、演讲中的核心内容。根据美国耶鲁大学的研究报告，芬兰、瑞典在国家创新能力方面名列前茅，北欧五国也是遥遥领先。

至于哈耶克等传统自由主义者担心的，福利国家因为需要大政府而会逐渐向极权主义社会演变的趋势，在瑞典更是纯属杞人忧天。北欧是人类最自由的地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民主、透明、公正和人权保障，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口皆碑的。

美国传统基金会经常发布年度经济自由度数据，它由多个指标组成，包括税收、通胀、政府规模、工作自由、贸易自由等，瑞典等北欧国家的指数都很

高，经济自由度指数显示，瑞典、丹麦、芬兰这些北欧国家的经济自由度比大部分欧洲国家都要高。

北欧国家还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廉洁的国家，被誉为世界廉洁之地。美国兰德公司有关廉政建设和惩治腐败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世界各国政府廉洁自律总排名”中，芬兰、丹麦名列第一、二名。透明国际每年推出的各国“清廉指数”，北欧五国得分基本都在8分以上（总分10分），排名靠前，属于所谓的廉洁国家，其中芬兰在近十年内有7年位居榜首，丹麦有7年位居前三，瑞典和冰岛均位列前十。

北欧国家政府丑闻并不多见。冰岛自1918年成为主权国家以来，一共只有4名高官因腐败辞职，最近一次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1995年，瑞典副首相萨林女士因使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个人衣物，被媒体曝光后被迫辞职。2002年，芬兰文化部长苏维·林登利用职务之便批准为其亲属拥有股份的一家公司提供17万欧元的政府赞助而被调查。这已经算是近些年来北欧国家影响较大的高级官员腐败丑闻。三是腐败案件性质较轻，金额较低。

### 为什么北欧能够幸福和谐

北欧福利国家模式成为了人类文明的巅峰，不仅创造了最好的经济发展，也建成了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北欧并非文化重镇，其模式的建立主要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共产主义运动，另一个是战后英国的福利国家建设。北欧模式是典型的高福利模式。

历史上，人们对北欧模式的看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舆论对瑞典模式大唱赞歌。人们赞叹瑞典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认为它是很成功的，对它充满了羡慕之情。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后半期石油危机以后，那时大谈瑞典模式的是瑞典国内、外的保守势力。他们把高税收和低效率说成是瑞典模式的集中表现，于是瑞典模式就从榜样、

楷模，变成了危险、可怕的东西。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瑞典经济复兴了，它的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和经济稳定增长率，使它成了调整 and 发展的样板，瑞典模式又一次成为国际舆论注意的中心。

活得长久一点自由，免于生病无着的恐惧，免于匮乏的恐惧，获得有适当报酬的就业机会，在和平的、无犯罪的社区生活……这些，就是瑞典式的“社会主义”。可以说，瑞典的穷人生活得远比美国的穷人更体面，而穷人的体面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北欧是真正帮助穷人实现了“积极自由”。

“福利国家”应该如何理解呢，它不是社会保险、不是公费医疗，也不是家庭福利或社会救济计划，而是它们的总和。社会保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出现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把最先推行社会保险制度的“铁血首相”俾斯麦称为“福利首相”。

现代福利制度起源于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贝弗里奇报告》对战后英国福利社会的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报告所主张的社会福利可以被概括为“3U”原则：普享性原则（Universality）、统一性原则（Unity）和均等性原则（Uniformity）。

福利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成了西部欧洲的时代精神和基本制度。此后，这一理念又被推广到欧洲其他国家。其中，最典型的的就是北欧国家，它们后来甚至成了福利国家的“橱窗”。而作为福利国家发源地的英国，自20世纪70年代遇到财政困难后，开始改革并逐渐削减福利规模，引入市场因素，实际是走上了“去福利化”的道路。

从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北欧国家始终被世界认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好的地区，一些国家屡屡被评为诸如“最具竞争力的国家”、“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家”、“最廉洁的国家”、“最好的国家”等称号，人们对“斯堪的纳维亚经济模式”赞誉有加。这些国家的共性是：国民素质高，充分就业，高收入，高福

利，工会强大，社会民主、平等和公正。其经济运行体系可以简化为：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福利国家+国家干预+合作主义+平等的精神。

北欧的经验充分证明高增长和公平分配是可以兼顾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之间不仅并不冲突，而且福利和社会公正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时，福利导向体制和民主、自由之间也没有冲突。

当今瑞典，国家掌握有5%的工业企业，国有经济支配着基础设施的要害部门，但绝大部分的企业是归私人和合作社所有。瑞典福利经济的特点是较低的失业率，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现了充分就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瑞典政府保证失业率不超过1%~2%。据官方的统计，繁荣时期失业率在1.5%，危机时期不超过2.5%~3%。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强有力的工会组织，高比例的福利保障支出，丰富而慷慨的社会服务，都使国民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较高。瑞典、丹麦、挪威、芬兰都是人均GDP排位在世界上很靠前的国家，同时历年来基尼系数都以较低的状态排在工业化国家的前列。

北欧五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在0.25~0.26之间，属于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与其他欧美国家不同，北欧国家提供福利更多的并非现金，而是提供服务。这样，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部门雇用了大量的劳动力，由此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比如，社会、医疗和教育等公共部门大约90%的雇员由政府雇用，而其他欧洲国家通常仅为40%~80%，所以北欧诸国也被视为服务型国家。

在这些国家，中央政府一般主要负责制定国民福利的政策、标准，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网络，而管理的主要职责一般由各级地方政府和工会组织来承担。资金来源上，政府投入是大头，一般约占40%以上，丹麦则高达60%。公共福利保障费用占GDP的比重很高，一般至少在1/3以上，瑞典经常波动在35%~40%之间，芬兰在21世纪的十年里维持在1/4~2/5的区间，挪威基本为33%。而同期美国一般徘徊在18%~20%，日本才略高于10%。

一般福利的非商品化倾向与合作主义因素具有某种关联性。非商品化程度越高，合作主义倾向也越高。北欧国家的非商品化程度最高，雇员、雇主和国家三方伙伴协商合作的社会机制作用也最大。

北欧实行普享型的福利保障模式，其原则是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一种中产阶级品位的生活品质，而不只是满足贫困者的最低需求。

北欧模式非常强调充分就业，政府要求“能够工作的人都要工作”，人们普遍崇尚劳动，鄙夷不劳而获者，很多人工作都是为了理想、兴趣，而非金钱。所以西方世界一般认为北欧国家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瑞典更是对外公开宣称自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经济的发展并不会自动带来社会公平，社会公平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础和文化氛围，最重要的就是要建构一个公平的分配体制，在这一点上，北欧国家做到了。

没有平等的精神、公正的分配制度，财富很难持续积累，效率也就很难保证。原因很简单，不平等、不公正的分配会造成社会动乱，制约经济的发展。

而外界对瑞典的误读，往往是从“蛋糕”的概念开始的。当他们把社会保障视为蛋糕的时候，其实就暗含着这样一种概念，即：要想有好的社会保障，必须先把经济搞上去。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初，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着手建立他们的理想社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社会保障仅仅视为蛋糕，而是苦心琢磨如何才能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民主和合作的社会”。

1932年，瑞典社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并连续执政四十多年，从而成功地创造了瑞典模式。战后，瑞典逐步建立了全民就业、全民养老金、全民医疗保险、全民免费教育，随着这一项项计划的逐步落实，瑞典进入了一个“黄金发

展期”。到了1980年，瑞典人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使人均GDP达到了57161瑞典克朗，比1960年增加了约6.6倍，瑞典不仅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且在联合国的社会发展排名中名列第四。

瑞典给世人展示的是一个公平、透明、幸福、和谐而且富裕的社会。最后一点，通过对瑞典穷人与美国穷人的比较就可以看清楚。

瑞典人之所以买得起房子，主要是因为他们不需要为孩子上学存钱，也不需要为自己退休后看病存钱，他们没有“后顾之忧”。瑞典实行的是全民医疗保险。

在瑞典即便月收入不高，只要满18岁，就很容易获取贷款，银行有时根本不加细问。而在美国，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很多美国穷人甚至连账户都开不了，拿到工资支票后，只能再到典当行去兑现，而典当行往往会收取相当于兑现金额3%～10%的手续费。统计显示，在美国约有28%的工薪家庭需要这样的服务。这其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经济模式下不同的生活基础。美国人更倚重收入，生活质量受收入影响较大；瑞典人倚重的是社会福利，福利则要靠公平的分配来实现。假如一个社会越是需要个人用金钱来购买生活质量，那它必然会出现更多的不平等。

其实19世纪的瑞典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瑞典的工业革命来得比较晚，起步于19世纪30年代，真正开始发展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在英、德等国工业革命的带动下，瑞典成了铁矿石、木材等原料的供应国。当时瑞典工人的生存状况非常恶劣，他们买不起自己生产的产品，政治上也低人一等。当时规定，参加议会和地方选举的条件是年收入必须超过800克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作家斯特林堡在《红房子》一书中描述过当时一位木匠的心里话：“太太们啊，老实告诉你们吧，日子已经苦透了，而且以后还会更苦，但是到了那一天——那一天，我们要像瀑布似的吼叫着从贫民窟中汹涌而出，我们将要回到



我们的床上，是要回吗？不，是夺回！”

和许多西欧国家一样，如此恶劣的工人生存状况也意味着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动荡期，而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

在早期的瑞典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名叫奥古斯特·帕尔姆，他在德国、丹麦参加过工人运动。1881年，帕尔姆从德国回国后，在南方城市马尔默做了一个历史性的演讲，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要的是什么？”他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者并不要求平分所有的资产，而是要把资本家们拿走的那一部分要回来。

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当时它的终极目标是消灭阶级，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给瑞典以沉重打击，失业率飙升，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过了两年，北部的奥达伦发生罢工，政府派兵镇压，打死五人，这是瑞典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惨案，导致动乱升级。同年，“火柴大王”克鲁格因股票泡沫破灭而自杀，将众多瑞典企业拖入泥坑。首相埃克曼因被揭露拿了克鲁格的“补贴”，致使内阁倒台。严峻的事态表明，和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瑞典也走到了改革的关口。

1932年，社民党上台，开始了福利国家的建设。瑞典的变革与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出现的变革大致是同步的，不同的只是，瑞典的工会运动更为强大，而平等、妥协、合作的理念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瑞典民族的传统之中。特别由于工会运动的强大，瑞典的社会力量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当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三方坐在谈判桌前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劳资双方在政府的协调下最终达成了工资协议，实际上也为确保国家经济寻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

在瑞典历史上，19世纪是现代社会福利政策的“胚胎期”，政府开始从教会手中接过社会福利的责任。这个变化当时有两大背景因素：一是工业化的发

展造成大批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贫富差距加大，穷人迅速增多；二是政教分离，教会的职权被大大削弱。1847年和1853年，瑞典政府两次通过《济贫法》，确定“使每个贫民吃饱饭是每个教区和城市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瑞典社民党构建的瑞典模式中，人民已经成为主体，社会保障不再是救济或给予，而是要打造一个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平等的平台，这也是经济进步不可或缺的动力源。丹麦学者安德森讲过这样一个例子，他在20世纪80年代对18个西方国家的福利情况做调查时发现，“工人运动反对旧有的济贫传统，因为他们要争取坚实的‘公民’权利”。而这样的济贫传统在北欧国家几乎完全绝迹，而只有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还占有相当显著的地位。

西方学者对欧洲社会发展的研究结果表明，推动社会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于道德信念。在1932年的竞选中，社民党就没有像以前那样提出“社会化”的目标，而是强调了“平等、关心、合作和互助精神”。在当时的社民党人看来，在福利大蛋糕出现之前，需要对分配体制进行改革，同时也为将来蛋糕的划分奠定一个公平的基础。后来的发展实践表明，没有这样的改革和规则的建立，瑞典的福利蛋糕也是无法做大的。

由于社民党的改革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推进的，当时瑞典经济还比较落后，特别是贫富分化。瑞典模式有两个最突出的目标，一个是全民就业；另一个是平等。这两个目标也是社民党政府改革的重点所在，而且直到现在这两点还是北欧模式的典型特征。

瑞典社民党提出的“全民就业”，是通过扩大公共部门、加强职业培训等一系列措施以增加就业的经济政策来实现的，有着较浓重的凯恩斯主义的色彩，但又不完全相同。在社民党人看来，“充分就业是社会的、也是经济的目标。它使人人都能参与福利创建工作，防止失业造成的不平等、人身伤害和社会排斥。”1932社民党执政后，大幅提高公共开支，用于创造就业机会的开支

也比以往占了更大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30年里，瑞典失业率从未超过3.5%，在西方国家中极为少见。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分配体制一开始就突出了“全民”的意义。瑞典学者阿德勒—卡尔松在《职能社会主义——瑞典的民主社会化理论》一书中说，“实现任何社会主义政策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政府甘心为人民行事，而不是去维护少数权势集团的特权。”所以它不再只是一个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是全国公民无论男女，无论工人、农民、官员，无论职位、级别高低，无论收入多少，都能够公平享有社会保障的问题。比如，政府有责任帮助每一个失业者找到工作；养老金人人都有权享受；给小孩的补贴，每个家庭都有份；医疗保险不因职位高低和就业部门不同而有区别；住房政策则是“人人有房可居”。

理解全民这个词，就需要理解分配这个词。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家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做的事情就是，“夺取和控制若干原来由资本家控制的职能。而在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这些职能目前仍旧由资本家自己控制。”

这是一些什么职能呢？比如就业培训指导、教育、医疗、养老，所有这些领域的资源，都要由国家来统一、公平地分配。这就是所谓“经济领域私有化+社会领域社会化”的模式。

要理解他们这套体制，举个例子就会明白。如果有三个人，一个是收入较少的工人，一个是收入较多的教授，另一个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官员，他们假如患有同样的疾病，将享受完全相同的医疗服务，花同样的钱买药，住同样的病房，做同样的检查和手术，社民党追求的平等理念并不复杂。

现在回过头来看，瑞典这个北欧王国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实践表明，公平社会的构建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更多的是分配体制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解决的问题。相对于财富积累来说，一个比较公平的分

配体制对财富积累也是有益的。

瑞典的福利制度都有明确的法律保障，凡是应得到各项福利而没有得到的，可以到法院起诉。有接受这种起诉的特别法院，叫公共保险法法院。

全国共有三个公共保险法法院，斯德哥尔摩还有一个全国最高的公共保险法法院，凡对地方公共保险法法院判决不服的，可以上诉到那里，公民对社会应尽的义务而没有尽到的，比如说，偷税漏税等也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依法治国突出地表现在，瑞典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公开超越法律，不但部长和总理，就是国家机关也都可能成为民事、刑事的被告和原告。瑞典的刑罚很轻，犯罪率却很低。瑞典早已废除了死刑，最高刑期只有12年，以这样轻的刑罚维持这样好的社会秩序，真是令人吃惊的。他们最主要的一条经验是，严格地依法办事，做到不纵不枉。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重视对犯罪的预防和对罪犯的感化教育。瑞典有两个重要的国家机关，一个叫作国家监狱与刑事犯感化所管理局，它主要是管理监狱并致力于对已判刑关押的罪犯实行感化教育和智力培训，另一个叫作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这是由国会各政党与政府部门的代表组成的董事会领导的，目的在于动员和组织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促进在社会各个不同领域内的犯罪的预防工作。

福利国家盛行“大锅饭”、容易“养懒人”，在许多批评者眼里，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但事实并非经济学教科书里从“风险收益关系”、“道德风险”等概念出发推演出来的逻辑结果那么简单和黑白分明，甚至完全相反。瑞典经验也有力地批驳了这一说法，瑞典人更勤快，更具创造力。我们可以看看就业率、劳工参与率这些反映一国民众是否懒惰的主要指标。

先看非生产性的“局外人口”情况，当前瑞典的非经济活动人口占国民总数的比重为49%，而德国的指标为60%。德国人以勤奋著称于世，妇女也大多数参加工作，两国人口结构情况近似，但是德国的这项指标都要比瑞典高

10%，别的国家就不用比了，因为德国也是个高福利国家。

北欧国家的高就业率是公认的。这些国家一般情况下失业率在2%～3%的窄幅范围内波动，近乎完全就业，远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7%～10%失业率的常规水平，这也说明了北欧人并不懒。

劳工参与率是指法定工作年龄中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实际人数和法定工作年龄人口总数的比例，一般用来衡量一国民众的工作热情。北欧福利国家的劳工参与率多年来均高过崇尚自由和个人奋斗的美国人，美国的参与率一般保持在80%～82%之间，北欧国家参与率最高的冰岛高达90%，最低的芬兰一般为84%。

北欧的妇女享受的福利要比男人多，妇女生养小孩可以领取许多福利而不用工作都生活得无忧无虑。美国的妇女劳工参与率近年来基本为75%，而冰岛的数据是86%，北欧最低的挪威也高过80%。由此可见北欧福利国家的妇女不仅不懒惰，而且非常勤劳。

以上数据都不支持福利保障容易养懒汉的荒唐说法。北欧福利国家的社会风尚更如此，这个地区的人们普遍以诚实劳动为荣，鄙夷那些靠社会养活的人，甚至连投机取巧者在这些国家都无法立足。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情况也很说明问题，一般人，尤其是本土的白人尽量不依赖于救济性的福利津贴苟活，觉得不光彩、有失尊严，这也是人之常情。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归根到底还在于高福利、高教育提高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使投机取巧的事情很难发生。换言之，投机取巧、偷盗、贪污腐败反而更容易出现在那些缺乏福利、民众生存得不到保障的国家。

### 三、合作主义社会是怎么回事？

---

合作主义是北欧和德国等欧洲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社会经济管理模式，是介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种模式，这种模式真正实现了阶层和谐和社会和谐，这些国家也因此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水平。

任何一种社会模式，其实都有理论基础或是文化基础，北欧的高福利社会也是这样，他们的基础就是“合作主义”。这种文化并非来自于历史，而是来自于近代的阶级斗争，而这也说明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文化并非总是到古代去寻觅传统，而更应该注重近代的积累，比如美国的罗斯福时代，中国的毛泽东时代，都为国家积累了良好的传统。

合作主义，这个名词，中国人也许比较陌生，但是对于合作主义的产物，中国人肯定不陌生，比如计划经济时代的“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以及现在中国农村非常流行的各种各样的生产、种植合作社都是合作主义的产物。而前些年中国流行的合作建房等也是带有合作主义的成分。

合作主义有两大分支，一种是阶层内部的合作，比如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合作建房等，另外一种是劳资合作，劳资合作主要是工会参与企业管理。这两点在北欧都非常重要。目前农业合作社和住房合作社仍然在北欧和德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大家都知道，在西方国家，工会的力量很大。但是这种强大也是有区别的，比如美国的工会仅限于为工人争取福利，而德国和北欧的工会则全然不同，德国和北欧的工会是全面参与企业管理的，而且这也是有制度保障的，因此德国和北欧都被称为合作主义国家。

德国和北欧的公司治理模式与美国模式完全不同。美国模式是在公司董事会内部设立监事会，公司重大决策由董事会制定，而监事会只负责审计、薪酬

等少量事务；而德国、北欧的公司治理模式则是股东大会选举监事会，监事会再任命董事会，董事会是监事会的下属单位，监事会有很大的决策权，特别是任命董事会成员和批准某些特别交易的权力，监事会实际上几乎控制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权不仅包括财务监督权，也包括业务监督权。

德国的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共同组成，是资本和劳动者共同对公司进行治理的模式，体现了现代公司法理论中的“利益相关者理论”，而且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共同组成。这是因为根据德国法律，企业必须设立职工委员会，德国企业的职工通过参加监事会和职工委员会参与公司管理。北欧和德国都实行相同的公司治理模式。

我们可以以一则新闻来进行佐证，比如沃尔沃在成都设立生产基地时的新闻表述为“2011年2月22日，瑞典沃尔沃公司监事会做出决定，成都成为吉利沃尔沃汽车项目在中国的首个生产基地”。从中可见监事会的权力所在。

而在国际上，合作主义曾经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列，是世界三大体系。其中可以这样理解，资本主义是资本所有者专政，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合作主义是资本所有者和无产阶级合作的模式。

我们熟知的美国罗斯福“新政”也是合作主义的产物，“新政”的主要设计师休·约翰逊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威尔逊总统军事动员项目的负责人，由于在那一时期的卓越表现，他被委以从大萧条中拯救国家经济的重任。

1933年6月，休·约翰逊将军被任命为国家复兴局局长。上台伊始，他就按照合作主义原则将政府官员、主要工业企业和劳工代表拉到一起，拟定被认为是公平的法规，最后经总统签署颁布。其中包括一项关于工资和工时的协定，即总统的再就业法规。该法规禁止雇用童工，规定产业工人每周工时为35小时，脑力劳动者为40小时，产业工人最低工资每小时为40美分。

约翰逊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使大约200万工人有了工作；并建立了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童工和血汗工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2年建立起福利国家基石的贝弗里奇报告本身就是“合作主义的产物”，具体表现就是涵盖“社会工资”的“社会契约”。例如，英国1974年、1976年的社会契约，挪威1976年的社会契约，瑞典1974年、1975—1976年的社会契约，等等。社会契约的主要内容为社会工资。其主要观点是，社会工资属于总劳动成本，而不属于“利润”，因此福利支出不会妨碍资本的积累，因此，社会契约是增加社会福利的一个工具。

事实上，合作主义这种独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劳资合作上的政治经济体系；合作主义否定了资本主义的个人功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指出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组织起来建设有机的国家共同体，反过来，这一共同体保障了个人权利的实现。

同时，合作主义也是建立福利国家的重要理论和制度基础，瑞典的社会平等，不仅体现了税收的“削高填低”，而且工会斗争使得企业内部工资差距也很小，这是两方面的作用。其实现在很多中国人都意识到了税收的作用，但对于企业内部收入差距问题则没有重视，而社会的贫富的分化更多的是企业内部贫富分化的延伸，现在中国企业高管的工资与普通员工相差几十倍是正常的事情。

瑞典是一个阶级合作的国家，“瑞典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治妥协和阶级合作。而瑞典的阶级合作并非只是工会代表工人争取福利那么简单，而是工人直接参与管理，参与企业的管理和社会的管理。我们可以看看这一思想的来龙去脉。

瑞典社会民主党有三种手段：议会道路、阶级合作、政治妥协。他们认为，瑞典是一个“受妥协支配的国家”。



为了在实践中推行这个构想，社会民主党的第二任主席汉森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思想。1932年他上台以后，就提出了系统的纲领，这个纲领的思想就是按照团结、合作的原则，改变社会，奠定富裕的基础，为全体人民带来好处，强调要用阶级合作、消除分歧、互相妥协的方式来实现“福利社会主义”的目标，把瑞典建成一个“人民之家”。汉森还以首相的身份向私人企业主发出正式的合作邀请，提出保护、支持和充分发挥私人的主动性，提出民主是唯一的秩序。瑞典社会民主党1944年的纲领也提出“以平等、自由为基础的公民合作代替以阶级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世界出现了建设现代福利社会的潮流，合作主义更是与福利国家结缘，成为分析和完善福利模式的工具。半个多世纪以来，合作主义已经被正式认为是福利国家建立的基础。

合作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最具体的表现就是涵盖“社会工资”等内容的“社会契约”。通过合作主义的制度安排，政府机构与各个利益群体以契约的方式达成默契，在契约中，各群体在保留传统利益的同时也获得某些新利益。

现在中国很多人喜欢谈契约精神，但这些人不知道，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乏契约精神，中国人连口头承诺都会认真遵守，何况是白纸黑字的契约！中国人实际缺乏的是“社会契约”精神，契约精神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而社会契约的提出只有几百年的时间。其实当这些人将社会契约精神简化为契约精神的时候就错了，中国现在需要增加的不是契约精神，而是社会契约精神。社会契约精神才是西方民主宪政的精神，而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骨子里是反对社会契约的。

合作主义所强调的国家、雇主、雇员三方的伙伴关系，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关系，工会在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代表着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劳动者的权利。没有工会的参与，工会不签约，就不可能建立起三方合

作关系。当然，如果没有国家和雇主对于社会契约的遵守，劳资之间的信任关系也不可能建立起来，而这一切都需要全社会都具备社会契约的意识。

### 合作主义社会的四大体现

现在很多人喜欢谈美式民主，但美式民主与北欧民主比起来就差多了，美式民主主要体现为政客选举，而且选了也白选，因为几乎没有一个政客能够实现自己的竞选承诺，而北欧民主体现更多的是社会契约，也就是美国民主只停留在政治领域，而北欧民主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是整个社会的民主。北欧的社会合作主要有四种形式。

#### 1. 劳资双方共同解决劳资纠纷

在19世纪末，瑞典劳动市场中就出现了集体谈判，但这时的劳资纠纷还是很多的。一直到1936年，工会联合会和雇主联合会开始进行谈判，到1938年双方签订了“萨尔茨耶巴登”协议，这个协议就是瑞典模式的雏形，这个模式使工人能够对分配产生影响，企业主则享有投资和扩大生产的条件。

由于纠纷很多，这个协议规定了解决劳资纠纷的程序、机构等，对企业主的管理特权进行了限制。协议规定双方代表进行谈判，最后达成为期1～3年的协议，共同遵守。如果协议到期前两个月内，双方中任何一方没有提出异议的话，就继续有效，如果达不成协议，就由政府指派一名调停人介入谈判，促成问题的解决。如果仍达不成协议，工人可以举行罢工，厂主要关厂的话就必须在一周以前通知。不过，一般情况下双方谈判都能达成协议。如果达成协议后，对协议的解释仍有分歧，可上诉劳工法庭。这种法庭也是由劳资双方代表组成的。这个协议被认为是瑞典劳资关系史上的转折点，它对以后瑞典社会关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30年代以后，瑞典罢工的次数大为减少。

## 2. 劳资双方共同管理劳动力市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瑞典成立了全国劳动力市场委员会。它是政府、工会和资本家共同管理市场的机构。这个委员会的领导机构是由董事长（一名）、副董事长（一名）、雇主联合会的代表（三名）、工会联合会的代表（三名）、还有其他方面的代表所组成。在全国各省有分支机构。为了保证经济不断发展，这个机构与各个方面直接有关：劳动力计划、职业培训计划、就业服务、失业救济、长期经济计划等等。它实际上成为瑞典经济运行的中心，成为瑞典政府借助于劳资双方的配合，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助手。

## 3. 劳资双方共同决定企业大事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起，瑞典就建立了企业内部“共同决定”生产条件、劳动条件的制度。1946年，劳资双方制定了关于建立“生产委员会”协议。直到1976年，议会通过了《劳动生活共决法》，法令主要是废除雇主联合会章程的第三十二款，就是原来由雇主单独决定问题，改由劳资双方共同决定，工会有权参与投资、生产战略等过去由资方决定的事情。其要点是：①企业主在决定对企业经营做出重大改变以前和决定雇员劳动条件以前，要和工会进行谈判，工会可以要求对任何其他问题，举行地方一级的谈判或中央一级的谈判，这种要求一经提出，企业主就应推迟做出决定或推迟决定的实施，直到谈判结束为止。②要求企业主将经济技术情报以及人事政策的指导原则，经常向工会通报。③工会有权查询账目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有关文件。

这项法令导致劳资关系形成了更高层次的合作。瑞典前首相帕尔梅把它称作历史性的文件，认为它的意义堪比普选权。它增强了工会在企业中的地位，规定工会可以就有关招工解雇等劳动组织和企业管理事项与资方进行谈判。

#### 4. 参股制度

1983年，瑞典议会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这使工人开始拥有掌握资本的权利。这大大改变了工会在社会生活、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它是社会民主党1982年上台以后通过的。这项基金的来源是增收两项企业税：每年从各股份公司中征税后超额利润的20%，将公共附加养老金费用提高0.2% ~ 0.5%。该基金主要用于在各类股份公司中购买企业股票，也就是用来投资。

这实际上是对私人所有制的一种限制。当然这种局面也不是轻易得到的，也需要长期的斗争。在此之前，瑞典的三个非社会主义政党及其社会利益集团的21个组织，曾经拒绝参与讨论这个方案。在议会召开时，瑞典主要企业家们为向议会施加压力，曾组织了7万多人的反对游行，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资本家大游行。所以，帕尔梅不得不在原先计划上一再向各方让步。瑞典最终通过的法令，要比原来的方案温和得多。当然，即便如此，如果该法令继续执行下去，也会对瑞典的私人垄断资本起到限制作用。但它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瑞典劳资之间在这方面的斗争还会继续下去。这一事实也证明，瑞典的阶级合作并不是没有斗争。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保持了长期稳定统治，执行阶级合作的政策是重要原因。社会民主党认为，雇主联合会和工会联合会两者不是阶级敌人，而是社会中的伙伴，是影响经济福利和阶级和平的力量。我们听起来觉得这不是阶级斗争观点，对，合作才是瑞典工人运动的传统！由于合作，人们往往会达到较好效果。

#### 合作主义社会有何好处？

北欧、德国作为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合作主义国家，其经济在世界上也都是最成功的，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经济危机，虽然实行高福利，但从未欠下巨额债务，这足以证明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是不会阻碍经济发展的。

在西方，有工会的传统，也有反工会的传统，而且一遇到经济不景气，他们就认为工会必须对经济不景气负责。反工会者认为，如果能够撤销工会，就会立竿见影地恢复厂商或国家竞争力。

针对这些攻击，中左派学者曾经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过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不能用简单的工资绝对水平来衡量其增长的幅度，而应与其生产率的增幅进行比较，较高且平均的工资水平使雇主们不愿意随意解雇工人，而情愿通过再投资，对工人进行再培训，以保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竞争力。

培训使工人们得到了更高的技能，从而使劳动力本身产生了一种“柔性”，为提高企业竞争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获得就业保障的工人不仅更容易接受公司的培训，而且在公司内部营造了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与合作氛围。在合作主义的企业里，集体协议和共同决策等制度使公司拥有了较高的雇用稳定性。高生产率、工人权利、弹性、工会化和经济竞争力是可以相容的，他们共同构成了高效率商业体系中的要素。

工会是经济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约束”。工会的存在不仅阻止了“血汗工厂”的短期行为，避免了厂商仅靠低工资和提高劳动强度获得竞争力，而且还有助于形成产业资本的长期动力，敦促雇主通过人力资源投资来赢得竞争力，这也就从客观上推动了企业的产业升级。

工会与经济增长不存在重要的必然联系。作为一个追求劳资权利和福利待遇的机构，工会与厂商已经结为一个整体，他们共同构成了“一致对外”的竞争主体。

相反，产业衰退很可能是工会力量弱小造成的；只有强大的工会才能导致工资适度 and 收入平等，从而激起产业发展的推动力。这是因为，工会作为企业的一员，他们会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在雇员和他们的管理人员之间传递信息和承诺，从而更有可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成为效率和收入平等强有力的

发起者。

工会产生的约束力不仅约束了工人放弃短期利益，去追求更大的长期利益，而且对雇主也产生一种约束力，即强制雇主在进行决策之前，要与工人商量意见，这就是共同决策；因此，合作主义的优势在于使管理层和劳动力都拒绝和排除了投机主义的压力。

通过考察发现，在左派政治强大和工会运动相对集中的地方，一般来说，那里的经济表现就要相对好一些，而那些右翼保守主义执政的国家或时期，经济反而不好，换句话说，合作主义与国家竞争力之间具有某种正相关关系。比如工会势力最强大的德国在出口方面虽然稍逊色于美国，但却一直强于日本，按人均计算，德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商品出口国，“德国造”商品依然保持着竞争力。

总而言之，福利国家就是合作主义的现实体现。合作主义下，强大的工会势力不但不会降低国家竞争力，反而会促进经济的增长。

#### 四、德国——欧洲的新盟主

现在的德国属于民富国强的国家，诺贝尔获奖获得者将近全球一半（包括移民到其他国家的德裔）。我们都熟知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是美国人，但他是德国血统，在德国完成了大学学业，毕业之后才去的美国。还有一些著名的人士，比如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这些都是改变世界的人。

德国有很多世界第一，汽车、化工、机械、环保都是世界第一。现在很多人出国上大学首选美国，以为教育国际化排名前列的是美国、加拿大、澳洲，后来英国总领事会公布一个数据：德国大学国际化水平2010年跃居世界第一。当然，这也是有证据的，德国大学的留学生占大学学生总数的10%～15%，

一般不会低于10%。因为德国政府每年给大学提供补贴，外国学生越多，补贴越多。这只是补贴而已，财政投入办学的基本经费仍是必不可少的。

欧洲已有27个成员国的欧洲联盟，17个国家加入的欧元区，还破天荒地有了统一的货币。未来十年欧盟将发展到35个成员国，并扩大到巴尔干地区。一个貌似强大的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让欧洲统一的进程成为可能，足以让欧洲人欢欣鼓舞。然而，一场由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进而引发了整个欧洲的主权债务的危机，将欧洲的统一进程，拖入了沼泽泥潭。

然而一场欧债危机，却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带来了统一欧洲的机遇。两次大战未能如愿以偿充当欧洲霸主的德国，终于等到了唾手可得的时机。客观上不得不承认，现在的欧盟及其欧元区国家，要想解决欧债危机，必须依赖于这位“世界第四”、“欧洲老大”的德国。

德国的经济总量在2010年就超出法国近30%，债务总额占GDP比率也少于法国近3个百分点。此外，2010年德国出口同比增长高达18.5%，2011年上半年出口增长也高达14.7%，且历年2%的低通胀水平，使德国在欧元区成为最健康的国家。

德国能有今天，全依赖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德国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国家，德国是马克思的故乡，因此也是社会主义的发源地。社会一词，在德国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德国人将他们的市场经济称为“社会市场经济”，将他们的法治国称为“社会法治国”，将他们的民主党称为“社会民主党”，可见在德国，社会不仅是一个中性的名词，还是一个褒义的形容词。社会一词应该包含着和谐、合作等意思，很难直接与汉语中的某个词汇进行对应。

有人认为只要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奉行自由主义，都是主张自由至上的，这更是缺乏常识的表现。其实，奉行自由国原则的只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国家，而实行莱茵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德国、瑞士、奥地

利、北欧等全部奉行“社会国”原则，自由主义在这些国家并不受欢迎。比如“社会国”原则是德国宪法的第一原则，也是德国宪法的根本原则，而在经济上他们则信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而非“自由市场经济”。

目前奉行“社会国”原则的德国和北欧是世界上发展最好的地区，无论是经济还是民生都与信奉自由国原则的国家相比具有全方位的优势，而且这些国家也极少发生经济危机，而信奉自由国原则的英、美则发展得并不尽如人意，而且危机连连。

## 五、德国制胜法宝之一：社会国宪政模式

现代法学中，社会国原则、给付行政、生存照顾，这些与福利保障密切相关的基本概念都是德国学者的智慧凝结。德国法学界通过深刻的研究和谨慎的国家立法，保证了公民福利保障权的落实。

德国宪法有四大支柱，“社会国、民主、法治和联邦”，这四大支柱为“国家目标条款”，并通过第79条第3款的禁止修改与废弃条款彻底锁定。这意味着任何时候修宪都不能触及上述目标，从而保证“社会国、民主、法治和联邦”成为国家得以存续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民主、法治与联邦都好理解，我们来看看德国人特别强调的“社会国原则”有何奥秘。

社会国原则是起源于19世纪的一项宪法原则，以国家给付为逻辑起点，以保护弱势群体为目标。作为社会国原则，国家具有很强的给付义务，主要分为物质性给付、服务性给付、制度性给付和程序性给付等方面。

工业革命后，劳资关系发生对立冲突，在此情形下，国家不能再保持“最



少统治、最佳政府”的思想，而必须为社会创造合乎人性尊严的生活环境。为了化解矛盾冲突，国家角色逐渐从管理者、支配者过渡到给付者、服务者。

现代社会国原则是指国家对社会正义、公共福祉，通过制度规范、法院判决、收取税款和提供给付等方式，对人民的请求进行回应。其意旨是国家履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以维护最低限度的实质平等，创造机会平等。

社会法治国原则是与自由法治国原则相对的，与自由法治国相比，社会法治国除了保障自由外，更强调国家应提供一定的给付。其内涵更宽泛，社会国原则下真正保障了民众积极自由权的实现。

社会国原则有两个重要内容：（1）社会安全。国家必须保障人民享有合乎人性尊严的生存条件，以避免经济困境。（2）社会正义。国家必须努力调和财富不均，对年老、疾病、残疾与失业提供社会保险；对困难者给付生存必需的物质。社会国原则实现社会正义，目的在于调和利益、促进福祉。

在社会国原则下，社会权作为宪法基本权，旨在保护弱势群体的人性尊严，国家负有积极给付义务。人民也并非只是被动地等待，人民可以进一步要求国家改善其给付不足，以实现个人自由和尊严。

现代社会国原则已经不限于弱势群体，而是扩展到一般社会大众，给付目的也不限于“维护生存所需”，而扩展为“福利的最大化”、“自主的人格发展”。

制度给付是物质给付的保障，国家有义务完善给付领域的各种法律。

程序性给付是国家给付公平、合理、合乎正义的程序，司法救济义务是国家最古老的义务。德国著名思想家洪堡认为：“如果公民之间有争端，国家就有义务和权利进行裁决。”提出诉讼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相应地，国家裁判是一种义务，而不是国家给予公民的恩惠，更不能付费。

社会国原则作为宪法原则，法律不明确的地方，要依据社会国原则进行裁量，而司法解释则直接推动了社会国原则的逐渐明晰，“社会国”原则延伸到了所有的法律领域。

自由国理论要求国家承认公民私域，在这个私域，个人拥有不受侵犯的完全自由。这种自由观的历史背景是欧洲资产阶级对抗封建阶级时形成的，再往上可追溯到对教权的抗争，所以捍卫生命权、身体健康权、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私有财产权的立场非常坚定。然而这种自由观具有较强的防御性，但忽略了“实质自由”。

现实社会中，自由的兑现是依赖于各种要素的，比如，财产状况、受教育程度、能力与机遇等。而传统自由观并不在意这些保障条件，只排斥国家的任何干预，这样就限制了国家对个人有益的或善意的行动。因而国家没有义务为公民实现自由创设物质条件与社会条件；反过来公民也仅有权要求国家免于干预而无权要求国家采取积极行动来促进自由权的真正落实。这些都是传统自由观的弊端。

德国学者们仔细研究分析了传统自由，认识到其功能仅局限于消极对抗国家，因而将这种自由称为消极自由。

现代社会与17～19世纪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小商品经济几乎荡然无存，专制力量早已被彻底摧毁，工业化时代面临的社会风险完全不同于过去，所以对自由观进行修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德国人虽然保守，但在这一点上却走得很远，核心就在其社会国概念。

社会国将实现自由所需的先决条件也纳入了保护领域，强调实现自由所需的物质条件与社会条件同样要受到保障，并赋予了国家积极作为的义务。这种公民基本权因为导入了社会国原则，所以国家必须保障公民实现自由的前提条件，这样，形式自由也就上升到了实质自由。

社会国介入可能与自由权相冲突的矛盾如何解决？德国人主张传统自由权兼有主观权利与客观价值的双重属性。主观权利要求国家尊重个人自由并在感到被侵犯时通过法律请求停止侵犯。

自由权的客观价值则要求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都应将其作为应予尊重的客观价值。在这两种属性的综合作用下，理论上因为国家干预侵犯自由权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而法理上将社会国原则与自由权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在这样的法理下，既避免了自由权流于形式，又限制了公权体系。

社会国原则赋予国家积极作为的义务，支持政府进行资源再分配和社会平衡。最初德国理论中国家给付是作为自由权防御功能的补充而出现的，随着社会国与基本权理论的发展，后来这种要求逐渐升华为独立于传统自由权的另一类公民权，德国学界将之称为公民的“社会基本权”，与英国人的“社会权利”内涵很接近。社会基本权具有积极属性，不同于居于消极的自由权，由此德国公民的基本权就同时包含了自由权和社会权两个方面。

积极自由权又衍生出请求权，即当公民面临国家侵犯时可要求国家停止侵害；社会基本权赋予公民享受社会资源的权利，提供改善个人境况、调整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的社会条件。

从自由权到社会基本权，从消极防御到积极给付，德国人完成了社会福利保障的理论建设。社会基本权其实就是积极自由权，现代公民不仅需要消极自由权，更需要积极自由权，只有这两个条件都具备了，才能实现现代公民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在中国，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主张的自由其实属于消极自由，而对于积极自由则是他们反对的。

在美国也分为左派和右派，在美国的左派被称为自由派，右派被称为保守派，美国的左派是承认积极自由权的，而美国的右派则反对积极自由权。因为

中国的自由派和美国的自由派是完全相反的，中国的自由派属于右派，其实是保守派，而不能称之为自由派。

中国需要“顶层设计”，甚至是“顶顶层设计”，这几乎是共识。无论是顶层，或是顶顶层如何设计，却鲜有人提出方案。笔者认为“社会国原则”应该成为中国的顶层设计的一个原则，也就是顶顶层的东西。

是向美国的“自由国”原则靠拢，还是向德国、北欧的“社会国”原则靠拢，这是中国必须做出的选择，也是当前最困惑中国的问题！

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第44条亦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这从宪法上规定了社会保险作为国家给付的基本类型。

随着社会保障权利在宪法中的落实，现在自由法治国也都逐渐演进到社会法治国，这一转变也是公民社会的需求。

社会国的建设能够使我们每个人更有尊严地活着，具有良好的生活状态。

其实观察世界就可以知道，奉行自由国原则的国家，比如美国都出现了很大的社会问题，而奉行社会国原则的德国、北欧则经济发展水平高，社会和谐稳定。因此社会国原则应该成为中国进行顶层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

现在从我们的宪法上来看是符合社会国原则的，但是由于知道这一原则的人太少，而媒体和学术界又炒作一些消极自由，反对积极自由，特别是很多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主张小政府，因此要在中国真正落实社会国原则还有很大的难度。

## 六、德国制胜法宝之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德国是世界上真正实现了国富民强的国家。德国模式的核心就是其“社会国”宪法原则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是德国制胜的法宝。

除了政治领域的社会国原则之外，经济领域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德国进行福利保障的基础。

在市场经济中，国家是中立的力量，由于市场经济对个人存在着一些威胁和挑战，而国家的任务，就是帮助个人应付这种困难和挑战。在德国，福利国原则也是被纳入宪法的，这也是德国在20世纪50年里得到快速发展的原因。

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重点在于确保市场的自由竞争以及市场的有序发展，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框架之内发展经济。

“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来自经济奇迹之父——艾茵哈特的设想，他也是“为了全体国民的富裕，不能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这句话的原创者。

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是指将市场竞争和社会利益均衡相结合，协调个人进取心与社会进步，以贯彻国民福利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因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执行福利制是政府的任务，所以政府有权对经济生活进行宏观调控。概括来说，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主要有三点：市场经济、国民福利制和宏观调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便将社会市场经济作为其执政纲领，后来社会民主党也抛弃陈旧的计划经济主张而皈依社会市场经济。

其实，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比如19世纪李斯特的重商主义，比如后来的历史学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强调国家的作用。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和上述两者虽然有重大区别，但是都没有否定国家的作用。

与美国相比，德国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19世纪全世界都在处于古典主义的黄金时期，但进入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却出现了问题，发现市场失灵了，之后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大家都认识到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德国并没有顺着这一规律发展，而是拧着来。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实行自由放任时，德国却强调发挥国家的功能和作用，例如李斯特主张国家提高关税保护幼稚工业。为什么？因为德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它需要依靠国家力量来发展。20世纪20年代后，大家觉得“市场之手”失灵，需要政府来发挥作用时，德国弗莱堡的经济学家却提出了不同的东西。他们也承认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不合理的，但也不认为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是合适的。他们认为问题的症结是市场缺乏秩序，市场的失灵是缺乏秩序造成的。这套理论学说就是弗莱堡学派。

弗莱堡学派的理论实质：第一，强调充分市场机制；第二，国家来维护秩序；因此，战后德国的主流经济思想跟其他西方国家不一样。除德国之外，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主要国家得到广泛认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德国的确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也被称为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因为莱茵河一般被看作是德国的象征。

社会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进行适当调节，并以社会安全为保障的市场经济。用通俗的公式表示，就是“市场经济+总体调节+社会保障”。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政策应该实现的国民经济总目标是：货币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适度经济增长。这四大目标由于其实现的难度而被经济学家称为“魔鬼四角”。

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奥地利、瑞士等莱茵河谷两岸的国家。广义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还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今日欧元区的大陆欧洲所有国家。联邦德国创建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莱茵资本

主义的基础。

德国虽然信奉市场机制，但原则上，只要国家能够比市场提供更好的服务，都应该让国家积极活动。国家还提供公共产品和劳务，建立和发展教育事业。

国家应当关注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包括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通信事业，以及各种各样的能源生产，这是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

通过中央银行的货币与信贷政策建立金融秩序，维护国家的货币稳定也是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还负担维护秩序的责任，负责确定市场参加者遵守的法律和社会条件，并且负责监督这些规则的遵守情况。德国把国家在这方面的任务比作足球赛中裁判员的角色。

除此之外，国家还要通过货币信贷政策、财政政策、外贸政策、劳动市场政策维持经济繁荣，阻止或者延缓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波动，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货币稳定和对外经济平衡，这也叫作反经济周期的景气政策，德国反对把一切都交给市场。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社会国家，英国学者吉登斯在他的《第三条道路》一书中，强调欧洲的社会福利国家具有共同的历史起源、目标与结构的同时，具体又将它们划分为四种类型。

英国的制度，强调社会与医疗保健服务，但是规定了与收入挂钩的福利金。

北欧的社会福利国家，高额征税，有十分出色的国办的服务事业，包括医

疗保健方面的服务。

中欧制度，没有十分庞大的社会服务福利，但是具有数量可观的福利金，主要通过就业关系在收取社会保险费的基础上筹集资金。

南欧制度，与中欧制度比较类似，但是不那么广泛，国家提供的救济水平较低。

德国人认为，他们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重大贡献。甚至说，英国人贡献了自由，法国人贡献了民主，德国人贡献了社会市场经济，其实这个评价并不过分。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德国的社会福利开支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0%，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实行莱茵模式的国家都相对比较平等，收入差距明显比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要小。中产阶级在美国占50%，在德国占75%，在瑞士或瑞典占80%。

德国模式抛弃了传统的放任，而是驯化了资本主义，给野蛮的资本主义“戴上笼头”，通过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建设抑制了市场经济的消极后果，抑制了社会的贫富分化。

自由一直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在当代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知识界，自由也像法律一样神圣。然而中国人对消极自由强调过多，对积极自由强调得少，这是最大的问题。自由，通俗地讲，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不包含违法的事情。但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没有钱的话，很多事情都干不了，因为要保障民众的自由，首先就要保证民众先有钱。德国不仅提出了积极自由的概念，而且建立了从哲学到法律，再到社会管理模式一整套的东西。

在西方世界中，德国的所得税率几乎最高，包括社会保险金在内的税率超过了50%，而美国不到30%。这样的高税率，不仅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是经济良好发展的基础。这里面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免费教育造就了高水平的劳动



力，在这一点上，德国与美国的反差特别强烈。美国新一代劳动力的平均教育程度低于婴儿潮一代，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出现的教育退化现象。这使得风雨飘摇的美国制造业更加难以面对全球化的竞争，也是美国中产阶级挤压的主要动因。

经济管理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自由而不放任，德国模式就非常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在今天的全球化竞争中，连美国媒体近来也纷纷承认，西方世界如果要维持原有的领先地位和社会稳定发展，就必须效仿德国模式，特别是高质量的公共教育、保障社会公平和限制两极分化。这都是德国经济一枝独秀的秘密。在这样的社会模式下，德国老百姓活得舒服、有尊严，政府也有钱为民众做事，因此，人民安居乐业，官民友好相处，社会一派和谐。

## 七、“居者有其屋”成就了新加坡模式

为什么亚洲四小龙只有新加坡建成了中产阶级社会？与普遍鄙视社会福利的其他亚洲小龙国家和地区不同，新加坡是唯一一个将社会保障作为立国基础的经济体，因此新加坡也是唯一达到高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经济体。新加坡的发展模式是独具特色的。

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学术上大多是美国的附庸，而且大多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末时美国放弃了罗斯福主义，而开始了里根主义，里根是代表美国富人利益的共和党的总统，共和党的总统都反对社会福利，里根和后来的小布什都是这样。

由于亚洲四小龙受美国的这种影响，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鄙视社会福利，因此亚洲四小龙中没有一个是福利社会。虽然不是福利社会，但是新加坡却在非福利社会的基础上创造了另外一种社会保障模式，效果也不错。新加坡的这

种体制就是中央公积金制度，其实属于强制性的商业保险。

在亚洲四小龙中，新加坡是唯一建成中产阶级社会的经济体。有数据显示，新加坡300万人口中约90%以上属于中产阶级，新加坡家庭年均收入普遍在2万美元以上；而这主要归功于其以中央公积金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

新加坡是个特殊的国家，国家很小而经济实力不俗，所以它的社会福利模式值得尊敬但不宜模仿。至少在管理上，大国的福利保障系统根本无法像一个城市国家那么高效、灵活；此外一个国家如果政局不稳定，以及通货膨胀而使得货币购买力长期损失更不适用此模式。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也是新加坡模式，但总体来说不是很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新加坡具备的城市国家、自由港、儒家文化传统和国有经济较强的背景。

中央公积金制度是新加坡迥异于福利模式的另一种社会保障模式。中央公积金制度是以个人储蓄积累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归类为的“储蓄保险”型模式，其基础为公积金制度，性质属于商业保险性质，而非其他国家的税收性质，所以新加坡不属于福利社会。

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有两点。

第一，新加坡国家比较小，而且国家领导人比较能干，他们的中央公积金能够保值、增值。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的本质是保险基金，这种保险基金最重要的就是保值增值。而新加坡由于国家小、人口少，因此可以通过国家投资获得高收益，从而实现保值增值。因此这种模式不可复制，如果一个大国实行这种模式，大量的中央公积金根本没有合适而稳妥的投资途径，因此不能实行保值、增值。如果保险基金不能保值增值，其结果就与我们曾经实行的“老农保”是一样的，我们的“老农保”，17年前，拿出三个月的工资缴费，到现在每人每月只能领取两元人民币。其实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和中国的“老农保”是一个性质，只是一个经营得好，一个经营得不好而已。

第二，新加坡的住房都是由国家进行建设，而且以非常低的价格卖给居民，这已经不是市场经济的行为了，很类似于社会主义的做法，也可以算是一种社会福利。

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实行的是会员制，所有受雇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无论雇主或雇员都必须按照雇员月薪的一定比例缴纳强制性的公积金，每个会员都有自己的独立个人账户。目前的缴费比例为40%，雇员缴纳22%，雇主缴纳18%（这份其实也是受雇者本应得到的薪酬），自雇者当然都是自掏腰包，这个比例在世界上属于超高的范围。公积金覆盖了医疗、保险、养老金、教育、投资和组屋（新加坡特有的公建房，相当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购买等主要领域，是一种综合性的储蓄保险计划。适应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特点，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被认为是社会保障制度成功运行的典范。

普通账户占公积金的75%，用于参加公共住屋、住宅产业、非住宅产业、家属保障、家庭保障、教育计划、基本与增进资产投资计划等保障计划。

保健账户占公积金的15%，主要用于自己和家庭成员的医疗健康需要。公积金成员在55岁（法定退休年龄）前必须保留1.3万新元以备急用。

特别账户占公积金的10%，主要是考虑养老和特别急需之用。成员年满55岁时要在特别账户上至少保留4万新元，以保证60岁退休后能够购买最低终身年金（支付水平相当于届时社会平均收入的25%）。

这种强调自我负责，实行完全积累、与资本市场密切结合的公积金制度，从实践效果来看在新加坡运行得比较理想。新加坡国家小、经济发展平稳、通货膨胀很低、投资风格稳健等特点使相关公积金实现了高积累性、高回报率的成绩；在这个前提下，个人享受待遇才显出好处来。

中央公积金制度的本质是强制性的全民保险，然而新加坡模式缺乏互助性或者说社会共助性差，对收入再分配几乎不起作用。尤其是一国通货膨胀严重，基金投资管理水平低下，这种模式势必引起很大的麻烦。

### 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

早在1955年7月，中央公积金局便推出了养老储蓄计划。新加坡的养老保险采取全部缴纳的制度，即雇主和雇员分别按一定比例为雇员存储退休金。当公积金会员年龄达到55岁并且退休账户达到最低存款额这两个要求后，可一次性提取公积金。若最低存款未达到规定数额，可选择推迟退休以继续增加公积金账户积累，或用现金填补差额，或由其配偶、子女从各自的公积金账户中转账填补。政府鼓励已达退休年龄但身体健康的会员继续工作，以使他们积蓄更多的公积金存款。

随着中央公积金使用范围的逐步放宽，为避免公积金过多用于住房、医疗、教育等其他项目支付而影响养老金的积累，确保会员有足够的存款保障晚年生活，1987年中央公积金局推出“最低存款计划”，规定公积金会员在年满55岁提取公积金存款时，必须在其退休账户中保留一笔存款作为最低存款。此外，新加坡政府还利用东方人孝文化的传统美德，在养老保险上注重家庭养老保险。1987年，中央公积金局同时推出了“最低存款填补计划”，规定公积金会员可在父母年龄超过55岁而公积金存款少于最低存款额的情况下，自愿填补父母的退休户头，填补金额是最低存款额和他的父母年龄达55岁时退休账户结存额之差。从1995年7月起，会员也可以为配偶填补，以保障其晚年生活。

养老保障制度使国民在退休时有一笔可观的公积金存款，确保其退休后能有较高的收入安享晚年。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公积金局制定了多项医疗保健计划，主要包括“保健储蓄计划”、“健保双全计划”和“保健基金计划”。新加坡的医疗产业发

达，服务好，收费却很低，因为这个特点，新加坡已经成为目前亚洲最大、最有名的医疗旅游目的地。这也是支持新加坡保障模式的资本，一个国家如果医疗发展差（不能就近就医而要外地医院）或者费用较高，也断然无法消受新加坡模式。

### “保健储蓄计划”

1984年4月，公积金局推出“保健储蓄计划”。在该计划下，公积金会员每月必须把部分公积金存进保健储蓄账户。缴费比例因投保年龄不同而不同，年龄越大，相应缴费比例越高。公积金会员可以动用保健储蓄账户中的存款，为本人或是任何一个直系亲属如配偶、子女、父母和祖父母支付在当地的医疗费用，主要支付公立医院和获准私人医院的住院费和某些门诊费。1992年7月，公积金局还推出自雇人士保健储蓄计划，以保障自雇人士在急需时有能力支付其医疗费用。

### “健保双全计划”

“保健储蓄计划”对发生一般医疗费用的居民来说已经能保障，但对因患重病和慢性病等花费多的国民来说，账户资金可能不够。为此，从1990年7月开始，公积金局又实施了“健保双全计划”。这是一项大病医疗保险计划。它允许会员以公积金保健储蓄账户的存款投保，确保会员有能力支付重病治疗和长期住院而保健储蓄不足的费用。自1990年开始，所有75岁以下的保健储蓄储户除非选择不参加这项医疗保险，否则都被自动纳入该保险计划内。

1994年7月，公积金局又推出了“增值健保双全计划”。与“健保双全计划”相比，“增值健保双全计划”必须缴付的保费稍高，相应的支付待遇也较高。

### “保健基金计划”

尽管“保健储蓄计划”和“健保双全计划”覆盖了绝大多数新加坡人口，

但仍有少部分贫困国民无力支付医疗费。为此，1991年新加坡提出了由政府拨款建立专项基金的设想。1992年1月，《医疗基金法案》获议会批准。1993年4月，医疗保健基金正式设立，以援助在“保健储蓄计划”和“健保双全计划”外仍无法支付医药费用的贫病者，实际上是对他们实施医疗救济。

上述三重医疗保障安全网，确保了新加坡国民获得基本的医疗保障。

### 居者有其屋制度是新加坡维持中产阶级社会的核心

新加坡的以上措施，本质就是强制性的商业保险，但是其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却完全不同，带有很强的社会福利性质。

新加坡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甚至是唯一一个，把公共住房解决好的国家。新加坡的整个社会制度就是建立在“居者有其屋”这样一个华人传统道理之上。它的住房政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基本国策，是新加坡国家建设的核心。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国土面积狭小而人口密度很大。1959年自治时面临着严重的“屋荒”，当时200万人口中有40%的人居住在贫民窟和窝棚内，恶劣的住房条件导致公共卫生状况恶化和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为解决居住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1960年新加坡政府宣布成立建屋发展局。1964年又推出“居者有其屋”的政府组屋计划。

新加坡的一系列社会政策都是围绕组屋来进行的，比如它的社区服务、医疗、教育、种族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关系等，所有都跟组屋有关系。通过组屋政策，它还要落实一些传统价值观，比如照顾老人等。可以说，组屋是这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平台。没有组屋这个平台，这些政策的执行会变得非常困难。很显然，组屋是新加坡政府“亲民”政治的平台。

新加坡公共住房的概念是从欧洲过来的。但是新加坡没有照抄，而是加以

改善。比如在英国，它的公共住房政策，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福利，是为了救济穷人的，是一种施舍。但是，大多都不成功，失败了。因为政府要救济穷人，所以这些屋子里面要么是穷人住在一起，要么是少数种族的人住在一起，所以往往会出现社会问题，后来就变成贫民窟了。

新加坡很好的一点是，把西方的公共住房政策拿过来后，对此进行改造。新加坡现在85%的人都住在组屋里面，它不再是西方救济穷人的那个概念，而是一个基本国策。这是新加坡最大的创新，没有这个创新，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功。

土地是国家财富之源，也是组屋建设的基础所在。1966年，新加坡政府规定，政府有权征用私人土地用于国家建设，可在任何地方征用土地建造公共组屋；政府有权调整被征用土地的价格。根据该项法令，新加坡政府协助建屋发展局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得土地开发权。

在资金方面，新加坡政府以提供低息贷款的形式给予建屋支持，支付大笔财政预算以维持组屋顺畅运作。此外，为保障普通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组屋，其售价是由政府根据中低收入阶层的承受能力来确定的，而不是靠成本来定价的，因此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并造成建屋发展局的收支亏损。这部分损失，政府核准后每年都从财政预算中给予补贴。据统计，从政府开始拨款计算，至今累积的政府补助金总额已达159亿新元。政府财政支撑是新加坡组屋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格限制炒卖组屋的行为。建屋发展局的政策定位是“以自住为主”，限制居民购买组屋的次数。规定新的组屋在购买五年之内不得转售，也不能用于商业性经营。如果确实需要在五年内出售，必须到政府机构登记，不得自行在市场上出售。一个家庭同时只能拥有一套组屋，如果要再购买新组屋，旧组屋必须退出来，以防投机多占，更不允许以投资为目的买

房，等等。由于严格执行了上述一系列措施，新加坡政府有效地抑制了“炒房”行为，确保了组屋建设健康、有序地进行。

1968年，政府允许居民利用他们的公积金存款购买组屋，也就是居民首付20%的购房款，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拿到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剩下的80%也不会增加居民的日常开支压力，而是由公积金偿付。这一政策使购屋居民数量大为增加。

不是政府的钱就可以赖着不还，政府给出贷款后，会从贷款者的公积金中分年予以扣还。而公积金是居民和雇主必须依法按月缴纳的，是一项绝对固定的收入。对房屋发展机构的补助，也有严密的制度安排，以确保财尽其用。因此，没有通常商业银行住房贷款中大量存在的呆死账，较好地保证了政府住房贷款的良性循环。这是新加坡可以连续近四十多年向居民提供政府贷款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没有这一措施，新加坡政府即使是再有钱，也是无法承受住房贷款亏空之重的。

至于这90%的贷款，贫困家庭也不必太过担心，由政府在他们的公积金中慢慢扣除，而不会影响日常开销。这个制度保证了弱势群体基本住房。

或许正是这一点，是新加坡政府自成立以来就大受普通市民欢迎的原因之一。由此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政府如果能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这个政府将是不可战胜的。

新加坡其实也是一个贫富差距非常大的社会，但是新加坡的中产阶级社会认同感比较强。笔者认为新加坡最大的优势就是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比如“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家庭保障”，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居者有其屋”制度。因为在居民支出中，住房支出是最大的一笔支出，而只要解决好了住房问题，民生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大半。新加坡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解决了“居者有其屋”的问题，新加坡也因此成为了东亚乃至世



界范围内中产阶级社会成功运行的典范。

另一个显著的事实是，由于政府公共事业开支及房屋政策的合理公正，贫富差距并没有在新加坡造成明显的社会矛盾。这和新加坡的立国原则以及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执政理念以及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

## 八、希腊从来不是高福利国家

债务危机以来，希腊被当成了高福利的典型，但这是真的吗？也有人说，高福利的北欧五国确实成功了，那高福利的南欧却失败了，但人云亦云的事情往往禁不住深入推敲。

南欧从来就不存在什么高福利国家，所谓“希腊是高福利国家”都是赤裸裸的谎言，而且也就是这一两年才被媒体广泛炒作的谎言。其实，世界主要国家的福利程度在学术界早就有共识，那就是北欧高于西欧，西欧高于南欧，南欧根本就不存在高福利国家，而是低福利国家。

欧债危机中，希腊几乎成为“明星”国家，但是翻看媒体的报道，几乎都是一边倒地批判希腊的高福利制度。而希腊的福利水平其实远远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更是低于北欧五国那些真正的福利国家水平。

希腊是莫名其妙地“被高福利”了，而在之前的任何经济资料中都没有将希腊当成过高福利国家的记录。民间俗语有谓“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在西方舆论霸权面前，希腊不服不行。

西方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希腊欠债了，欠债该如何还，必须削减政府开支；政府开支如何削减，当然是削减民众的福利了。因此，英国、美国都炒作希腊是福利国家，其实就是为了让希腊削减福利。希腊人民当然不愿意，

因为希腊本来福利就很低，如果再削减那怎么受得了。

2011年的希腊面对高达17.6%的失业率，将近10万的失业人口，福利其实少得可怜。仅仅是发放最基本的退休金和退养金方面，希腊就用掉了其福利开支的90%，而用在医疗、失业和社会救助等方面的资金只占3.2%左右。

希腊的失业保险项目只能覆盖极少数的失业人群，失业方面的福利开支也一直很低，且只有长期、不间断的失业者，才能申请失业救济金。通常情况下，福利国家的失业保险开支与失业率成正比，但希腊的失业保险金多少年来，并没有随失业率增长而增长。希腊的失业补助开支还不到GDP的0.1%，仅仅为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的1/5，与丹麦、瑞典这样的高福利国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在希腊，家庭仍然是给失业者提供救济和庇护的主要单位。

其实希腊的高负债并非因为“高福利”，而是因为举办2004年奥运会的亏损所致。希腊是个小国，其人口不过1100万，这个数字还不及我国上海市常住人口的一半，这样一个小国家，却要承办一场奥运会，其财政负担可想而知。

雅典奥运会最初的预算为46亿欧元，这大约是2000—2004年希腊财政总收入200亿欧元的1/4。事后，雅典奥运会总开支大约160亿美元，几乎是预算的3倍。雅典奥运会刚刚结束，《经济学人》杂志就替雅典算了一笔经济账，除去商业赞助、门票销售和其他商业活动获得的收入之外，希腊的纳税人还必须承担3亿美元的奥运会组织费用、15亿美元的安全保卫工作费用、70亿美元的其他费用。建设和安全费用的大幅提升是亏损的一大因素。

雅典“9·11”事件后举办首届奥运会，史无前例的8万安保人员和众多北约舰船出动，希腊人几乎倾其所有用于支付安保费用，平均每个希腊人要为此付出100多美元。雅典奥运会在安全费用方面的支出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6倍，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50倍。希腊奥运会也是自1952年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之后，52年来第一个由小国举办的奥运会。其结果就是雅典奥运会是自

1992年奥运会以来4届中亏损最大的。如果亏损在今后5年通过增税补足，则每年需要征税约5.5亿欧元，相当于希腊2000年财政收入的1/10。这才是希腊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所在。

另外，希腊危机也有其他原因，希腊面临债务危机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社会管理失范的问题。研究发现，凡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在政治上都是极端多党制国家。西方的政党制度一般分为一党独大制、两党制、温和多党制和极端多党制四种，北欧五国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一党独大制，英美是两党制，德法是温和多党制。比如，希腊危机爆发时的议会产生于2009年10月，各政党的议员人数组成是：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160人，新民主党91人，希腊共产党21人，人民东正教阵线15人，激进左翼联盟13人。爱尔兰也是极端多党制国家，最近两次众议院选举均有超过十个以上政党参与角逐，目前众议院共有6个政党享有席次。在意大利，参加竞选的党派或政治组织一般不下30个，在议会中获得席位的有10个。

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党派越多，财政纪律就越差，国家欠债也就越多，管理也最乱。而现在被迫削减支出的国家，就是这种“财政赤字大到再也拖不下去”的国家。而民主并不能阻止国家举债，比如美国虽然设定了政府债务上限，但这一上限在过去十年被上调了10次，完全成了摆设。

希腊作为典型的极端多党制国家，社会管理能力极差，其共同的表现就是黑社会横行，地下经济发达，偷税漏税严重。日本、意大利等极端多党制国家都是举世闻名的黑社会国家，没有黑社会的支持，政治人物都难以上台。在意大利，黑社会已经成长为第一经济支柱。同样，希腊也是如此，比如希腊政府对人口走私问题置若罔闻，许多专门拐卖妇女儿童蛇头的把希腊当成了欧洲人口走私的中转站。

希腊地下经济规模巨大，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位居第

一。希腊“全民逃税”，根据希腊媒体援引希腊企业联合会的估算，希腊全国每年偷逃税款高达300亿欧元，相当于GDP的10%。据估计，不向政府纳税、不为职工办理任何保险、无法纳入政府正常经济统计系统的“影子经济”，占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的1/4 ~ 1/3。在希腊，如果病人上私人诊所看病，最好用现金，而不是信用卡，另外，大多数医生不会给病人开收据，这样就可以逃税了。去年，希腊政府做过一项调查，在雅典一个高收入社区的150名医生中，超过50%的人说自己年收入少于3万欧元，甚至还有30多人居然说年收入少于1万欧元。这样的结果让财政大臣疑惑不解：就凭那么少的收入，你们怎么可能住豪宅、开名车、养游艇，还把子女送往贵族学校念书？希腊有一种流传很久的说法：希腊是一个挤满了富有群体的贫穷国家。

政党越多的国家，选举越频繁。在意大利，总理的平均任期是一年，日本也是“十年九相”。极端多党制国家的这种频繁选举，费用也非常高。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近期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贿赂、献金和其他公职腐败致使希腊政府每年损失200多亿欧元，相当于希腊GDP的8%。

另外，希腊民主制度也导致公务员福利最高。西方国家都面临着民众投票热情不高的情况，很多大选民众投票率都不到一半，因此投票率较高的公务员成为各政党争夺的票仓，因此都向公务员许以各种承诺，公务员待遇过高成为多党制国家的通病。

在希腊，公务员不仅有法律保障的铁饭碗，还能享受超高福利，希腊公共部门雇员一年有14个月的收入，一年至少有一个月的带薪休假，58岁就可以退休，退休以后一年领取14个月的养老金。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公务员的待遇，而不是普通民众，我们很多媒体在说希腊高福利时都引用这个案例，其实是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在希腊，政府部门中的公务员数量占全国劳动人口的10%，是英国这一比例的5倍，如果算上公共部门的劳动人口，希腊的比例会

更高。因此希腊面临的不是“福利病”，而是“民主病”。

总之，希腊发生债务危机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这些原因中并没有高福利这一项，因此高福利绝对不是头号因素。其他欧洲国家炒作希腊福利过高，其实是为希腊削减福利创造借口，这如同当年中国“入世”时将中国炒作成发达国家一样，背后都是舆论霸权在作祟。

但削减福利绝对不是上策，相反却是导致希腊经济衰退、迟迟走不出危机的原因。国际经验早就表明，一个国家福利越高，抗经济危机的能力就越强。因为一个福利充足的国家，当经济危机来临时，这个国家就不会产生过度的需求萎缩，因此不会发生经济衰退。而现代社会经济危机发生的次数并没有减少，其危害程度也没有降低，但没有出现资本主义早期那种灾难性局面，其根本就在于现代国家都健全了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些制度大大抵御了经济危机的冲击，而希腊在经济危机时发生了经济衰退，其实就是因为希腊的社会福利水平太低所致。

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巴巴拉·韦斯说：“希腊这些南欧国家在失业保险方面，比欧洲大陆福利国家和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要少得多。这也是北欧福利国家在应对当前的危机时，远比希腊做得更好的原因之一，因为前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维持民众的生活标准，而后者则不能。”当前希腊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问题就是经济持续衰退，而导致这一问题的不是因为福利过高，反而是因为缺乏福利保障而导致的消费低迷。

但是，2010年，丹麦赤字仅为GDP的2.6%，政府债务规模从未超过GDP的60%这一上限，芬兰赤字仅占GDP的2.5%，并且瑞典、挪威都有财政盈余。而且北欧很多真正的高福利国家都有着明星般的经济表现，因此福利并非关键因素。

## 九、对福利社会和大政府的八大谎言

近30年的世界是最精彩的，其精彩的程度，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及冷战时期。而这30年世界格局的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坚持“高福利”、“有为政府”的国家都胜利了，而那些实行“去福利化”和“小政府”的国家则遇到了全面性的失败。

在这30年中，大政府的北欧从一个以打鱼捕猎为主的国家，攀登上了人类文明的巅峰，成为了世界最富有、最自由的国家；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而非“自由市场经济”的德国成为了欧洲的新盟主；与此同时，英国在遭遇了撒切尔的“私有化”之后，仅出现了三个月的繁荣，然后就是长达30年的沉沦，今天成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三流国家，包括汽车在内的众多核心产业均被外资控制，英国在治好了英国病的同时，却染上了更严重的拉美病；美国虽然出现了克林顿时期的“新经济繁荣”，但结果也不得不面对“里根-小布什”巫毒经济学的危害；而那些经历了自由化危机的经济体比如日本、拉美、东南亚、前苏联、东欧等至今没有起色。

那为什么实行“小政府”的全部失败，而实行“有为政府”的全部成功了呢？这就必须从对“大政府”和“高福利”的谎言和误解说起。

谎言一，经常有这样一种论调，高福利是发达国家的事情，落后国家不能改善人民的福利。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现在世界知名的福利样板国家和地区比如北欧、德国、新加坡，都是在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建成的。比如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的国家，而当时的德国经济还非常落后，还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德国的经济水平远低于当时的英国和法国，而北欧建立高福利国家的时候也还没有完成城市化，还是以打鱼和捕猎为经济支柱。

而新加坡则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建立起福利社会的，这些国家都

是当时的落后国家，但他们的福利政策不但没有阻碍这些国家的崛起，反而加速了这些国家的崛起，帮助这些国家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了发达国家。比如北欧建立福利社会后，从一个以打鱼捕猎为主的落后地区变成了世界上人均世界五百强企业最多的地区，是人类最富有的地区，而德国也从一个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了今天欧洲最成功的国家，新加坡则是亚洲四小龙中发展得最好的，其人均GDP几乎是其他几个小龙的两倍，已经进入世界第一梯队。

谎言二，大家认为福利社会会让社会失去自由，甚至认为只要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奉行自由主义，都是主张自由至上的。这更是缺乏常识的表现，其实奉行自由国原则的只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国家，而实行莱茵资本主义的国家比如德国、瑞士、奥地利、北欧等国全部奉行“社会国”原则，自由主义在这些国家并不受欢迎。比如“社会国”原则是德国宪法的第一原则，也是德国宪法的根本原则，而在经济上他们则信奉“社会市场经济”，而非“自由市场经济”。

目前奉行“社会国”原则的德国和北欧是世界上发展最好的地区，而且无论是经济还是民生都与信奉自由国原则的国家相比具有全方位的优势，而且这些国家也极少发生经济危机，而信奉自由国原则的英国和美国则发展得并不尽如人意，而且危机连连。

哈耶克曾经用“失去自由和通奴役之路”来恐吓那些希望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政府，但是实践已经证明，哈耶克的预言完全是错误的，北欧福利国家的人民和企业并没有被奴役，反而通过大政府获得了更多的幸福和自由。

一个人是否具有自由，关键取决于拥有财富的多少，不自由往往与财富的缺乏相伴。退休金、社会福利，都是自己财富的一部分，福利国家最终享受到的个人财富要远远高于非福利国家，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福利国家的人民不可能不自由，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空余时间从事自己所喜欢的事情。

其实，即使是美国那些最保守的右翼基金会都将北欧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福利国家与自由不能同时并存早已被证实是谎言。自由其实可以用两个标准来衡量，那就是看个人拥有多少可供支配的财富，和拥有多少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

公共福利是财富，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财富，而民众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公共服务，就必须是大政府。其实大政府本身并没有问题，政府的问题主要是出在官员上，而官员本身也是小政府的受害者，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缺乏的情况下，官员必然拼命贪污受贿，这点在美国和英国也不例外。如果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都非常完善，官员们何必去冒险贪污呢，比如在新加坡和北欧，官员贪污都是很难听到的事情，因为那里的官员没有后顾之忧。

谎言三，认为只要是大政府就会产生腐败，这也是错误的。其实民主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福利的民主，一类是没有福利的民主，那些没有福利的民主国家毫无优势可言，相反很多都成了典型的“失败国家”，我们所期待的“政治红利”完全是“有福利的民主国家”才有，比如印度、菲律宾这些国家虽然也是民主国家，但却是公认的腐败透顶的失败国家。我们所期待的“民主政治红利”其实根本不是由自由、民主带来的，完全是由“福利社会”带来的，他们的这些优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福利社会建成之后才具有的。

也就是说，打败腐败的不是民主自由，而是福利社会，是战后的福利国家建设。而民主本身不但不能治理腐败，反而加剧腐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非常腐败，而样本研究也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腐败程度与其福利程度成反比，福利越高，腐败越低，福利越低，腐败越高。北欧等国、新加坡是高福利国家，腐败几乎绝迹；德、法是中等福利国家，腐败极少；英、美、日是低福利国家，腐败也有，但不多；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排斥福利，腐败一般严重；而印度的福利非常落后，腐败就非常严重。腐败与发展



水平、政治制度关系不大，只与一个指标挂钩，那就是福利程度。

福利社会不仅消灭了动乱，打败了腐败，甚至大家所追求的爱情也是福利社会所带来的。爱情能独立地获得一种社会承认，是出现于俾斯麦创造最早的福利社会之后，此前仅仅出现在大量的文学和少数个案里面。现在全世界公认北欧地区的人谈恋爱是根本不考虑家庭、出身、收入、地位的。北欧是世界上福利最丰厚的社会，这些国家对富人征收巨额税收，将CEO的工资拉至与清洁工差不多的水平，所以姑娘们和她们的妈妈不需要再打听小伙子收入多少、有没有房。北欧是恋爱次数、婚姻次数最多的地方，他们更看重感觉，而不是物质，但是他们单次婚姻的短命程度也是非常醒目的。

谎言四，人们可能认为高税收会增加人们的痛苦感，其实不是这样。那些税收最高的国家反而幸福感最高，这是因为高税收可以带来高保障，这样人们可以用更多的时间用于休闲、娱乐和社交，大家也会互相信任、互相照顾，当然幸福度更高。只有高税收和高福利的国家，人们才会轻松拥有以上这些。盖洛普健康组织曾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进行了定期调查：根据各国的年度调查报告显示，税率最高的北欧国家的居民是地球上最快乐的人，丹麦一如既往地名列第一，随后是芬兰、荷兰和瑞典。

而在低税率的美国，人民反而不快乐。调查显示，大约25%的美国人患有心理疾病，大约16%的美国人将终生遭受抑郁症的痛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这些数字几乎是最高的，是欧洲的2倍，美国人每年花费大约800亿美元治疗抑郁症，可见，高税率、高保障给人带来的是快乐，而低税收、低保障却带来了痛苦。

谎言五，大家认为福利社会会让国家走向落后，这种论调也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福利国家不会造成国家的落后，反而会促进国家的繁荣。从现实上看，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不是美国，而是北欧的高福利国家，福利社会之

所以能带来经济繁荣，这是因为福利本身不是政府的负担，而是政府对社会的投资，是会产生巨大效益的。比如，让人人有保障，人民都能安居乐业，就没有人从事非法活动来维持生活，比如免费的就业培训，可以让人更快地找到工作，找到更合适的工资，比如免费医疗可以让生病的人更快地恢复健康，更快地恢复工作。

总之，高素质的劳动力，健康的生活，能发挥个人才干的职业，较低的犯罪率，都是这个社会繁荣昌盛的基础。而这些只有福利社会才可以做到，因为只有福利社会才对这些项目进行了投资，因此也只有福利社才会得到最高的回报，因此福利国家才出现了最低的失业率、最高的教育水平、最好的公民健康状况、最大的内需消费需求，这些都直接促成了福利国家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最富有的人民。

谎言六，认为福利社会的高工资会导致失业，事实已经表明是错的。因为那些将最低工资标准定得最高的国家，反而失业率非常低，因为人们工资高了，消费就会更旺盛，社会就不会出现需求不足，反而能带来经济的繁荣并降低失业率。比如北欧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最高的，一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70%，但这些国家一般情况下失业率在2%～3%的窄幅范围内波动，近乎完全就业，远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7%～10%失业率的常规水平。

在本轮金融危机中，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经济恰恰是所有西方发达国家中应对最成功和表现最好的：GDP增幅超过6%，失业率迅速下降。贫富差距是完全可控的，是可以人为设定的，也就是想要社会贫富差距是多大，就可以是多大，只要设定好了最低工资标准这个指标，贫富差距就不再是问题。

谎言七，对“养懒人”的偏见。大家认为福利国家会落后，是与一个“福利社会养懒人”的论调有关的，事实证明这种论调也是错的。高福利国家反而是懒人最少的，因为社会根本不存在懒人，只存在缺乏机会、缺乏希望和能力

不足的人。福利社会给所有人创造了机会，带来了希望，提高了他们的职业能力，怎么会产生懒人呢？其次，福利国家跟社会主义、平均主义、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是完全不同的，福利国家仍然是按劳分配，即使在福利国家，也不是不劳而获的，也是不工作就没有收入，福利国家都有失业补贴，但这也是很小的一笔钱，如果正常人要靠失业补贴生活，也是非常艰难的，依赖福利的人大多是失业者和低收入者，他们本身就无法养活家人。

“福利社会养懒人”的谬误还在于，参与社会劳动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而这些人基本上不享受福利，不享受福利也就不会偷懒，而享受福利的主要是儿童、老年人、学生、残疾人、病人、孕妇等群体，这些人本身就不是劳动人口，与懒不懒惰也就无关，所以说福利社会养懒人本身就搞错了对象。现实也证明高福利国家反而懒人最少。比如劳工参与率一般用来衡量一国民众的工作热情。北欧福利国家的劳工参与率多年来均高过崇尚自由和个人奋斗的美国人，美国的参与率一般保持在80%～82%之间，北欧国家参与率最高的冰岛高达90%，最低的芬兰也为84%。另外看非生产性的“局外人口”情况，当前瑞典的非经济活动人口占国民总数的比重为49%，而德国的指标为60%。德国人以勤奋著称于世，妇女也大多数参加工作，两国人口结构情况近似，但是德国的这项指标都要比瑞典低了10个百分点，别的国家就不用比了，而且德国也是个高福利国家。

谎言八，福利国家会欠债。近年又开始流行一个说法，那就是福利国家让政府欠债，这也不符合现实，福利国家不仅没有欠债，反而是债务水平最低的，高福利国家的债务水平不仅远低于美国、日本，甚至比中国更低，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低的。例如，瑞典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约为30%左右，财政赤字不超过1%，而挪威不仅没有赤字，反而有大量的盈余，新加坡也是这样，不仅没有一点债务，而且每年还向民众分红。

高福利国家一般经济都非常繁荣，而且非常稳定，国内需求旺盛而稳定，经济危机对其基本没有冲击，因此政府也没理由欠债。而大家所熟悉的南欧四国，其实他们都不是高福利国家，比如希腊的福利支出水平都不及欧盟的平均水平，更是远低于高福利的北欧。

总之，经过我们的考察和研究，认为社会对福利的投资不仅不会成为经济的负担，反而会成为经济繁荣的基础；福利社会不仅不会让人变得懒惰，反而会让人变得勤快；福利社会不仅不是经济发达的产物，相反却是最先在落后国家兴起；福利社会不仅不会让政府欠债，反而因为经济的稳定繁荣让政府出现财政盈余；福利社会不仅不会限制自由，反而创造了积极的自由；福利社会的人们不仅不会有痛苦感，反而更轻松和幸福。

## 第六章

# 从“世界模式 1.0”到“世界模式 3.0”

### 一、“大同社会”和“理想国”并非真理想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那些优秀的、具有前瞻性的学者，就在考虑人类社会的终极形式。在古代，西方以柏拉图的“理想国”最为著名，中国以“大同社会”最为著名。

#### 大同社会不是理想社会

中国的大同社会主张“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如果按照大同社会的字面标准进行衡量，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制度完全符合大同社会的标准。但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并不是很幸福，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生产力条件非常落后，物质生活非常贫乏，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因此民众幸福的时代必须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时代，是物质产品极其丰富

的时代。如果缺少了这一条件，即使达到了大同社会的标准，民众也不会感到幸福。

### 柏拉图的理想国并不理想

西方人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以柏拉图的“理想国”最为有名。在理想国里实行“哲人”的统治，哲人就是那些受过道德教育的人。其实这一点，在我国古代已经实现了，但结果也不是非常理想。因为即使统治者受过道德教育，也不一定能控制住自己的贪欲，而人的贪欲是由物质的贫乏、生活来源的不稳定以及人自私的本性决定的。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来保证物质生活的丰富，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保障制度来保证人们有稳定的生活来源，那即使对人进行再多的道德教育，也不能控制住人的贪欲。我国古代官员都熟读四书五经，经过了严格的道德教育，这种方式虽然也造就了一批严于律己的清官，但大部分官员并不能控制住自己的私欲。可见要保证官员有着良好的道德，仅靠教育是远远不够的。

在国家的结构上柏拉图主张一种“生产建设兵团式”的国家结构，这样的社会如果没有物质产品的丰富，又不能给予人民一定的自由度，即使实现了，同样也不能带来幸福。

按现代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古人关于社会模式的构想还是太简单了，现实社会的复杂程度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 二、世界模式从“1.0”到“2.0”

### 人类发展的简单历程

自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人类的历史基本可以归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是自由放任主义阶段，在《世界如此危机》一书中，笔者将其称为“世界模式 1.0”，在这种模式下，人类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种模式最终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成为经典，当时的政府被称为“守夜人”政府。在这种模式下，西方国家表面上也拥有了一切：财富、政治智慧和军事力量，在此期间，世界的霸权也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传递到了英国手中。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表面风光，但其内部矛盾重重，而频繁的经济危机、严重的阶级冲突，以及风起云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宣告了这种模式的失败。

在这种情形下，另一种模式诞生了，这种模式并没有诞生在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而是诞生在了另一个正在新崛起的大国——德国。确切地说，当时还不存在德国，因为当时的德意志还处在封建社会，全国由几百个骑士国组成，虽然资本主义发展迅速，但封建割据导致了国内缺乏统一的市场，因此卑斯麦极力想统一德国，但德国也面临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这阻碍了卑斯麦的对外征战，而当时国内兴起的“工厂立法”却吸引了卑斯麦的注意。

工厂立法其实并非起源于德国，而是诞生于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英国工人要求政府进行立法，缩短工时，英国资本家当时极其反对缩短工作日的“工厂立法”，并且与工人展开了血腥斗争，直到缩短工作日，在工人状况有所改善的时候，资本家的收益也大大增加。卑斯麦看到“工厂立法”对平息工人斗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后，便亲自推动了这一进程。1883年，德国通过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在次年通过，就连最难通过的《老年残障保险法》，在1889年也获得批准。

就是这样，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早通过立法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德国工人在世界上最早拥有了保险和退休金。而工人福利的改善，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的经济发展，德国也一跃从西欧落后的国家迅速成为与英法抗衡的强国。当

时的德国首相俾斯麦一直将“工厂立法”当成自己最伟大的成就，并将其称为“一切历史上的社会改革之花”。

现在柏林市政厅二楼会议堂的一幅19世纪的油画显示的就是当时的情形。在画中，卑斯麦身穿军服，手里拎着一把德国菜刀主持国务议会，讨论最难通过的《老年残障保险法》，当时的气氛非常紧张，如果哪个利益集团的代表敢对这老年保险法不同意，这位铁血宰相随时都可能将他的脑袋削下来，最后所有人战战兢兢地顺从了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意志。

德国崛起的经验反过来又触动了英法等国家，它们也纷纷效仿。英国1905年制定了《失业工人法》，1909年制定了《退休法》和《劳工介绍法》，1911年通过了《国民保险法》。法国1894年颁布了《强制退休法》，1905年制定了《专业保险法》。自此，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了自己的“工厂立法”进程。这就揭开了“世界模式2.0”的序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另一个高福利的大国苏联开始崛起，大萧条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经济上采用了凯恩斯主义政策，积极干预经济，在民生上也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 三、为什么有社保的国家不会乱？

有社保的国家不会乱，凡是发生动乱的国家，大多数是没有社保的国家，下面笔者联系苏联、中东的变局进行分析。

历史有的时候真的是简单地重复，苏联、罗马、大清的灭亡似乎都遵循着同样的道理：建立制度是为了享受这一制度的好处，但一旦享受到了这种制度的好处后，就丧失了保卫这种制度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丧失，就意味着这种对好处的享受也将停止。苏联公民的贵族化，罗马公民的奢靡，八旗子弟的腐



朽，都是一样的。

无论是保卫这种制度的一方，还是反对这种制度的一方，一旦交起火来，就需要有人打仗，而要打仗就必须有一批在“饿死”和“战死”之间进行选择的人。如果苏联要保卫他们的制度，也就需要这样的人，但苏联公民当时生活的优越程度决定了国家确实没有这样的人。他们没有一个因处于饥饿状态而被迫去送死的人，因此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保卫他们的制度。

当时的苏联公民生活之优越，是直到现在绝大部分国家的公民都难以企及的。他们夏天有凉爽的空调，冬天有热腾腾的暖气，每年都可以出国度假一次，生活上“土豆炖牛肉”成为了他们的主食。他们也不用为住房担忧，一切都是免费的；不用为小孩的教育担忧，一切都是免费的；不用为养老、医疗担忧，一切都是免费的。苏联公民的生活超过了中世纪的贵族，拥有这种生活的人，他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享受这种生活，怎么可能去“送死”呢？

所以苏联当时尽管发生了那么大的变革，但是却从来没有爆发军事冲突，没有战斗，因为全国公民早已失去了战斗的能力。社会主义制度的消失，受损最大的是工人阶层，但当时的工人阶层与列宁时代的工人阶层完全不一样了。列宁时代的工人阶级是赤贫的，是受压迫的，而苏联解体的时候，他们拥有了维持体面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但也因此失去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能力。如果苏联解体时的工人阶级哪怕还有列宁时代1%的血性，苏联也不可能解体。因此“公民贵族化”是苏联灭亡的根源。

苏联的“乱”，主要体现为高层的乱，但社会秩序没乱，最重要的就是社保兜底。而在希腊也只是出现了游行、示威，以及少量的暴乱，因为他们也是略有保障的。很多人说希腊是福利国家，这纯属造谣，希腊是典型的低福利国家，它的福利支出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而利比亚、叙利亚则不同了，它们所处的中东到处是赤贫的人，而且没有社保，“去打仗”是很多人的“活路”之

一。而且在这两个国家，为反对派打仗的人很多都不是本国人，而是来路不明的人，因为在中东地区存在着大批的无业流民，这些人随时处于没饭吃的状态，这些人参加战争，也不懂什么价值观，甚至连工资都不要，给饭吃就行。而这类人，在全苏联基本上是找不到的，所以苏联那么大的变革可以一点不乱，希腊可以小乱，而叙利亚、利比亚则大乱，关键是社保程度的不同。

总之，一个国家在政权更替时“乱”的程度与这个国家的社保体系成反比，社保体系越完善，政权更替越容易，也不会乱，而社保越低，越容易乱，而且很容易演变成军事暴乱，这种乱越难收拾。这个规律我们还可以在其他地区得到证明，比如在韩国也发生过政权更替，但也没大乱，而在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家，则是换一次乱一次，即使是单纯的民主选举都会产生大乱，从根本上还是缺乏社保，流民太多。因此笔者所提出的“有社保的国家不会乱”的论断，在大部分国家都是可以得到验证的。

当然中国才刚刚迈出第一步，中国需要改革的地方还很多。而且要更上一层楼，也要从行政上改革。媒体很喜欢将“政治体制改革”简化为“政改”，其实这是错误的，政治主要是指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主要是行政方面。

中国的行政结构还不完善，中国的部门还可以进行改革，可以将社保的职能从人力和社会保障部抽离出来，将社会保障职能与现有的民政部进行合并，组建民生与社会保障部，专门负责民生与社会保障的问题，而原人力方面的职能可并入教育部重组成教育与人力资源部。这样既整合了大教育的资源，也整合了大社会发展的资源，理顺了两方面的关系。

## 四、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

### 中国养老保险参保方式

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

(1) 企业单位首次参保，须携带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地税税务登记证、法人身份证、银行基本账号、开户许可证等复印件各一份，填写用人单位社会保险登记表（一式四份）到社保中心办理登记参保等手续。同时填报参保人员名册（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参保月份）报到社保中心征缴科，经社保中心审核后，在次月10日前到企业所在地税务部门申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2) 城镇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办理参保，须携带工商营业执照（自由职业者带户口簿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二份，及一寸照片三张，到社保中心办理参保手续，建立社会保险关系（外来人口首次参保须带当地社保部门未参保证明）。

(3) 企业失业人员办理参保，须携带养老保险手册、企业签发的“续缴养老保险费、衔接缴费年限计算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文件到社保中心办理续保手续。

### 养老保险缴费比例

(一) 企业缴费额=核定的企业职工工资总额 $\times$ 20%；职工个人缴费额=核定缴费基数 $\times$ 8%（目前为8%）。

(二) 个体劳动者（包括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缴费额=核定缴费基数 $\times$ 18%。

核定缴费基数则以本省上年度职工社会平均工资（简称省社平工资）为

基准。(1)企业职工凡工资收入低于省社平均工资60%的,按60%核定缴费基数;高于省社平均工资60%的,按实际工资收入核定缴费基数,但是最高不得高于省社平均工资的300%。(2)个体劳动者可以在省社平均工资以上至300%的范围内,自主确定缴费基数。

### 养老保险领取方式

职工退休时的社保养老金由两部分组成: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其中,

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储存额÷计发月数(50岁为195、55岁为170、60岁为139,不再统一是120了)

基础养老金=(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2×缴费年限×1%=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1+本人平均缴费指数)÷2×缴费年限×1%

(公式中,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本人平均缴费指数。)

在上述公式中可以看到,在缴费年限相同的情况下,基础养老金的高低取决于个人的平均缴费指数。个人的平均缴费指数就是自己实际的缴费基数与社会平均工资之比的历年平均值,最低限为0.6,最高限为3。

因此,在养老金的两项计算中,无论何种情况,缴费基数越高,缴费的年限越长,养老金就会越高。

养老金的领取是无限期规定的,只要领取人生存,就可以享受按月领取养老金的待遇,即使个人账户养老金已经用完,仍然会继续按照原标准计发,而且个人养老金还要逐年根据社会在岗职工的月平均工资的增加而增长。因此,

活得越久，就可以领取得越多，相对于缴费来说，肯定更加划算。

例如：

根据上述公式，假定男职工在60岁退休时，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4000元。

累计缴费年限为15年时，个人平均缴费基数为0.6时，基础养老金 =  $(4000\text{元} + 4000\text{元} \times 0.6) \div 2 \times 15 \times 1\% = 480\text{元}$ 。个人平均缴费基数为1.0时，基础养老金 =  $(4000\text{元} + 4000\text{元} \times 1.0) \div 2 \times 15 \times 1\% = 600\text{元}$ 。个人平均缴费基数为3.0时，基础养老金 =  $(4000\text{元} + 4000\text{元} \times 3.0) \div 2 \times 15 \times 1\% = 1200\text{元}$ 。

累计缴费年限为40年时，个人平均缴费基数为0.6时，基础养老金 =  $(4000\text{元} + 4000\text{元} \times 0.6) \div 2 \times 40 \times 1\% = 1280\text{元}$ 。个人平均缴费基数为1.0时，基础养老金 =  $(4000\text{元} + 4000\text{元} \times 1.0) \div 2 \times 40 \times 1\% = 1600\text{元}$ 。个人平均缴费基数为3.0时，基础养老金 =  $(4000\text{元} + 4000\text{元} \times 3.0) \div 2 \times 40 \times 1\% = 3200\text{元}$ 。

个人养老金 = 基础养老金 + 个人账户养老金 = 基础养老金 + 个人账户储存额  $\div 139$

平均缴费指数 =  $(\text{视同缴费指数} \times \text{视同缴费月数} + \text{实际缴费指数之和}) \div (\text{视同缴费月数} + \text{实际缴费月数})$

视同缴费指数：分为一般人群和特殊群体。

① 一般人群，即1993年底前参加工作，1993年底前已按规定参加企业养老保险并缴费的参保人（含1993年底前调到企业的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安置到企业的复转军人）。

② 特殊群体，指1994年1月1日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前按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可视同缴费年限的，由本省安置到企业的复员转业军人、流动到

企业的原机关工作人员，以及改制前参照依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计算公式：视同缴费指数＝本人复员转业、单位改制或离开原单位前12个月月平均基本工资÷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结果大于3.0的取3.0）

### 解读什么是“五险一金”？

“五险”是指五种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一金”指的是住房公积金。

其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这三种险是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的保费，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完全是由企业承担的，个人不需缴纳。这里要注意的是“五险”是法定的，而“一金”不是法定的。

#### “五险一金”的缴费比例是什么？

- 目前北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单位20%（其中17%划入统筹基金，3%划入个人账户），个人8%（全部划入个人账户）。

- 医疗保险缴费比例：单位10%，个人2%+3元。

- 失业保险缴费比例：单位1.5%，个人0.5%。

- 工伤保险根据单位被划分的行业范围来确定它的工伤费率。

- 生育保险缴费比例：单位0.8%，个人不交钱。非工作所在地户口的没有这个，所以非工作所在地户口的最多只有“四险一金”。

公积金缴费比例：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选择住房公积金缴费比例。但原则上最高缴费额不得超过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300%的10%。

统筹基金在养老保险制度从国家一单位制逐渐向国家一社会制转变的过程中需要国家统筹，以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及人口老龄化等问题。

统筹基金分为以下三种：

- 以企业缴费为主建立社会统筹基金；
- 由职工和企业缴费为主建立个人账户；
- 政府负担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费用。

这种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半基金制有利于应付中国人口老龄化危机，逐渐分散旧制度到新制度的转轨成本，逐步实现由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到个人养老保险制度的转变。

四险一金的缴纳额度每个地区的规定都不同，基数是以工资总额为基数。有的企业在发放时有基本工资，有一些相关补贴，但有的企业在缴纳时，只是基本工资，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具体比例要向当地的劳动部门去咨询。

关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支取，是在法定允许的情况下才可以领取，是由设保登记部门来发放的。比如，养老保险，要达到法定的年龄才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的领取也是要具备条件，比如你到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办理失业证明，同时又办了求职证，就是指你失业以后还必须有求职的意愿，这样的条件才可以领取。

如果失业之后你不想工作，那么就不能给你发保险金。另外，养老金和失业金是不能同时享受的。

试用期内是否享有保险？

在试用期内也应该享受保险，因为试用期是合同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隔离在合同期之外的，所以在试用期内也应该上保险。另外，企业给员工上保险是一个法定的义务，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或自愿与否，即使员工表示不需要交保险也不行，而且商业保险不能替代社会保险。

### 养老保险的享受待遇

累计缴纳养老保险15年以上，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可以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1) 按月领取按规定计发的基本养老金，直至死亡。

基本养老金的计算公式如下：

基本养老金 = 基础养老金 + 个人账户养老金 + 过渡性养老金 = 退休前一年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  $\times 20\%$  (缴费年限不满15年的按15%) + 个人账户本息和  $\div 120\%$  + 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  $\times 1997$  年底前缴费年限  $\times 1.4\%$ 。

(2) 死亡待遇。

① 丧葬费；② 一次性抚恤费；③ 符合供养条件的直系亲属生活困难补助费，按月发放，直至供养直系亲属死亡。

注意：养老保险应尽量连续缴纳，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凡企业或被保险人间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或按有关规定不缴费的人员除外），被保险人符合国家规定的养老条件，计算基本养老金时，其基础性养老金的计算基数，按累计间断的缴费时间逐年推至相应年度上一年的本市职工平均工资计算（累计间断的缴费时间，按每满12个月为一个间断缴费年度计算，不满12个月不计算）。

举例来说：

如果你2020年退休，正常你的基础养老金是2019年的社会平均工资  $\times 20\%$ ，但是如果你在退休之前养老保险中断了30个月，就是中断了2.5年，按2年算，你的基础养老金就是2017年社会平均工资  $\times 20\%$ 。



## 医疗保险的享受待遇

### (1) 门诊、急诊医疗费用

在职职工年度内(1月1日~12月31日)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定范围的医疗费累计超过2000元以上部分。

### (2) 结算比例

合同期内派遣人员2000元以上部分报销50%，个人自付50%。

在一个年度内累计支付派遣人员门、急诊报销最高数额为2万元。

(3) 参保人员要妥善保管好在定点医院就诊的门诊医疗单据(含大额以下部分的收据、处方底方等)，作为医疗费用报销凭证。

### (4) 三种特殊病的门诊就医

参保人员患恶性肿瘤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肾透析、肾移植后服抗排异药需在门诊就医时，由参保人就医的二、三级定点医院开具“疾病诊断证明”，并填写《北京市医疗保险特殊病种申报审批表》，报区医保中心审批备案。这三种特殊病的门诊就医及取药仅限在批准就诊的定点医院，不能到定点零售药店购买。发生的医疗费符合门诊特殊病规定范围的，参照住院进行结算。

### (5) 住院医疗

住院押金：符合住院条件的参保人员，在收入住院时，医院收取参保人员部分押金，押金数额由医院根据病情按比例确定。如被派遣人员单位和参保人员未能按时足额缴纳医疗保险费的，住院押金由派遣人员个人全额垫付。

结算周期：参保人员住院治疗每90天为一个结算周期：不超过90天的，每次住院为一个结算周期。

恶性肿瘤患者门诊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肾透析、肾移植后服抗排异药、患有精神病需常年住院的患者其发生的医疗费用每360天为一个结算周期。

参保人员在定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家庭病床治疗发生的医疗费用，每90天为一个结算周期。

参保人员出院或阶段治疗结束时，需由派遣人员个人先与医院结清应由派遣人员个人自费和自付的费用，应由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大额医疗互助资金支付的医疗费用，由医院向医保中心申报审核、结算。

参保人员住院治疗，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定范围的医疗费用的结算，设定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起付线和最高支付额。

起付线第一次住院为1300元，以后住院为650元，最高支付限额为5万元；超过最高支付上限的（不含起付标准以下以及派遣人员个人负担部分）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支付70%，派遣人员个人负担30%，在一个年度内最高支付10万元。住院费用的结算标准，在一个结算周期内按医院等级和费用数额采取分段计算、累加支付的办法。

各项比例有调整时，应按新的标准执行。

注意，非因公交通事故，医保是免责的！

### 失业保险享受待遇

失业保险连续缴纳一年以上，档案退回街道后，可以在街道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1）失业保险金：是指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按规定支付给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费用，它是最主要的失业保险待遇。

（2）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医疗补助金：是指支付给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

险金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的补助。

(3) 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失业人员的丧葬补助金和其供养的配偶、直系亲属的抚恤金按有关规定执行。

### 工伤保险享受待遇

在合同期内不幸发生意外，需向企业索取情况说明，并加盖企业公章，尽快（最好在三个工作日内）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供下列材料：

- 初次治疗诊断书或住院病历；
- 职业病诊断证明（原件、复印件各一份）；
- 交通事故需提供交警大队的事故裁决书或交通部门的交通事故证明；
- 身份证复印件；
- 有效期内的劳动合同原件。

### 生育保险享受待遇

可以报销与生育有关的费用。

报销范围包括，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用、计划生育手术医疗费用、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其他与生育有关的费用。

生育津贴按照女职工本人生育当月的缴费基数除以30再乘以产假天数计算。生育津贴为女职工产假期间的工资，生育津贴低于本人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由企业补足。

生育医疗费用包括女职工因怀孕、生育发生的医疗检查费、接生费、手术费、住院费和药品费。

计划生育手术医疗费用包括职工因计划生育发生的医疗费用。

现在要求，医保缴够20年，养老保险缴够15年才有资格领养老金和享受退休后的医保报销。

### 中国的城市居民养老

2011年起中国将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规定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城镇居民，年满60周岁，可按月领取养老金。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金主要由个人缴费和政府补贴构成。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600元、700元、800元、900元、1000元10个档次，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档次缴费，多缴多得。

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

参保居民年满60周岁，可按月领取养老金。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未享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养老待遇的，不用缴费，可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距领取年龄不足15年的，应按年缴费，也允许补缴，累计缴费不超过15年；距领取年龄超过15年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不少于15年。

### 【实施时间】

2011年7月1日试点，2012年实现全覆盖。

## 五、中国养老金根本问题在哪里？

---

提到财富缩水，很多人肯定认为是通货膨胀的因素，这方面的因素是有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其实比通货膨胀导致财富缩水更重要的是生存成本的提高。

生存成本和消费水平两者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生存成本是指必要性消费。我们举个例子，在古代人们出行主要靠走路或是骑马，后来改成了骑自行车，再后来是公交车，后来是地铁，最后是私家车。比如现在的美国，没有自己的汽车根本就是寸步难行，中国以后也可能这样。

我们可以分析以下几种交通方式的成本，步行，几乎是不需要成本的；而骑自行车，不过是定期的修车费用，可以说是非常的小；如果是坐公交车，那每月的公交费则要一百多元，现在北京的公交是比较便宜的，上车一元，中国很多城市是两元，甚至是两元五角；如果是坐地铁的话，北京地铁，单一票价2元，上海、广州、深圳、沈阳、天津、成都等地则是两元起步，分段计价；如果是开车上下班，那费用更高。其实，公交、地铁这种交通方式反映的还不是真正的成本，很多是靠财政补贴，如果是按真实成本收费，那费用就更高了。

其实在美国，私家车已经是非常必要的交通工具，中国以后很可能也是这样。我们所举的只是交通的例子，其实，吃穿住行各方面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比如我们每月几百元的手机话费，和每年上千元的上网费，更是生存成本升高的表现。十几年之前，人们是不会想到还有这项支出的。

由于通货膨胀和社会发展导致的生存成本急速升高，因此如果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攒钱养老变得非常不现实。比如在三十年前，中国的平均工资只有几十元，在十五年前，中国的平均工资只有几百元，现在中国大部分省份的平均工资已经在三千元上下，而在未来中国平均工资要增长到几万元，因此年

轻时的储蓄，到了年老之后，可以说已经缩水殆尽。

因此，现在各国的养老保险都是现收现付制度，也就是每年需要支付多少养老金就收多少养老保险或是社会保障税，这样就避免了由于通货膨胀和生存成本升高带来的财富缩水。

其实除了现收现付的部分，世界各国还有个人账户，个人账户一般实行基金积累制。

所谓“基金积累制”，是指参加养老保险的在职劳动者，通过他和他的雇主在其工作期间的缴费，把一部分劳动收入交由社保经办机构，并将这些不断积累的资金用于投资，等参保人退休后，该基金再以积累的养老金和投资所得回报向他兑现当初的养老金承诺。这是一种把劳动者工作期间的部分收入转移到退休期间使用的制度安排。

美国叫401k，中国叫个人账户，道理都是一样，都是不由国家进行统筹，而是直接进入个人账户。我们现在经常听说的养老金投资，或是中国的养老金入市，其实就是这些不属于国家统筹部分的个人账户资金。

这部分资金，大多是十年前、或是二三十年前缴纳的养老金，其实在这几十年的时间内面临着极大的财富缩水，而定期存款或是国债，基本上是可以弥补通货膨胀的损失，但是至于生存成本升高造成的缩水，是很难弥补的。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如果不进行投资的话，那就面临财富缩水，如果进行投资的话，那就面临风险，美国的养老金投资亏损是常见的事情。

其实面对这样的问题，只能是加大国家统筹的力度，全部进入现收现付是最好的，这样才能避免财富的缩水，或是投资风险代理的损失。

国家统筹的程度越高，财富缩水得越少，因此哪个国家统筹越高，哪个国家的国民损失就越小。其实中国的养儿防老就是现收现付的。现收现付制是指

以同一个时期正在工作的人的缴费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一代人的养老金的保险财务模式。本期征收，本期使用，不为以后使用提供储备。

目前世界各国的基础养老金，都是国家统筹，有的称为社会保障费，有的直接称为社会保障税，从本质上是税的性质，而不是商业保险的性质。而且世界上的大国里面，完全都是实行的现收现付制度，美国直接就叫社会保障税，中国等国家名称上叫社会保险，其实本质上也是税的性质，与各个保险公司所推销的保险产品是完全不同的，私人养老保险在任何国家所占的比例都不大。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通胀结合”的养老金模式，这其实就是现收现付和基金积累制相结合的方法，因此在通货膨胀和生存成本升高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个人账户养老金缩水非常厉害，而统筹账户不够用。中国现在社保账户出现的问题，其实就是当初设计上的问题。

中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改变统账结合的模式，改成完全的现收现付制度，改变现在的双轨制，公务员也要交养老保险，另外就是实行费改税收。

## 第七章

### 世界模式 3.0：社会福利型国家

#### 一、英国是如何率先建立福利国家的？

苏联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经的霸主英国不甘落后，痛定思痛，下定决心建立世界上最完善、最先进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而且不仅仅是简单复制德国、苏联和美国模式，而是开辟自己的道路。

1941年，英国成立“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部际协调委员会”，着手制定战后社会保障计划。受英国战时内阁财政部长委托，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爵士提交了题为《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的报告，这也是影响整个世界社会保障的经典著作，在英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被业内人士视为现代福利国家的奠基石。而报告中最著名的福利社会三原则，普享性原则、统一性原则、均等性原则，也成为所有文明社会的基本精神和核心制度。

此后，福利国家的理念又被推广至北欧。而且它们后来居上，成了西方福利国家的“橱窗”。而当时的北欧，福利化才刚刚开始，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



进入高峰，他们大多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极其重视劳动者的福利，当时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政府补贴建设住宅，为工人提高各种福利，而就是这些措施让野蛮落后的北欧海盗国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崛起，并一跃成为人类最富有、最自由的地区，成为现代人类文明的标杆，影响至今。至此世界模式3.0正式确立，并发展到顶峰。

然而，世界的变化并没有停止，20世纪70年代，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石油价格上涨了将近10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进入“滞胀”状态，此时被压制多年的保守主义势力趁机上台。作为福利国家发源地的英国，在大滞胀后，最先走向了“去福利化”道路，美国紧随其后，而且这一削减福利的浪潮也逐步席卷到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其实现在英国的福利制度早已不是贝弗里奇模式了；而北欧国才真正继承了英国模式的“衣钵”，成为贝弗里奇模式的典范。“入海方知天地远，出水才见两腿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那些“去福利化”国家的经济几乎成为残枝败叶，而北欧却一枝独秀，散发着明星般的魅力。

事实证明，“去福利化”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好办法，毕竟福利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然而话又说回来，那些已经“去福利化”的国家要想重回高福利也是不容易的，毕竟高福利也有高福利的缺陷，因为高福利必然要求高税收，而高税收又必然推高生存成本，而且现在人类面临的不仅是贫富分化的问题，更是生存成本不断升高的问题。

## 二、福利国家好在哪里？

---

为什么福利社会是必要的？

福利社会的必要性，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方面如吉登斯所说，现代社会是

一种风险社会，其次是因为福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投资。

福利其实是一种社会投资福利，不是经济的负担，而是一种投资，是会产生巨大效益的。观察同一个事物，视角不同，结论就不同，不用说事物，其实就是同一个经济数据，从不同角度，有时也会得出完全相反的两个结论。

而对于福利社会的理解，就有很多视角，比如有人道主义的视角，有政治的视角，也有经济的视角。在经济的视角中，福利经济学是一个孤立的学科，说起孤立，就是因为没有更多的与经济学其他分支融汇在一起，福利经济的目的就是研究如何增加社会福利，但是对于为何要增加社会福利，更多是从伦理学角度来解释的，因为福利经济学经常被认为是经济学、伦理学的交叉学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福利经济学发展。

后来福利经济学摆脱了伦理的束缚后，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其实福利经济完全可以从经济学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其实如果从纯经济学的角度看，福利也可以作为一种社会投资，只要是投资就有产出，同样，福利也是一种有效益的投资。只是这种效益不那么明显，很难进入统计报表，也没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甚至从来没有人将其看作投资，而是将其看作一种纯粹的消费，其存在的价值也仅仅是限于扩大整个社会的需求，从而克服需求不足的经济难题。

这种分析是正确的，但并没有把握住问题的实质，福利经济是有扩大需求的一面，但是更是一种投资，是自己单独产生效益的，而且效益很大。它的效益不必通过其他方面来体现。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之所以发展缓慢，成就不明显，关键就是没有找到分析视角。而如果我们用“投资—收益”模型来分析福利经济学，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福利经济要想有大的突破，后来的经济学人绝不能从前人研究的延长线上拓展，而只有另辟蹊径。

社会投资与企业投资不同，社会投资很大程度上是公共行为，需要政府来做。比如国防，国防的效益体现得不明显，但是这种效益是可以感觉到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否定国防存在的合理性。国防其实也是可以购买的，比如在欧洲中世纪，很多小国都是向职业雇佣军来购买国防，但古代的国防比较简单，现代国防极其专业，不是哪个公司可以承担的，因此必然由政府来做。其实这类的产品还有很多，比如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益更是极其明显，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连基础设施都修建不好，那这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很好，比如印度，印度的基础设施都非常差，它的经济是不可能发展好的。

但还有一种投资，它有效益，但不像基础设施投资那么明显，也不像国防那样让人能感觉到，但是它的效益并不小，而且也是可以讲清楚的，这就是社会福利投资。如果说基础设施投资是硬投资的话，那福利投资就是软投资，这种软投资的作用也很大。我们可以从不同项目来看：比如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可以造就一大批高素质人才，这是经济起飞的基础，比如大学免费就可以很好地达到这样的效果。还是拿印度做比较，在印度，一半的人是文盲，这样的国家经济怎么可能会起飞。

比如让人人有保障，人民都能安居乐业，就没有人从事非法活动来维持生活。北欧的刑罚是最轻的，可以省去很大的维稳成本；而在美国大约四分之一的年轻人都有过犯罪的经历，从事各种非法活动的就更多，这都是很大的社会成本；中国的维稳成本也很高，比如犯罪活动的侦破，案件的审理，高昂的律师费用，这都是社会成本。而在高福利国家，这些费用都是可以省去的。北欧国家的法律也非常细密，执行也非常严格，之所以很少人犯法，就是因为在高保障下，人民都能安居乐业，而像日本那样很多老年人通过犯罪实现“监狱养老”更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比如在失业方面的福利，可以让人更快地找到工作，或是虽然慢一点，但

是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现代社会工作不难找，但是找到合适的工作却非常难。因为现代社会分工极其细致，可选择空间非常小，职场人都是专业人，因此一旦失业，如果再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需要更长的时间。找到合适的工作才能为社会创造效益，如果大学生都去卖猪肉，或是集体去开网店，这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如果他有充足的失业金，就可以用稍微长一点的时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另外有些行业确实饱和了，或是被淘汰了，那这些人就必须转行，失业的人生活都比较窘迫，如果让他们自己掏腰包进行培训，很多人是出不起这笔费用的，如果政府组织培训，那就很容易帮失业者开辟自己的新职业，不然这些人很容易沦为纯粹的体力劳动者。

再比如，政府有医疗方面的福利，就可以让生病的人更快地恢复健康，更快地恢复工作，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福利，那很可能就是小病拖成大病，最后拖垮一个家庭。

总之，高素质的劳动力，健康的生活，能发挥个人才干的职业，较低的犯罪率，都是这个社会繁荣昌盛的基础。而这些只有福利社会才可以做到，因为只有福利社会才对这些项目进行了投资，因此也只有福利社才会得到最高的回报，因此福利国家才出现了最低失业率、人民最幸福的生活。

福利是投资，而不是消费，不是政府负担。

意义就是长远的利益，世界之所以需要战略家，就是要看到表象背后的东西，我们只有发现了长远的意义，才能不急功近利，才能少做利近害远的事情，整个社会才能良性发展。低福利、低人权并非经济发展之福，而是经济进步的障碍。

福利是一种公共产品。

现代社会的产物分为两种，一种是私人物品，一种是公共物品。私人物品

由私营企业进行提供，而公共物品必须由政府进行提供。在古代，公共物品很少，最突出的就是“治水”，其实就是国防和治安。而到了现代社会，公共产品则越来越多。如国防、公安、司法、公共交通、供水、排水、供气、电信网络、义务教育、公共福利等都是公共产品。

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民众所享受的公共产品呈上升趋势，维持生活更多是依靠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在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处处都离不开公共产品。没有公共道路就不能行走，没有公共网络就不能进行通信，人类越来越生活在公共生活中。公共产品如果由私人提供，效率会更低，而且会造成不公平，所以公共产品一般都由政府进行经营。

福利社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根据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一个国家要实现发达，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只要实行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其人均GDP达到1万多美元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阶段是自主创新和产业自立，一个国家如果实现了自主创新和产业自立，其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是没有问题的；第三个阶段是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建立，一个国家如果要达到人均GDP 4万美元，没有社会保障建设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从需求的角度对此进行解释：工业化和城市化是通过挖掘农村的消费潜力实现经济增长，而自主创新和产业自立则是通过挖掘产业链的附加价值实现经济增长，而建设社会福利，则是通过提升中低收入人群和老年人的消费来实现经济增长。

目前，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三个阶段，日本、韩国正处于第二个阶段，中国和拉美等国家正处于第一个阶段。拉美国家之所以陷入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就是因为缺乏自主创新和产业自立，而韩国拥有着很多世界级的大企业，但是其人均GDP也只在2万美元上下晃悠，关键就是没能适时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因此他们的人均GDP很难进入4万美元的发达国家普遍水平。而福利制

度最健全的北欧国家是经济发展最好的，所以他们的人均GDP一般在5万～10万美元。

### 三、为什么有福利的国家不会腐败？

根据笔者研究，只有城市化和福利社会才能根治腐败。腐败是发展的问题，只能用更快的发展才能解决，而不是让发展停滞，发展本身就可以抑制腐败。

政府基层人员的腐败只能通过城市化解决，而高层的腐败只能通过社会福利解决。基层腐败的土壤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不存在了，基层腐败自然也就消失了，城市化之后，大家都互相不认识，贿赂和受贿难度都增加。而高级官员的腐败只能靠福利社会解决，也就是笔者曾经提出的一个观点“有福利的国家不会腐败”。

腐败严重的都是非福利国家，在英国、美国这些福利不高的国家腐败也经常有，而到了北欧、新加坡这些高福利国家，腐败早已难觅踪迹。

而做样本研究，确实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与这个国家的福利程度成反比，福利越高，腐败越低，福利越低，腐败越高。北欧、新加坡是高福利国家，腐败几乎绝迹；德法是中等福利国家，腐败极少；英美日是低福利国家，腐败也有，但不多。韩国排斥福利，腐败一般严重，而印度，福利非常落后，腐败就非常严重。总之，腐败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关系不大，只与一个指标挂钩，那就是福利程度。

福利建设最大的作用就是“改善人的道德”，贪污是犯罪，是巨大的冒险，谁都知道。“一个人冒险是为了巨大的收益”，但很少有人进一步追问，“他要那么大的收益做什么？”根本上还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如果一个人有了安

全感，就不会再那么冒险。因为这些冒险都是有代价的。福利社会就是为整个社会营造了一种安全感，让整个社会不再那么急功近利。

分权、限权、严刑峻法，都不是根治之策。中国对贪污的法律也不可谓不重，但仍然腐败严重，归根结底就在于官员缺乏安全感。众多调查表明，官员是幸福感最差的阶层，而且官员的工资也很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社会上可以收入三千多元，如果是公务员很可能只有两千元，副部长的工资都不到一万元，在这样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社会，这些人怎么可能不腐败。

腐败是冒着失去自由的风险去犯罪，治理腐败重要的是“断贪念”，如果没有贪念了，给他多大的权利都没问题。而构建福利社会，就是让整个社会都充满安全感，让官员凭自己的工资就可以过上非常不错的生活，就可以充分享受生活的快乐，那他为什么还要去冒失去自由的风险呢！福利社会的官员根本就不想腐败，所以腐败自然就没有了。

民主国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福利的民主国家，一种是没有福利的民主国家，我们所期待的“政治红利”完全是“有福利的民主国家”才有，比如印度、菲律宾这些国家虽然也是民主国家，但却是公认的腐败透顶的国家。而这些所谓的“民主政治红利”其实根本不是由民主带来的，完全是由“福利社会”带来的。

同样的国家在不同阶段也有所不同，比如欧美所谓民主国家，在早期也是非常腐败的，比现在的中国要腐败得多。那个时候也没有“民主国家”这个词，“民主国家”这个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广泛流行起来的，当时的政治学者将这种多党政治称为“政党分赃制”，或是翻译为“政党分肥制”，这就是西方的政治学者给他们的制度下的定义，而且非常准确。当时的西方多党政治最核心的就是“分赃”，腐败几乎接近于掠夺，每次政党更替都是政党分赃的过程，现在美国总统可以分配的职位仍然高达六七千个，其中驻外大使等都

是经常用于分赃的肥缺。

而西方国家由高度腐败逐渐好转也是与它们的福利社会建设同步的，特别是战后的福利国家建设，让这些国家的政治腐败得到了极大的抑制。同一种制度，在不同国家或是同一国家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其实这些表现跟这种制度根本就无关。西方国家腐败的降低，根本不是分权、限权在起作用，而是福利建设在起作用。

福利的根本作用是改善道德，是积聚社会正能量的根本基础，除此之外，任何宣传、教育、惩罚都治标不治本。中国的改革学者强调腐败，但又反对福利社会，而他们主张的模式只能造成更大的腐败，这也就中国越改革越腐败的道理，可惜这些人还没看清楚，还用改革不彻底搪塞，如果改革彻底了，那只能是彻底腐败了。中国某些学者主张的改革目标接近于印度模式，印度、菲律宾这些国家根治腐败了吗？显然没有，而且是全民腐败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只有民主，而没有福利。

中国的改革学者强调腐败，但又反对福利社会，而他们主张的模式只能造成更大的腐败。可惜这些人还没看清楚，还用改革不彻底搪塞，如果改革彻底了，那只能是彻底腐败了。他们的改革目标接近于印度模式，印度根治腐败了吗？没有！印度不仅没有根治腐败，反而是个彻底腐败的国家。

#### 四、福利社会的本质是什么？

由于目前中国对福利社会尚缺乏科学的分析，所以关于福利社会的“误解”得以广泛流传。但是，构建全面的社会保障型社会已是大势所趋，消除对社会福利的各种误解则是实现美好蓝图的前提。

福利社会的本质不是富人养穷人，也不是公民让国家养着，而仍然是自己



养自己。在福利社会，国家的作用只不过是公民能够更好地养自己做出了一个科学系统的规划而已。那些用“富人养穷人”、“让国家养着”等理由来反对福利社会的人的说辞是站不住脚的。

流传最广的一个误解就是“福利社会是富人养穷人”，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福利社会仍然是自己养自己，而不是富人养穷人。

比如福利社会中金额最大的养老金福利。在福利社会，任何人的养老金都来自于自己缴纳的养老保险或是社保税，不缴就没有，多缴多得，少缴少得。只有失业者才可以不交，只要参加工作就没有不交的可能，因此养老金就是养老保险或是社保税的返还，不是吃富人。其他的福利保障机制莫不如此。这也是福利与慈善的区别。很多“仇穷”的无良学者刻意强调富人在社会福利建设中的损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另外一个流传颇广的误解是“福利社会养懒人，可以不劳动就白吃白喝”，这更是谬传。目前没有任何一个福利国家做到了这点，“白吃白喝”也许只能在共产主义社会才存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大锅饭时代都没有做到，更不要说从本质上属于市场经济的福利社会了。

很多盲目替富人说话的学者总是强调，任何人都应该负起责任，而不是靠国家养着，而他们根本没搞懂的就是，福利社会的本质不是所谓的国家养着，国家的作用只是为公民能够更好地养自己做出了一个科学系统的规划而已。其实，任何福利国家的社保费用都是单独收取、单独使用的，是受财政监管但独立于财政的，这些钱虽是税收的性质，但从使用方式上与税收不同。

福利国家的传统定义是政府创办并资助社会公共事业，实行和完善一套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以保证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正常运行。但这个定义对福利分配的内涵界定并不清楚，使得福利社会从字面上看有“免费享受”的意思，而实际不是这样的。福利社会这套非常科学、完善的体系，其本质是国家主导

的个人财富使用体系，这种分配更多是根据民众不同年龄段的收入不同进行分配，而不是在贫富之间进行分配。当然福利社会也有一些极端情况，比如有人不上班，只靠在家生孩子领取补贴，或是靠装病领补贴，这是极少见的情况，可以少到忽略不计，这些特例不说明什么，也根本不会对社会造成负担，而且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福利国家的移民中，其自己国家的公民中比较少见。

总之，构建全面的社会保障型社会是大势所趋，而消除对社会福利的种种误解则是实现这一切的前提。

改革之初，中国政府曾有“先富带后富”的设想，近期的十八大也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表述，而在笔者看来，其实只要消灭了贫穷，即是实现了富裕，当前的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绝对贫穷早已不存在，而通过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让民众不因社会风险陷入相对贫困则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任务。这几年来中国政府也似乎逐渐看透并认准了这一点，这也许就是中国大跨步进行社保建设的根由，也是敢于宣布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气所在，而这样做也确实是正确的。在进行这一系列建设的同时，也希望全社会，特别是知识界，消除对福利社会的误解，以减少不必要的争论。

## 五、关于福利社会的七大谎言

反对福利社会的论调都是一些禁不住推敲的谎言，这些谎言看起来很符合“常识”，所以很能迷惑人。

现在中国学术界反福利的论调很多，笔者在这里再进行一下汇总剖析。

### 谎言一、福利社会只产生于富裕国家

有人说“福利国家只产生于富裕国家”，或是说“福利社会是国家富裕的

结果”，这种说法完全违背历史。我们只要了解下德国和北欧的崛起就可以知道，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往往都是在最落后的国家诞生，而且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都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比如德国是世界上最早通过立法建立全面社会保障的国家，而当时的德国正处于铁血宰相俾斯麦统治时期，还处于半封建社会，德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世界上最先建立起了社会保障制度，从而迅速崛起。

另外，北欧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全面社会福利的地区，至今也是世界上社会福利和经济表现最好的地区。但北欧建立全面社会福利的时候，几乎处于欧洲最穷的状态，城市化才刚刚开始，北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率先建立了世界上最全面、最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且很快就赶上并超越了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促进了北欧的崛起。

德国和北欧，作为世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发源地，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几乎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这两大经济地区都是靠率先建立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而实现国家崛起和人民幸福的。

德国和北欧的案例就足以说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不是国家崛起的障碍，而是动力。所谓国家还不富裕，不能建立福利国家的论调纯属借口，现在的中国，比俾斯麦统治时期的德国、比21世纪30年代的北欧要富裕得多。

新加坡的社会保障比较完善，因此新加坡的经济表现很好，而且已经跻身世界前列。2011年新加坡人均GDP 50123美元，已经与北欧国家不相上下了。

我们再看看韩国，韩国尽管拥有众多让人羡慕不已的世界一流企业，但其人均GDP却极其不相称，韩国的人均GDP在2007年才首次突破2万美元，此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国人均GDP在2008年下跌至1.9195万美元，2009年受汇率影响进一步下跌至1.7071万美元。这几年一直在两万美元上下晃悠。

其实我们如果去除发展早晚以及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其实是与这个国家的福利水平成正比的。也就是福利水平越高，经济水平就越高；反之，福利水平越差，经济也就越差。而且越早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崛起越快，福利制度建立晚了，反而会阻碍国家的崛起。

### 谎言二、福利社会会造成低效率？

这种论调也不成立，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率是否高，可以用这个国家的国民创造财富的能力来衡量，而人均GDP是一个公认的指标，如果一个国家效率很低，是不可能创造出最高的国民生产总值的。而现在世界上，北欧、德国这些高福利国家，经济发展都非常好，人均创造财富的能力都非常高，而且其经济竞争力远强于那些低福利国家。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角度进行分析，如果说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好不好，取决于效率的话，那决定效率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其实是需求，如果没有需求，那就完不成“生产—消费”的循环，经济整体效率就不会高。而福利国家之所以能够在世界竞争中胜出，关键就是福利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内需求，因此它们的经济发展也非常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富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可以是穷人的几百倍、几千倍，甚至是几万倍，但是他们消耗财富的能力并没有成比例扩大。其实这一点在生活中就可以得到验证，比如那些靠艰难创业走向成功的“富一代”们，他们的消费能力有的还不如一个中产阶级，而这种创造财富和消费财富能力之间的不均衡，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需求不足。

其实，由于财富占有不均等所引起的需求不足问题，早就进入了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视野，对此世界各国也采取了很多办法，比如面对需求不足，美国就曾试验过军事凯恩斯主义和信贷消费等多种方法，但都效果不佳，军事凯恩斯

主义最终导致了经济滞胀，而两次信贷消费，分别造成了20世纪和本次的经济大萧条。

而我们中国所实行的投资凯恩斯主义虽然在短期内是成功的，但从长期看，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当基础设施完善之后，可投资的领域就会减少。因此中国像北欧和德国那样，靠加强社会福利来提高需求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美国是种族矛盾根深蒂固的国家，黑人普遍贫穷、富豪大多是白人，因此美国不可能搞社会福利，而我们国家大部分都是汉族，而且对少数民族没有歧视情节，因此并没有障碍，我们只要破除了思想障碍，实行起来是很容易的。

### 谎言三、福利国家失败论

现在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说是福利国家失败了。世界上确实有很多经济败局，比如拉美经济败局、日本经济败局、俄罗斯经济败局、美国经济败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但这些经济败局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发生在非福利国家，或是“去福利化”国家。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欧猪五国”也不是高福利国家，很多人炒作希腊是福利国家，其实希腊的福利支出在欧盟算低的。

现在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不仅仅高福利国家没有失败，而且德国和北欧这些高福利国家都有着明星般的经济表现，相反，美国、日本这些低福利国家出了问题。

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之后，能否转型到福利社会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再上升一个台阶的关键。如果不能实现福利化，那就只能停留在中等收入国家，而不能成为高等收入国家。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后，国家就面临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的问题，而只有实现福利化，才能扩大内需，提高经济增长，这也是福利国家人均GDP都比较高的原因。

总之，北欧、德国这些高福利国家都胜利了，而美国、日本、南欧等低福利国家都失败了。很多学者散布福利国家失败的谬论，其实只是试图阻止自己的国家向福利国家靠拢，但这不但拯救不了经济，反而只能让经济更加失败。

#### 谎言四、福利社会会让民众失去自由

福利不仅不会让民众失去自由，反而能让民众获得比非福利社会更多的自由。

哈耶克曾经用“失去自由和通奴役之路”来恐吓那些希望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政府，但是实践已经证明，哈耶克的预言完全是错误的，北欧福利国家的人民和企业并没有被奴役，反而通过大政府获得了更多的幸福和自由。

一个人是否具有自由，关键取决于拥有财富的多少，不自由往往与财富的缺乏相伴，退休金、社会福利，都是自己财富的一部分。福利国家最终享受到的个人财富要远远高于非福利国家，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福利国家的人民不可能不自由，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空余时间从事自己所喜欢的事情。

其实即使是美国那些最保守的右翼基金会都将北欧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福利国家与自由不能同时并存早已被证实是谎言。自由其实可以用两个标准来衡量，那就是看个人拥有多少可供支配的财富和拥有多少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

公共福利是财富，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财富，而民众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公共服务，就必须是大政府，其实大政府本身并没有问题，政府的问题主要是出在官员上，而官员本身也是小政府的受害者，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缺乏的情况下，官员必然拼命贪污受贿，这点在美国和英国也不例外。如果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都非常完善，官员们何必去冒险贪污呢，比如在新加坡和北欧，官员贪污都是很难听到的事情，因为那里的官员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 谎言五、福利社会会让国家负债

有人认为福利国家会让政府欠债，但现实是低福利国家反而欠了很多债，而高福利国家几乎没有欠债，这足以说明，一个国家是否负债，与这个国家的福利程度没有什么关系。美国、日本不是高福利国家，但是政府欠了很多债，而北欧、德国的福利程度相当高，却没有什么债务，国家欠债从根本上只与政党制度有关，政党越多，欠债越多。

一个国家的欠债只与政党数量相关，而与福利水平无关。这是因为高福利必须以高税收为前提，而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为了拉选票，肆意减税，加上不遵守财政纪律，这才导致了入不敷出的情况。

西方国家一般分为一党独大制、两党制、温和多党制和极端多党制四种，北欧国家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一党独大制，英、美是两党制，德、法是温和多党制，凡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在政治上都是极端多党制国家，国家党派越多，财政纪律越差。一个国家是否欠债，不在于这个国家的福利有多高，而在于这个国家是否遵守财政纪律，高福利就要对应高税收，想高福利，但不想高税收，还不想欠债，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对于一个多党制国家，他们根本没有动力来遵守财经纪律，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欠的债不需要自己还，而是可以轻松地留给自己的下任，除非实在是拖不过去了。而现在被迫削减支出的国家，就是这种“财政赤字大到再也拖不下去”的国家。债务危机的出现，问题并不出现在福利制度上，其失败的根源还在于政治制度。

### 谎言六、高福利会养懒汉，使人们产生对社会保障的依赖

有人认为福利会养懒汉，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即使在福利国家，也不是不劳而获的，也是不工作就没有收入。福利国家都有失业补贴，但这也是很小

的一笔钱，如果正常人要靠失业补贴生活，也是非常艰难的，依赖福利的人大多是失业者和低收入者，他们本身就无法养活家人。

如果能让这一部分人不依赖社会福利，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提高他们的工资，或者是帮助他们找到有足够收入的工作。而那些反对依赖福利的人往往是支持拉大工资差距的人。他们更多地强调竞争，更愿意减少最低工资水平而不是提高。其实正是这些人在制造更多的不得不依赖社会保障的人。福利国家正是通过再分配来确保给这些人提供重新参加工作的条件和机会。

其实“竞争”一直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的本质之一，而且这一理念也被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所推崇。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市场经济的本质不是竞争，而是合作，竞争只是现象，合作才是本质。而这种合作包含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合作，穷人和富人的合作等。这些合作都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处理好了这些合作关系，整个社会才会走向和谐。

### 谎言七、可以用富人慈善取代社会福利

指望富有群体救助穷人，现实根本不能成立，其实只要看看欧美国民福利消耗的税收比例，就知道这种资金缺口，不可能依靠慈善填平，发达国家福利开支一般占到财政收入的30%以上，富人捐款根本没这么多。况且即使在美国整个慈善捐款的70%也是中产阶级贡献的，慈善捐款的主力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富豪，其实富豪更吝啬。

美国富豪捐款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税。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主要征收企业所得税，很多富豪为了免税，不得不进行假捐款。而欧洲富豪并不热衷捐款，这也是税制原因，欧洲主要实行增值税制度，这种制度下捐款很难免税，所以欧洲富豪不捐款。而美国富豪捐款，其实也只是将自己的资产转移到自己控制的基金会，只不过是“左手转右手”而已，而不是真正的捐给社会，他们是不会为了免那点税收，真正将自己的资产捐出去的。



## 六、现有的福利社会存在哪些缺陷？

笔者虽然对福利社会不吝赞美之词，但福利社会好得还不够，现在的福利社会还太虚，不够实在，现在的福利项目还有弊端，仍需要改正。

现在即使是福利社会，其实很多所谓的福利项目，严格来说，只能算是社会保障，而不是福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是不一样的，社会保障更多是直接源于自己的缴费，而且多缴多得，只是国家进行了小部分的平均，而福利是免费获得的。目前的福利社会模式也存在不少的问题。

### 一、高税收，直接抬高了商品价格，提高了民众的生存成本

税收，无论是商品税，或是收入税，其实都差不多，商品税抬高了商品的价格，而收入税降低了民众的收入。无论是商品价格被抬高，还是民众收入被减少，都会导致一个最终的结果，那就是“被削弱的民众购买力”。而福利社会又是建立在税收基础上的，因此福利社会的高税收从本质上是削弱民众购买力的，也就是说高福利、高税收，不仅没有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反而提高了民众的生存成本。

现在很多人，总是说中国商品含税高，其实单独拿商品含税进行比较，也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只看商品含税，也要看收入税，其实如果中国减免了商品税，而改成了收入税，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如果从构建低生存成本社会的角度，笔者肯定是希望商品的价格越低越好，但我们不能总是从理想的角度看问题，因为税收还存在征收的问题，因为富人逃税太容易了，美国巴菲特的纳税额还不如他的秘书。收入税的征收难度和复杂度要远远高于商品税，商品税直接面向企业，而收入税要面向个人，面向个人，就需要更多的征收人员和监督人员，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本，但是富人最终都是要消费商品的，因此商品税更公平，谁也逃不掉。

## 二、看似名目繁多，其实普通人能享受到的很少

福利国家的福利项目，看似名目繁多，其实是很少的。首先很多项目属于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不仅仅是福利国家有，中国也有，只要去掉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项目，纯粹的社会福利项目并不多。比如中国目前所实行的福利制度，如果罗列在纸上，那也需要好几张纸，但这些中国人根本感觉不到，也享受不到。比如中国有低保，但是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享受不到，也感觉不到，比如中国有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而且这些项目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不少的，但大多数人也是享受不到的。另外中国现在面向农村的各种福利补贴已经非常多了，但是面向城市职工的则严重不足。

很多社会福利名目中，绝大多数都是针对特殊人群的，比如伤残人士、失业人士、收入极低者、鳏寡孤独人士、孕妇、特定年龄的儿童等。对于绝大多数身体健康、正常工作的人群，基本上是享受不到太多福利的，甚至是没有福利的。比如妇女有孕妇福利，但大部分女人的怀孕期只是很短一段时间。

只要以收入为标准采取的福利措施，基本上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是享受不到的，比如美国的食物券制度，即使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年份，也只有六分之一的人能享受到了这一措施。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比较，即使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再多，也没有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多，而且要少得多。中国很多人都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其实就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也没有那么幸福，这当然与物质贫乏也有关系。

## 三、小项目多，大项目少

福利国家的福利项目虽然很多，但都是多在小项目上，真正解决民众实质性难题的大项目上却极其吝啬。比如住房是大项目，但是几乎所有国家在住房上，都一致的吝啬，包含北欧国家。比如大学教育是大项目，但是真正做到大

学免费的国家几乎没有几个。

#### 四、只是保基本，并不能保障生活

福利社会几乎对生活并不起作用，免费教育，但是校服、吃饭等并不免费，住宿也不免费。大学生都已经接近成人，而且大学都要四年，这四年的生活费就是很大的数目，而且生活费并不比学费的数目低，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大学生的生活费用发放全部补贴的，这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有过，大学生一入学，就有生活费，上大学基本不用家里负担一分钱，但是改革开放后，这些措施早就取消了。

医疗也是这样，医疗费在很多国家是有保障的，但是医疗期间的误工费、照料费、营养费也都是很大的开支。

另外很多现在各国的所谓福利，也主要是局限于孕妇和儿童，比如发放孕妇补贴，免费为孕妇进行检查，为婴儿发奶粉钱或是提供婴儿车，其实这并非出于“善”或是“维护人权”的角度，更多是为了经济利益。因为现代发达国家，民众生存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养不起小孩，他们采取这些措施，不过是为了鼓励生育，提高人口而已，并非出于多么高尚的人道目的。

我们的生活可以分为衣、食、住、行、教五大方面，其实只是从教育方面，我们能享受到少量的国家福利，而教育又是这几大方面花钱最少的，花钱最大的方面还是前面的“衣食住行”几大方面，而在这几大方面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普享型的政策。而民众的生存压力主要来源于“衣食住行”，而要减轻民众的生存压力就必须从“衣食住行”入手。而这只有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才能做到。

笔者提出了“新福利社会”的思想，“新福利社会”是超越现在的福利社会的，新福利社会的基础不是福利社会学，不仅新福利社会不是基于福利经济

学，而且任何国家的福利建设从来就没有基于福利经济学过。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是最不成熟的两个学科，福利经济学几乎没有对福利国家建设做出什么贡献，发展经济学也没有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做出什么贡献。这两个学科都是没有走出实验室的学问。

新福利社会理论的基础是生存经济学，也就是笔者经常提到的低生存成本社会。低生存成本社会主张从降低民众生存成本的角度来改善民众的福利，是一种着眼于在不同消费方式之间进行平衡的分配方案。比如笔者将消费分为生存性消费、享受性消费和奢侈性消费三种，政府应该通过税收等手段提高奢侈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的成本，从而降低生存性消费的成本。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并不要求在不同人群之间进行财富分配，这样也就避免了福利经济学研究所经常遭遇的伦理困境，笔者这一理论也日益得到有识之士的认可。

传统福利社会主要是从“生老病教”等大的方面进行保障，而以“生存经济学”为核心的新福利社会则是从“衣食住行”等细微方面进行民生的保障。

## 第八章

# 世界模式 4.0：社会投资型国家

### 一、什么是社会投资型国家

以“社会投资型”国家为核心的第三条道路，是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一种社会建设模式，但是总体效果不佳。

撒切尔-里根新保守主义后，欧美纷纷走上了“第三条道路”，这主要是指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的“社会投资型国家”。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德国总理施罗德都是第三条道路的拥护者和实践者。

第三条道路的开创者吉登斯是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院长，是最有知名度的西方学者之一。他所建构的社会理论不仅在当代社会学界中占据重要一席，而且还影响着社会学以外的诸多学科，“社会投资型国家”就是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重要内容。他指出为推行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我们应该树立“社会投资国家”这一理念，逐步洗出对“福利国家”的依赖。吉登斯认为福利国家的危机是风险管理危机，而非简单的财政危机。

吉登斯认为，传统的社会福利，是从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视角出发，通过再分配来实现缩小贫富差距，从而促进社会平等，这是一种在社会公正旗号下的平均主义。而吉登斯认为：“对福利国家的压力只有一部分是来自经费方面，但主要的问题在于福利国家在原则上是不民主的。”因为福利国家是从上到下分配财富的，它强调的是一种结果平等。尽管它保护了一部分人的利益。

在社会投资型国家中，就是要变结果平等为机会平等，这种机会平等不是“狭隘的机会观念，而是致力于一切的机会平等，即满足不同群体对机会的不同需求。”

首先，失业者服务方面。吉登斯认为，社会投资型国家尽量不提供直接的经济救助，而是将社会财富直接投资于人力资本上，即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对失业者社会福利制度不能仅限于为其提供失业救济金，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重新就业的机会，具体说就是让失业者积极参加培训，掌握新知识、新技能，提高自身就业能力，为重新就业或积极创业打下坚实基础，置于民众身上，就是要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通过教育提高知识和技能水平，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这不仅是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竞争力强的人才的要求，且有利于消除因知识贫富催生的新的不平等，同时对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的转变也是有利的，是提高国家竞争力和整体人民素质的一种战略性选择。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也认为“在现代社会，生存的关键在于获得知识和信息。否则，任何个人、企业、整个民族都无法繁荣兴旺。”

其次，老年人服务方面。吉登斯指出，我们应该改变观念，倡导改革养老保障制度，主张废除固定的退休年龄制度，视老年人为社会财富而不是只享受福利的负担，从他们的实际心理需求出发，给予社会尊重，并鼓励他们适应社会潮流，学习乐观和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满足他们想继续工作的心理诉求，不能工作的也可继续为社会服务，如从事抚育幼儿、植树造林等社会公益事

业。再次，在解决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上，吉登斯认为应该发挥老年人自己的力量和潜能，做到以老养老。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寿命的延长和出生率的下降，全球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成为困扰世界各国发展的重要问题。

吉登斯认为人口的老龄问题也是一种新的风险，他说，“养老金的领取者实际上专门指的是依赖性的人。福利国家规定退休年龄有可能会造成政府以法定的形式主动地产生出一批家庭和社会的负担，而这些人事实上是政府所不愿面对的；也有可能使得一些身体状况良好的老年人被迫放弃了工作的机会，使他们还想继续参加工作的愿望受到了限制，或者使那些身体早已出现问题的老年人只能等到退休年龄之后才能够退休。”

政府所要做的是“必须创造老年人的才华和技术有用武之地的条件”，解除目前有些国家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问题。首先要取消按年龄强制退休的规定，其次，老年人应有法定的劳动权利，社会应该尊重老年人继续参加工作的意愿，并为他们创造和提供便利的条件，使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纳入到整个社会的劳动力总规划中，而不是把他们排除在外。也就是说，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老年人确实是自己能够养活自己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

### 社会投资型国家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就开始摸索“第三条道路”，为了取代“福利国家”这个概念，吉登斯提出了“社会投资型国家”。第三条道路的理论由西方社会学权威吉登斯提出，其基础是风险社会理论，他们认为现代社会风险在增加，这是导致福利保障不堪重负的原因，因此主张在保持现有福利不变的情况下，加强教育培训、老年就业等以增加人类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就大受欢迎，得到了英国首相布莱尔、德国总理施罗德、美国总统

克林顿等人的追捧，一时间成为了新的世界模式。但实践结果表明，这一理论虽然正确，但在现实中可操作空间非常小，教育和培训、老年人再就业等对改善社会状况的影响并不大，第三条道路的效果并不理想，确切地说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社会投资型国家不仅关心人的经济福利，而且更注重“人力资本”投资。而他的这些观念都是建立在风险社会思想上的，风险社会的风险主要包含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产生的风险以及人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传统的福利政策对外部风险采取事后风险分配制，而积极的福利政策对人为风险采取“事先预防”的方法，即在风险出现或可能出现时，采取防范措施。

吉登斯认为取消管制不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有效措施，福利支出应当维持在欧洲的水准上而不是向美国看齐，但是，应当把这些支出主要引向人力资源的投资上。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吉登斯认为因为人人都面临着不确定性的风险威胁，因此贫困是世界性的问题，而不是某个地区或某个国家的问题。要解决贫困问题，应当注重和加强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协作。

总的来说，吉登斯的福利主张，是在分析和概括左右两派的社会福利分歧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介于左右两派的中间主张，即所谓“第三条道路”。这种道路，其实也是有理念的，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折中。

这也正如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一书中所写道的：世界的变化使传统的阶级政治分析已经过时，面对新挑战，只有超越“左右对立”，兼顾“发展与正义”，均衡“权利与义务”的第三条道路，才能适应新的时代。

美国总统克林顿指出，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介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的中间道路”。经济管理既不是左翼的问题，也不是右翼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国家如何发展。



布莱尔指出,任何一个正直的政府总得设法以公正来缓和市场的影响,确保在全球经济条件下有利于人民。政府的作用是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制定能鼓励独立而不依赖别人的经济社会政策。

德国总理施罗德在为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一书的德文版作序中写道,好的选择应是一种“鼓励个人的创造性和潜力,而不只是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做文章”的社会政策,福利政策应当不再是消极的,而应当是积极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目标不应当是预防风险,而应当是利用机会。

吉登斯主张将经济增长放在首要位置,用经济增长的方式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只有这样,所有公民才都能够享受到社会福利的帮助,另外,吉登斯认为社会保障领域有着广泛的普遍性原则,他认为只有造福于多数人的福利制度才能产生出一种公民的共同道德。如果社会福利的改革只有一种消极的内涵,即主要面向穷人,那么它就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化。

传统的福利国家强调的是公民享有福利是一种政治权利,“政府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最低所得、营养、健康、住房、教育水平,对于国民来说,这是一种政治权利而非慈善。”

吉登斯认为,当个人物质需求达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能使他们感受到幸福感的是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而在一定时期内收入的提高并不会让他们获得更大的幸福。一个真正关心国民幸福的政府应为其国民的自我实现创造便利的条件。传统的福利政策措施是对外部风险采取的一种事后风险的重新再分配,而积极的福利政策对人为风险采取的是“事先预防”的方法,即在风险出现或可能出现时,社会和个人就采取防范的措施,而这种福利政策的实施通常要求国家的干预,甚至是国际或全球范围的合作。这里必须提到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理论是吉登斯提出社会投资型国家理念的基础,吉登斯打算用提高社会投资,来抵抗社会风险。

## 二、社会投资型国家的理论基础：风险社会理论

“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我饿！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害怕！”这是社会学家吉登斯对风险社会的一种通俗表达。

“风险社会”是社会学界对后工业时代人类社会的定性，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开门见山地指出，当今人类社会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由此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理论。其实，贝克的《风险社会》一书于1956年就在德国出版了，但反应平淡。直到1992年该书被译成英文后，“风险社会”理论才被更多的西方学者接受。以后贝克、吉登斯等人都是这一理论的构建者。特别是吉登斯的著作在推广这个理论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吉登斯则是继凯恩斯之后对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学者。贝克、吉登斯两人的论述具有高度的互补性。贝克更强调技术性风险，而吉登斯侧重于制度性风险。

吉登斯认为，“在中世纪，没有任何真正的风险概念。”风险原本是资本主义早期商贸航行的一个术语，意指遇上危险或触礁。风险概念起源于现代社会的早期，风险与危险的差别在于，风险取决于人的决断，而危险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危险能够控制，也能够保险；而风险是不确定的，我们无法估计。在近大之后，风险的结构和特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因此也出现了“风险社会”的雏形。

在工业化前两百年里，外部风险占主导地位，后工业时代，人为风险逐渐发展成为主导。人为风险是现代制度成熟的结果，其发生以及影响更加无法预测，后果更可能是全球性的。此时，科学已造成新的不确定性，对这些捉摸不定的因素，我们无法用以往的经验来消除。

现代风险其实很多是由制度引起的，与市场有关的诸多制度，典型的是股

票市场，为冒险行为提供了激励，而现代国家则为人类的安全提供了保护。无论是鼓励冒险还是提供安全的制度，其自身带来了另外一种风险，即运转失灵的风险，从而使风险的“制度化”转变成“制度化”风险。

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的差异，首先是由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来区分的。在“人造风险”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会出现风险管理危机，生活在高度现代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

“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其根本目的是要以此为依据来批判和改造“现代性”，因此我们没必要对风险社会过于悲观，因为这些新的风险具有政治反思性，能够对制度变革产生推动作用。

其实这次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就是“风险社会危机”，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本是债务危机，包含早期的美国次贷危机和后期的欧洲债务危机，都是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的出现，本质上是信息革命导致的借贷便利化，如果没有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信息革命，民众或国家的信贷都不可能这么便利，也就是没有计算机的发明，人们不可能进行如此复杂的债务交易。所以这也是新科技给社会带来的风险，这是一种社会学的解释方式，社会学只能解释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得需要经济学。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福利国家的危机是风险管理危机，并非简单的财政危机。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工业社会里，人们所面临的风险都是一种可以预见的、呈现一定时间规律的风险，如人口生育与养老，这种风险都是外部风险，都能以社会保险的方法加以解决。而在后工业社会人们面临着一种更加难以预料的风险，不能用传统的方法加以解决，也即“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

### 三、社会投资型国家的效果

正是因为风险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福利社会都出现了深重的社会危机，这种危机是风险管理的危机，并不是简单的财政危机。布莱尔、施罗德、克林顿都是吉登斯的拥护者和实践者，而且在这几个人的任期内，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有不错的发展，但尽管如此，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还是危机重重，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

首先，西方政治没有连续性，经过撒切尔、里根等人的“去福利化”，英美等国家都已经不再属于福利社会。当年撒切尔、里根这些右翼势力可以借“滞胀”这样的危机大幅削减福利，而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等左翼势力显然没有那么好的时机。西方政治其实就是危机政治，只有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才能实现“大更大变”。在他们任期内，尽管社会福利水平有所提高，但是社会福利很难恢复到以前的水平，而等他们这些左派势力下台后，这些纲领就被束之高阁，没能彻底执行下去。比如克林顿下台后，小布什又走上了削减社会福利的老路子，布莱尔和布朗下台后，卡梅伦开始削减福利，等等。

其次，社会投资型国家理论缺乏实质性创新，更多的是理念创新。其实在没有这一理论之前，福利社会中的大部分福利本身就是社会投资，比如免费的大学教育、免费的就业培训都是社会投资，公立养老机构也是投资，这些领导人上台后，也并没有想出太多具有投资性质的新福利举措，因为以前人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另外，社会投资型国家理念，还主张去掉那些不符合投资理念的福利，这导致了去福利化，比如推迟退休就是去福利化。另外，吉登斯认为现代福利社会的危机不是财政危机的说法也不完全正确，随着社会越来越现代化，国家向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越来越多，现代公民越来越依靠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来生活，比如免费的教育、医疗、公共道路等，这些都给现代政府造成了非常大的财政负担。英、法、德等国家的政府财政收入基本上都占到GDP的

40%以上，北欧更是占到50%以上，负担不可谓不重。

高福利必然要求高税收，这都严重威胁到了富人的利益，因为这些人纳税的主体，所以高福利一直就遭到富人的反对。

最后，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社会投资型国家理念的基础理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这个理论是有一定正确性的。但是吉登斯提出的方案并不好，吉登斯主张加大社会投资，比如加强就业培训，比如鼓励老年人就业等，这些并非上策。

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是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失业人口增加，领取救济金的人增多，而这最终还是要通过缩短工时来得到根本解决。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工人的劳动时间一直都是不断缩短的趋势，将来工作时间还会更短，这是社会发展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如果生产效率提高了，工人还按原来的时间工作，必然造成一部分人失业，当前世界出现的“无就业型经济复苏”其实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第二，人口的年龄结构中，老年人的比例越来越高，同时人的寿命逐渐延长，领取养老金的时间也越来越长；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医疗费用增加，使人人都能享受的健康保障体制成本增大。这些都使福利国家在财政上走到了极限。其实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增加养老金缴纳比例来解决。老龄化不是猛虎，是有极限的，人类只要将现有的养老金缴纳标准提高几个点，对付老龄化一点问题都没有，老龄化的问题不宜过分夸大。

风险社会理论毕竟是社会学理论，但吉登斯提出的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经济问题，从具体上说是生存成本升高的问题。我们可以以大学教育为例，在德国、北欧等国家都实行免费的大学教育，而在战后很长时间内接受大学教育并非“必要的事情”，因此政府的负担不会很重，而现在接受大学教育几乎是

每个国民所必需的，因此随着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政府的教育成本肯定越来越高。在医疗领域也是如此，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新的药物越来越多，治病的成本越来越高，政府的医疗成本也在增加。

而医疗、教育、食品等的改善和提高，如果由个人来负担，那就是生存成本升高的问题，如果由政府来负担，那就是福利成本升高的问题，因此现代社会出现“福利超载”一点也不奇怪。国家债务危机的出现就是这种“福利超载”所致。因此只有建立低生存成本社会才有希望。

其实西方国家去福利化的问题早就凸显出来了，而根据笔者的分析是，风险社会的论断固然正确，但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他们以“风险”的角度来分析，仍然是对传统社会思路的延续，无论是德国率先建立社保制度，英国率先发展出福利社会，还是北欧将福利社会发展到极致，他们虽然没有利用“风险社会”的学术概念，但是其目的却是为了减小社会风险，因此“风险社会”概念只能是对前人的总结，对后人的启发意义并不大，仍然是以前道路的延续，而不是全新的模式。

第二，对“风险”本身的分析不对，现代社会确实是风险社会，但这种风险并不完全体现在工作和就业上，而在于“生活方式变贵”导致的“生存成本升高”的问题。人类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们所能享受到的产品越来越多，在这背后却是生活方式越来越贵，人类也越来越不堪重负，现代社会风险归根结底还是“生存风险”。“生存风险”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这是擅长社会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的提出者吉登斯等人所没能认识到的。

第三，解决方法也不对，没有分析问题，当然解决方法就效果不大。吉登斯主张的教育和培训、老年人再就业等都很对，但仅仅是提高了人类的抗风险能力，但并没有降低社会风险。吉登斯既然认为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那要想让人类生活幸福，就必须想方设法降低社会风险，这才是治本，而提高人类的抗风险能力，只是治标。

## 第九章

# 世界模式 5.0：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

### 一、低生存成本社会的诞生背景

#### 马尔萨斯陷阱

人类社会自其诞生以来，就始终面临一个困境：物质生活的贫乏和人类繁衍要求之间的矛盾。这就是简单意义上的马尔萨斯陷阱。解决机制在根本思路上是极其简单的。一共三种：降低人类的物质生活要求（宗教）；减少人类繁衍（战争、生育控制）；扩大对现有物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科技、制度、经济）。毫无疑问，只有第三种思路才是成熟社会的思路，正是经济学所解决的核心命题。

同样自从其诞生以来，人类社会都始终在利用上述各种思路、手段解决马尔萨斯困境。毫无疑问，从史前时代到公元纪年，物质生活贫乏的局面没有显著改善。事实上，在1800年以前，从全人类的平均水平来看，生活水准从来没有较大进步。各时代的宗教只是让底层的人们找到精神的寄托；而战争、瘟疫、生育控制都只是不断地被动维持人类社会的发展均衡。技术进步在不断发

生，但从来没有对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虽然统治阶级生活得繁花似锦，以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艺技术都不断地超越祖先达到的新的高度，但任何一个社会时期的大多数人民，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都生活在穷苦的环境中。如果考虑到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完全可以说1800年前各时期的底层人民还不如史前时代。期间中国表现略好，尽管她仅以非常微小的程度超越世界平均水平。

由于历史记载资料不详，以及各国各朝币值物价水平混乱，无法清晰地进行分析对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文明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是属于世界的遥遥领先者。中国的农业社会文明曾经在公元700年前后达到鼎盛，70%的人口已经不再有生存之忧，有唐诗云：“种桑百余树，种黍三十亩，衣食既有余，时时会亲友”（储光曦）。这正是大多数农户能达到的生活。而科技上的四大发明、织布机、水车、冶铁等手工业作坊已进入民间大众。再从唐至宋，中国开始从农业文明的成熟体系中孕育城市化和大规模手工业的萌芽，国内外贸易、手工业工场等资本主义文明已略显雏形。中国超越马尔萨斯陷阱的时刻，在《清明上河图》中呼之欲出。

所谓超越马尔萨斯陷阱，就是进入这样一个趋势：人口可以稳定增加；扩大的人口规模还可以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准。直觉上我们可以看出，这的确是个相互矛盾的困境。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是：人口数量和科学技术形成正反馈系统，即，人口越多科技越发达；科技越发达，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经过中西文明不断地对撞，欧洲终于在公元12世纪掌握了成熟的农业文明和在当时最先进的传播、交通技术，虽然造纸和造船在此时仍然是中国领先。又经过300年的发展，中国等着欧洲一起，进入了人类史上最为重要的15世纪末这个分水岭。15世纪末，亚欧大陆共同面临的问题仍然是：马尔萨斯陷阱。简言之，人多地少。



结果已经摆在眼前。欧洲，用了400年的时间崛起，终于在1800年前后，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进入了大发展阶段。自此之后的所有技术突破，和在此之前的技术突破相比，有了一个本质的特征，它不再造福于特定的阶级，而是造福于全人类；并且从中受益最多的不是统治阶级，而是底层的人民。1800年之后，欧洲的特权阶层逐渐从王权宝座上走下来；底层人民开始享受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对15世纪末到18世纪300年的发展，我们可以追溯出很多原因。例如，这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进程，而是科技、制度和经济三位一体、潜移默化进步300年之后的必然飞跃；例如，欧洲日耳曼民族天生的冒险精神使得葡萄牙王子和哥伦布翻开了史册上最为重要的一页。

但无论分析出多少理由，有一点是肯定的。海外的市场、资源、劳动力，是欧洲成就工业革命历史继而成为世界霸主的关键一环。这不仅仅是最后一根稻草或者是催化剂，甚至，海外资源和市场的存在和英国1215大宪章一样，是欧洲发展不可或缺的本质推动力。美洲贵金属的发掘，使得欧洲维持了亚欧贸易中岌岌可危的平衡；非洲黑奴的大贩卖，进一步缓解了欧洲的财政和贵金属困境；美洲经济的初步发展和亚洲的进一步沦陷，使得欧洲工业制成品在其发展之初从来不为市场发愁。

同样由于欧洲文明带有中华文明从来不带有的掠夺色彩，使得1800年分水岭在划分出世界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同时，也给今后的数百年历史带来了浓重的悲剧色彩。一幕幕大规模惨绝人寰的种族不平等事件不断上演，进而发展到席卷全球的两次世界大战。欧洲没有始终成为世界的霸主，或许正是因为其第一桶金带着诅咒。

欧美一方面在走出“马尔萨斯陷阱”，但“马尔萨斯陷阱”却也在失灵，物质财富在增加，人口却没有增长，而这既完全不是因为节育措施的发明，也不完全是家庭观念的改变，而是生存成本的提高。

## 二、人类的生存成本是如何提高的？

现代社会，人们的生存成本其实是随着现代化的住宅楼、高等教育、洗衣机、空调、电冰箱、计算机、手机等被垒高的，这些虽然给我们带来了便利，节省了我们的劳动，但这些却也要用我们另外的劳动成果——工资，来换取。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人类历史既是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是生存成本不断提高的历史。

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在这里看到的是商机，经济学家看到的是财富的创造，而社会学家或是制度经济学家则必须看到人类生存成本的变迁。

在古代，人们只需要解决吃和住的问题，但住的主要是土房子，问题也不大，其实真正成问题的就是食物，只要食物的问题解决了，生存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因此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生存一直都是直接与食物的多少挂钩。而现代社会显然比这复杂多了，除了吃足够的食物之外，人们还要住比较好的住房，还要受教育，还要有必要的娱乐如电视，还要有必要的的生活工具，如汽车、计算机、手机等，还要有必要的舒适条件，比如空调、电冰箱、洗衣机等，这些都构成了现代人生存成本的一部分。

在这里笔者用“生存成本”，而不是用“生活成本”，是因为这些从某种程度上是不可压缩的。生活质量是可以有弹性的，但生存是不可以压缩的。比如你可以用几千元的手机，也可以用几百元的手机，但是没有手机却是不行的；比如你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只接受义务教育，但是不接受教育是不行的。这些不仅是生活的问题，更是生存的问题，也是生活问题与生存问题的区别。

### 洗衣机的发展历史

洗衣机是较早进入家庭生活辅助类工具。洗衣机最开始是手动的，1858

年，一名叫汉密尔顿·史密斯的美国人在匹茨堡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洗衣机，该洗衣机的主件是一只圆桶，桶内装有一根带有桨状叶子的直轴，轴是通过摇动和它相连的曲柄转动的。同年，史密斯取得了这台洗衣机的专利权。但这台洗衣机使用费力，且损伤衣服，因而没被广泛使用，但这却标志着用机器洗衣的开端。

次年在德国出现了一种用捣衣杵作为搅拌器的洗衣机，当捣衣杵上下运动时，装有弹簧的木钉便连续作用于衣服。19世纪末期的洗衣机已发展到一只用手柄转动的八角形洗衣缸，洗衣时缸内放入热肥皂水，衣服洗净后，由轧液装置把衣服挤干。

1874年，美国人比尔·布莱克斯发明了木制手摇洗衣机。布莱克斯的洗衣机构造极为简单，是在木筒里装上6块叶片，用手柄和齿轮传动，使衣服在筒内翻转，从而达到“净衣”的目的。这套装置的问世，让那些为提高生活效率而冥思苦想的人士大受启发，洗衣机的改进过程开始大大加快。

1880年，美国又出现了蒸汽洗衣机，蒸汽动力开始取代人力。蒸汽洗衣机之后，水力洗衣机、内燃机洗衣机也相继出现。1910年，美国的费希尔在芝加哥试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电动洗衣机。电动洗衣机的问世，标志着人类家务劳动自动化的开端。

1922年，美国玛塔依格公司改造了洗衣机的洗涤结构，把拖动式改为搅拌式，使洗衣机的结构固定下来，也就是第一台搅拌式洗衣机的诞生。1932年，美国本德克斯航空公司宣布，他们研制成功第一台前装式滚筒洗衣机，洗涤、漂洗、脱水在同一个滚筒内完成。这意味着电动洗衣机的形式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朝自动化又前进了一大步。

第一台自动洗衣机于1937年问世。这是一种“前置”式自动洗衣机，靠一根水平的轴带动的缸可容纳4千克的衣服。衣服在注满水的缸内不停地上下翻

滚，使之去污除垢。到了20世纪40年代，便出现了现代的“上置”式自动洗衣机。1955年，日本研制出至今流行的波轮式洗衣机。至此，波轮式、滚筒式、搅拌式在洗衣机生产领域三分天下的局面初步形成。

20世纪60年代，日本生产出波轮式套桶全自动洗衣机。70年代后期，以电脑（实际上是微处理器）控制的全自动洗衣机在日本问世，开创了洗衣机发展史的新阶段。

此后，随着电机驱动技术的发展与提高，日本生产出了电机直接驱动式洗衣机，省去了齿轮传动和变速机构，引发了洗衣机驱动方式的巨大革命。之后，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滚筒洗衣机已经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产品。伴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相信新型的、更适合人们使用的洗衣机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新的方式。

目前中国洗衣机的均价在2000元上下，1000元左右的也非常多，相当于国人平均月工资的60%左右。

### 电冰箱的发展历史

1822年，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法拉第发现了氨、氯等气体在加压的条件下会变成液体，压力降低时又会变成气体的现象。在由液体变为气体的过程中会大量吸收热量，使周围的温度迅速下降。法拉第的这一发现为后人发明压缩机等人工制冷技术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一台人工制冷压缩机是由哈里森于1851年发明的。哈里森是澳大利亚《基朗广告报》的老板，在一次用醚清洗铅字时，他发现醚涂在金属上有强烈的冷却作用。醚是一种沸点很低的液体，它很容易发生蒸发吸热现象。哈里森经过研究制出了使用醚和压力泵的冷冻机，并把它应用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的一家酿酒厂，供酿酒时制冷降温用。

1873年,德国化学家、工程师卡尔·冯·林德发明了以氨为制冷剂的冷冻机。林德用一台小蒸汽机驱动压缩系统,使氨受到反复的压缩和蒸发,产生制冷作用。林德首先将他的发明用于威斯巴登市的塞杜马尔酿酒厂,设计制造了一台工业用冰箱。后来,他将工业用冰箱加以改进。使之小型化,于1879年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人工制冷的家用冰箱。这种蒸汽动力的冰箱很快就投入了生产,到1891年时,已在德国和美国售出了12 000台。

第一台用电动机带动压缩机工作的冰箱是由瑞典工程师布莱顿和孟德斯于1923年发明的。后来一家美国公司购买了他们的专利,于1925年生产出第一批家用电冰箱。最初的电冰箱其电动压缩机和冷藏箱是分离的,后者通常是放在家庭的地窖或贮藏室内,通过管道与电动压缩机连接,后来才合二为一。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冰箱使用的制冷剂大多不安全,如醚、氨、硫酸等,或易燃,或腐蚀性强,或刺激性强等。后来开始探寻比较安全的制冷剂,结果找到了氟利昂。氟利昂是无毒、无腐蚀、不可燃的氟化合物,很快它就成为各种制冷设备的制冷剂了,一直沿用了50多年。但近年来人们又发现氟利昂对地球大气的臭氧层有破坏作用,于是人们又开始寻找新的、更好的制冷剂了。

冰箱的发明让人类远离了发霉的食物,可以将温度降低并保存,让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享受健康的食物,不能不说是科技带给人的一种进步。

电冰箱的均价也不到3000元,基本不到一个月的平均工资,中国平均工资超过3000元的省份已经很多。

### 空调的发展历史

19世纪,英国科学家及发明家麦可·法拉第发现压缩及液化某种气体可以将空气冷冻,此现象出现于液化氨气蒸发时,当时其意念仍流于理论化。

1842年，佛罗里达州医生约翰·哥里落成的新大楼设有中央空调。一名新泽西州的工程师协助设计此崭新的空气调节系统，并把技术由纺织厂迁移至商业大厦，他被认为是令工作环境变得凉快的先驱之一。

1902年后期，首个现代化、电力推动的空气调节系统由威利斯·开利发明。此技术提供了低热度及湿度的环境，令纸张面积及油墨的排列更准确。其后，开利的技术开始用于工作间以提升生产效率，开利工程公司亦在1915年成立，以应付激增的需求。在逐渐发展下，空气调节开始用于提升家居及汽车的舒适度。住宅空调系统的销量到1950年代才真正起飞。建于1906年、位于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在建筑工程学上具有特别的意义，被称为世界首座设有空气调节的大厦。

空调发明后的20年，享受的一直都是机器，而不是人。直到1924年，底特律的一家商场，常因天气闷热而有不少人晕倒，于是首先安装了三台中央空调，此举大大成功，凉爽的环境使得人们的消费意欲大增，自此，空调成为商家吸引顾客的有力工具，空调为人们服务的时代也正式来临了。

空调的普及主要是通过电影院，大多数美国人是在电影院第一次接触到空调的。在中国主要是通过大型商场。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院利用空调技术，承诺能为观众提供凉爽的空气，使空调变得和电影本身一样吸引人，而夏季也取代了冬季成为看电影的高峰季节。随后出现了大量全年开放的室内娱乐场所，如赌场、室内运动场和商场，这些都得归功于空调的出现。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了罕见的干旱天气，为解决干旱缺水地区的空调冷热源问题，美国率先研制出风冷式冷水机，用空气散热代替冷却塔。

20世纪90年代，中国也从其他先进国家引进了较大型空调设备的先进高新技术，并与多数美国的大公司组成合资企业。如今，中国已是最大的空调出口国，2012年国内空调的平均单价在3300元左右，基本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

## 暖气的发展历史

暖气是北方冬季主要的御寒设施，暖气片起步较早，发展较成熟。当时，还没有暖气片这个称号，那时一直叫散热器。散热器在欧洲较成熟，出现的年代大家公认为是19世纪末，1890年在欧洲贵族宅邸兴起，采用铸铁浮雕单柱形式，价格极其昂贵，作为一种生活中的奢侈品流行于上流社会。

20世纪初至20年代，伴随着暖气片取暖的方便性、舒适性被广泛认可和用于上流社会交际场所（如教堂、剧院）的需要，产生了散热量较大的多柱、铸铁浮雕暖气片。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多数人放弃生火取暖的基本方式，追求更高生活水准，从而产生了大众化的暖气片，即多柱铸铁和多柱钢质散热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铜质板式暖气片以散热量大、外观简洁、大方、价格适中，受到人们的青睐，成为主流产品。

## 暖气片

散热器是将热媒的热量传导到室内的一种末端设备，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散热器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996年以后，随着超声波自动焊接（激光焊）工艺的普及和焊接成本的降低，国内生产厂商经过生产设备改造，暖气片有了第一次革命，出现了单柱钢质暖气片，明显地提高了生产量，较大地满足了社会需求。

1998年前的中国暖气片几乎清一色的铸铁暖气片，1998年，引入了钢制柱形暖气片，解决了家居装饰上的一个难题。2005年后，出现了铜铝复合暖气片，铝合金暖气片这种新型材质的暖气片深受广大用户的欢迎。

据美国能源部的估计，美国家庭年平均取暖费为1000美元。其中使用天然

气的家庭花费约889美元，而使用燃料油的家庭花费约1694美元。中国一般楼房的取暖费在2000元左右。

### 电视的发展历史

19世纪末，少数先驱者开始研究设计传送图像的技术。1904年，英国人贝尔威尔和德国人柯隆发明了一次传送一张照片的电视技术，每传一张照片需要10分钟。

1926年电视的发明者之一贝尔德向英国报界做了一次播发和接收电视的表演。1927—1929年贝尔德通过电话电缆首次进行电视试播；英国广播公司开始长期连续播放电视节目。1930年实现了电视图像和声音的同时播放。1931年首次把影片搬上电视荧幕。人们在伦敦通过电视欣赏了英国著名的地方赛马会实况转播。

1936年英国广播公司采用贝尔德电视广播，第一次播出了具有较高清晰度、步入实用阶段的电视图像。1939年美国无线电公司开始播送全电子式电视。瑞士菲普发明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投影机。

1940年，美国古尔马研制出机电式彩色电视系统。1954年美国得克萨斯仪器公司研制出第一台全晶体管电视接收机。1966年美国无线电公司研制出集成电路电视机。1969年后又生产出具有电子调谐装置的彩色电视接收机。1972年日本研制出彩色电视投影机。

1973年，数字技术用于电视广播，实验证明，数字电视可用于卫星通信。

1979年，世上第一个“有线电视”在伦敦开通，它是英国邮政局发明的。它能把计算机里的信息通过普通电话线传送出，并显示在用户电视机屏幕上。

1996年，日本索尼公司推出“壁挂”式电视：其长60厘米、宽38厘米，而



厚度只有3.7厘米,重量仅1.7千克,犹如一幅壁画。

中国电视的发展基本上是与世界同步的,1958年9月2日,我国开始播放黑白电视节目,并建立了相应的电视工业。1973年初期,开始试播彩色电视节目。电视机经历了从黑白到彩色,从电子管、晶体管电视迅速发展到集成电路电视,目前,电视正在向智能化、数字化和多用途化迈进;电视转播也由卫星传播到卫星直播。

电视主要是购置成本比较低,即使是使用比较先进技术的大尺寸电视,2000元以内的也非常多,基本上用月工资的一半就可以买到一个不错的电视。

### 计算机的发展历史

1666年,在英国发明了一部可以计算加数及减数的机械计数机。1694年,德国数学家制造了一部可以计算乘数的机器,它仍然是用齿轮及刻度盘操作。1893年,第一部四功能计算器被发明。1931年,人类发明了一部可以解决差分程序的计数机,这机器可以解决一些令数学家、科学家头痛的复杂差分程序。1952年,第一台“储存程序计算器”诞生。1977年,TRS-80微电脑诞生。1979年,夏普公司宣布制成第一台手提式微电脑。1982年,微电脑开始普及,大量进入学校和家庭。2000年,互联网开始普及,计算机更是大规模进入家庭。目前的家用计算机主要分为台式、笔记本、平板等样式,中国在这方面与世界基本上也是同步的。

目前计算机的价格也比较便宜,台式计算机基本上3000多元就可以组装一台,而且性能越来越好,家庭基本普及。

### 电话与手机的发展历史

手机是现代人必需的装备,手机的前身是电话。欧洲对于远距离传送声音的研究,始于18世纪,在1796年,休斯提出了用话筒接力传送语音信息

的办法。虽然这种方法不太切合实际，但他赐给这种通信方式一个名字——Telephone（电话），并一直沿用至今。1861年，德国一名教师发明了最原始的电话机，利用声波原理可在短距离互相通话，但无法投入真正的使用。

1876年3月7日，贝尔发明了真正的电话。第二年，在波士顿和纽约架设的第一条电话线路开通了，两地相距300千米。一年之内，贝尔共安装了230部电话，建立了贝尔电话公司，这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的前身。

1900年，中国第一部市内电话在南京正式问世；上海、南京电报局开办市内电话，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加快了基础电信设施的建设，到2003年3月，固定电话用户数达22562.6万。

移动电话最先出现在美国，1973年4月的一天，一名男子站在纽约街头，掏出一个约有两块砖头大的无线电话，并打了一通，引得过路人纷纷驻足侧目。这个人就是手机的发明者马丁·库帕。当时，库帕是美国著名的摩托罗拉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这世界上第一通移动电话是打给他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一位对手。

第一代手机（1G）是指模拟的移动电话，也就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香港、美国等影视作品中出现的大哥大。由于当时的电池容量限制和模拟调制技术需要硕大的天线和集成电路的发展状况等制约，这种手机外表四四方方，只能称为可移动，算不上便携。很多人称呼这种手机为“砖头”或是黑金刚等。

这种手机有多种制式，接收效果不稳定，且保密性不好，无线带宽利用不充分。此种手机类似于简单的无线电双工电台，通话是锁定在一定频率，所以使用可调频电台就可以窃听通话。

第二代手机（2G）也是最常见的手机。通常使用GSM或者CDMA这些十

分成熟的标准, 具有稳定的通话质量和合适的待机时间。在第二代中为了适应数据通信的需求, 一些中间标准也在手机上得到支持, 例如支持彩信业务的GPRS和上网业务的WAP服务, 以及各式各样的Java程序等。

3G, 指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相对第一代模拟制式手机(1G)和第二代GSM、CDMA等数字手机(2G), 第三代手机是指将无线通信与国际互联网等多媒体通信结合的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它能够处理图像、音乐、视频流等多种媒体形式, 提供包括网页浏览、电话会议、电子商务等多种信息服务。

1995年问世的第一代数字手机只能进行语音通话; 而1996—1997年出现的第二代数字手机便增加了接收数据的功能, 如接收电子邮件或网页; 第三代与前两代的主要区别是在传输声音和数据的速度上的提升。

4G是第四代移动通信及其技术的简称, 能够传输高质量视频图像以及图像传输质量与高清晰度电视不相上下的技术产品。

目前手机的价格倒是非常便宜, 200元就可以买一个满足基本通话需求的手机。

### 汽车的发展历史

1680年, 著名科学家牛顿设想了喷气式汽车方案, 利用喷管喷射蒸汽来推动汽车, 但未能制成实物。不过, 从此研究蒸汽车的人越来越多了。1829年, 英国的詹姆斯发明了时速25千米的蒸汽车, 该车可以作为大轿车使用。这种汽车装有笨重的锅炉和很多煤, 冒着黑烟, 污染街道, 并发出隆隆的噪声, 而且事故频发。

1882年, 德国工程师戴姆勒开始进行内燃机的研究。他发明了用电火花为发动机点火的自动点火装置, 然后, 在这一发明的基础上制造出了优秀的汽油发动机。这种发动机每分钟转900转, 结构简单紧凑, 而且能产生很大的功

率。1883年，戴姆勒完成了这种汽油发动机，第二年开始装配在二轮车、三轮车和四轮车上，制成了汽油发动机汽车。特别是1886年制造的汽油发动机四轮载货汽车，装有1100瓦的发动机，速度达18千米/小时。

1885年和1886年是汽车发明取得决定性突破的一年。当时和戴姆勒在同一工厂的本茨，也在研究汽车。他在1885年几乎与戴姆勒同时制成了汽油发动机，装在汽车上，以每小时12千米的速度行驶，获得成功。这一年，英国的巴特勒也发明了装有汽油发动机的汽车。此外，意大利的贝尔纳也发明了汽车，俄国的普奇洛夫和伏洛波夫两人发明了装有内燃机的汽车。

### 20世纪中国汽车发展史

汽车在中国的普及是改革开放之后，1985年3月，经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拍板的国内首个轿车合资企业上海大众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汽车工业开辟了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加快发展的道路。

2012年我国汽车产销双双突破1900万辆，再次突破纪录，蝉联世界第一。

### 高等教育

近代高等教育始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大学校和德国1810年创立的柏林大学。法国大学校是国家主义和实用教育价值观的典型代表；德国大学则强调教学与研究的结合，强调大学自由地进行纯学术研究。两者分别代表了西方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两大模式，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西方主要国家高等教育的在校人数和机构数都有了较大的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高等教育的逐渐大众化，这一阶段，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的突出特征是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西方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是伴随着高等教育在国家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国民收入逐步提高以及各国广泛推行高等教

育民主化政策而实现的。

到20世纪90年代末，加拿大和瑞典的高等教育接近普及化的边缘；美国的高等教育则完全进入了普及化阶段。

人类的生存成本是随着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而随之被推高的。但是现代化并非只是推高，而也有降低的时候，比如科技进步也会导致生产成本的降低，从而让这些产品顺利进入家庭。

### 三、低生存成本社会的理论

---

#### “低生存成本社会”是怎么回事？

回顾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把古典自由主义指导下的低福利社会称为世界模式1.0，而福利社会则称为世界资本主义模式2.0，现在回归1.0模式是肯定不行，而2.0模式也并非理想，因此现在人类必须发展出世界模式的3.0版本。而笔者认为，这种世界模式的3.0版本就应该是低生存成本社会。

低生存成本社会的提出，旨在解决现在人类所面临的难题，而现在的难题就是人们相信市场，又不想放任贫富分化的加剧，人们渴望福利社会，而又不想加重税收负担。总结起来就是两对矛盾，即“市场经济和贫富差距”的矛盾，“福利社会和高税收”的矛盾。而这两大矛盾，只有“低生存成本社会”才能解决。

低生存成本社会不是要降低民众的生活品质，相反是要提高民众的生活品质，民众的生活成本更低了，当然生活品质也就提高了。

现在人们总是一味迷信收入的增长，但是收入的增长并不一定会给民众带来幸福感。美国、日本、欧洲可以算是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但是那里的民众照样面临生存难题。因此要想让民众获得幸福，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经济发展最终的目的是改善民生，但由于市场经济的无序性，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带来民生的改善。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但是普通民众“养家糊口”却越来越不易。民众普遍抱怨生存成本过高，这是因为在收入增长的同时，民众的生存成本也在增加，甚至增加得更快。在中国，民生问题越来越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民众收入的增长赶不上民众生存成本的升高，因为经济越发展，民众生存所必需的产品就越多，因此民众生存成本提高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当然这不是要反对经济发展，而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将民众从高昂的生存成本之苦中解脱出来。

高生存成本社会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种是生活所需要的物品越来越多，比如汽车地铁、高等教育、公共网络等，这些随着经济的发展拉高了民众的生存成本。

除了生活所需的物品越来越多，随着分工越来越细，生活所需要购买的环节也越来越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越来越不能自给自足，什么都要买，衣服不能自己做，要买，鞋子不能自己做，要买。现在提到市场经济，大家都会想到高效率，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市场经济的高成本，市场经济是一种成本极高的经济模式。比如商业保险是市场经济，但是极其昂贵，这也是很多人买不起保险的原因。而且经济越发展，社会分工越细致，生活成本就越高。

以上两点，生活所需产品的增多和生活购买环节的增多是民众生活成本增高的根本原因。我们不妨再说得细一点，比如，人人上大学、人人有手机和电

脑，属于生活必需品的增加，而衣服由自己纺布做衣服，到找裁缝店定制衣服，再到商场买衣服，则是分工带来的生存成本升高。

民众生存成本的提高主要有两个最直接的原因，一是不同的生活模式导致了生产成本升高；二是由高物价直接导致生存成本升高。

### 一、生活模式不同导致生活成本升高

生活方式是造成生存成本过高的一个主因。中国正处于城镇化时期，我们可以从吃、穿、住、行、用等方面，将农村的生活方式与城市生活方式进行一下比较。比如在吃饭方面：农民都是吃自己种的粮食、蔬菜，可以免去经销商的层层盘剥，也省去了运输费用；比如在居住方面：农民在自己的宅基地盖房，付出的只是一些建筑材料费，而在城市，则需要向开发商购买住房，而开发商则要向国家缴纳土地出让金，开发商也要牟利，房地产行业是典型的暴利行业，这导致城市房价非常高，而且农民住自己的房子，还不用每月交纳物业管理费。

现在很多人喜欢用人均收入对城市和农村进行比较，其实这样比较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农村与城市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城市人要想达到与农村人相同的生活水平，其收入水平必须远远大于农村人才可以。

### 二、高物价是导致生存成本过高的直接原因

曾经看到过一个朋友的QQ签名“我搬家了，很远，很便宜。”看到这样的话，不知道是幸福还是无奈。

同样是城市生活，在不同国家，或是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生存成本也不一样，这主要表现为物价的高低不一样。高物价是导致生存成本较高的最直接原因，而物价的不同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 1. 高税收导致高物价

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高福利国家，高福利国家各种税收非常高，产品到了消费者手上，价格也就非常贵了。比如北欧的所有商品都非常贵，在各个版本的世界城市物价大排名中，北欧城市都高居榜首，最关键的就是高税收导致了高物价。

### 2. 高房价导致高物价

高房价导致高物价的情况在东亚地区表现得非常突出，或是一些大城市这种情况也非常突出。首先，房价高，工人的生存成本就高，工人生存成本高必然带动工资上升，工资上升又必然导致物价升高。这两年珠三角地区的通货膨胀并不很厉害，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也不多，但高房价却导致了工人生存成本大幅提高，因此很多人逃离这些地方。其次高房价也会带动商业租金的提高，而商业租金的升高直接导致了商品流通环节的高成本，也可以导致物价升高。

### 3. 级差地租导致的高物价

级差地租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繁华商业区往往商铺租金较高，经营者必须靠提高商品价格来弥补租金损失。因此在同一城市，不同地段，商品价格往往有很大的差异，越是繁华地段，商品价格就越高，民众的生存成本也就越大，同样，越大的城市，生存成本越高。

### 4. 廉价商业模式的取消导致高物价

同样的商品也会因为不同的商业模式而产生较大的价格差异，比如，流动商贩的存在可以让普通民众买到一些便宜的生活用品，露天菜市场可以让民众买到一些便宜的蔬菜。那些高档的商业模式所必需的装潢费用、照明费用、营销成本等都会大大增加商品的价格。而政府如果强制取消一些廉价的商业模



式,就必须导致商品价格的总体走高,加重民众的生产成本。

### 5. 劳动力价格上升导致高物价

劳动力价格基本上与劳动生产率成负相关关系。劳动生产率越低的经济体,劳动力价格越低;而劳动生产率越高的经济体,劳动力价格就会越高。因此发达国家一般劳动力价格比较高,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则比较低。

劳动力价格的提升必然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导致那些机器化生产的产品价格不断下降,因此在发达国家那些机器化生产的产品都非常便宜,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则非常高,不得不从国外进口。而服务业不能进口,所以发达国家服务业的价格非常高。

而民众的生存必需品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食品、纺织品、建筑;而享受型产品大部分属于机器化生存的产品,比如汽车、各种家用电器、消费电子产品等。民众的生存成本,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成本,基本上是由生存必需品的价格决定的。因此生存必需品价格的提高,必然导致民众生活成本升高,生活压力加大。

### 6. 导致物价比较高的一些其他因素

除了以上比较有共性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会导致物价比较高。比如在俄罗斯很多轻工产品都不能生产,需要进口,因此商品价格都比较高,而在美国由于其特殊的医疗保险体制,导致美国的医疗价格奇高。而投机炒作严重扭曲了商品价格也会导致高物价,人类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后,商品价格已经不再受成本价值的影响,而且也经常不受真实供求关系的束缚,而投机炒作则可以使商品价格长期偏离其价值,比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属于这一情况。

以上是造成民众生存成本过高的主要原因,具体到中国来说,各方面的原因都有,但中国最突出的原因还是房价问题。

### 三、低生存成本社会

要想民众生活幸福，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让民众有钱，而让民众有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提高民众的收入，另外一种降低商品的价格，从而变相提高民众的购买力，而低生存成本社会采取的是第二种方式。

我们可以将消费按不同层次分为生存性消费型、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三个层次。所谓低生存成本社会，就是降低生存型消费品的价格，以满足民众对生存必需品的需求，从而达到降低生存成本、缓解民众生存压力的目的的社会模式。

低生存成本社会主张的是降低生存性消费品的价格，而生存性消费是相对于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而言的。与低生存成本对应的是高享受成本和高奢侈成本。以前很多朋友在看到低生存成本社会这个概念时，以为笔者是在提倡低碳生活，是在提倡简单的生活方式，或是提倡省吃俭用、节俭持家，如果这样理解就误会了笔者的意思。

生存必需品可以包含吃、穿、住、行、用等多个方面，人类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生存问题仍然是面临的首要问题，对于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更是如此。广大的中低收入人群生活支出的大部分仍然属于生存型消费。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适合于其他国家。

一般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以生存性消费为主，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以享受型消费为主，而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是以奢侈型消费为主。

### 四、如何建立低生存成本社会

低生存成本社会不是让人们省吃俭用，而是要政府通过税收和城市规划降

低物价，低生存成本的核心是低物价。

我们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建立低生存成本社会。

### 1. 完善消费税征收制度，根据商品的消费层次进行征税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只做两件事，那就是征税和用税，不同性质的政府，或是不同的发展模式，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征税和用税的方式不同。同样，低生存成本社会对税收也有要求。

现在中国和世界都一样，对大部分商品都征收相同的税率，而不对商品的性质进行区分，这是不科学的。低生存成本社会的改进就是按商品的性质进行区别征税，而这种区别主要就是根据对人们的有用程度。

我们将消费分为生存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三个消费层次。在制定税收制度时，将这三种消费形式进行产异化定税，对于奢侈品征收极高的税，对于享受型产品征收比较高的税，而对于生存性产品免税；并用享受型消费、奢侈型消费的税收，弥补在生存型消费方面的税收损失。

现在，中国除了对烟酒等商品征收消费税外，对税收的划分还不够细致，也没有按消费层次进行征税的概念。现阶段，尽管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生存型消费仍然占据着较大的比重，但如果从全社会来考察，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所占的比重，要远远大于生存型消费所占的比重，因此用这两方面的税收来弥补在生存型消费方面的税收损失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税收的区别征收并不一定非要放到消费环节，也可以从生存、流通、消费三个环节进行。比如食品是生存必需品，那么我们可以从粮食、蔬菜的生产、流通、加工、销售等多环节进行免税，以达到降低食品价格的目的。比如，对农药、化肥免税，对粮食、蔬菜的流通销售免税，对符合一个条件的餐饮店免税，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吃”方面的成本降到最低，至少可以达到现在水平的

一半。如果能这样，民众就不用担心吃饭的问题，而在现代社会，吃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非常大的一笔支出。

因为单从一个环节进行征收很容易遇到商品消费层次界定难的问题。总之，在把握原则的情况下，应该以有利于界定的方式进行征收，并且这种征收也并不一定要从产品出发，也可以从产品生产配套的角度进行。比如为了降低农产品的价格，可以对农药、化肥等农业生存资料实行税收减免，因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降低也可以带来农产品价格的降低。

## 2. 合理布局工作区及居住生活区，让所有人可以就近满足居住需求

城市生活，交通出行费用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我们在进行城市规划时，如果可以让民众都居住在自己的工作场所附近，则可以大大节省这笔开支。比如很多工厂都拥有自己的员工宿舍，这样就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到达工作场所，就节省了上下班的交通开支，对于那些没有宿舍的单位，如果员工可以就近租到合适的住所也可以省掉交通费用，这就需要政府合理布局工商业区域和生活区域，以达到为社会节省资源的目的。

现在的住房制度实际与这一理念是背道而驰的。现在中国一线大城市，市中心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了民众的承受能力，而民众往往置业在郊区，而工作在市区，居住在郊区无疑加大了交通成本，其实这也是政府规划不合理所致。如果市区多发展房地产，让工商业也向郊区扩散，则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美国人，大部分人上下班开车都需要一个小时，这对于社会资源简直就是极大的浪费。

## 3. 适当保存一些廉价的商业模式及生活模式

同种商品采用不同的销售模式，价格会有很大的差异，街边店要比流动商贩贵，而那些拥有中央空调的大型室内商场里的商品则要比街铺更贵。适

当保留一些廉价的商业模式，比如允许流动商贩的存在，也可以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

廉价生活模式的存在也可以降低生存成本，比较很多城市禁止电动车上路，这无疑加大了那些原本依靠电动车上下班的民众的生存成本，而这些人本身就属于中低收入人群。

#### 4. 建立统一的、专门的生存保障型产品供销体系及相应制度

建立生存必需品目录，为进入目录的商品建立独立的生产及销售体系，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其成本，从而最终降低销售价格。比如，可以由政府免费提供土地，建立销售场所，实行政府招投标体制，统一进行批量采购。如果这套体系建立起来，则生存必需品的价格降低20%以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其实生存必需品都是成熟的产品，过于强调竞争和创新是没什么必要的。

#### 5. 控制好级差地租

级差地租的存在也是造成民众生存成本过高的原因之一，在某些地域甚至是头号因素。级差地租的出现是市场因素，但级差地租的高低，政府是可以引导的。比如政府合理布局国家的经济增长极，不要让全国大部分的人都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将人口分流到其他的经济增长极地区。这大城市内，严格控制城市密度，将人口均匀分布在各个地区，这就可以大大降低所谓黄金地段的土地使用租金，从而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特别是大城市的生产成本。

以上几条如果都可以做到，那么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成本降低30%以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前面笔者还提到“新五蠹”造成财富巨大转移的问题，如果政府将“新五蠹”转移社会财富的渠道全部堵死，再加上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的建立，民众生存成本至少可以降低50%以上。

总之，大幅度提高劳动生存率、坚决取缔“新五蠹”对社会财富的巨额转

移，和建立低生存成本社会，是改善民生最主要的措施，其中提高劳动生存率是根本措施，后两条是辅助措施。

## 五、低生存成本社会的具体政策建议

好的思想必须转化为政策，才能为社会服务。大多数人也只对非常直观的做法感兴趣，而笔者的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本身就非常实用，政策转化度非常强。下面是笔者将其转化为政策之后的一些想法，主要是笔者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体会，主要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展开，供各位参考。

### 1. 衣

(1) 对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下、单价不超过300元的小型服装店，实行免税，品牌专卖店除外。

(2) 对在校学生实行免费校服制度。

### 2. 食

(1) 对新鲜蔬菜在生产、流通、运输环节免税。

(2) 允许流动水果、蔬菜摊贩存在，不得强行拆除大型农贸市场，保证在一定区域内都有一个农贸市场存在。

(3) 对农药、化肥、种子的生产、经营实行全行业免税。

(4) 对稻米、小麦、玉米等主食作物的生产，加工、流通实行免税。

(5) 对婴儿奶粉的生产、经营实行免税制度。

(6) 对方便面等主要方便食品免税，因为食用方便食品的往往是不具备做

饭条件或是旅行的人群，总体上属于弱势、低收入，甚至诸如在校学生等无收入的群体。

(7) 对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下、单人消费不超过50元的小型餐馆，实行免税。对大型餐饮、酒店也根据人均消费标准的不同进行阶梯征税。

在对以上生存必需型食品免税的同时，可以通过加大对休闲食品、营养保健食品、特色特产食品、各种肉食、糕点、酒水、大型餐饮、酒店等加大税收。

### 3. 住

(1) 实行住房一定面积内的免费供应制度，学生毕业之后即可从国家获得15平方米的住房，结婚后可以从国家获得30平方米的住房，有孩子后免费获得45平方米的住房。当然国家在开发这些住房时，可以按上面的面积进行开发，也可以开发更大的住房，超出面积按市场价格支付。

(2) 在每一区域，进行工商业设施和住宅的1:1配套建设，不得兴建单纯的商业中心区和工业区，都必须与住宅配套。这样上班族基本上都可以做到就近居住，才可以避免巨大的交通压力，而巨额的交通费，从全社会讲，本身就是浪费。

(3) 鉴于全国各地城市基本饱和的现状，在城市中心区，不得新建写字楼、工厂等工商业设施，只建住宅楼，即使兴建也要严格控制其与住宅楼的比例，不得超出住宅楼所能承受的人口。

(4) 对日均住宿费用在200元以下的小型旅馆实行免税。

(5) 对住房在建设、流通等各个环节进行免税。

在对以上关系生存问题的住房实行规划控制和税收减免的同时，可以对大面积豪华住房实行高税收，对工商业用房实行适度高税收。

#### 4. 行

- (1) 公交、地铁实行财政补贴，政府限价制度。
- (2) 对长途客运企业，如长途汽车、火车等实行免税。
- (3) 对私家车，根据单价实行不同的税收制度。

从财政的角度看，政府只做两件事，征税和用税，因此征税和用税方式的不同就决定了政府的性质。总体来说，从建设低生存成本社会的角度出发，笔者主张税收制度应遵循三大原则，第一，是对生存必需品实行免税，对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加大税收；第二，对生活型消费实行低税收，对生产型消费实行高税收；第三，对个人消费实行低税收，对企业消费实行高税收。

低生存成本社会对税收原则进行了突破，为税收提供了新的思维框架，而之前税收也是有原则的，以前税收主要坚持“公平、效率、适度、法治”的四大原则，而这四大原则显然是只针对税收本身提出的，而笔者提供的原则是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是跳出税收看税收。

## 六、建设低生存成本社会的样本

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是笔者提出的，但在理论提出之前，低生存成本社会虽然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是也有些零星样本存在。

### 一、北京样本：公交太便宜了

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理应各种消费都很高，其实不然，在北京最便宜的当属公交。外地人进京，感受最深的就是这点，北京很多公交都是全程1元，刷卡还要便宜，才0.4元，很多都是空调车。地铁2元可以坐遍北京，这种价格



全国其他任何城市都做不到，其他城市公交最低都是1元，2元是大多数，在广东东莞很多地方是3元。现代社会交通费也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如果是1元的话，出门一次至少2元，如果是2元的话，出门一次至少4元，如果是3元的话，出门一次至少6元。而且很多地方公交并不能直达，只要转车一次，车费就翻倍，零零碎碎地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北京公交便宜，一方面是政府的补贴，另一方面是因为坐公交的人多，自然成本就低了。另外北京的蔬菜也不贵，这是因为北京属于蔬菜的集散地，物流成本相对较低。

## 二、东莞样本：吃穿住都不用钱

东莞是中国制造业的样本城市，东莞也有很多低生存成本的地方，主要体现在工厂食堂、工作服和员工宿舍，这是东莞制造业的基本特征。走在北京街头，到处都可以见到穿着入时的情侣，但在东莞见到最多的是一群群身着工作服的打工者，这些人工资并不高，但是消费却很低，吃饭在公司食堂，衣服整天都是工作服，不用买很多衣服，住宿有宿舍。其实在东莞这些城市，工厂员工的收入实际比很多白领要高，经常会看到很多打工仔拿着最潮流的手机，而其实很多白领都舍不得买，关键就是生活成本的差异。白领的工资并不比工厂普工高，即使高也是高一点点，如果将吃饭、租房、买衣服都算上，根本剩不下钱，而工厂普工则可以省下这些钱。

## 三、交通运输部样本：蔬菜绿色通道

近几年，中国推出了蔬菜绿色通道措施，各个地方也积极跟进，长期下来已经成为固定性的、长期性的政策。其实绿色通道一直就有，比如为落实国务院提出的“菜篮子工程”，1995年国务院纠风办、交通部、公安部先后开通了山东寿光至北京、山东寿光至哈尔滨、海南至上海等多条蔬菜运输“绿色通道”，总里程达到1.1万公里，贯穿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从2002年开始，

湖北、四川、贵州、安徽、浙江、福建等省相继出台了对整车合法运送本省生产的蔬菜、水果等鲜活农产品的车辆给予减免通行费的优惠政策，建立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农产品公路运输“绿色通道”。2008年1月，我国南方出现百年罕见的冰雪灾害天气，交通运输部下发了“关于在春节前启动鲜活农产品运输应急机制的紧急通知”，将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的免费政策由“五纵二横”的绿色通道扩大到与之平行的高速公路，从此，高速公路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免费政策一直执行至今。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减免通行费每年都超过100亿元。

#### 四、中国税收制度：90%的公民不直接纳税

税收是个很能带来痛苦的政策，税不直接加于民是中国古代“仁政”的主要内容，这一政策也被现政府承接下来。中国的税收体系与西方完全不同，中国主要是企业税，西方主要是个人税。税不直接加于民，怎么办呢，就是向商人征税，向企业征税，这是中国税收的特点。有人说这不都一样吗，当然不一样，起码感受上就不一样。向企业征税，只有少数企业家感受到税负，而广大民众却没有税负感，而企业家交税，很多都是会计完成的，到了企业家那里就成了一个数字，没有从钱包掏钱的痛苦感。另外，税收在美国，绝大部分人都缴纳个税，而中国2011年个税调整后，缴纳个税的人只有2400万，之前稍微多些，也不是很多，除了个税，其他由公民直接承担的税很少。也就是说，中国90%的人都不直接纳税，这是减轻税痛很好的做法。在西方，每月不仅要缴个人所得税，而且几乎每天都要缴消费税，而且一天就缴好几次税，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有幸福感可言。

西方有重商的传统，所以苦了民众，中国有民本的传统，所以对商人苛刻了些，但总体上商人对税收的承担能力要强于普通百姓，而且商人的收入本也来自民众。

除了中国，在国外也有很多。比如，在日本，哺乳期的妈妈可以将小孩带到单位，单位有专人帮忙看管，比如在北欧、德国，上大学是免费的，在欧美，农业补贴非常高，这些都是降低民众生存成本的好政策。从生存成本的角度减轻民众的社会痛苦感是构建幸福社会的必由之路，希望这些措施能够更多。目前更大的高成本的问题正在抵消这些措施带来的好处，北京的公交只有0.4元，但是如果想用公交省下的钱来买一套住房，又是多么的奢望！所以低生存成本社会的建设必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一个全盘的规划。

## 七、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应用案例

### 案例一：治理浪费

无论事情多么耸人听闻，一旦变成了数字，就没有感觉了，因为大多数人对数字是没有概念的，这方面，专业人士也许会好点，其实也并不比普通人好多少。各种专家坐在办公室里，之所以搞不出研究成果，就是很多社会实践都简化成了几个数字。

我们看看这个每年的浪费数字，中国人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一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还有一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困难群众。

而目前粮食自给率已经跌破90%。如果按一个人一年吃800斤粮食，去年相当于进口粮食养活了1.9亿中国人。

对此，袁隆平建议政府将浪费当成犯罪行为来限制。他认为水稻产量每亩提高10斤、5斤都是很难的，提高了单产之后呢，又浪费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然而舆论教育是难有长期效果的，将浪费列入犯罪又是不现实的，最终还是需要经济手段，特别是税收手段。

生存经济学将消费分为生存性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三种，主张这三种消费方式对应不同的税收标准，也就是对生存型的餐饮实行免税，而对享受型的餐饮实行中等程度的税收，对高端餐饮则必须实行重税。从税收入手，必须对餐饮业进行分级收费。我一直在考虑按饭店的规模进行分类，比如营业面积多少平方米以下的饭店，或是雇工在多少以下的饭店可以采取税收优惠，这是一个方法，而且也是可行的，

另外，也可以采取按人均消费的方式进行额外征税，比如一顿饭人均消费超过50元，额外纳税多少，超过100元，纳税多少，等等，这样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刹住吃喝之风。

前面一种方法主要针对小型餐饮机构，主要体现为免税，后面一种主要针对高档餐饮机构，主要体现为纳税。

分级纳税虽然科学，但往往会遇到管理的问题，但其实也不难，可以采用商业活动中经常采用的神秘顾客调查的方法来避免逃税漏税，这一方法在商业上主要用于防止业务员“飞单”，效果都非常好。

吃喝不仅是风气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其实更是资源的问题。粮食是可再生的，但是在生产粮食的过程却耗费了大量的非可再生能源，比如化肥、农药的原料是石油，石油就是不可再生资源。在有限的资源面前，任何人的浪费或是过度消费都是对他人或是后人生存权的严酷剥夺。

其实经济学界早就发现了“私人富足”与“公共贫困”并存的社会现象。私人的富足并非指所有人，而是部分人，而这种私人富足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大量的浪费和奢侈型消费，而公共贫困则是指公共服务的不到位，以及背后政府

财政的捉襟见肘，或是大量负债。这点最早在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的《丰裕社会》中，给予了充分的描述。

其实，社会治理最大的问题就是税收问题，政府所做的工作完全可以简化为收税和用税两个大的方面，社会管理模式的差异也可以归结为税收方式的差异上。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虽然发现并提出了问题，但并没有给出科学的答案，盲目地加税，往往会导致中产阶级赋税过重，最终必将反弹到“低税收-低服务”的恶性循环状态。所以美国既有肯尼迪-约翰逊“伟大社建设”的慷慨悲歌，也有里根-小布什“巫毒经济学”的无奈泛滥。

要想解决这样的问题，按生存经济学标准，对不同的消费方式进行分级征税才是科学而必然的选择。

而这些其实从干预或是市场的传统视角来分析都是较肤浅的，这背后都需要复杂的机制设计，现代经济学也正经历着从自由市场到机制设计的转变。经济学不是哲学，不需要理念或是主义，而是科学，需要实验与设计，这也是现在机制设计理论越来越走红的道理，因为原来的分析框架已经完全失灵了。

市场机制设计者需要具有像工程师一样的视野，运用包括机制设计理论、实验经济学和计算机工具的多元工具，细致考虑和把握市场细节以及市场参与者与市场制度的博弈过程，分析市场低效和市场失灵问题，进而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当然，这一切最终的目标就是激励相容，这是赫尔维茨于1972年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简单说就是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能实现社会目标。而要达到这种目标，就必须对市场参与者给予激励，这样他们才会遵循该机制的约束和要求，把事情做好，否则，他们就会选择不遵循该机制的约束，或者

不把事情做好。而分级征税对于餐饮管理就是一种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

## 案例二：养老金调整

中国的养老金是政府规定的，按政府规定的比例进行调整，但这种规定其实必要性不大，只要掌握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养老金完全可以自动调整，而不需要人时时进行干预。

从经济学出发，微观经济学可能会认为养老金应该按照CPI进行调整，宏观经济学可能会认为按经济增值率调整更合适，但笔者指出这些都是错误的，按生存经济学的观点，养老金应该按照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之和进行调整，也就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般为9%，通胀一般为3%，而养老金的调整比例就是12%。

按CPI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通胀来调整，可以避免因购买力下降导致的收入缩水，但这前提是，你现在买的、用的东西，跟以前一模一样。但现实中并非如此，因为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生活方式在转变，以前的生活方式不存在了，新的生活方式更贵了。比如以前人们骑自行车上班，而现在要乘公交或是地铁，所以即使自行车的价格没有上涨，你现在的的生活开支也会上升，因为生活方式变了。原来如果你的收入是按自行车的水平来规划的，那地铁时代，肯定就不够了，所以如果你的收入只与通胀同步提高，那必然适应不了生活方式的发展进化。

那按经济发展速度，也就是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来调整，可以吗？也不行，因为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是“净增长”，而不是真实的经济增长数字，是真实的经济增长数字减去CPI增长数据后得到的。真实的经济增长，我们可以称为经济的“毛增长率”，学术上称为“名义增长率”，这才是数字上的增长。

这个增长不仅包含了物价的增长，也包含了生活方式的变化，是真实的增

长。我们如果要提高养老金，就必须与这个真实的经济增长也就是名义经济增长率挂钩才行。

除了以上谈的与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其实养老金还可以与收入的增长挂钩。但是收入增长也经常面临两个数据，一个是名义增长，一个是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增长，而要与收入挂钩，就必须与前面一个挂钩，也就是与名义增长挂钩。

比如，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4.1%，2012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总名义增长12.6%，名义收入都高于大家平时听到的“经济增长率”。

其实与名义经济增长率挂钩更科学，与名义收入挂钩也问题不大，因为名义收入的增长与名义经济增长差不多，一般是围绕名义经济增长上下波动，不会有太大的偏离。总之，养老金与通胀挂钩或是与实际经济增长率挂钩，是绝对不行的，那样会导致居民真实生活水平的下降。

养老金一般来源于社保收入，或是财政收入，如果不考虑税费率的变化，这两项的增长也是与名义经济增长率挂钩的，养老金按经济名义增长率调整，不会带来任何额外的支出负担。因为中国经济名义增长率一般都是11%以上，所以任何养老金增长低于这个数字，就是不科学的，就会导致老年人生活水平的下降。

中国养老金已经实现了“九连涨”，每次涨10%，好像很给力，其实涨得不多，而且这种涨既跟不上经济的名义增长，也跟不上社会平均收入的增长。中国的养老金应该每年增长12%左右，才是合适的。

中国公布数据时，一直有个陷阱，中国公布收入状况时，既公布平均数据，又公布中位数，这是为了让人们看到自己工资不如平均时，不抱怨“被平

均”，所以公布了中位数；但是公布养老金时却只公布平均数，而不公布中位数，公布中位数后，就显得更低了。

2013调整后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达到1893元，这只是平均数，如果公布中位数肯定比这个低很多，说明大部分人都是一千多一点，这些收入对于老年人是非常低的。

希望中国相关部门，能够正视经济发展的规律，变人工调整养老金增长为与经济名义增长率同步自动调整。

## 八、低生存成本社会有什么好处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阶段，生存仍然是首要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抱怨生活成本太高，在物价奇高的大城市更是如此。低生存成本社会对普通民众和国家整体经济都有着非常大的好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低生存成本是最大的社会福利

很多国家在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同时又加大了物价水平，客观上加大了人们的生存成本，福利社会永远不可能照顾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如果能够在人们的工资水平保持固定不变的前提下，大大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则相当于提高了民众的购买力，可以大大舒缓民众的生存压力。低生存成本社会也就是这样一种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减轻民众生存负担的社会模式。对普通民众来说，低生存成本就是最大的福利。

### 2. 低生存成本社会使国家产业更具国际竞争力

一个国家的产业是否具有竞争力，除了技术因素外，劳动力价格水平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大部分的消费都是与生存相关



的必要性消费。如果民众的生存成本降低,则这个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水平就可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在与其他国家进行产业竞争时就可以具有优势,当今很多发达国家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方面渐渐失去了优势,而只能将经济锁定在少数资本密集及知识密集型的经济领域。而随着新兴经济体在技术方面的不断进步,这些国家在高附加值领域的优势也将不断消失,而对于同一技术发展水平的两个国家来说,谁的劳工成本越低,谁就更具备发展优势。比如美国和日本的汽车企业竞争时,美国工人工资太高使美国汽车丧失了价格优势,当然美国的工人工资价格高主要是其医疗费用价格太高。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就可以大大降低劳工成本。

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是由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成本决定的,而与高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关系不大,因此建立低生存成本社会可以将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水平保持在合适的范围内。

### 3. 可以从整体上提升全社会消费能力

当“低生存成本社会”降低了住房、医疗、生存必需品等方面的物价,也就为民众省去了大量的生活开支,而民众剩余的钱就可以更多地用于享受性消费,这样也就从整体上提升了民众的消费水平,扩大了社会需求,从而带动经济的增长。

### 4. 可以让人生活得更更有尊严

在福利社会,很多补助都是按照收入水平来发放的,而这样的发放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监督,而且程序相当烦琐,这些都给低收入群体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而这些过程无形中也损害了民众的尊严。而低生存成本社会则直接降低商品的价格,让那些本该接受政府救助的民众可以通过自己的收入维持生存,而不用通过烦琐的手续从政府那里获得救助,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生存得更更有尊严。因为现代社会,收入的高低主要是由于国家的经济政策决定的,而与

勤劳还是懒惰已经关系不大，现在国家主张民众应该体面地工作，有尊严地生活，因此建立低生存成本社会非常有必要。

#### 5. 可以降低国家的经济风险

对于民众来说，在生活中，会遇到生病、失业等风险，对于全社会来说，则要经受经济周期的考验，而如果生存成本非常低的话，则社会的抗风险能力将大大增强。

#### 低生存成本社会适用于中国与世界

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并不反对和排斥福利社会，也不是福利社会的替代方案，而是福利社会的补充方案。

低生存成本社会主张从衣、食、住、行等生活细微之处减轻民众的生存压力，而福利社会则是从生、老、病、学、教大的方面减轻民众的负担。两种社会模式出发点不同，其效果也各异。低生存成本社会的主张没有改变“多劳多得”的原则，福利社会相当于将一样东西直接送给你，而低生存成本社会则相当于低价卖给你，因此低生存成本社会不存在施舍的问题，这样可以保障民众的尊严。不存在施舍的问题，也就从根本上不存在养懒汉的嫌疑。

中国现在正处于高发展阶段，完全的福利社会将是社会的不可承受之重，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可以减轻单纯依靠福利社会模式的风险，减轻福利社会模式对民众造成的负担，特别是对于生存的负担，两种模式完全可以协调发展，齐头并进。

我们相信市场，但又不能放任民生难题的不断加大，我们渴望社会福利，但又不想背负沉重的税收负担，在这种情况下，笔者的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则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选择。当然建立低生存成本社会，既需要政府，也需要市场，确切地说，是要政府利用市场手段来建立，而不是依靠行政手段建立。低

生存成本社会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适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因为这些问题中国与世界都同样在面对。

### 低生存成本社会属于帕累托改进

大部分改革都会伤害到某个群体的利益，会造成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但是笔者主张的低生存成本社会，不是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进行利益重新分配，而是在每个人的消费行为间进行利益分配，比如我们将生存型消费领域的产品价格降得非常低，让人们可以用最少的钱解决生存问题，享受型产品的价格可以稍微高些，而奢侈品我们将价格定得非常高。这些可以通过税收手段进行调节，也就是提高享受型消费品和奢侈型消费品的税收，来补贴到生存型消费领域。这种改革在经济学上基本上属于帕累托改进，是最理想的改革方式。

现在我们可以将世界的民生模式分为两大类：以美国为代表的低福利、低物价模式为第一类，北欧的高税收、高福利、高物价模式为第二类，其他的国家基本上处于这两种模式之间，比如日本等。在20世纪80年代前，北欧和美国、西欧这些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差不多，20世纪80年代为了对付滞胀，以英国撒切尔和美国里根为代表的政治团体掀起了一股私有化和减税风潮；而北欧却反其道而行之，反而加大了社会保障。经过20年的实践表明，北欧模式是成功的，而欧美模式是失败的。其他国家基本在这两种模式间摇摆不定，比如我国有人呼吁加强社会保障，有人主张减税，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 九、低生存成本社会相对于福利社会的优势

笔者认为福利社会相对于没有福利的社会是好的，是进步的。比如在北欧，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很少，像法国、英国、德国那样动辄出现罢工、示威游行等现象也较少出现，这些国家的治安比西欧国家要好得多，国家领导人大大

都清廉，几乎没有贪污现象，而且比较平民化，与普通大众一样上街购物，据有些媒体报道，瑞典首相上街都不带保镖。

当然，福利社会在实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了非常多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低工资、高物价问题。因为高税收必然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那就是高个人所得税导致工资很大一部分被交了税，比如在瑞典，工人每年12个月中，有相当于8个月时间是为政府税收工作。高企业税则直接推动了高物价。

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并不反对和排斥福利社会，也不是福利社会的替代方案，而是福利社会的补充方案。

低成本型社会主张从生活细微之处减轻民众的生存压力，而福利社会则是从大的方面减轻民众的负担，两种社会模式出发点不同，其效果也不同。福利社会相当于将一样东西送给你，而低生存成本社会则是打5折后卖给你，因此低生存成本社会不存在施舍的问题，也就从根本上不存在养懒汉的隐患。

### 低生存成本社会与传统福利社会的比较优势

以建设低生存成本社会为核心的“新福利社会”与“传统福利社会”比较，具有四大优势。首先，传统福利社会是行政化的，主要以公民的收入水平为考量，然后再根据收入的不同，进行行政性分配，这需要大量的人来操作。效率低，黑幕多，公平难保证，中国的保障房之所以广受质疑就在这里，而新福利社会是市场化的，不干预市场，而且主要靠市场的力量完成。

其次，传统福利社会存在一定的社会伦理缺陷，容易遭到富人的反对，而新福利社会根本不用参考公民的收入水平，不直接针对任何社会阶层，只根据商品的消费性质进行调节，因此对所有公民都是公平的，可以避免社会伦理问题，不会激起富人的反对，这也是新福利社会的第二个优点。

新福利社会还有第三个优点就是更着眼于未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福利社会越来越难以维持,因为社会越发展,人类需要购买的商品越多,福利保障越来越五花八门,而且即使这样,也不可能面面兼顾。政府也越来越疲于应付。而新福利社会则不存在这些问题,而随着社会发展,新福利社会会越来越容易实行,因为社会越发展,生存必需品所占的比重越低,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所占的比重越高,所以调节起来越来越容易,而且调节成本会越来越低。

新福利社会还有第四个优点,那就是公众受益更多、更直接、更细微。传统的福利社会,虽然称为“福利社会”,但主要存在于“生老病教”几个大方面,而对“衣食住行用”等直接关系生存的问题几乎没有照顾,而新福利社会完全相反,新福利社会主要是从“衣食住行用”等公民生活的细微之处,来降低生存成本,因此民众可以时刻受益。比如如果我们将粮食加工和流通环节以及小规模餐饮企业的税收全部免掉,那人们以后在外面吃饭,价格就可以降低一半,如果我们将一定标准之内的非豪华住房的有关税费全部免掉,房地产价格就可以降低一半,所以新福利社会的好处都是实实在在的,是所有人大部分时刻都能享受到的,因此也能得到更多的支持。

人类从前资本主义时代,走向“世界模式1.0”时代实现的是从“奴役社会”向“自由社会”的转变,而人类从“世界模式1.0”时代走向“世界模式2.0”时代实现的是从“风险社会”向“保障社会”的转变,而从“世界模式2.0”时代走向“世界模式3.0”时代,则是实现从“昂贵社会”向“便宜社会”的转变。

危机是一种世界模式进入“过去时”的标志,也是另一种世界模式即将成为“将来时”的先兆。人类发展到现在,模式更新已经是必然,我们相信市场,但又不能容忍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我们渴望福利社会,却又不想背负沉重

的税务负担，而要破解这一难题，就必须创新发展模式。同时大危机也就需要大变革。以市场化为基础的新福利社会形态，是继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模式，应该可以成为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出路所在，也是各中国管理者们构建幸福中国的重要参考。

但是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政府的推动，需要税收制度的改革。只要有政府、学术界和民众的一致认可，那推动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 十、为何称为新福利社会

中国需要优先考虑社会福利问题，而且也必须通过创新来解决福利问题。

福利经济学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福利经济学认为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因此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福利经济学要求富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也提出了累进所得税等调节社会贫富的政策主张。

但福利经济学的这些主张遭到了很多贵族经济学家的反对甚至是否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帕累托。帕累托提出了“帕累托最优”定理，即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才是最优的。通俗地讲，就是如果要增进穷人福利的同时，绝不能损害富人的利益。帕累托这一难题震慑住了福利经济学研究的推进，后来福利经济学便沿着帕累托的思路进行研究，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对既得利益者的补偿问题上，但事实上如果要既得利益群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又要补偿他们，从根本上就是矛盾的。举例来说，如果在对巴菲特进行征税的同时又对巴菲特进行补偿是不可能的。“帕累托最优”定理横空出

世后，其实福利经济学发展也就近乎停滞了，至今再也没有太大的发展。

但福利经济学与福利国家建设从来就是两码事，后者主要源于现实的需要，德国的俾斯麦最先在世界上建成社会保障型国家以及北欧成为福利国家的典范，几乎没受到福利经济学的任何影响，美国进行伟大社会建设也是如此，此后尽管福利经济学停滞了，但是欧美的福利国家建设却狂飙突进。

但福利社会理论也并非完全没有进展，比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哈佛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提出了“公共贫困”的概念。他痛斥美国人在进行大量奢靡浪费的同时却吝啬于拿出一部分资金改善社会公共服务，他这些批判也确实说到了美国人的痛处，也激起了强大的社会共鸣，随后美国便开始了以消灭贫困为代表的伟大国家建设，而美国总统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建设演讲稿也是请加尔布雷斯帮忙起草的。

20世纪80年代是保守主义的年代，欧美进入了削减福利的年代。而90年代则是反思的年代，9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是吉登斯的思想，他认为福利危机不光是钱的问题，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现代化程度越高，社会风险越大，政府在提供福利的同时要增加民众的抗风险能力，比如对待失业，不仅要提供失业补助，更要对失业者进行培训，吉登斯这一崭新思想立马得到了布莱尔、克林顿、施罗德一波领导人的赞同，并付诸实践。

而在中国，贫富分化也日益严重，2006年经济学家郎咸平提出“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前提不能是其他人更加贫困”，在当时也掀起一股旋风。郎咸平这一对帕累托定理的反向运用可以算是世界范围内对“帕累托最优”定理诞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反击。

21世纪前十年也是保守主义的十年，减税与社会福利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后，世界再次讨论这些问题，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提出“人才主义”其本质也是基于吉登斯的风险社会思想。世界首

富比尔·盖茨则主张通过国家的机制设计让资本主义也为穷人服务。

而笔者提出了新福利社会的概念，也就是低生存成本社会。低生存成本社会主张从降低民众生存成本的角度来改善民众的福利，是一种着眼于在不同消费方式之间进行平衡的分配方案。比如笔者将消费分为生存性消费、享受性消费和奢侈性消费三种，政府应该通过税收等手段提高奢侈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的成本，从而降低生存性消费的成本，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并不要求在不同人群之间进行财富分配，这样也就避免了福利经济学研究所经常遭遇的伦理困境，笔者这一理论也日益得到有识之士人的认可。

新福利社会所主张的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与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也有承接关系，吉登斯主张通过人才增强民众的抗风险能力，而笔者则主张通过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来降低社会风险，因为现代社会的风险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结为生存风险，如果民众的生存成本降低了，相应的社会风险也自然就降低了。

总之，福利社会是人类发展的趋势，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而创新这一模式才是正路。